



目 录

序	(1)
青年会改良中国社会的实践及其影响	韩玉霞(1)
天津青年会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刘海岩(35)
天津青年会的文化效应	杨大辛(51)
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文明在天津地区的传播	张 博(60)
从“非政府组织”视角看百十年来的天津青年会	王 昊(71)
天津青年会: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范例	冯志阳(82)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王建明(101)
天津青年会与西方文化的传入	张绍祖(116)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天津的平民教育	齐 君(134)
近代天津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	任云兰(144)
天津青年会与社会赈灾救济事业初探	王 军(156)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体育运动发展	王兆祥(168)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体育运动	崔景波(184)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	郭晓勇(198)
天津青年会二三十年代的体育活动	郭凤岐(217)
张伯苓:天津青年会活动家	梁吉生(221)
天津青年会会长雍剑秋略论	李 纳(235)
宋□卿与天津青年会	张继祖(251)



英敛之、《大公报》与天津青年会的关系述论

..... 侯杰、孔菁菁、秦方(263)

马千里与天津青年会 胡 伟(278)

从梅贻琦略述天津青年会对近代中国教育的贡献 李 钊(289)

早期天津青年会的总干事事略 刘桂芳(306)

附录一:回忆录 (333)

我对天津青年会的认识 乔维熊(333)

回忆天津联青社 杨肖彭(343)

怀念乔老 罗世龙、牛冰峰、崔胜、傅雁秋、祁铮娴(353)

忆肖彭 王宗舆(356)

体现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宗旨的两次赈济工作 郑汝铨(366)

难以忘却的纪念 张澜生(371)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独具风采 王仁风(373)

往事随忆 崔约翰(378)

我和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任永康(383)

我与青年会 卢稚宗(386)

难忘的五年 周乃森(388)

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点滴 焦承恪(391)

回忆三十年代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 王士斌(394)

青年会音乐专修科 马道允(395)

青年会广播电台 贾振中(396)

我与青年会的情缘 杨今豪(398)

举办助学讲座,为国育才 邸永生(401)

天津青年会——培养口琴人才的摇篮 邱景山(405)

YMCA 和燕京大学情缘 林 放(410)



附录二：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10 周年纪事(1895 ~ 2005)	
.....	(415)
后记	(537)



CONTENTS

Preface (3)

How the YMCA Changed Chinese Society: Practices and Influences
..... *HAN Yuxia*(1)

Establishment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ianjin YMCA
..... *LIU Haiyan*(35)

Cultural Effects of Tianjin YMCA *YANG Daxin*(51)

YMCA and the Diffus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ianjin Area
..... *ZHANG Bo*(60)

110 Years of Tianjin YMCA as a 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WANG Hao* (71)

Tianjin YMCA: A Model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 *FENG Zhiyang*(82)

Tianjin YMCA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WANG Jianming*(101)

Tianjin YMCA and Introduce of Western Culture
..... *ZHANG Shaozu*(116)

Tianjin YMCA and Education for Common People in Modern Tianjin
..... *QI Jun*(134)

Tianjin YMCA and Social Relief in Modern Times ... *REN Yunlan*(144)

Tianjin YMCA and Social Relief *WANG Jun*(156)

Tianjin YMC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



.....	<i>WANG Zhaoxiang</i> (168)
Tianjin YMCA and Modern Sports	<i>CUI Jinbo</i> (184)
Tianjin YMCA and Basketball in Modern Tianjin	<i>GUO Xiaoyong</i> (198)
Tianjin YMCA and Sports in the 1920 – 30s	<i>GUO Fengqi</i> (217)
Zhang Boling, An Activist of Tianjin YMCA	<i>LIANG Jisheng</i> (221)
About Yong Jianqiu, the President of Tianjin YMCA	<i>LI Na</i> (235)
Song Feiqing and Tianjin YMCA	<i>ZHANG Jizu</i> (251)
Ying Lianzhi, Takungpao and Tianjin YMCA in Perspective	<i>HOU Jie, KONG Jingjing, QIN Fang</i> (263)
Ma Qianli and Tianjin YMCA	<i>HU Wei</i> (278)
Tianjin YMCA'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Education: A Case of Mei Yiqi	<i>LI Zhao</i> (289)
Circulars From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ianjin YMCA	<i>LIU Guifang</i> (306)
Appendix I : Reminiscences	(323)
Tianjin YMCA In My Mind	<i>QIAO Weixiong</i> (333)
Recall of Y's Men of Tianjin YMCA	<i>YANG Xiuopeng</i> (343)
Recall of Mr Qiao Weixiong	
<i>Luo Shilong, Niu Bengfeng, CUI Sheng, FU Yanqiu, QI zhengxian</i> (353)	
Recall of Xiao Peng	<i>WANG Zongyu</i> (356)
Two Relieves Presented the Aim of Tianjin YMCA of China	<i>ZHENG Ruquan</i> (366)
An Unforgivable Memory	<i>ZHANG Lansheng</i> (371)
Unique Charm of Tianjing YMCA of China	<i>WANG Renfeng</i> (373)
Refreshing Past	<i>John CUI</i> (378)
My Life and Tianjin YMCA of China	<i>REN Yongkang</i> (383)



My Life and Tianjin YMCA	<i>LU Zhizong</i> (386)
The Five Years I Never Forget	<i>ZHOU Naisen</i> (388)
Activities of Tianjing YMCA of China in My Memory	<i>JIAO Chengke</i> (391)
Paris Road YMCA in French Concession in the 1930s Recalled	<i>WANG Shibin</i> (394)
YMCA Music School	<i>MA Daoyun</i> (395)
YMCA Radio Station	<i>JIA Zhenzhong</i> (396)
My Complex of YMCA	<i>YANG Jinhao</i> (398)
Train Qualified People for the Country by Sponsoring Lectures to Aid Students	<i>DI Yongsheng</i> (401)
Tianjin YMCA the Cradle for Talents of Harmonica	<i>Qiu Jingshan</i> (405)
My Complex of YMCA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i>LIN Fang</i> (410)
Appendix II : Events of Tianjin YMCA of China in 110 Years (1783 ~ 2005)	(415)
Postscript	(537)

青年会改良中国社会的实践及其影响*

韩玉霞

一、青年会概述

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YMCA),是基督新教的社会活动机构之一。1844年,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创立于伦敦。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许多城市青年由于工作生活条件的恶劣,以及休息娱乐的缺乏而深感苦闷和空虚。威廉斯邀集12位青年店员成立了一个以学习研讨圣经为主的宗教小团体,这就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最初,青年会以“追求基督教道德精神,避免城市青年的堕落”为宗旨,^①在青年职工中进行宗教和道德教育,开展一些娱乐活动。由于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教会的支持,这一组织迅速传遍了英伦三岛。1851年,青年会传入美国以后得到空前发展,增添了德智体群四育和为社会服务等新内容,成为一个广泛参与社会改良活动的宗教团体。1855年,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成立。188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成了“北美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 Sin USA and Canada),会址设于纽约。由于美国资产阶级的强大支持,北美协会很快发展成为

* 本文是作者的硕士论文,收入本书时作者有所删改。 编者。



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青年会组织，它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青年会在人事和经济上有往来，并在实质上取得了领导地位。

中国最早出现的青年会，是1876年以后在上海、汉口、香港等处由外国青年组成的。最早的中国人自己的青年会，是1885年先后成立于福州英华书院及北通州潞河书院的两个学校青年会。1890年举行的全国基督教会议通过了一个议案。联合商请北美协会选派干事来华，“根据美国青年会之经验，提倡同样之事业于中国”。^②是年4年，北美协会学生总干事魏夏德来华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考察。经过考察，魏氏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建立这一组织的需要和条件。1895年，北美协会应邀派遣来会理牧师来华开展青年会的工作。同年12月，他在天津的医学堂、北洋学堂、海军学堂等五所官立学校中建立了第一个校际青年会。^③1900年，北美干事路义思在上海为商界和职业界青年设立的青年会，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

1896年8月北美协会学生干事穆德^④来华，他和各地教会与学校频繁接触，“经其赞助鼓吹”，22个学校青年会迅速成立。10月穆德召集全国27个学校青年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会议，产生了青年会的全国性组织——中国基督教学熟幼徒会，来会理任总干事。1912年6月，青年会经北京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为合法的宗教组织。12月召开的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正式将青年会总部名称确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美国干事巴乐满任总干事。实际上，该会接受北美协会的领导，并成为它的分支机构。民国成立以后，青年会发展迅速，1922年达到鼎盛，会员达77,947人。自1922年开始，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青年会逐渐衰落，尤其是192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削减了对青年会的经济资助，严重影响了青年会的发展。30年代以后才渐有恢复。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教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⑤意



即要服务他人,而不是受他人服务。青年会的日常活动是以培养青年的德智体群四育为中心,使青年养成完美的人格,以服务于社会和建设完美的社会。所谓的“四育”,包含有如下的内容:德育就是用基督教的道德培养青年,提倡博爱、互动、牺牲和服务,使青年养成基督徒的人格。智育就是要对青年进行科学与知识的教育,启蒙青年的智慧和思想,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使其具有科学的头脑和服务社会的本领。体育是要使青年养成健康的体魄。青年会广泛提倡和开展活泼健康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游戏,以焕发青年的精神,增强他们的体质。群育就是要培养青年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使之养成利群尚公、互助合作的现代社会道德观念。青年会分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两大部分。全国协会由各市、校会联合召集之全国大会产生。全国协会下设三组八部,即市会组、校会组和宗教部、职工部、庶务部、体育部、智育部、干事部、学生部和书报部,市会和校会也是类似的机构。全国协会和市会都设有董事部(会)和干事部会两层机构实行立法与行政分立,董事会是青年会的立法与决策机关,董事有许多是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由董事会推举产生的干事会是青年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各部日常事务的进行。青年会除了由中国人担任干事以外,尚有一些外国干事,他们主要是北美协会派来的美国干事。

青年会的会员以青年为主体,但不只限于青年,十几岁的少年会员和中老年会员都有。会员的职业包括工商企业的经理、董事、职员、工人,学界的教师、学生,还有医生、律师、神职人员等等,有不少实业界巨头、官僚士绅、教授学者等社会名流也因赞同青年会的宗旨而加入青年会。青年会的会员不是永久性的,而是由定期(一年或半年)和责任会员两类征求得来。会员基本分为同宗会员(基督徒会员)和责任会员两类,前者在会内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青年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资本家的捐款,一般通过北美协会转交;一是国内募捐和会费收入;一是青年会的事业收入。大多数市会



一般都开办有旅馆、俱乐部、健身房、餐厅等行业，收入充作会费，以贯彻经济自养的原则。

二、青年会改良中国社会的理论

1. 顺应维新潮流，感化知识界

青年会传入中国的初期，正值维新运动逐渐高涨时期。传教士清楚地看到，要使青年会在中国有所作为和求得迅速发展，非得迎合这股新潮的趋势，感化和争取中国的文士与开明官绅不可。北京长老会的一个年轻宣教师魏兰博士在 1895 年写给来会理的信中说：“在年轻的文人中，现在似乎有一种赞成维新的运动，他们正在热烈企求知识上的指导……所以你若要感化中国的思想界，现在便是最好的机会。”^①来会理也认为，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如果能在这些思变求新的学生和士大夫阶层中开展青年会的工作，无异于在对新中国未来的领袖做“感化”的工作。穆德也认为，使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②青年会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中国的。

2. 新教强调社会福音

青年会的宗教使命是辅助教会传播上帝的福音，引导人们皈依上帝。尽管，它本身不是教会组织，但它在欧美就已成为一个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督教外围团体了。传入中国以后，它是近代资本主义新教神学理论为基础的，它也很快投入到改造社会、变法维新的时代潮流中。

青年会认为：基督徒只注意个人是不够的，还要关心个人以外的社会，要用博爱和牺牲精神，服务社会，将恶的社会改造为善的社会，



把上帝的福音推到社会中。青年会的思想领袖刘廷芳在论述青年会的思想时提出,主的福音是不能限于个人的,因为个人不能离群而独存。罪恶也不仅是个人的,也有社会的罪恶,道德也不是限于个人的,而是与社会的组织及现状密不可分的,因此,“不救社会,不能彻底救个人”。^⑩基督教的教义决定了青年会不能坐视社会的贫穷愚昧和罪恶横生,而是要将上帝的福音推广到社会中。这就是青年会进行社会改良的宗教动因。

3. 改良社会是资产阶级的时代要求

从戊戌维新开始,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先进分子,就开始自觉地发动全面的社会改良运动。而青年会以“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宗旨,这与资产阶级改良社会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其把人格的改造视为社会改造的根本,而不遗余力地提倡德智体群四育,以培养知识道德全面发展的新型国民。这一宗旨顺应了资产阶级发展新教育造就新国民的时代潮流,因此受到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青年会还把提倡四育上升到“人格救国”的高度,其涵义就是,“以德知体群四育来造就全国青年的人格;一方面即以有人格的人才,督促新社会的进步,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⑪青年会宣称自己唯一的使命和目的,就是辅助中国青年获得修养品性,研究学问,锻炼体魄的机会,做建造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翁。^⑫清朝末叶,长期处于封建专制淫威之下的中国人,作为立国精神的国魂大受摧残,弥漫于中国大地的则是种种愚昧怯弱的旧灵魂,“梦魇于官,词呶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糜于游,瘦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⑬梁启超明确指出,中国国民的品格有四大特点: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⑭青年会少年干事陆干臣指出,国民品格的堕落是桎梏中国富强进步的锁链,



“体质孱弱，志气颓唐，怠惰倖得和不守纪律，不负责任；这都是历年以来少年人的通病——亦是一般国人的通病，是中国积弱危亡的致命伤”¹³因此，他认为，“今后中国少年事业的动向，惟一的标准就是养成少年力事振拔，而起救亡图存的责任”。

4. 改造人格是改良社会的根本

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人心，青年会认为中国贫穷愚昧落后的根源是国民素质的低下和人格的堕落。因此，救国应从改造人格，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孙中山先生极为赞赏青年会改造人格的社会理想，他在1923年青年会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国的团体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会，所以青年会是造成好国家的好团体。”“青年会的宗旨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¹⁴他勉励青年会发扬“人格救国”的思想，组织更多的人才来改良社会，拯救中国。青年会宣称其宗旨是养成青年“四育具备的基督化的人格”。¹⁵使之成为具有资产阶级社会道德观念、现代科学知识和健康体魄的一代新国民。因此，一般社会人士都认为青年会“宗旨纯正，目标远大”。¹⁶甚至民国政府在1912年7月批准青年会立案时也表示，青年会“本神道之规模，作人伦之坊表，与政治相辅而行，深堪嘉许”。¹⁷

青年会总是将培养个人基督化的人格与尽己所能服务群众联成环。改造人格的目的仍是要改造社会——“以良好之社会性质代去世界之恶社会”。¹⁸在1895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内，围绕着改造人心和改造社会，青年会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良活动，如改良公民道德，传播科学知识，提倡体育和卫生，改良社会风气，开办劳工新村，开展农村服务等等，这些活动对当时人们思想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青年会开展的社会改良运动

(一)改良国民道德

道德是人格的基点,人格改造的关键在于道德的改良。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⑩1915年任全国协会总干事的王正廷就认为:“吾国道德哲学,素重私德之修持,疏于公德之养成,故私德完备者,往往较其他民族而无愧,而公德欠缺,则无可讳言,因之对于社会服务,国家效力,每少急公好义之风,公共事务进步多滞,恒受其弊。”^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发动了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的道德革命,他们提倡国民树立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去除公心薄私心重的弊端。青年会号召改良国民道德,使人们接受和养成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尤其是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公德观念,这与资产阶级道德革命的主旨是一致的。青年会推行的道德改良运动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通过宗教活动,向广大青年灌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宗教事工^⑫是青年会德育事业的核心。世界协会曾强调各国青年会的宗旨必须为:“率领青年及童子,切信耶稣基督为神圣的救主,贡献他们自己,专门从事于天国的扩张。”^⑬青年会的宗教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所有青年会(包括市会和校会),都组织有查经班、灵修会、祈祷会、退修会、晨更团、奋兴会等宗教小团体,吸收会员和会外青年参加,其活动内容主要是,研究基督教义,学习圣经,举行宗教演说和辩论。通过这些活动,青年会向青年宣传基督教的信仰,灌输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青年会教育青年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做事要忠实、廉洁、公正、勤俭,有情操、有爱心、有义气、有恒心,这包含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



德的两方面。宗教事业一向受到青年会的最大重视，“每周宗教会、查经班、社会服务工作，特别布道会等，均为各地市公之通常程序”。^②

青年会虽本身不是教会，但也经常举行或参与当地教会的布道活动。各地青年会每年春季都组织有“新春布道”活动，市会和校会都参加，其目的主要是面向社会宣传基督教。青年会还经常邀请牧师在青年会讲道，并以电影、幻灯吸引市民听讲，劝导人们皈依上帝，有时青年会还设立自己的布道处，并提供布道工作人员。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西方教会掀起的“海外布道”的热潮中，英美许多著名布道家来中国举行布道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基督教领袖、著名宗教活动家艾迪和穆德，他们二人曾多次来华。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由该市的青年会负责安排布道事宜。他们每次来华举行布道演讲，都有十几万青年听讲，影响极大。据称，“每处均有知名之士受洗归主”。^③甚至袁世凯、黎元洪等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曾听过他们的演讲。^④1914 年艾迪来华布道，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北京公立学校师生停课半天听艾迪布道。^⑤这些布道家的演说，在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因此而加入了青年会的查经班。^⑥北京青年会学生干事徐宝谦说道：“自穆德、艾迪两君大布道后，学界门户已洞开，人心向道犹若饥渴。”^⑦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亲教情绪。

青年会还非常注意利用报刊书籍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长期从事青年会报刊编辑工作的范丽海先生在谈到青年会文字事业时指出：“德育是四育之首，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所以，青年会的出版物，“以发明道德的书及道德的论说为最多”。^⑧在 1912 年以前青年会书报部出版的九十余种书籍中，有关宗教教义、道德修养和立身处世之道的书籍就占 70%，尽管到 1927 年时略微有所下降，但仍占 51%。^⑨青年会所提倡的道德改良是以灌输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为核心的，而



新教伦理本身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因此,青年会开展的道德教育传播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思想。

2. 利用演讲等多种大众宣传手段,向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道德演说之外,各市校青年会还经常举办种种题目和内容的时事报告、社会问题研讨等活动,帮助人们了解国家大事,关心社会问题,逐渐培养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周围的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公众道德演讲的对象包括会员和会外的广大学生及社会上的各阶层民众,主讲者也多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社会名人,这类经常举办、影响广泛的演讲活动,是青年会道德改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在学校和社会中开展公民教育运动。公民教育运动就是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制度下公民所需常识,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并使之懂得如何行使公民的权利,尽公民的义务,造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需的合格的公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在民间教育团体、社会人士以及政府教育的积极提倡和推行下,公民教育成为当时最为盛行的教育运动,公民教育提倡公民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目的也是为了根除中国人公德观念淡薄的积弊,因此,推行公民教育,也就成为青年会改良国民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

1924年春,广州青年会第一次试办公民教育,组织了公民研究团。次年,公民教育运动就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各地市会、校会也纷纷响应。青年会宣称公民教育的宗旨是,“养成公民观念及公民生活所必需之知识”。^③青年会开展公民教育,最突出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以幻灯、演讲、图表等新颖的方式开展公民教育。这些幻灯、图表的内容极为广泛,其中就有:中外人民教育程度比较表、人民不识字之痛苦情况表,外国公民爱国事迹图画、国旗、国歌、地图、公民教育图、公民唱本等。这些图片幻灯,很能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宣



传效果极好。

(2)编制千字课本,开展民众扫盲运动。青年会认为文化素质是公民资格的首要因素,并把公民的文化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青年会积极推行识字教育,成效显著。青年会编写制作的千字课本、幻灯图表等教材,普遍为其他教育团体推行公民教育、义务教育、补习教育所首选。

(3)在城市和农村广泛设立公民训练所、暑假服务团等机构,征集市民和农民进行公民常识的教育和训练。其所授课程包括政治、经济、民生等诸方面的常识,如民治权、宪法、政党、选举、纳税、银行、金融、农工运动;平均地权、财源分配;不平等条约及国际关系问题等等。

(4)编著公民教育书籍,促进运动的推广。据30年代初的统计,青年会已印行的公民教育书籍有:公民教育研究丛书20种、公民教育小丛刊18种、公民讲话20种、公民唱本16种、公民教育书12种。

(5)开展市政训练。市政是国家政治的一个缩影,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市政所涉及的选举、罢免等直接的民权,正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一个基础训练。青年会开展公民市政训练,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因此颇有声势。

青年会推进公民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举行公民教育运动会,联合各界作大规模宣传,在市民和学生中组织公民研究团、公民宣讲队、少年公民养成团等组织,举行公教演讲、公教征文、公民测验,组织国货展览,参观市政、法庭等,选举模范公民,散发公教传单,举行公教游行等。公民教育运动,是二三十年代青年会所开展的最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之一,对于养成公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传播科学文化,发达国民智育

青年会认为学问知识是共和国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他们指出:“何谓治国之能力,学问知识其最显者也……愚民而行愚政,不将成为愚国乎?”⁶²因此,要改造国民的人格,必须向国民灌输新知识。“有新的知识,才有新的思想,接受西学影响的具有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渴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用西学来改造中国”。⁶³

为了推行知识教育,全国协会和校会、市会都设有专门的部门——智育部。它提倡的智育事业也是以社会教育为主,面向广大民众,而不是学校的学生。青年会不无自豪地称自己是一种社会教育机关,并认为自己的全部工作都可称为教育事业。青年会进行的文化教育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智育演讲。智育演讲是青年会开展最普遍、最经常的智育活动,其听众从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上的民众,从贫民百姓到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影响范围极广,当时人们就把智育演讲作为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之一。智育演讲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讲解声光化电、天文、地理、工业制造术、环境保护等近代自然科学常识;介绍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宗教学、伦理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也宣讲防治疾病以及公共卫生学医学常识;阐述发展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等等。智育演讲的目的是向最大多数的人介绍和灌输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启蒙人们的头脑,开通民智,改变人民的愚昧无知状况。

在20世纪初,传教士就已开始在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中进行科学演讲。⁶⁴青年会传入中国以后,更把科学演讲推向了新阶段——听众的范围扩大,演讲的内容更丰富。1906年前后,天津青年会最早举行科学演讲和通俗演讲,听众“非常踊跃”,“更有官立学校校长,带了



他们的学生来听讲”。^⑤此后，各地的青年会普遍开展了科学演讲活动。

饶伯森(C. H. Robertson)对青年会的科学演讲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是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教授,1902年由北美协会派遣来华,1905年到天津青年会任职时就开始举办科学演讲,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1906年他调任全国协会从事科学普及工作。1911年他在全国协会成立了演讲部,领导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会推行科学演讲的计划。到1920年该部已扩大,下设科学、教育、卫生、水上保持、直观教育等几个组,雇用着相当多的职员。仅1920年,饶伯森率领的科学组就到过16个城市,对官员、教育家、学生、商会、同业公会等类听众讲演电话、电报、X光等电磁学、光学的知识,累计听讲人数多达116,400余人。这些演讲活动,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也加强了教会、青年会与知识分子、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系,并对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影响。据称,有的地方在听了青年会的演讲之后,便发起制定了教育计划和水上保持计划。^⑥

后来任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余日章,1913年在演讲部任智育科干事。余日章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教育的重要性,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和一些地方省长的注意,他们聘请余日章组织成立了训练教育演讲人才的训练班,使参与受训的数十人,能迅速到各地传播他们的思想。据说有25万人曾听了这些演说。^⑦青年会举行大规模的教育演讲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政府当局和社会上层,为建立一个正规、系统的教育体系而做出努力。青年会举办智育演讲,希望对社会上层施加影响,并能借助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权力,支持科学教育普及工作。这些演讲确实引起不少上层人物对青年会事业的兴趣,有的官员向青年会捐赠了大笔的款项,有些人受青年会的影响决心“归主”,信仰基督教,有的人则加入了青年会,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

青年会的智育演讲常常配以图表、仪器、幻灯、电影和实验,使问



趣易懂能引起听众的兴趣。由于这些通俗演讲既有教育价值,又有很好的娱乐活动,因而常常被各地青年会用作社会服务的教材,来吸引听众的参与。如1919年秋季,天津青年会智育部举办了52次演讲活动,累计听众达10,700余人。青年会还普遍开设图书室等场所,备有各种中外书籍供人们阅读、学习。青年会所办报刊,也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渠道,它们“以介绍新知识供青年会(员)阅读为宗旨”,最著名的刊物如《进步》、《青年进步》等,都辟有自然科学、文化学术专栏,登载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著和论文,成为向青年学生传播新科学知识、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2. 青年会还开办有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包括各种职业训练班)、补习学校和义务学校,进行学校和社会教育。

青年会主办的中学,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其教育程度与普通中学相当。这种学校,各地有条件的市会曾创办不少。其中设立最早的是天津青年会1901年在海关道唐绍仪的支持下,创办的一所中学,该校专门招收文人与士绅子弟,后与天津著名的铃铛阁中学合并。此后,各地市会也陆续办这种中学,到30年代初,已达20所。辛亥革命以后,新式学堂大批涌现,青年会感到自己不是一个教育机构,不应把大力气花在开办普通教育上。因而直到1924年,青年会中学也只有学生4,863人。^②青年会开始把普通中学课程逐渐改为商业教育,“以适应社会需要”。^③

各地青年会普遍开设有各种职业技术训练班和补习学校,为工商界青年商人和职员学习职业技能职务。青年会所办职业教育,多是采取夜校、半日校或训练班的形式,教授如外语、贸易学、广告学、摄影学、速记、簿记、打字、音乐等等多种内容。这类职业补习学校一般学期较短,专业性强,很能满足社会的急需,受到当时工商界青年职员的欢迎。然而,限于财力和组织的性质,青年会所办职业教育的规模是相当有限的(1924年统计,全国各青年会职业夜校的学生仅



6,625人),^⑤但是,它对于弥补当时教育的空缺,满足新式工商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同时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社会咸称其实用”。^⑥

设立贫民义务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是青年会在社会中开展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义务学校是一种类似慈善事业的教育,主要而向社会下层无力受教育的贫民,目的是给文盲和文化程度较低的成人提供一个扫盲和继续学习的机会。义务学校主要教授语文、算术和其他常识;儿童义务学校,除了教授文化知识外,还组织儿童游戏娱乐,培养他们守纪律和团体互助的意识。青年会还专门编写了“社会教育读本”,“专为各地青年会社会服务部通俗教育及补习学校、半夜学校之用”。义务学校及补习学校,是各地青年会坚持不断,开办最多的一种社会教育,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下层民众获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更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文化对于个人生活和国家强弱的重要意义。

3. 发起和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五四前后,受民主科学思想的启蒙,以及杜威来华讲学对平民主义教育大力宣传的影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迅速兴起了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平民教育的核心是废除贵族教育,使所有的人受教育,即教育的普及性、大众化。平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共和精神、人格健全的国民。平民教育由一种思潮演变成一场运动,是在青年会的推动下发生的。

青年会创办平民教育,是在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主持下开始的。晏阳初是一位留美学生,一战中曾在法国的华工青年会中工作,他们通过开设识字班、办华工周报等活动对华工进行文化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晏氏从中受到启发,立志要把这种识字教育推广到国内。1920年8月,他回国后就到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新设的平民教育部的工作。

1912年秋,晏阳初和傅若愚^⑦合作编写出版了四册《平民千字课



本》，之后，青年会选定长沙、烟台、杭州三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平民识字运动的实验。其办法：一是由该市青年会设立若干所平民学校，招收成年文盲学习《平民千字课本》，四个月毕业。实验结果，这三座城市平民学校学生共有5,200余人，经考试合格毕业者达70%，一般的学生也都达到了粗通文字的水平。^⑳青年会用“文盲的国家是一个衰弱的国家”^㉑这样的口号，进行平民教育的宣传。这三个市会都是联合当地各界人士共同推行识字教育的实验的，规模可观，成效显著，引起了国内教育界的注意，许多教育家提倡把这种平民普及教育推广到全国去。二是1923年3月，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4年夏成立总会，各省也相继成立分会。一时间，平民教育运动风起云涌，很快推广到全国。此后，平民教育运动的中心便由城市转入了农村。

晏阳初离开青年会以后，青年会仍继续开展平民教育。全国二百多个城市和学校青年会都设立了平民学校，京津沪汉等24个大城市的青年会举办过大规模的识字运动。据1926年的统计，各地青年会先后设办了5,815所平民学校，义务教员有3,853人，肄业学生达87,949人，实际毕业生45,385人，售出平民教育书籍75,000册，举办平民教育的经费达70,112.99元。^㉒据1935年统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达25万人。平民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从上面的数字上，我们可得知平民教育的不俗成绩。

与“平教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不同，青年会仍主要在城市中推行平民教育，其特点有二：（一）在识字教育之外，特别注意继续教育。青年会设立平民高级学校，教授历史、地理、算法、书信、卫生等课程，设立平民图书馆，供人阅读平民读物；组织平民同学会，联合平校毕业生为平民教育服务。（二）注重平教书籍的编辑。除了平民千字课以外，青年会还编写出版了平民历史、地理、卫生、常识等高级课本和专述推行平民教育方法的“平教小丛书”，这些书籍深受社会欢



迎,被很多社会团体、教育团体采用,作为开展社会教育的教材。^④

平民教育运动从 20 年代初兴起,前后持续了十几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青年会是这场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也是积极的推行者。青年会的机构遍设许多城市,也网络了大批青年学生,为推行平民教育提供了组织和人才的准备。青年会推行的平民教育,成绩最卓著的是识字教育。平民教育所信奉和追求的教育万能、教育救国的理想,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在当时中国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平民教育本身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关心社会问题,开展社会服务,进行社会改良

青年会非常关心社会问题,当时人们评价道:“无论其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于社会救济的,凡成为社会的问题,即每每为青年会的问题,每每由青年会发起一种组织,造成一种运动,以促成解决之。”^⑤社会服务工作,是青年会重要的事工之一,青年学生则是社会服务的主力。开展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的宣传,开办贫民义务学校、公共游戏等公益事业,都是青年会社会服务最通常的内容。

青年会进行社会改良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改善下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因此,对于社会的贫困问题,20 年代以后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劳资冲突和农村经济凋敝等重大社会问题,青年会都予以了极大的注意,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许多改良的实验。其中社会贫困问题的调查、劳工新村运动和农村改良服务,是辛亥革命以后到 30 年代初青年会开展的几项重要的“社会服务”,颇能代表青年会社会改良的思想。

1. 社会调查。余日章认为,欲改良社会,先调查社会恶势力,——明白而宣布之,使社会不知者知之,不详知者详知,则自提起其改良社会之心理矣。^⑥辛亥革命以后,西方社会学开始在中国迅速



传播,社会调查的方法也被引进国内。教会大学是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会学校的青年会,是最早组织学生从事社会调查的。1913年,北京青年会的学生(来自燕京大学等几所高校)成立了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北京社会实进会(Peking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Club),提出了“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的宗旨。^②1914—1915年间,该会对北京302名人力车夫进行了社会调查,内容有健康、娱乐、教育、宗教、中国历史等问题,这是我国社会学史上最早的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北京青年会也由此开展了为人力车夫提供主餐的服务活动。其他城市的青年会也开展了有关贫民生活的社会调查。这类活动使青年学生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唤起了他们改造社会的责任心。

2. 劳工新村。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也日益普通和发达,资本家对工人进行经济和超经济剥削,导致了工人生活的极端贫困和劳资关系的日益紧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也引起了青年会的关注。在如何解决劳资冲突问题上,青年会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它对工人阶级的贫困之状是深表同情的,出于一个宗教团体的慈善性质,它希望能够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青年会又是由资产阶级参加和扶持的社会团体,青年会必须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于是,青年会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劳资合作。1930年五一劳动节,青年会所办杂志《青年进步》特出了一期“劳工专号”,该刊主编范雨海在卷首语中阐明了青年会对劳工问题的态度。他认为劳资双方是不能偏废的。“吾国的五一节应当是劳资合作的五一节,而不是阶级战争的五一节”。^③资产阶级则要求青年会维护资本家的利益,1920年在青年会召开的一次征求企业界赞助的会议上,汉阳铁厂的经理就明确提出,“青年会的任务就是要使工人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能取代资方”。^④青年会提出的



具体解决办法,就是设立劳工新村,从改变工人居住条件入手逐渐改良劳工阶级的生活。

青年会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开始创办劳工新村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17 年上海青年会与沪江大学合作创立的“沪东公社”。一方面,青年会在这里对工人开展多种社会服务活动,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增加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丰富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在这里进行社会实习,作为一个教学实验场所。1926 年,上海青年会在浦东工人聚居区建立了“浦东新村”。本着简朴、卫生、实用的原则,青年会自筹款项修建了房舍数十间供工人家庭居住,帮助村民进行自治管理。新村采取了经济合作的方式,经费由政府 and 资方出或募捐而来,工人也交纳适当的房租。青年会在村中举办平民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组织文明的娱乐消遣,开展基督教宣传,其目的是要使工人“不但身心愉快,并能革除其旧有烟酒嫖等恶习”。^⑤经过几年的工作,新村中工人的素质和村中的社会风气得到极大的改善,村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赌博与迷信等活动渐绝,村友对村中公共事业的态度日渐积极,然而,这种耗费颇巨的新村,青年会无力普及,到 1935 年,劳工新村也只有浦东一处。其他城市的青年会也开展了改良工人生活的社会活动,天津青年会职工部还开设初、高级小学,招收工人子弟入校学习。

青年会举办劳工新村,企图在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前提下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缓和劳资冲突。当然这种改良是不可能彻底改变工人的贫困处境的,而且青年会也无力普及这一社会改良活动。因而劳工新村只具有示范的意义。

3. 农村服务。青年会是在城市中诞生和成长的,但是在 20 世纪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出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青年会也对农村问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当时,不同的阶级提出了不同的拯救农村危机、复兴农村的计划和办法。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实验,梁



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中国共产党则在南方数省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青年会不赞成土地革命，它主张通过知识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能力，从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青年会称自己在农村中的改良活动为“农村服务”。1928年，全国协会与苏州青年会合作，在苏州附近的唯亭山举办了青年会的第一个农村服务实验场，开展了如下四项工作：①改良农业方法，组织各种合作社，增强农民生产能力。②举行通俗演讲，开展识字教育，用知识武装农民。③提倡公共卫生运动，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④倡办公益事业，提倡爱乡精神，培养人们爱国崇公的道德观念。

不难看出，“农村服务”在内容和宗旨上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农村中推行的平民教育是基本一致的。经过几年的工作，唯亭山一带的农民从精神面貌、知识水平到生活状况以及社会风气，都有了一定的改善和进步。继唯亭实验之后，芜湖、香港、广州、重庆、济南、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的青年会，都依照唯亭的经验开展了农村服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青年会在农村中开展的改良活动，基本处于实验的阶段，而且影响的范围也相当有限，并没有像青年会所夸耀的那样，形成了一种改良主义运动。当然青年会也不会明白，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并不在于改善生产技术等枝枝节节的改良；而是使中国农民拥有土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才是彻底解放农民，振兴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

（四）革除社会积弊，提倡文明风尚

社会风尚是一定时期人们社会意识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着社会意识的更新变革。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新旧思想和势力急剧冲突更替的历史时期，愚昧、腐朽、颓废的社会风尚，已成为桎梏人们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青年会强调人与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认为：要造就善的灵魂，就必须要在善的社会中



才有可能,要养成完美的人格,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因此,青年会把革除社会的积弊陋习,维持良好的道德风尚,视为拯救青年灵魂的基本前提,并在移风易俗、改造社会风气上做出不遗余力地努力。归纳起来,青年会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反对吸毒(鸦片)、缠足、赌博、纳妾、嫖娼,提倡革除颓风陋习。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不去五经毒、鸦片毒,终无望治之一日”,^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也都明令取缔和禁止这些陋俗恶习。^③青年会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改良社会风尚的实践活动。青年会通过演讲活动和报刊书籍,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年要改掉烟酒嫖赌的恶习,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青年会还直接参加当地的社会改革运动,影响较大的有:1909年上海青年会参加该市的关闭烟馆的活动;1918年天津青年会联合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拒土会”,反对吸食鸦片,抗议政府所垄断的赌博场,迫使省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取缔了全省公共赌博场。这一拒赌运动,一时被人们视为改良社会的壮举。

青年会提倡改造人格,因此它要求会员首先要革除恶习,正己修身。各地青年会在会员内部都组织有各种道德修身的小团体,如同胞革心会、联谊会、正俗社、崇俭会等,这些小团体都规定不吸毒、不赌博、不纳妾嫖娼、勤俭节约等会规,要求会员遵守,使青年会会员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新风尚的典范。青年会举办科学演讲,有时也会对民间的一些狐仙鬼怪的迷信说法进行科学的解释和批判,^④破除人们的迷信思想,树立科学的观念。

2. 青年会提倡群育,组织社交和团体自学成才活动,引导人们接受文明开放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社会化城市生活的需要。群育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如举办联欢会、演讲会,组织聚餐、参观、旅游等等。各级青年会还专门设立群育部(科)负责开展群育工作。城市青年会还普遍开办俱乐部,组织各种小团体,如摄影社、演剧社、健身班、网球会、口琴会、文学社等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会员和会外



人士提供娱乐消遣和社交活动的机会和场所,这些活动向中国人引进了开放文明的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对于改良社会风尚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3. 提倡近代体育运动,开展民众卫生教育,以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改变人们萎靡衰弱的精神面貌,进而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青年会认为: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体育的不发达,完美的人格首先就要有强健的体魄。因此,青年会把提倡体育和卫生,视为一项最基本的事。各级青年会都设有体育部,负责体育和卫生工作的开展。

通过演讲、报刊和书籍,青年会向广大青年和民众广为介绍西方近代体育,宣传体育对于个人生活和国家强弱的重要意义。体育演讲是各青年会经常举行的活动,主要面向广大学生。青年会所办报刊,也多辟有体育专栏。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麦克乐还曾创办《体育季刊》杂志。青年会注重传播体育救国思想,号召人们热爱体育运动,把增强身体素质当作人格改造的一个方面。

除了宣传和提倡以外,青年会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开展体育活动上。各地青年会普遍设有体育场(馆)、健身房、游艺室、游泳池等体育设施,在旧中国体育事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青年会往往成为该地区体育运动的中心,成为体育事业最有力的提倡者和组织者。1918年,全国有8所市会拥有现代装备的体育馆,26个市会有体育场,4个有游泳池。该年使用这些体育设施的人次达224,197。各地青年会还普遍开设健身班,指导会员和会外群众进行身体锻炼,1917年统计的14所市会,就有130,890人次参加了6,516期健身班;1922年,各地青年会有725,062人次参加健身班。^⑤当然,参加健身班的基本是社会的中上阶层。青年会还组织有多种运动队,如网球会、武术班、篮球竞进会、体重班(减肥)、羽毛球队、足球队、棒球队等等,开展经常性的训练和比赛活动,颇受人们欢迎。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开展,



青年会还经常联合学校和一些教育团体、体育团体,举行各种体育比赛和运动会,往往在地方上造成很大的影响。青年会还特别为儿童开设公共游戏场,组织儿童进行活泼有趣的运动和游戏(尤其是团体游戏),培养他们的勇敢精神和团体互助的意识。青年会体育干事还为地方上的学校培训体育师资,目的是以近代体育刷新统一体育教学,改良小学体育运动游戏。^⑤据估计,青年会的体育工作可以直接影响到40%的会员,而会外则有数百万人受其影响。^⑥青年会传播和提倡西方近代体育,为促进中国近代体育的发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开展卫生教育,提倡公共卫生,是青年会改良人们生活习尚的又一重要内容。封建中国经济与科学文化的落后,造成了民众卫生健康水平严重落后,人们缺乏讲求卫生的习惯,“个人卫生既多忽视。公共卫生更无设施”。^⑦以致外国人称华人为“东亚病夫”,视中国为“流行疾病的泉源”。^⑧青年会认为,“强国基于强民,强民尤基于强身健康之保存”。^⑨健康的身体蕴育着健康的灵魂,要保全精神之强国,“必先力□健康”。

青年会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军队甚至大街小巷举办卫生演讲,对广大民众进行卫生教育。卫生演讲常以健康与救国的关系为题,唤起民众对卫生健康的重视。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全国人民爱国热情大增,“人民健康与国家强大的关系”一时间便成为青年会最主要的公众演讲题目,其他题目都被暂且搁置。^⑩宣讲卫生常识,如常见疾病、流行病、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种痘等免疫知识,紧急救护、饮食、育婴等日常生活中的卫生知识等等。全国协会演讲部专门设有卫生组,负责推进各地的卫生宣传工作,该组由学医的宣教师毕德辉领导。

青年会所办报刊杂志,卫生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如登载中外卫生状况比较的文章,以唤醒人们改变中国卫生落后状况的决



心。这些报刊还注重介绍病理知识和医学最新成果,供有相当知识的人们深入学习和了解。全国协会出版部还出版了不少关于当前卫生问题的小册子,作为卫生宣传的教材,很受欢迎。⁶⁶1915年前后,上海、长沙、湘潭、南京等市的青年会还分别举办了大规模的公众健康展览,在当地市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官员、士绅等上层人士的重视,并赢得了他们对青年会卫生工作的赞助和支持。为了更有力地在全国推动公众卫生教育,1916年,青年会联合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和全国医药学会,⁶⁷成立了“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仍由毕德辉领导。青年会联合其他教会团体和社会团体,为普及公众卫生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青年会还组织会员尤其是青年学生走上社会,进行广泛生动的卫生教育。如向市民发送卫生日历和传单等宣传品;发送苍蝇拍,开展灭蝇活动;举行急救表演;组织种痘和身体检查;在春夏之交疾病易发时节举行防疫活动;联合警察进行卫生巡视;打扫街道等等卫生活动。这些经常性的活动,使市民耳濡目染,促进了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了解到更多的卫生常识。

总之,青年会提倡体育运动,开展卫生教育,对于改变人民的精神风貌,改善民众的健康水平,创造一个卫生的公共环境,树立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四、青年会社会改良活动的特点及影响

在1895~1930年中国社会空前动荡激变的30余年中,在南到广州、北至哈尔滨,东起上海、西到成都的40余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都会城市,和荟萃着知识精英的二百多所大中学校中,青年会建立了它的市会和校会组织,⁶⁸发展了数万名会员,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之一。以改造青年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指导思想,青年会



发起和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良活动。青年会的思想不同程度地渗入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头脑中,青年会的活动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青年会开展的社会改良活动,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运动的一部分,是近代社会的进步潮流。戊戌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改革政治之外,他们还提出了振兴实业、发展科学、兴办教育、改良社会风俗等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造目标,力图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造。青年会认为,社会的改造首先是人的改造,是国民人格和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即要用资产阶级的人格标准来改造中国青年,造就一代新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青年会着重开展了改良国民道德,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改善社会风尚等几方面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和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历史责任感,对于启蒙民众的智力和思想,对于改变国民的精神风貌,树立文明的社会风尚,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学者、民主人士李公朴,在1935年曾评价道:“青年会的工作,提倡集体活动,注重德智体群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启发等等,这对于中国旧时代那种狭隘贫弱的社会生活说起来,它给了我们以一个更广大更丰富的生活领域,开辟了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一条广阔的道路。”^⑩青年会强调道德和人格的决定意义,充分体现了其宗教团体的思想特质,青年会提倡“四育”改造人格,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因此,受到了社会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

2. 青年会传入中国以后,在组织上和事工上迅速实现了“本色化”,即针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开展活动,而没有拘泥于欧美青年会的传统。青年会传入中国之始,就十分注意组织上的本色化,强调中国干事应该负起领导责任。青年会也十分注意培养训练中国干事,充实到干事队伍中,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华干事”(中国干事)的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1902年以后,“华干事”便超过了“西



干事”(外国干事)人数,1922年时,青年会共有550名华干事,103名西干事,到1935年,华西干事人数则分别为282人和14人,1912年以后,市会总干事一职“次第改请华人充任”。^{①7}1915年以后,全国协会总干事一职开始由华人担任。作为决策机构的董事会,最初就是华人占绝大多数。所以,相对于教会来说,中国人在青年会中拥有较大的领导权。在经济上,青年会也奉行自立的原则,不依赖外国的资助,地方市会也不依赖全国协会,如果地方市会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全国协会就不批准它有建会的资格。^{①8}人事上和经济上的自立、自主,成为青年会事工本色化的基础。

青年会宣称自己的使命是,“发展各种方式的活动,藉以适应青年与国家的随时代而变化的需要”,^{①9}青年会强调“研究吾国特殊之需要而以适宜的方法应付之”。^{②0}青年会最基本的事工——提倡“四育”,就是要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国民,担负起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的,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的。青年会举办科学演讲,设立学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以改变中国人愚昧无知的文化落后状况。同时青年会提倡社会公德和“服务社会”的精神,目的就是改变民心涣散、民德私贪的道德堕落的情况,提倡体育和卫生,以改变中国人精神怠惰、身体孱弱的“东亚病夫”之貌。这些改良活动,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的,为改造中国,促进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青年会也因此赢得了资产阶级和进步人士的欢迎。

3. 青年会开展社会改良活动,是以人的改造为中心,改造的方法则是实施教育,这是基督教社会思想的反映,也是教育万能思想的产物。基督教社会思想的核心是人格决定论,认为“只要人改变了,世界就可改变……好人会产生好的社会,坏人则反是”。^{②1}青年会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认为“一国之兴盛,必恃有人格之人物以为之”;“吾人当以人格之高尚为改良社会之模范”。^{②2}四育事业,本身即



教育手段,白不必说,青年会设办劳工新村,开展农村服务,其核心工作仍是通过宗教的、道德的、知识的、卫生的等方面教育,实现民众素质的自我改善。青年会以为,去除了人民贫愚弱私“四大病”,社会的改造即可水到渠成了。在这里青年会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愚昧贫穷、社会黑暗落后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阶级的剥削压迫,只有彻底推翻这一剥削制度和反动统治,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改造。

“教育救国”、“教育万能”,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教育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主张。曾任天津青年会董事和董事长二十余年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就认为:“有精神方有物质,欲造物质必先造精神,教育事业,强国之善股票。”^⑤1919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创办《新社会》杂志,其发刊词就明确提出,我们改造社会的方法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⑥青年会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青年会的干事多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他们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深信教育万能,教育可以救国。显然,这种理论是有缺陷的,这种理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们致力于用教育的手段提高国民素质,改造青年的人格,对于人们思想和文化的启蒙是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的。

4. 青年会是一个青年人的组织,它以中国的青年学生为主要的工作对象,青年会的思想和活动也在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青年会选择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作为传播基督教的突破口,它相信:“一个信从基督的中国学者,他所具有的感人的力量,比较寻常青年自能高出数倍。”^⑦青年会在知识阶层中开展宗教宣传,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青年会宣称自己的使命是“宣扬基督的福音,辅助基督的教会”。^⑧宗教事业一直受到青年会最大的重视。青年会所办的宗教小团体查经班,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学生。1920年,全国各市会参加查经班的学生人数达13,860人,各校



会达 10,561 人。^⑦一位牧师就曾讲，“他的教堂的教友最大来源就是青年会的查经班”。^⑧

青年会强调“用现代最新学说闡扬基督教义”，这非常有利于劝导知识分子接受和信仰基督教。燕京人学校长、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就曾讲道：“基督教青年会不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能及时满足年轻知识分子渴求学习西方知识和进步思想的欲望，为我的传教活动打开了路子。”^⑨基督教青年会甚至吸引了梁启超、李公朴、张伯苓这样的文化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入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督教扩大了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而青年会则从中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全国协会副总干事鲍乃德不无自豪地说：“在教育界对于宗教向来表示缄默的社会里，青年会却自始言所欲言，对宗教尽了忠心。”^⑩当然，促进知识界转变态度的因素并不只青年会一端，教会的本色化，传教士传播西学、提倡维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等等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思潮的涌入和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尤其是 1922 年以后知识界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开始离异，青年会在遭到这场运动的打击之后便逐渐衰落下来。

青年会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也向青年灌输“普爱和平”、“天下一家”、“联宗联种”等基督教博爱思想，这种宣传的消极影响就是模糊了一部分青年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磨灭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惯于利用教育和宗教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文化和思想的渗透，使这些社会精英在羡慕和接受美国的文明和道德标准的同时，产生亲美崇美的情绪。青年会在进行宗教“感化”之外，还注意向青年介绍和宣传美国文明，向青年灌输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博爱大同、文明同化的欺骗下，掩盖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可悲的侵略工具。法国的一家报纸就曾揭露说：“青年会与美孚油行是



美国侵华的两大利器。”

青年会提倡社会服务,号召青年树立造福人群、改造社会的责任心。青年会也确实集合了一批爱国青年,他们关心社会的改造,富于公心和牺牲精神,青年会的社会改良思想,也对他们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恽代英早年在武昌读书时,因经常参加青年会的各种活动而深受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青年会的演讲“颇多切中时弊”;宗教有缺点,也有优点,可以利用宗教的优点为社会服务。^{⑤1}在听过余日章和艾迪的演说之后,恽代英产生了一种认识,确信“社会之改良为短期间可能之事,苟能维持善良少年,扶掖可与为善良之少年,则其胜恶势力甚易”。^{⑤2}恽代英还在《青年进步》杂志上发表了《一国之善势力之养成》、《国行救国论》等文章,阐述他所接受的青年会的社会改良思想。张伯苓先生曾讲道,他的入教动机就是“期得宗教热忱,多为社会服务”。^{⑤3}他认为“中国新教育最要之目的,即为训练青年人以社会服务心”。^{⑤4}青年会提倡社会服务,对于广大青年学生树立利群尚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5. 青年会提倡人群的组织,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并以自身宗旨明确、组织严密、办法得当,为清末民初众多的社会团体树立了一种典范。当时就有人评价说,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把社会事业的意义,以及做社会事业的方法,介绍给国人”。^{⑤5}在封建时代,统治者“利于民散,忌于民和”,人民没有集会结社之自由,除去家庭和商行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人们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⑤6}在近代中国,人群组织的涣散,人民意志的消沉,已成为振兴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机的最大障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社会有组织而后有进步,国家有组织而后能自强”,中国人必须强化“合群”的意识。清末民初,在资产阶级和其他新兴社会阶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的人群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进步,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民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倡办各种社会事业了。青年



会提倡社会的组织和团结,积极参与社会改良活动,因此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在全国各处得到数万的会员热心参加和公众的经济资助”。^⑥成为一个蔚然可观的社会团体。

青年会网罗了大批青年学生,注重他们德智体群四育的培养,从而保证了分子整齐。青年会的组织非常严密,各级机构和各个部门的权限和分工极为明确,尤其是干事的职业化,更加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青年会还善于利用公众演讲、报刊书籍、电台广播、电影幻灯等近代化的大众宣传和组织手段,开展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推进社会的改良,它使人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近代科学文明的成果和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由于采用了新颖得力的手段,青年会的社会教育和宣传活动在广大民众中间产生了富有成效的影响。上述的各种优点,无疑加强了青年会社会改良活动的影响,同时,也使青年会成为当时众多的社会团体效仿的榜样。

注 释:

①天津市宗教志编辑室编:《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15页。

②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第1页。

③由于该青年会是几个学校联合组成的,故有些看法认为它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笔者认为,该会的成员全部来自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因此仍是校会性质。

④穆德(1865-1955)美国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创始人,长期担任青年会北美协会学生干事和总干事。1930年以前常来中国,在各地演讲。著有《东京的中国留学生》(1908年)一书。

⑤此话取自《圣约新约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5节。



⑥米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87 页。

⑦马泰士：《穆德传》，张仁章译，第 364 页，Mott to A. Conssett, 1909 年 11 月 7 日。

⑧刘廷芳：《青年会对于中国教会的贡献》，第 16—18 页。1935 年 11 月燕京大学出版。

⑨范前晦：“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34 页。

⑩路义思：“曹雪庚先生平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78 页。

⑪壮游：“国民新灵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72 页。

⑫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⑬陆翰臣：“青年会对于少年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53 页。

⑭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第 26 页。

⑮米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99 页。

⑯江恒源：“青年会五十周年感言”《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1 页。

⑰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第 45 页。

⑱南开学校青年会编印：《青年会要览》，第 1 页。

⑲袁访贵：《余日章传》，第 48 页，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 19 辑，第 13 页。

⑳王正廷：“青年会对于新中国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31 页。

㉑青年会称自己的各种活动为“事工”。

㉒《青年进步》1923 年 3 月，第 61 期，第 98 页。

㉓㉔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青年会五十周



周年纪念册》，第 199 页。

②⑤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 436 页。

②⑥陈学恂：《近代中国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3 页。

②⑦《民国八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报告》，第 4 页。

②⑧《青年进步》1917 年 5 月，第三册。

②⑨、③⑩范砾诒：“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39 页，第 38 页。

③⑪《青年进步》1924 年 3 月，第 71 册，第 98 页。

③⑫《进步》月刊，第 2 卷，第 10 册，1912 年 8 月。

③⑬范砾诒：“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39 页。

③⑭科学演讲基本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它是智育演讲的主要部分。

③⑮来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97 页。

③⑯《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790 页。

③⑰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 - 1926. By Shirley S. Garrett, 第 153 页。

③⑱⑲唐钺、朱经农、高觉敷：《教育大辞书》，第 97 页。

③⑲《中华归主》上册，第 98 页。

④⑰“孙哲先生勛词”，《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0 页。

④⑲傅若愚也是青年会的干事，在法国华工青年会工作时就是晏阳初的合作者，回国后二人同在青年会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晏氏离开青年会以后，傅若愚仍留下继续领导平教工作。

④⑳该数字乃计算得出，资料取自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见《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47 页。



④④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M., 1895 - 1925 By Shirley S. Gawett, 第 160 页。

④⑤ 唐钺、朱经农、高觉敷：《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第 98 页。

④⑥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48 页。

④⑦ 卢作孚：“青年会与社会”，《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4 页。

④⑧ 《恽代英日记》1918 年 5 月 8 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68 页。

④⑨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 页。

④⑩ 《青年进步》，1930 年 5 月，第 133 册，第 4 页。

④⑪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N., 1895 - 1926. By Shirley S. Gerrett. 第 170 页。

④⑫ 《根本的建设——工厂农村事业》，1928 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刊行，第 8 页。

④⑬ “五经”为“四书五经”的“五经”。引文出自可权《改良风俗论》，《东方杂志》，1904 年 10 月，第 1 卷，第 8 册。

④⑭ 1902 年，清政府颁布谕禁止缠足；1906 年，又下诏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结果显然是禁而不止。

④⑮ 《天津青年报》1920 年 7 月，第 93 册。

④⑯、④⑰ 郝更生：《中国体育概论》(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第 212 - 214、215 页。

④⑱ 《民国八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报告》，第 13 页。

④⑲ 王正廷：“青年会对于新中国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30 页。

④⑳ 《中华归主》下册，第 977 页。

④㉑ 天翼：“保存国民健康论”，《进步》月刊，1912 年 6 月，第 2 卷第



8册。

⑥2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 1895 - 1926 By Shirleys Gawett, 第148页。

⑥3《中华归主》中册,第788页。

⑥4这两个学会都属于基督教会差会系统。

⑥5东京的华侨青年会及香港青年会,这一时期亦属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这二百多所大、中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和官立学校。

⑥6李公朴:“青年会复兴的途径”,《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9页。

⑥7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97页。

⑥8刘廷芳:《青年会对于中国教会的贡献》(《真理与生命小丛书》第四种),第8页。

⑥9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15页。

⑦0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史略》,第10页。

⑦1龙冠海、张永汉:《社会思想史》,三民书局1979年版(台),第115页。

⑦2《青年进步》1917年3月,第一册。

⑦3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⑦4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43页。

⑦5米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载《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78页。

⑦6张仕章:“青年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载《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54页。

⑦7《中华归主》中册,第787页,第792页。

⑦8《中华归主》中册,第788页。

⑦9《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38页。



⑩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14 页。

⑪《恽代英日记》，第 180 页。

⑫《恽代英日记》，第 369 页。

⑬⑭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第 70 页。

⑮章元善：“光荣的既往伟大的未来”，《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4 页。

⑯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6 页。

⑰鲍乃德：“中国青年会之史的演进”，《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14 页。

（作者单位：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青年会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刘海岩

距今 110 年以前,也就是 1895 年 11 月 2 日,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派遣,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偕夫人从美国来华,在天津租界紫竹林码头登岸。前来迎接他的是他的妻兄、保定传教士米勒尔牧师(Rev. J. Albert Miller)。来会理的到来,开始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和天津青年会的早期历史。

本文所谈的天津青年会的早期历史,是从 1895 年起,截止到 1914 年青年会东马路新会址建成以前这一时期。这段时期,又可以 1900 年为界,分作两个阶段。

在近代历史上,天津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总部的所在地,也是青年会组织和活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但是,对青年会在天津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状况,以往的研究却非常缺乏,这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环境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资料的严重缺乏。本文主要依据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①中搜集到的资料,对天津青年会的早期历史略加探讨,希望能引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一

尽管基督教青年会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传入中国,1876 年



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组织，^②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和通州潞河书院先后成立了学校青年会，但是，这一时期的上海青年会，主要还是为在沪外国人服务的组织，而福州和通州的青年会都设在公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中。青年会还没有全国性的组织。

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上，正式向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提出，请他们派专人来华从事全国性的青年会组织工作。来会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来会理1870年出生于宁波，父亲是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士。他的幼年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1881年，他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大学(Wooster University)预科学习。1891年，他在该学校毕业后，入芝加哥麦考密克神学院(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在他读大学期间，正是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迅速发展的时期，他加入了青年会组织，并担任学校青年会的主席。在神学院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海外志愿运动”，并担任该组织的干事。1895年9月，他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第一任中国干事，被委派到中国，组织在华基督教青年会。^③

当来会理来到中国的时候，北美协会对他在什么地方开始工作，以及如何建立青年会组织，没有任何计划和限制，全权由他决定。在他来中国之前，青年会已经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汉口和烟台等地基督教传教士分别发出的邀请，希望派人到他们那里建立青年会组织。到了上海以后，来会理又接到了来自天津的邀请函。

在上海，来会理曾经与在华外国传教士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他发现，这些传教士对青年会工作的性质和组织方式，存在很多意见分歧，有的主张青年会应当注重通商口岸城市中外国青年人的需要，有的则觉得应当集中关注外国洋行中能讲英语的中国人，还有的则认为，应当把教会学校中的学生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来会理则认为，按照青年会的宗旨，应当把组织工作的重点放



在学校的学生方面。

最初,他把首先开展工作的城市选定在北京。但是,当他到达天津并了解到天津的情况之后,马上决定首先在天津开始工作。在他抵达天津六天后写给北美协会干事的信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决定。

他在信中对天津和北京的情况作了比较。他谈道,北京是最早正式请求北美协会委派干事的中国城市,而且,北京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是能产生重大影响力的中心,凡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多少都会打上权威的印记。特别是在中国年轻的“文人”中间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整个庞大的教育体系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但是,他认为,马上到完全处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中的“文人”中间直接进行工作是没有希望的。加上他刚到中国,还不会讲中文,语言的障碍更使他无法在北京工作。

在这一年,北京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千名“举子”签名要求变法图强。来会理刚到天津,也收到了北京长老会怀礼(Wherry)的信,告诉他:“最近,在年轻的文人当中,似乎有一种赞成改革的趋向。他们在真诚地寻求知识上的引导。许多翰林(原文如此)是主要的参加者,他们在试图说服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创办了一个双月刊,倡导西方文明。你要感化中国的思想界,这或许是最好的机会。贵会特别是你本人,也许能利用这个机会达到好的结果”。^④但是,来会理仍然认为不能把北京确定为开始工作的地点,因为当时的改革还处在初始的无组织状态。

相比较之下,来会理认为天津更适合马上开展组织青年会的工作。一是天津对青年会发出的邀请更迫切和热情,当地的教会组织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邀请来会理到天津。二是当时天津已经建有几所官办高等学堂,即医学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电报学堂以及刚刚成立的北洋大学堂,还有设在机器局内的学堂。这些学堂都设有英文课程。按照来会理的看法,这些高等学堂中,起码有五百多名学



生能讲程度不同的英文,尤其是医学堂和北洋大学堂的学生,相当一部分人的英文水平较高,这些无疑使他可以马上直接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他宣称,北京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而天津则是近代教育的中心。

当时,在医学堂任教的美国教授安德培博士(Dr. Atterbury)已经在学生中组织了文学会,并颇得学生的信任。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不论是演讲还是讨论,都使用英文。安德培又在医学堂的学生中组织了“勉励会”(Mutual Improvement Club),他本人还提供资助,为勉励会租用了一处活动场所。安德培也与北洋大学堂的总教习丁家立是亲密的朋友,可以为来会理在北洋大学堂的活动提供一条途径。这些实际上为来会理创办青年会提供了基础。

1895年12月1日,勉励会开会欢迎来会理。来会理在会上的演讲宣传青年会的宗旨是青年人的团体,目的是在德智体群四个方面援助青年。同月8日,召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共有70名学生,65人宣布加入青年会,其中有19人签名为同宗会员,46人签名为同志会员。当时,青年会的中文名称为“天津学塾幼徒会”。

青年会成立之初,主要的活动是每周一次的查经班,用英文宣讲圣经,然后会员们用英文讨论,锻炼英语的表达能力。

同时,青年会也组织体育活动,尤其是篮球。这也许是篮球最早在天津的华人社会中出现。据记载,当时这些高等学堂的学生们,平口举止拘谨,青年会的篮球运动使他们暂时放下了书生的尊严,恢复了年轻人的活泼本性。为了打篮球,他们修短长长的指甲,脱掉长袍,盘起发辮。

1896年,青年会募得捐银585两,在靠近北洋大学堂的英租界大营门购置地基一块。同年4月,美国克里夫兰的富商泰勒尔夫人访问天津,当即捐赠美金1万元用于建造会所。1897年6月,天津青年会的第一幢会所建成。^⑥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的建立,北美协会也开始把中国作为他们工作的重点。1896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穆德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并到各地巡游,发表演讲。他访问了天津并发表了演讲,后在上海召开了由29个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会议正式组成全国性的青年会组织,来会理任总干事,总部设在天津。会议决定“编印适当书报以促进学生宗教生活”。1897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第一份刊物《学塾月报》(Chinese Inercollegian)在天津创刊。该刊每月刊发一期,包括中文和英文。主要内容宣讲教义,圣经课占了很大的部分,此外是介绍各国青年会的情况、各地传教的情况,以及少量的《各会新闻》。

1898年4月,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格林(Robert R. Cailley)抵达天津,担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来会理辞去天津青年会干事的职务,专任中国青年会总干事。

尽管青年会才成立了几年,但是19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天津青年会由于有较好的学校环境,发展比较快。他们不仅成立了组织,而且建起了活动的会所,办起了刊物。这一时期,青年会的会员大都是学堂的学生。尽管来会理也企图在天津年轻的商人中开展工作,但是最终也没有多少商界中人加入。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以及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完全改变了青年会的发展进程。

二

庚子事变之后,作为青年会会员主要来源的几所高等学堂,都在战乱中解散。虽然1902年北洋大学恢复,却已经搬迁到老城区以北的西沽。建在大沽路上的会所,由于原在附近的高等学堂已经不复



存在,也无法接近城市其他年轻人,因而青年会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继续组织活动。

这一时期,青年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租界地区转向老城区,从1900年以前的高等学堂中的学生,转向老城区的社会中上层以及他们的子弟。为了在老城区谋求发展,青年会促进更多的华人成员担任干事,同时在老城区创办学堂,以便能通过办学堂,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加青年会的活动。^⑩

基督教青年会一般的工作方式,是在各类学校中建立青年会组织,或者举办夜校,只有少数地方有青年会自己正式创办的全日制学校。在这方面,天津是一个典型。1901年,格林联合天津的士绅在铃铛阁创设了普通中学堂。^⑪这所学堂建立之初,便有学生将近百名,^⑫是天津创办最早的新式中学堂。青年会创办这所学堂的目的,一方面是有利于在青年人中开展工作,当时格林本人每周日上午都要在学堂开设讲经班;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大多来自社会中上层的青年学生,使得青年会有机会与天津的“文人”阶层相识和打交道,^⑬显然这对他们能在老城区立足和谋求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格林认为,办教育是打开中国大门的“法宝”(open sesame)。^⑭开办普通学堂,使青年会有了与士绅等社会上层打交道的机会。普通学堂开办的最初两年,青年会是与天津士绅合作。1903年,由于地方政府需要铃铛阁开办官立学堂,普通学堂迁至仓廩街“城厢会所”旁。天津地方官员为普通学堂出资,支付校舍的租金,以及装修校舍、购置学堂必要设备所需的费用。^⑮1904年9月,普通学堂再次迁至经司胡同。1905年春季,青年会普通学堂在直隶省学务处登记立案,批准与官立中学堂同等出身。^⑯“天津青年会自庚子后,即设有普通学堂,尔时天津除北洋大学堂外,惟此校设立最早,为本埠青年求西学之滥觞。……承直隶学务处予以立案,毕业奖励得与官立中学同其出身”。^⑰1909年,普通学堂举行毕业礼式,前直隶总督杨士骧位



会演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亲自颁发文凭。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推行新政,天津开新式教育之先河的时候,兴办新式学堂成为潮流,青年会的普通学堂不仅因为创办在先而广受赞赏,也成为新学堂模仿的一个模式,不仅在天津,在一些边远的城镇也知道天津青年会的普通学堂。普通学堂的学生,有很多都升入天津和北京的官办高等学堂。^⑭地方官员在私下谈话和公开讲话中,也一再赞扬青年会是天津新教育的先驱者。^⑮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天津兴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青年会与教育新政的先行者们的来往逐渐密切起来。1905年9月,严修第一次到青年会听取大主教关于“基督教与教育”的演讲。^⑯同时,他也聘请青年会的外国教师到他创办的南开学堂去任教。

另外,随着各级官立和私立学堂的不断建立,他们都需要教授英语或其他新型课程的教师,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外国干事和教师们,成为受欢迎的师资,他们也得以有机会积极到各学堂任教。

1905年,韩慕儒(R. M. Hersey)应邀到南开学校任教,讲授英语和地理。1907年到达天津的崔伯(P. B. Tripp)当年就去中国学堂教书,1909年又在官立中学堂和第一私立中学堂同时任教。女青年会布朗夫人(Mrs. Brown)在河北女子师范学堂和天津女子高等学堂(Tientsin Women's College)任教。郝瑞满(R. S. Hall)一边担任青年会的工作,一边也在官立中学堂任教。负责管理普通学堂的海士(L. Newton Hayes),除了在学堂中任课之外,还应聘到天津商会总理王竹林家中,担任王的儿子的家庭教师。^⑰

这一时期担任天津青年会外国总干事的格林认为,中国复兴的最重要因素是教育,青年会能够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福音就是能够联合并影响新式教育的领导人。他们希望通过办学堂,能够与城市社会上层建立联系,与官方沟通,使青年会与老城区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利于青年会的发展。



20世纪初,正值北洋新政时期,兴办新式教育使得青年会与天津地方官员、社会上层有了建立良好关系的契机。在提交给美国总部的报告中,格林一直强调兴办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这一途径,与天津的“文人”(literati)阶层打交道,从而能够与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阶层建立联系,这是发展青年会事业的最佳途径。这里的“文人”并非单指新型知识阶层,而同时也包括传统的士绅阶层,以及官僚阶层。

然而,很难想象那些一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熏陶的传统“文人”阶层,会很快接受基督教文化。1903年,大约有四十多名天津地方官员和商人为青年会提供了捐助。^⑬青年会一面认为他们的工作发挥了效果,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这些捐助者并非是对基督教感兴趣,而是对青年会在教育方面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有益的影响表示赞成和支持而已。这一时期,天津青年会把在“文人”阶层中开展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各城市青年会中,天津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⑭为了在“文人”阶层开展工作,青年会聘请了有功名的仲伟仪担任华干事。

青年会长期的“文人”工作,使得他们与天津社会上层之间逐渐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每当普通学堂学生毕业,天津的地方官员和士绅们都要出席毕业典礼,并亲自颁发毕业证书。一些新型的“文人”,主要是新式学堂中的教师,也经常到青年会的会所参与各种活动。他们还成立了社会俱乐部。

1908年,南开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并成为青年会的华人领导人。在天津青年会的报告中,这件事被认为是青年会最大的成功。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尽管现在还无法找到资料说明他19世纪在水师学堂就学期间与青年会的关系,但是有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期,他就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并与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保持



着良好的关系。在青年会的长期影响下,张于1908年受洗加入基督教。在天津已经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资格公理会传教士斯坦利(Rev. C. A. Stanley),在新建成的公理会教堂为张伯苓主持了洗礼。^②1909年,张伯苓被选为青年会董事会的主席。^③此后多年间,张伯苓一直在青年会的董事会任职。

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在天津的社会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了青年会与华人社会上层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为青年会购置新会址土地提供资助的华商,声称他们提供资助,就是因为看到张伯苓参加青年会,因此认定青年会做了好事,会大大有益于城里的年轻人。^④

青年会全国总干事来会理在后来评价张伯苓对早期青年会的影响时认为,张伯苓帮助青年会摆脱了固守美国有关教育性质和范畴的传统思维;他在政治问题方面对青年会发挥了长期而有益的影响;他清醒地看到并不断强调,青年会是实用基督教的诠释者;他是基督教力量与非基督教力量之间联合促进个人和社会道德福祉的中介人;他清醒地看到宗教宗派主义的危险性,主张用中国的思想和实践表达的基督教组织形式;他还倡导由中国人自己领导的独立教会组织。^⑤

三

与创办学堂、促进近代教育发展相关的,是青年会在促进现代体育运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现代体育是伴随着19世纪欧美人的到来传入天津的。从19世纪60年代天津开埠之初,天津便出现了台球。更注重娱乐的赛马运动,不久也在租界出现。到90年代,网球已经成为在租界外国人中非常流行的、时尚的运动。1895年,天津的第一座运动场在英租界



建成。^②足球、篮球运动也开始出现。

然而,华人社会接受和参与体育运动却是较晚的事。19世纪90年代后期,青年会会员中的篮球运动,当是现代体育运动在华人社会中最早的出现。20世纪初,天津青年会在促进新式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体育运动的倡导和推广。

按照青年会“德智体群”的宗旨,提倡和推进体育运动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在清代的中国,理解体育锻炼的价值,参加体育运动,比提倡新式教育要困难得多。青年会在普通学堂和其他学堂,以及社会组织活动中,引进足球、篮球、网球以及田径等,^③通过体育的娱乐性,吸引青年人的参与。

为此,他们从美国委派专任体育干事到天津,在普通学堂,以及北洋大学、官立医学堂、官立中学堂和私立中学堂充任专门的体育教练,并组织教练班,培训专职体育干事。1908年到达天津的胡博德(H. W. Hubbard),除了担任青年会体育总教习,同时还在天津的三所官立学堂担任专门体育教练。他的到来,使得青年会可以在不同地方设置常规的体育训练项目。与此同时,青年会还在各学校之间建立校际联盟,联合举办运动会。

1902年,天津青年会首次联合北洋大学堂等,试办田径运动会。由于青年会一直注重在学堂中倡导体育运动,因此首次运动会取得了成功,是当时国内办得最好的。^④以后,这种由青年会组织,各学堂联合参加的运动会每年举办一次。1905年10月,青年会租用电车公司旁的空地,设置操场,举办运动会,有官立、私立和教会等各类学校共20多所的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将近2000人观看了比赛,其中有地方的主要官员以及商界名流。运动会还向一些公司募集赞助,向优胜者颁发奖金。^⑤青年会的普通学堂获得了优胜锦标。

到1909年,这种运动会更加正规化,组织更完善,比赛更准时和有秩序,观看比赛的人更多。这一年,青年会联合各学校举办第九届



运动会,保定和通州学堂的学生也到天津参加比赛。^②一共有7000人观看了比赛。^③

从1904年到1909年,这种运动会一共举办了6次,锦标5次为青年会普通学堂所获得。1911年4月青年会与学界联合举办的运动会,由青年会的毕辅安充任运动会的总教习,到场观看运动会者达15000余人。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国青年会成为最主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天津青年会组织的运动队在这次运动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青年会不仅把体育作为强健身体、娱乐生活的运动引进了天津,同时他们也宣扬现代体育精神,尤其是对学校中的学生。比如,在公开比赛中的公平竞赛原则和诚实精神,在比赛中无论有奖金与否都要“拼到底”等等。^④

此外,青年会还致力于在青年学生中普及近代科学知识。1902年12月,擅长宣讲科学知识的美国干事饶伯森(C. H. Robertson)来华。是时恰值江南乡试,饶氏首先向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演讲科学,然后来天津担任干事。他经常为学生发表演讲,演示科学,极受年轻人的欢迎。1905年,青年会还开设了小型博物馆,制作和展出鸟类标本、模型、图表、地球仪以及地图等等。饶伯森还自制设备,进行有关电等方面的物理演示实验,向青年学生宣传现代科学。^⑤

此外,青年会还开办演讲会,鼓励青年学生用英文发表演讲和自由交谈。同时,他们还通过品尝和讲授西餐的做法,向青年人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

四

作为一个需要开展各种宗教和“世俗化”活动的宗教团体,基督教青年会非常注重会所的建设。



在 19 世纪,天津青年会只在英租界设有会所。该会所选址在大沽路大营门一带,是因为靠近北洋大学堂以及其他高等学堂。庚子以后,这些学堂已经不复存在,青年会在租界地区的活动重点转到法租界,因此他们决定把租界会所从英租界迁到法租界。1905 年 11 月,经过资助者泰勒尔夫人的同意,青年会将英租界会所的建筑出售,用所售款项在法租界巴黎道购置楼房两所,一为会所,一为外国干事住宅。

1901 年,青年会成立了“城厢分会”。1903 年 2 月,青年会在仓廩街建立城厢会所。1904 年 9 月,城厢会所迁至经司胡同,门上张贴匾额,上书“志学会社”。至此,直至 1914 年东马路新会址落成,青年会才再次迁址。

另外,从基督教青年会的中文名称的演变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该组织演变的轨迹。19 世纪青年会创办初期,该组织的中文名称为“学塾幼徒会”。1902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作出决议,把中文名称中的“学塾”二字取消,意味着青年会的工作宗旨由只限于学校的学生,扩展到社会各界的青年,相应的“幼徒会”也改称“青年会”。在天津,早在这次大会尚未召开之前,已经开始试办城市青年会。

1902 年,天津青年会开始创办《天津青年会报》(Tientsin Young Men),该报为周刊。《天津青年会报》与 1900 年以前的《学塾月报》不同,《学塾月报》以宣讲基督教义为主要内容,《天津青年会报》则改变为以知识性内容为主,介绍科学知识、外国地理、风俗等等。在 1900 年以前,青年会也曾经用油印的方法,印发以会议和演讲通知为主要内容的简报,现在则改为中英文的周报,内容除了通知青年会的工作之外,有相当部分是向年轻人灌输各种知识和信息。最初,《天津青年会报》每期印 250 份,免费发给所有青年会的会员。1906 年,《天津青年会报》中文改称《星期报》,并注明为“天津东门内志学会社即青



年会刊发”。《星期报》第一期说明改名的缘山：

“本会社自出报以来三载于兹矣，初名《天津青年会报》，客岁更名‘星期’，……辅助青年之德育、智育、体育，与上海香港之青年会报异曲同工。之所以更名星期者，缘每星期出报一次”。^①

1911年以后，《星期报》再次改称《青年报》。

青年会在华发展的历史，表现了从19世纪开始的基督教传教的“世俗化”趋向。青年会的领导人和外国干事，人都是投身“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的刚刚毕业的美国大学生。他们年轻、热情，独立思考并勇于探索。他们批评老一代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强调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改革。他们并不认为必须用基督教拯救个人灵魂，而更主张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们提出“福音化就是文明开化”，无论治病还是办学都是传播福音信息的中介，通过这些中介提高非基督教国家的人们的地位是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②这一解释使传教活动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布道活动，文化教育等改造社会的活动也成为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③

基督教青年会的在华创建以及早期发展，正是在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迅速崛起时出现的。青年会在中国城市中的早期发展，也恰值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改革时期，青年会“世俗化”的传教政策和方式，与中国城市社会改革的结合，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天津青年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注 释：

①该档案馆的英文名称为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所藏为基督教青年会美国总部的档案。这批档案最初一直保存在纽约青年会总部，后转移到青年会办的一所大学，但一直缺乏管理。20世纪60年代，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档案的保管权。由 Kautz Family 提供资



助,将全部档案作了技术处理。2004年,该图书馆专门对该档案中有关中国部分做了编目。

②弗宙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调查报告书》,第50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③“D. Willard Lyon”, Biographical Records, Box132, YMCA Archives.

④Letter to Richard C. Morse, by D. Willard Lyon, November 8, 1895.

⑤Tientsin YMCA trustees minute book, 1896 - 1907, Box Y - 28 - 54 YMCA Archives.

⑥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1 - 1902,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⑦英文名称,先称 Anglo - Chinese School,后称 Putong School。

⑧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1 - 1902,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⑨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1 - 1902,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⑩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5,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⑪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3,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⑫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5,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业学校》,民国四年。

⑭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5,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⑮同⑭

⑯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5,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⑰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⑱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3,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⑲ Report for Year 1903, by Willard Lyon, YMCA Archives Box Y - 5 - 43.

⑳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㉑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㉒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㉓ The letter to Dr. Bennet, by D. Willard Lyon, Jun 2, 1946.

㉔ 英文为 Recreation Ground, 即今新华路体育场。

㉕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3,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㉖ Willard Lyon,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the YMCA in China.

㉗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5,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㉘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㉙ Report of R. M. Hers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㉚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9,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2.

㉛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5,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YMCA Archives Box Y - 24 - 50.

㉜ 《星期报弁言》,《星期报》1906年2月17日。

㉝ Clifton J. Phil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s, 1886 - 192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95)

④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青年会的文化效应

杨大辛

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系国际性的宗教团体,1884年首先出现于英国伦敦。创始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商人,他感到当时许多英国青年在产业革命大潮的冲击下精神状态低迷困惑,遂发起组织类似教会查经班的小团体,取名“青年会”,定期进行宗教灵修与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藉以排遣消极悲观情绪,坚定基督教道德信念。这一活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统治层的赞同与支持,于是他又在青年职工中开展改良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在伦敦及其他工业城市迅速地扩展开来。

1851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美国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青年会的工作方向转向整个社会,提倡“四育”(德、智、体、群),赋予新的教化功能,以期调和社会矛盾;又摘引《圣经·马太福音》21章25节的“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经文,作为“会训”。这一变革的实质,更加适应资产阶级政权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因此得到大资本家的赞助,同时在基督教内部形成一大派势,即所谓“社会福音派”。

1854年,美国与加拿大联合组成“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但其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美、加两国,声称这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10年在白宫召开一次特别会



议,讨论关于青年会扩大海外活动的问题,针对当时世界上“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的新的精神潮流”,会议强调扩大基督教青年会在海外活动的必要性。

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选择在天津

19世纪80年代青年会的活动模式开始传入中国。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与通州潞河书院先后成立了“学校青年会”,在少数学生中间开展活动。1890年来华的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时,与会者提出北美协会有必要派人来华正式组建基督教青年会。会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地向北美协会提出要求建立青年会的申请书。为此,北美协会在1895年派遣传教士来会理(Williard Lyon)前来中国进行考察。

来会理首先到达上海,随后又访问了北京、汉口、烟台等几个城市,最后来到天津。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来会理最终向北美协会建议,在天津创建城市青年会,主要理由是:天津的地理位置,便于向中国北方推广传教事业;天津是中国政府发展西方教育中心,建有北洋大学堂、水师学堂、医学馆,许多学生懂英语,有些人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在天津设立青年会,有利于“对新中国未来的伟人作些感化工作”。^①

1895年12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宣告成立;转年在德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大营门附近)购地建房,1897年竣工并举行开幕典礼,成为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1914年又在城厢东马路建成新会所,即今少年宫)。

来会理出任天津青年会的首任总干事,他特别重视对知名人士开展工作。

1898年北美协会派格林(R. R. Gailey)来天津接替来会理的总干



事职务。格林到任后,继续进行接近中国知识分子的“试验”,深入各新式学堂,开展教学工作,特别是推广西方体育竞技活动,扩大青年会在学生中的影响。来会理与格林的“感化中国思想界”实践经验,后来历任总干事无不奉为圭臬,形成青年会的传统。多年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广泛接纳知识界人士为“会员”,包括教育家、医生、工商业者、银行家、高级职员等,而且不问其是否信仰基督教。作为宗教团体的青年会,宗教色彩并不鲜明,而文化形象日益突出,客观上形成以传播西方文化、娱乐活动为媒介的社交中心。

附:历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1)来会理(Williard Lyon) 1895 - 1898

(2)格林(R. R. Gailey) 1898 - 1910

(3)韩慕儒(R. M. Hersey) 1910 - 1922

(4)王治平 1923 - 1926

(5)宋愚溪(代理)

郝瑞满(Raymond S. Hall)(副总干事) 1926 - 1928

(6)郝瑞满(代理)1928

(7)海士(Newton Hayes)1929 - 1931

宋愚溪(副总干事)1929 - 1931

陈锡三(副总干事)1929 - 1931

(8)陈锡三 1932 - 1942

狄克逊(Edward E. Dixon)(副总干事)1938 - 1941

(9)阮渭涇(代理) 1942 - 1943

(10)杨肖彭 1943 - 1987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文化效应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伊始,就把工作重点锁定在传播西方文



化与社会生活方式。就当时国内形势而言,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加之清廷日益腐败,国家前途岌岌可危,黎民百姓苦难深重。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急于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之道,形成一种思潮。天津开埠较早,列强辟有租界,工业产品的大量输入,城区建设的西方模式,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致使天津人无形中受到一次西方文明的“洗礼”,因而青年会开展的文化、娱乐活动,正迎合知识界人士的需求。青年会文化、娱乐活动,包括教育、体育、音乐、旅游、演讲会、电台广播等诸多方面。

(1)教育。办学是青年会“感化”中国知识青年的重要途径。早在1860年天津开埠之初,传教士最先引入西方教育模式,在教堂内附设书馆、小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国人兴办西学教育始于洋务运动,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主要是军事院校。最早的民办学校是1898年严修在私宅开办的“严氏家塾”,课程有英文、算术、物理等西学,聘请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为教师。1902年严修又创办“严氏女塾”。1904年严修创办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出任监督(校长),转年改称“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即后来的南开中学。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到任后,一眼看中了热心教育事业的张伯苓,经过多次接触,博得张伯苓的信任,聘请青年会干事饶伯森(G. H. Robertson)、韩慕儒(R. M. Hersey)、郝瑞满(Raymond S. Hall)等人到学校讲授英文、化学、物理、地理等西学课程;后来郝瑞满等人又应聘到天津官立中学堂任教。格林煞费苦心地引导张伯苓,原本认为基督教“浅薄无味”的张伯苓终于在1909年领洗信奉了基督教,并在南开中学设立了学校青年会,在部分学生中间开展查经、祈祷等宗教活动。此后,张伯苓便成为宗教界的知名人士,曾担任青年会董事长多年。青年会与张伯苓的结合,是来会理、格林实践其“感化中国思想界”最为典型的一例。

1901年格林联络天津士绅林墨卿等,在城西北稽古书院旧址



(铃铛阁)创办普通中学堂,为天津的第一所中学。1903年普通中学堂由天津府接办,改称“官立中学堂”,原普通中学堂迁至城里仓廩街。1909年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1911年普通中学堂停办。

1914年青年会在东马路建成四层楼的新会所,设置几间教室开办补习学校,分为日班与夜班,最受欢迎的是英文班(包括成人班与童子班),此外还开办过英文速记班、英文打字班、簿记班、美术班、摄影班、无线电班、化学工艺班等,开天津成人业余教育之先河。

(2)体育。青年会始终是推广普及西方竞技文化的组织者。1895年来会理筹建青年会之初,就组织了一次篮球表演赛(当时称“筐球”),为中国引进篮球运动之始。青年会还派出美籍干事饶伯森等到各学校传授篮球技术,并在1911年举办了天津首届篮球比赛。1914年建成的新会所,内有非常考究的室内篮球场,并于1916年举办为期三周的天津校际篮球比赛,此后便形成天津开展篮球运动的基地。青年会体育干事董守义曾培养一批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成为早期天津篮球运动的骨干力量。1925年董守义发起组织“万国篮球会”,举办年度国际篮球锦标赛。董还在1928年出版《篮球术》一书,多次再版,成为当时推动篮球运动的经典著作。

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原是全美足球明星,来天津后就致力于培训足球运动员,以提高竞技水平。1914年青年会举办了天津首届足球比赛,从此足球运动在天津逐渐开展起来。

乒乓球运动也是青年会首先引进的,1914年在新会所设置了天津的第一张乒乓球台(当时称“桌球”)。1931年举办了天津首届乒乓球公开赛,转年举办第二届时增加了女子比赛项目。

此外,青年会推广的体育项目还有:网球(1908年)、台球(1914年)、地球(1914年)、羽毛球比赛(1928年)、自行车比赛(1934年)、游艇比赛(1935年)、象棋比赛(1936年)等。

青年会组织的球类、田径类比赛以大中学校为重点,其他比赛项



日的参加者多系该会会员。青年会专设体育干事,组织的比赛项目多,持续时间长,发动面广,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天津体育竞技活动中心。

(3)音乐。青年会在推广与普及西方音乐方面的成效也比较显著。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举办各种音乐会,包括声乐、管弦乐、钢琴、小提琴演奏会,我国许多著名音乐家如马思聪、张肖虎、老志诚、刘金定、马道允、李洪滨、池元元、茅爱立等都曾应邀在青年会礼堂演出过。青年会组织的歌咏团、钢琴班、口琴队,培养出许多后来成为一流的音乐家。

1936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的危急时刻,上海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应邀来天津,深入各学校教唱爱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毕业歌》等,一时掀起高昂的抗日救亡热潮。

(4)演讲会。青年会经常邀请名人就社会热点问题举办演讲会。如张伯苓讲《基督教对于明日中国之贡献》(1920年)、《社会事业基督徒学生有何种贡献》(1923年),梁启超讲《个性与组织》(1920年)、《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1921年)、《平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与价值》(1922年),时子周讲《公民教育问题》(1933年),王正路等五位科学家讲科学知识(1935年),方显廷讲《经济问题》(1936年),郭德隆讲《肺结核病对青年的危害及其预防方法》(1941年),李烛尘讲《时事问题》(1946年),袁贤能讲《通货问题》(1948年)等。此外,政界要人与社会名流如黎元洪、顾维钧、颜惠庆、于学忠、王文典、杨豹灵以及文化名人潘光旦、何廉、李书田、蒋梦麟、熊佛西、黄钰生、齐璧亭、邓澄波等,都曾经应邀在青年会作过演讲。如此长期举办有关时事、政治、社会等问题的名人演讲会,提升了青年会的社会知名度。

(5)播音。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开始出现民营广播电台,1934年青年会也集资建立电台,功率初为50瓦,转年改为150瓦,波长



400米,750千赫,在当时几家民营电台中属于播音质量比较好的。青年会广播电台虽然也播放娱乐节目(有音乐、曲艺、京剧、话剧等),并招徕广告,但主要还是为了扩大青年会的社会影响,如报道青年会的活动、邀请名人演讲、组织学生演出、举办英文讲座,以及播放宗教音乐等。青年会广播电台在当时是惟一播放新闻节目的电台,而且不做烟酒行业的广告宣传,说明电台的文化品位。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以后,青年会电台被迫停播,后来电台的器材被日军强行低价收购。

(6)旅游。青年会多次以举办“夏令营”的名义组织青年到名胜景点旅游,夏天组织会员去北戴河避暑。1935年组织赴日旅行团,到东京、神户游览,并去大阪参观工业博览会;1935年组织赴美旅行团,游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夏威夷等30多个城市。

(7)联谊团组。自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青年会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吸收的会员为数甚多,有些会员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或其他目的,以青年会为阵地,组织社交小团体,有益友社(成立于1926年)、联青社(1927年)、福利社(1933年)、伉俪社(1933年)、父母会(1934年)、青紫团(1934年)、友爱团(1934年)、励青社(1935年)等。这些团组存在时间有长有短,维持最久的当属益友社与联青社,尤其联青社是青年会的国际性组织,参加者多系有经济实力的社会中坚人物,规定每周三中午聚餐,席间互通信息,商讨问题,或请名人演讲。当年能参加联青社为会员的,成为社会名流身份的一种标志,实际上是共同利益的驱动与结合。

(8)慈善救济。青年会长期兴办慈善救济事业,夏季舍暑药、施茶水,冬季舍棉衣、开粥厂,此外还施种牛痘,义诊舍药,救济失学儿童。遇有水旱灾害,必然募款赈济,特别是1917年、1939年两次洪水淹没天津大部分城区,青年会发起成立水灾赈济会,向被洪水围困的灾民运送食品、药品,搭建窝棚收容难民。青年会长期乐善好施,博



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此外,青年会还举办过集体结婚(1936年)、儿童健美比赛(1935年)、少年健康运动(1936年)、小学演说竞赛(1936年)以及国货展览会(1935年)等活动。(注:以上所述青年会工作情况,截止于1948年)

青年会的历任总干事与工作人员(无论中、外国籍)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视野开阔,事业心强,一切依照青年会的美国模式行事,因此青年会的活动具有国际性与时尚性的特征,发挥了融入时代潮流、促进城市文明的文化效应。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教信仰内核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宗教形象并不显著,会所建筑上没有十字架,会堂装饰也缺乏宗教氛围,在人们的直观印象中似乎是个“文化俱乐部”。没有教堂的神圣感与肃穆感,也可能是社会公众愿意参与活动的一个原因,更何况有国际性与时尚性的吸引力。据总干事杨肖彭提供的数字,青年会有5000多会员,其中基督徒大约1000人,^②不过五分之一,说明青年会活动的社会性大于宗教性。其实,青年会的一切活动都包涵着宗教精神的内核。作为青年会的“会训”——即摘引《圣经》经文的“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足以说明其所遵循的工作准则:为了“见证”基督教信仰的“奉献”精神。

实际上,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教堂侧重于领洗、祈祷、诵经、灵修活动有所不同,青年会更注重阐扬宗教意义、诠释《圣经》内涵的深层次的思想教化工作。如组织宗教界名人演说,举办查经班、退修会与《圣经》演讲会,提倡“道德灵性”与“人格建设”,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讲座”,夏令营安排读经活动,慈善事业中宗教宣传等。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青年会多次邀请国际著名宗教家来天津作宗教演讲,往往轰



动一时。

综上所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自 19 世纪末成立以来,在传播西方文化与时代思潮,尤其在体育竞技与社会生活方面成绩卓著,历史地、客观地加以评断,确实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文明与社会进步。但另一方面,无可讳言,其中也浸染了改良主义、惟美主义的杂质。

注 释:

① 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7 页。

② 杨肖彭:“八十回忆录”,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90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7 页。

(作者单位:天津市文史馆)

基督教青年会与 近代文明在天津地区的传播

张 博

晚清时期,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源源不断地移植到天津等一批通商口岸,“遂使这里既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和橱窗”。^①就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来会理(D. Willard Lyon)来中国,他考察了沿海几个城市后,认为天津有“大学林立”、“当地各校已有若干基督徒”、“设有青年勉励会”等三大优势,于是,决定首先在天津建立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成为第一个设立基督教青年会的城市。^②

本文谨就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天津后,以其对近代文明传播领域的影响为切入点,以其传播手段为中心,对基督教青年会将近代文明传入天津的途径和方式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试图对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文明在天津的传播作出较为详细的考察。

一、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的领域

从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天津后,就开始了其传播近代文明的历程,从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的轨迹上看,突出地表现了如下特点:以近代体育运动为突破口,渐次发展到社会习俗改良和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并在各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近代体育运动的引入。1895年,当北美协会来到天津并决定在这里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时,就将近代体育项目引入了天津。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之后,来会理就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在“会所草场围墙背后进行”,天津成为中国最早进行篮球运动的城市,这场比赛成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开始。^③由篮球运动传入开始,天津青年会成为了近代体育项目传播的基地,近代中国体育的诸多项目也是在这里酝酿,并在南开学校、北洋大学以及天津的中高等学校付诸实施的。此外,网球、乒乓球等项目也多由基督教青年会首倡而得到社会上的认同,并在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逐步开展起来,青年会还曾经组织棒球队,以推广这项运动。^④并多次举办天津市的各种运动会,推广体育运动。青年会不仅组织各种单项的运动,还组织天津学校的运动会,并涵盖了现代体育运动会的跳高、跳远、足球、铅球和60米赛跑等多种项目,^⑤让近代体育运动迅速在天津地区得以推广。

2. 提倡改良社会习俗。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当中国饱受西方凌辱,政局跌宕起伏之际,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如果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着手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陋习进行改良,并将这些改良思想付诸实践。而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有几个方面尤其受到开明人士的憎恶,如纳妾、缠足、抽大烟、酗酒等等。1910年,在基督教青年会主干成员的倡导下,天津人在全国率先向这些陋习宣战。

张伯苓等人提出首先要戒掉鸦片,此外纸烟和饮酒都属于绝对禁止之列。鸦片成为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公害之一,而青年会在抓住这个重点问题不放的同时,还对开埠通商传入天津的纸烟也要禁止。纸烟的传入是在天津开埠之后,尤其是在当时的紫竹林通商码头,在天津经商的广东人开始吸纸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祟”^⑥用以装置纸烟,使得纸烟也成为了当时人们希望禁止的一个方面。而缠足则是当时另外一个传统陋习,青年会的主干力量提出改良社会的具体步骤,要分为三步实施:首先要改良自己,将自己身上的不良



习俗改掉；其次是改良家庭，当自己身上陋习改净后，带动自己家庭成员改掉陋习；最后在社会上宣传改良，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⑦并准备从不抽纸烟、不缠足入手，在社会上进行广泛宣传。张伯苓等6人联名上书清政府，希望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缠足。这是一个流弊很深的陋习，除非有强制力推行，否则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此，他们提出，一方面由清政府责成地方官员在地方推行禁止缠足，另外一方面由各地绅士在本地区劝诫人民，希望百姓能够了解缠足的害处。^⑧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禁毒运动的开展，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成立了专门团体，“以辅助官厅查禁鸦片、吗啡以及类似烟啡等毒物为宗旨”，^⑨开展社会上的宣教活动，根据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刊物记载，该会的会员部每年都要在社会上举办拒毒讲演，以“痛斥毒流”。^⑩

与改良习俗相对应的是近代西方新鲜事物的传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集体婚礼观念的引入。婚丧嫁娶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天津在晚清民国时期，在婚礼和丧礼上尤为铺张。在这方面进行改良时，基督教青年会在1935年举办了第一次集体婚礼，并在天津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场婚礼在北宁公园举行。从当时的规模来说可谓盛况空前，据《大公报》载，仅在15日那天下午，北宁公园礼堂内外前来观看婚礼的人数达到了3000余人。^⑪而青年会举办这样一个婚礼的目的在于“新式的婚典比旧式的用轿来娶大方得多”。^⑫这种集体婚礼观念的输入，对于近代天津人的婚姻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基督教青年会以后举办的每次集体婚礼都有很多人报名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婚姻习俗的改良。

3. 注重平民教育。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面向社会的活动中，面向社会开办各种文化教育学校，对于教育的普及和天津市民素质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天津不久，就创办了一所普通中学，专门接受本地士绅文人的子弟入学，^⑬到了20



世纪初期,这所学校的“就学者甚众”,^⑭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公开办了英文夜校和英文晚校等专门补习英语的学校,晚校专门为青少年服务,夜校则针对成年人。这些业余学校专门为补习或是单独学习英文的人设立的,并开办英文商科、英文打字和无线电等科目,^⑮天津当时已经是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的口岸,在与外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青年会开办的这种实用性非常强的科目,对于那些需要谋求工作的人来说,帮助很大,因此,“就学者日众,学科亦繁”。^⑯该会不仅创办这些业余学校,同时,还为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的机会。在平民教育运动当中,基督教青年会还创办平民补习学校,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已达三百余人”。^⑰此后,青年会不断招收平民参加补习班,每期开办都有五十多人参加,并规定“凡十四岁以上寒苦青年,可随时报名入班。”^⑱这些补习班和夜校的开办,不仅解决了贫苦人家子弟的就学问题,同时,还将西方的近代文明如无线电等的知识传播给学员,让更多的天津人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

4. 政治意识的引导和传入。从封建社会的主权在君,到近代的主权在民,中国近代民众的这一思想的转变并非易事。青年会认为,“民众知识道德之程度影响政治社会最大”,而当时中国的民众在这方面却缺少训练,为此,青年会特意举办公民教育活动,引入西方的公民权和地方自治等观念,并面对社会宣讲,在春秋两季进行,“凡有关社会之各种常识均延请专门人才讲授”,^⑲不仅讲授公民权和地方自治等问题,还针对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并“广约本市报界名人及大律师”^⑳讲演,几乎每半个月就聚会一次,这些具有近代西方政治的观念的引入,并非是哗众取宠,这场运动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践踏东北大好河山的前提下开展的,与当时民众呼吁爱国的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因此,那几年青年会在天津的集中宣讲,得到了天津民众的积极响应,并从中了解了公民权等问题,仅1933年就有5090



人参加演说集会。^⑳此外,青年会还利用自办的刊物《天津青年》开办专题栏目,不仅将有关人士的文章全文刊登在刊物上,同时,还开辟“公民教育问题”这样普及性的栏目,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解答了“公民”等近代西方政治术语。^㉑

二、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的途径

从前文的叙述可以得知,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宽泛。同时,从该会传播近代文明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的途径主要是以该会的主干力量为核心,依托各种团体并以该会会所为基地传播各种近代文明,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1. 从总干事“单枪匹马”到核心会员集体努力。在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天津之初,传播近代文明主要依靠北美协会派来的西方总干事,这一点在篮球传入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格林担任总干事之后,他改变了传播的方针,开始了“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吸引了众多的天津文化界人士加入,提升了自身的素质和形象,张伯苓等人就是在此时加入的基督教,以这些文化名人为媒介,使得更多的西方近代文明传入天津。在1910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就是张伯苓等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干力量发起的。张伯苓、丁义华等7人为改良会的委员,这是晚清时期的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改良社会的团体,天津成了要求社会改良的“急先锋”。7位改良会的委员最后商定了改良会的名称,叫做“中国改良风俗会”(后来见诸报端的是“北洋万国改良会”),^㉒该会以“改善不善之风俗、除去无益之嗜好、黜邪崇正、益世济人、造社会之幸福、助世界之进化”为宗旨。^㉓在改良社会习俗方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外,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及理事分别到天津的高中等学堂进行宣传,并使得“天津青年会运动会”和“天津学堂运动会”得以推广,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天津体



育界的盛事,并成为近代体育传播的重要渠道。

不管是从北美协会派来的总干事,还是后来加入基督教并成为青年会总干事张伯苓等人,自身的修养和素质都很高,这也为这些骨干成员在传播近代文明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这一群体能够很快在社会上推广近代文明的重要因素。

2. 从以青年会名义主办活动到以下属各分会自由开展活动。这个变化非常值得注意,青年会传入天津之初,各种活动均以该会名义主办,如各种运动会的主办以及“毘战协济会中国直隶筹款部的成立”等等,^②并通过“放赈、卫生、节俭、家庭幸福和公民”^③等活动,大力倡导社会习俗改良。随着青年会的发展,在青年会下面设立了多种分会,有会员部、智育部、体育部等多个分部和遍布天津的分会,比如前文提到的英文夜校及各种业余学校就因就学者口众,而选择在分会开办更多的班次,使得基督教青年会可以更大范围地传播近代文明。同时,青年会还开设有无无线电研究会、军事常识班、书画社、法律讲习班、医药常识班和伉俪社等各种团体。^④这些团体的设立,拓展了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如前文提到的公民意识培训、平民教育等各种活动,都是通过这些团体主办的,这也使得青年会主办的各种活动频率明显提高,从最初的数月举办一次大型的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每个星期各个团体和分会都要举办相应的活动。^⑤应该说,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机构的完备,强化了该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虽然晚清民国时期通商口岸的“崇洋”风气很浓,但基督教青年会在传播近代文明的领域和举办的各类活动的选择性非常强,既能够让天津的民众领略西方文明的风采,又能够与中国传统社会习俗结合起来,如集体婚礼的引入等。

3. 以青年会会所为基地传播近代文明。在举办各种社会活动打破陋习、传播近代文明的同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址所在地也



成为当时天津重要的传播基地之一。许多天津近代史上非常有影响的活动就在这里举行,其中在传播近代文化、提倡新式教育等方面,这一会所更是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落成于1914年10月16日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其内设阅览室、会议室、体育馆、礼堂、招待所等,基督教青年会以此为基地,开展各种演说和有益的活动,提升了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社会上的良好声誉。

在基督教青年会这个会所里,不仅举行青年会各分部和团体的活动,同时,许多文化名人都曾经在这里宣讲,为天津的文化教育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杜威来华期间就曾经在这里发表过重要的演讲,1920年1月2日,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之邀,杜威莅临津门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话题,为他做翻译是著名文化名人胡适。针对许多中国人对个人主义看法的一些偏见,杜威亮出了自己多年思考后的观点。他认为,物质发达后,道德堕落和伦理被破坏不应该归咎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他认为个人主义首先要做到不人云亦云,要用自己的头脑观察和研究,要有独立的思考。同时,他认为首先要有思想上的革命,然后才会有物质革命。^⑳杜威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引起了张伯苓等人的浓厚兴趣,在南开学校发展过程中,张伯苓极力倡导学校要联合社会,书本知识要联系实际,“不能只有书本知识,不了解中国国情”。很明显地带有杜威教育观的影子。^㉑梁启超也曾多次受到邀请,在青年会的会所举行演讲,演说的内容广泛,从平民的群众运动到国际问题的讨论等等。此外,顾维钧等人也曾在此发表演说。^㉒

三、青年会在天津传播近代文明的影响和意义

在欧风美雨尽袭的晚清民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在鱼龙混杂的文化传播中,能够抓住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文明并使之传入天津,同



时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陋习。考察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传播近代文明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该会改变了近代文明传入天津的结构,并构建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传播模式,同时,对于近代文明在天津向深度和广度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1. 改变了近代文明传入天津的结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之时,天津已经通商开埠三十余年,以近代市政设施建设和电报、电话等近代化通讯工具的传入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传入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近代建筑、市内交通以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等近代公用设施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成为人们初步认识近代文明的启蒙“图本”,^②让人们在感性上对西方近代物质文明有所了解。而人们此时对西方近代精神文明传入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面对强大的传统社会压力,基督教青年会通过各种途径让近代体育、近代教育、近代公民意识等传入天津,并对传统社会习俗提出了改良的措施。这些近代西方较为先进的精神文明传入天津,使得近代文明传入天津的不是停留在物质传播的层面,对原有天津近代文明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文明传入天津的结构,即近代物质文明传播较为广泛而精神文明相对较少,使得天津近代文明的构成呈现从物质文明引入较多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时引入的状况,促使天津近代文明的构建趋向合理化和完整化。

2. 构建了传播近代文明的模式。在传播和引入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形成了传播近代文明的模式,即以骨干成员为纽带、以会所为基地,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在天津传播近代文明。在构建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以张伯苓为代表的近代天津文化名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骨干力量的努力,基督教青年会很难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陋习和寻找传播近代文明的突破口。作为近代文明传播的基地之一——天津青年会会所在传播近代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与



基督教青年会的骨干成员一道成为是沟通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社会的桥梁。同时,该会的分部和分公开设的各种团体和主办的各种活动,成为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近代文明的主要渠道。

3. 推动近代文明在天津向深度和广度传播。青年会针对平民教育活动,特别是各种英文补习学校的开办,不仅让这些民众接受了实用技能的培训,也让近代文明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同时,这一教育活动的开展,为当时天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人力资源保证。此外,在青年会将教育、文化等近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天津的过程中,可以明确看出这样一条主线即青年会在传播近代文明的过程时,是渐次向政治意识和家庭改良的社会文明的深度扩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底层民众只能在路边感受和耳闻近代文明尤其是近代物质文明魅力的状况,能够让更大范围的天津人领略近代文明的风采。晚清时期严复等具有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传入西方先进文化如“进化论”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其传播的领域和受众层面远不如基督教青年会宽泛。同时,二者在打破封建专制、推行民主进程等方面是一致的,不冲突。

注 释:

①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②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1930年版,第9页。

③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版,第52页。

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青年》,1932年6月15日。

⑤“青年会运动比赛”,《益世报》1922年1月18日。

⑥张焘:《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⑦“北洋万国改良会简章”,《大公报》1910年6月17日。



⑧“反缠足上书”，《大公报》1910年7月12日。

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第八次大会纪念册》，第16页，1920年版。

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第20页，1930年版。

⑪“集体婚礼纪胜”，《大公报》1935年6月17日。

⑫《天津青年》第130期，1936年10月1日。

⑬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⑭宋蕴璞辑：《天津志略》，第十一编第三章第一节“天津青年会”，1930年版。

⑮“本会夜校续招插班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青年》第55期，1933年1月15日。

⑯“本会夜校招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青年》第54期，1932年12月15日。

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1930年版，第18至19页。

⑱“励青社平民补习班第二届已开学”，天津青年会编：《天津青年》第77期，1934年11月1日。

⑲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1930年版，第18至19页。

⑳“国际问题研讨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青年》第55期，1933年1月15日。

㉑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版，第4页。

㉒“公民教育问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青年》第56期，1933年2月15日。

㉓“中国改良会发轫伊始”，《大公报》1910年7月16日。

㉔“中国改良会发轫伊始”，《大公报》1910年7月16日。



②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版，第52-54页。

③宋蕴璞辑：《天津志略》，第十一编第三章第一节“天津青年会”，1930年版。

④详见天津青年会编：《天津青年》第64期，1932年2月15日。

⑤详见天津青年会编：《天津青年》各期的分会和分部的活动介绍。

⑥“杜威博士演讲记”，《益世报》1921年1月3日。

⑦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⑧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版，第54页。

⑨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470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从“非政府组织”视角看 百十年来的天津青年会

王 昊

2005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天津青年会)迎来了成立110周年纪念,在这百十年中,天津青年会在天津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前半期,作为一个带有宗教色彩且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公益团体,天津青年会所发挥的作用和其自身所具备的服务功能显然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天津青年会在传播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社会事业,尤其是在提倡近代体育教育及竞技体育运动方面贡献尤多。百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历经数次重大转型,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体制随之发生巨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日渐加深,从一定意义上讲天津青年会是中国社会西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应时的产物,更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发展与社会需要的“调节器”。百十年来,天津青年会在天津乃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and 选择、困境和机遇。不过,正如乔维熊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百年纪念特刊”中所讲,她“历经沧桑,前辈先贤刻苦耕耘,社会贤达鼎力相助,会内同工团结努力,在开展德智体群四育活动,举办业余教育,培养优秀人才,推动社会优良风气,提高市民道德文化素质,进行社会救济和公益服务等方面都起过不少的作用。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变革中,为天津的稳定、繁荣、进步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文将从“非政府组织”视角入手探求百十年来天津青年会的发



展特征,考察其团体性质、服务社会的方式及其自身的社会功效等,以期能为今后天津青年会的工作与活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

提及“非政府组织”(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以下简称 NGO)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简要说明。

联合国在 1945 年制定《联合国宪章》时已经开始使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其“第十章经济暨社会理事会第七十一条”中称:“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此项办法得与国际组织商定之,并于适当情形下,经与关系联合国会员国会商后,得与该国内组织商定之。”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人们对 NGO 概念的使用还并不频繁,到了 70、80 年代,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才开始逐渐活跃,到 90 年代,在国际上“NGO”已经变成了一个流行名词了。可见,在 NGO 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社会服务组织就已经出现,并存在了百年(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于 1844 年),其组织结构、社团宗旨、服务方式和内容等都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且影响甚广。其实,这一现象正反映出—个团体的历史发展的成熟过程及其确定组织性质的正常规律,NGO 概念的出现正是对基督教青年会及与其类似社会公益团体的一种总结和界定。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对 NGO 有明确的学理上的定义。不过,可称为 NGO 的组织应该具有如下共同性:即是由—群有着共同目标的人集合而成的;有自己的策略性目标和服务定位;具有非营利的性质,不是企业;具备积极调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能起到沟通政府和公民联系的中介作用。NGO 所提倡的“服务”精神,其原动力来自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而基督教青年会正是英国人威廉·佐治(George Williams)“为追求



基督道德精神,避免城市青年的酗酒、生活放荡和堕落”而建立的具有服务性质的团体,后来这个团体发展到欧美各国,成为联系广泛的社会服务团体。考诸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内容和事工,其主要是“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工作”。^①从此着眼观察,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已经具备了 NGO 的特征。

说到 NGO 的类别,一般观点认为,NGO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公益服务的组织(不属于政府公共部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服务的组织);二是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考察天津青年会的历史档案可以发现,1951年2月,天津青年会向天津人民政府登记注册时,在登记表的“团体性质和宗旨”一栏中记有“当时一般风气未开,各大城市极需要类似青年会之组织,在业余之日为他们做些服务工作。一方面联络感情,一方面追求基督教的信仰,以期发展其健全的人格,即所谓德智体群四育的发展”,而且青年会的事业也“一直在扩展,特别在公民教育与体育工作最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在群众的集会,如教育演讲等以及其他文娱活动亦皆逐渐开展”^②等内容。另外,天津青年会的附属团体“天津联青社”的宗旨也极体现出 NGO 的特色,即“使社员对于有关公民、经济及社会之切近问题得有更优之启迪;以热诚服务之方法,赞助适当之慈善事业及社会运动;提倡以活泼、公正之精神办理公民事务,而不涉政治,不分党派;建立健全之人格,以发展真实之爱国心,使与形式上之爱国心有别;以勤慎、活泼之服务精神,单独与团结施行基督教青年会所定之各项工作”。^③其社训“以义务为权利”(To acknowledge the duty that accompanies every right)与天津青年会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相一致。由此相互比照,更可以看出天津青年会的 NGO 的特征。



二

如果我们跳出狭隘的“文化侵略”的评价范畴,而从 NGO 角度入手考稽天津青年会解放前的历史和事工活动,则会看到她作为一个社会服务组织所发挥的广泛影响和社会效应。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是天津青年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只要留意天津各大媒体,诸如《大公报》、《益世报》等,便会发现,天津青年会的诸种社会服务活动均能引起媒介注意,宣传、报道不胜枚举。其实,我们亦无必要一一分析天津青年会的各项具体工作,只要举出其最具影响的大宗公益活动便能发现天津青年会对天津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里,我们可以围绕天津青年会 1935 年事工活动和该会对 1939 年天津水灾的救济活动进行探讨。

1935 年,适逢天津青年会建会 40 周年,该会出版了详细的《事工报告》以及纪念册,40 年的岁月已经使天津青年会发展得十分成熟,而且 40 年间,她在组织系统、人员构成、开展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作为一个非行业性组织,天津青年会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行业组织在社会服务方面的限制,她吸收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人员加入进来,不仅完善了组织的结构,而且无形中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对于推进服务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天津工商、金融、教育等领域内著名人士,诸如雍剑秋、宋则久、宋□卿、卞倣成、陈锡三、陈芝琴、张伯苓、陈宝泉等人均是天津青年会董事、各部的事业委员,他们投身于天津青年会活动和工作,在疏通社会各环节、关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1949 年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相当丰富,其整体素质较高,一大批社会财富拥有者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有相当的认识,对于投身公益事业亦比较热心,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天津青年会正是广泛利用了



这些社会关系,积极吸收民间财富拥有者中热心公益之士,投身社会服务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此种作为,无论对于天津青年会本身,还是对于投身其间的社会人士都产生了互惠效果。

天津青年会 1935 年具体而细致的工作涉及“宗教与世俗”、“观念与事工”、“社会教育与提倡体育运动”等各方面,如此频繁、密切地社会联系对群体生活及个人生活至关重要,同时这些活动无形中让人们在循序渐进中增强了对生活的满意度。天津青年会无论是在开展“卫生运动”、“父母教育运动”、“宗教生活运动”,还是在交友活动、各种学术演讲活动、救济水灾活动、开展体育等活动方面都有益于促进社会和谐。从另一角度看,交友、学术、救济、体育等活动的开展,正是天津青年会切实实践其“促进德智体群四育发展”宗旨的有力证明。在政治和经济环境相对动荡的民国社会中,天津青年会无疑在天津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社会“润滑剂”和“调节剂”的作用,她在缓和各阶层矛盾、整合社会资源、重建社会信任、积累社会资本和维持社会稳定上产生了显著效果。不过,客观地讲,天津青年会 1935 年的事工活动大体限于天津现代城市的活动范围之内,对于广大的城市之外的农村地区则活动较少。

1939 年 8 月,天津遭受特大水灾,在救灾过程中天津青年会所做的具体工作实有典型的 NGO 的特征。对于灾后救济,尽管当时的政府应对救灾实行统一管理,但毕竟政府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而且当时中国尚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能发挥的公共救助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在战争年代,地方管理机构的社会救济功能往往失效,不能很好地救助受灾群体。在这种局面下,天津青年会便发挥了至为关键的社会作用。8 月 20 日,天津遭到大水侵袭,25 日,天津青年会在当时法国租界的大明电影院首先成立了难民收容所,并派船驶往各地营救灾民,同时为灾民提供饮食。其后,又先后组织第一、二、三水灾服务团,“分别在耀华学校,大明电影院,及开滦医院等处



服务；举凡疾病的治疗，秩序的管理，清洁的指导，常识的灌输等都在工作程序之内”。^④从1939年8月底投入水灾救济工作，到1940年3月救灾工作基本结束，天津青年会对灾民的救济和社会服务工作十分有序、高效。救灾期间，天津青年会不仅积极地义务从事卫生防疫、食品物资发放、救灾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诸多工作，而且还对灾民进行教育培训和组织娱乐活动，对受灾群体进行精神上的疏导和安慰。天津青年会举办的“儿童义务学校”、“少女识字班”、“编织班”以及“通俗讲演会”、“家长恳亲会”、“春节同乐会”等活动都体现出民间团体在应付和处理社会突发事件时，所发挥出的不同于政府等官方机关团体在救灾时所能发挥的作用。

其实，无论是在社会正常状态，还是在社会非正常状态中，通过天津青年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可以使人感受到，人们在维护自我利益的同时，不应忘记互惠、互信与合作的重要性，为其如此，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固和重组。天津青年会以互惠和信任为基础进行社会交往与服务社会的事业，对近代天津民众的实际生活及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工作的开展对非常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三

由于历史原因，加之客观政治及社会因素的影响，解放以后天津青年会的发展明显有别于解放前的天津青年会。解放后，天津青年会的性质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已经“作为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的会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三自爱国方针，积极工作”。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停止活动期后，“1981年3月，中共天津市委正式宣布恢复天津青年会工作。青年会恢复活动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和市青联的指导下，组织董事、会员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根据青年会的宗旨和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组建青年会文化培训部,先后开设了英语、日语、俄语、德语、书法、口琴、烹饪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开发了免费少儿声乐班和初中、高考助学讲座”,以及文化进修部的各种培训。^④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种 NGO 的概念,即“中国特色的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所谓“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ed NGO,简称 GONGO),“主要是指与扶贫、教育、儿童、妇女等社会发展领域密切相关,由政府自上而下设立的团体组织”。^⑤新时期下,特别是面对日渐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天津青年会的工作不仅涉及到天津及中国社会的“扶贫、教育、儿童、妇女”等相关领域,而且还要面对日渐国际化的社会服务领域,其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与解放前相比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当然,天津青年会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万能型的服务性组织,她的工作和活动,必然要有所侧重,其服务的目标也应有所限定。

近 25 年来,天津青年会的活动方式及工作内容,诸如进行社会教育,社会救济,与本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青年会开展交流与合作等工作在逐步向解放前的天津青年会看齐,服务的质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活动,确实加强了天津青年会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建设。不过,在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青年会的工作经验的同时,如何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环境、客观条件出发,将更为实际、有益与多元的社会服务工作做到实处?如何满足受服务对象的实际要求,如何使受救济对象的自身素质得到提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救济层面。如何能切实提高天津青年会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诸如此类问题,都应引起天津青年会领导者的重视。

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作为基层的社会组织,应该是 NGO 发挥积极作用的舞台,社区中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就决定了作为 NGO 的天津青年会所提供的服务类型。“社区服务,一直是社区建设的基



础,也是很多 NGO 组织的工作理念,通过服务于社区而服务社会”,尽管很多社区中有服务中心,可以提供诸如家政、健身、职业介绍等便民服务,但是“这些由街道负责管理和经营的社区服务往往缺乏有效的管理,成为街道和居委会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然而,近些年来,上海浦东新区的罗山市民会馆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充分发挥了综合的社区服务中心的作用,并且做了一个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有效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社会效益。^⑤在与社区进行合作的方面,天津青年会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义工分会与天津市各区县部分中学、养老院合作,在开展社会教育和服务弱势群体方面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天津青年会与会所所在的天津河西区文静里社区合作,多年来坚持举办各类文化建设展览,联合主办社区消夏、春节联欢晚会,对于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都做出了贡献。2004年1月,天津青年会派代表团赴韩国釜山交流考察,代表团特别对釜山青年会社会服务工作进行了细致考察。釜山青年会在青少年教育、社区法律援助、社区文化体育服务、社区弱势群体救助服务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对于天津青年会今后开展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比如“釜山有14个福祉馆,提供多项社会服务工作,不仅对孤寡老人、残障人员实行救助服务,收容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还开展各种自立生产活动,使一些有自理能力的救助对象能够学到一些简单的生产技术,并用他们的生产成果回报社会”。^⑥显然,救助工作不是以简单的帮助作为工作重点,而是以促进受救助者能获得生存能力为重点,进而能“反哺”社会,这些工作都有待天津青年会更深入学习和借鉴。

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如何充分发挥 NGO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如何发挥作为 NGO 的天津青年会对国家和社会的“智囊”作用?以弥补政府机构在某些公共领域政策制定和措施实施上的不足和限制,都应在今后天津青年会所应探索的方向。中国要通



过创新来适应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和人类需求的不断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面对人口不断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巨大压力,中国如何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向?我们认为,通过天津青年会的社会服务,可以使之成为创新的一部分。我们承认,要取得社会创新的成功,各级政府就应该发挥核心作用,应当代表领导力量,负责公共物品的提供,制定法律,实行人权保护等等。社会创新应当是有意识地进行设计、执行、培育和拓展,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努力。但这不是说政府应当承担一切事情,许多事情实际上由 NGO 或民间团体、私人部门来执行可能会更好。在政府提供基本的框架内,充分发挥天津青年会等 NGO 的社会作用,使得社会得以不断创新,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 20 余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十分剧烈和迅速,而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在某些领域,政府的管理职能逐渐减弱,社会服务职能日渐增加。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求政府日益强化社会服务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职能转换的过程,就是从管制型政府不断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过程。

不过,现代政府的决策过程具有程序性,在面对突发的非常事态问题时,政府的反应往往受到限制,因为突发事件常常超出政府管理体系正常决策范畴。而 NGO 则很少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面对突发事件能相对迅速地做出反应。在适当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下,给政府提供危机预警信号,促成政策的合理出台与修正。按照一些学者的



研究,NGO 在提供社会救济方面具有效率优势,即“具有政府部门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同时又以类似于企业的方式运行”;政府的应急政策一般过于统一和标准化,对于少数群体可能一时无法顾及,而“NGO 的公益性及多元化,恰好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的服务上”。^①2003 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2004 年初,东南亚发生“禽流感”疫情;2004 年底印度洋沿岸国家遭遇海啸袭击,突发性的灾难对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全球化和开放社会的环境下,应对突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对于许多事情的处理,政府应当相信社会的力量,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抗击灾害,战胜灾害,并非是可以靠政府的号召和作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在一个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中,NGO 与国家力量之间能够形成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参与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很多“NGO”研究者认为,目前中国还较少有相应的民间组织与国际性专业组织和国际志愿者组织接轨,而吸收各类捐助的民间基金会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作为具有“NGO”性质的天津青年会,在广泛参与社会服务、开展与世界各国青年会交流的同时,更应发挥出 NGO 的作用,在社会救济、社会教育、环境保护、吸收民间捐资等方面做进一步努力,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为和谐社会的养成贡献力量。在未来的时代中,天津青年会只有不断适应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变化,积极参与其中,扮演适当的社会角色,并时时将自己的服务理念发扬光大,才能真正实现其存在价值和社会价值。

注 释:

①“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庆特刊》,第 34 页。

②《天津市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



团体登记总表》。

③王鹏云：“联青社简述”，《天津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第46页；杨肖彭：“回忆天津联青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61页。

④《1939~1940年天津青年会救灾报告》的前言。

⑤《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介》。

⑥蔡凌平：“GONGO路漫漫”，《中国发展简报》，2004年总第十八期，第13页。

⑦蔡凌平：“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国发展简报》2003年夏季刊，第18~19页。

⑧梁吉生 王平：“友好访问促进交流——天津YMCA代表团访问韩国釜山侧记”，《天津YMCA会刊》2004年第一期，总第17期。

⑨高小贤：“NGO：想做什么与能作什么”，《中国发展简报》，2003年秋季刊，第32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天津青年会：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范例

冯志阳

天津青年会(全称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895年12月,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迄今已有110年的历史。这是青年会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是青年会本土化的一个范例。

作为在近代中国社会颇有影响的青年会组织之一,天津青年会十分重视自我形象的展示和宣传,一般通过会员们交友、举办各种事务活动、创办会刊来进行。这些方法,虽然效果很好,但毕竟受众较少,难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影响。而借助大众媒体来展示和宣传自己,则可以迅速扩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本文主要是以青年会在20世纪初的《大公报》上自我展示的情况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

一、青年会乃国家富强之利器

——青年会全球化形象的塑造

《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英敛之的教徒身份,使得《大公报》倾向于刊登有关西方宗教的稿件。1909年10月12日,《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叫《青年会缘起》的来稿。对于来函(或来稿),《大公报》有专门解释:“凡既入来函一门,其责任自有寄函之人承当,与本馆无涉。诸君以来函囑登者,其姓名、住址务须另纸开示,否则,概不刊登。”^①尽管来函的刊登与否,很大程度



上来自《大公报》本身的态度和立场，但是有一点很明显，即“来函”最主要是表明投函者想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大为宣传。

该稿对青年会的缘起、发展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考斯会创自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六月六日，发起人为英国卫廉佐治君。因当时伦敦诱人陷罪之事业甚繁，青年处此大都，放检□闲能自制其心而修德者鲜矣。爰于英京商肆中组织一公，其目的在输灌教理于商界青年，不使沾染恶习，而达品行端正之地步，赞成者仅十有二人。厥后，会务逐渐扩充，智育、体育与德育相辅而行，入会者口众。……回忆青年会自创立至今日，六十余年耳，而遍行六大洲，发达之神速，洵出人意表。试略举其事实如后：

	青年会数	会友数	干事员	会所	值金元若干
欧洲 二十国	五五二二	三四〇〇七五	三四三	四七四	九〇一七六〇
南北美洲 十二国	一九六〇	四六〇七三九	二六九八	六三三	六二八九六二五〇
亚洲 十一国	三一八	二一七六八	一一五	三八	八〇七〇〇〇
非洲	二二	三三四七	九	五	五二二一〇五
澳洲	二二	八二〇九	一八	一一	七一三五〇〇

统计全球四十九国，共有青年会七千八百四十五处，会友八十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名，干事员二千九百七十二名，会所一千一百六十二处，值金约七千七百九十五万零六百十五元。”^②

此文将青年会作为一个世界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进行介绍，不仅道出了青年会创办的时间、地点、发起者及其原因，更列举详细的统计数字，展示了青年会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之后，该文还附有《美国青年会杂志》一文，对青年会在美国的情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介绍。

“去岁北美国青年会为助外方十一国青年会干事员，共捐助美金十六万八千元；青年人在会所寄宿者一万九千有奇；每口至会所者十五万五千有奇；美政府特为巴拿马上著工人建立青年会所四处；铁路总公司捐金元三十八万五千为铁路青年会年中经费；美国共有铁路



公司青年会二百三十七所；学塾青年会计有六百六十七；州县青年会二百零二所；海陆军青年会二十八所；各大城青年会六百十三所”。^③

这种介绍一方面强化了青年会在国人心目中的全球化形象，更重要的是向国人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即在实力强大的美国，青年会事业是很发达的。这样，就在青年会事业的发达与国家的富强之间建立起相关的联系。

实际上，这一策略和导向一直是青年会在对自我形象的展示和宣传中的重要突出点。1909年10月14日《大公报》来稿《青年会之证书摘要》列举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之总统或首相、大臣等高官对青年会的赞美作为“青年会之证书”。

“美国前任大总统路斯弗柔云，……因在此世代，惟合青年会之宗旨，三育兼全不偏枯于一端者，朴诚而敬上帝，奉公守法有高尚优美之权衡，具明健之胆识，忠爱之魄力，可以任重致远求达当然之目的，宏发愿，力辅翼，公益始占优胜地步。人皆如此，则二十周世纪之文明道德日隆矣。……”

德君主卫廉为美国青年会五十年纪念大会致贺词云：回忆五十年内青年会所得之进步，甚有兴会，冀将来发达之景象，尽臻完善。德国青年会代表同情愿贵会多陶铸良国民，光照邻邦焉。

日本君主明治当口俄战事毕，因主帅 Kodama 大将之封奏有云，臣多年虑及军士无事之日，能助德育交际之善法，终未惬意。及见青年会诸干事之施为，乃偿素愿等语，特颁国帑万元助青年会以示奖励”。^④

该文所列举的事例，不仅显示了青年会的全球化性质，而且通过列强高官对青年会的赞美提高青年会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青年会有意突出西方强国与青年会的紧密关系，其用意很明显，即欧美日本等国的富强是离不开青年会的，那么渴求富强的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拒绝青年会呢？



此外，青年会也列举了一位中国高官对青年会的赞美。“中国钦差毓大臣因客岁接待美舰事，特委书记员唐介臣观察致谢中韩青年总会总委办函内亦有云，承贵总委办赞助欢迎美舰，所备一切均甚合宜，本大臣感激不胜等语”。^⑤可见青年会希望国人知道，该组织不仅对美、英、法、德、日等强国起到好的作用，同样也可以为中国带来益处。

对于青年会而言，它是要从理论上来说明青年会事业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联系。在青年会看来，拥有“良国民”的国家，必定可以富强。“苟全国皆忠孝仁义之人，即人人有忠君爱国之忧，如此，即国欲不富强也，岂可得乎？试观欧美诸邦，其所以致富强者，莫不得力于良国民也”。^⑥而对于国民如何成为良国民，青年会也有设想。“而国民何以能良，实赖少壮时有好习尚，以端其品行，虽至老大，壮志未消，忠君报国之心为其所固有也。夫青年何以有好习尚，是非多立基督教青年会则不能”。^⑦为什么青年会能使青年具有好习尚呢？青年会的解释是：“斯会之宗旨虽曰三育，实则以德育为根本。夫德育者，固忠孝仁义之母也”。^⑧由此，青年会通过逻辑推理，将自己的宗旨，尤其是“德育”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固是邦青年会兴盛，则国势亦必因以兴盛。……故欧美诸邦青年会所林立，举国皆视为要图者，职是故也”。^⑨

另外，青年会针对国人渴求国家富强的民族情感所作的本土化努力，从青年会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到。《大公报》上出现的第一则关于青年会的报道是1902年7月5日的“来函”《天津青年会缘起》一文，作者署名“蓬莱慕学动”。该稿认为天津青年会缘起于中国人不讲“群学”，不能团结一致。“今日之中国，有人四万万，族非不繁也，其通达时务者，亦间有人。格致、政治，暨声光化电诸学，凡西人之所能者，华人中俱有一二能之者，而中国仍似是而非、若存若亡者，无他，人心涣散，群学不讲，不能团结团体故也”。^⑩青年



会的建立是为了养成国人“合群”的习惯，由小群渐成大群。“居今日而讲群学，其惟自小群以成大群欤。此天津青年会所由起也”。^①通过青年会的创办，培养中国人“合群”之习性，以便国家富强。“与上海各埠之青年会声气亦相应求，直将自小群以成人群者也。中国之复兴，或在斯举乎”？^②此稿对青年会的介绍不多，但将青年会的创办视为中国通向富强之路的一条途径，无疑是与青年会此后所进行的自我展示和宣传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青年会针对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和国人心理所作的努力。因此说，青年会在近代中国的全球化形象和本土化努力，在青年会自我塑造的“青年会乃国家富强之利器”的形象上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和完美的呈现。

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青年会的本土化努力

青年会针对中国的本土化努力，主要体现是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思想，扩大基督教和青年会在中国的影响。

1913年9月1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标题为“青年会布告”的新闻：“天津青年会第十二次阐明圣经大会之预告云，本会三育宗旨，以德育为基，故每年秋季开办阐明圣经大会一次，揭两约之精华，补五经之缺略，成效颇著。……”^③很明显，“两约”指《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代指基督教文化；而“五经”指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代指中国传统文化。天津青年会将“揭两约之精华，补五经之缺略”作为开办阐明圣经大会的目的，说明了青年会对融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期望。实际上，这是青年会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赢得国人认可青年会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方式。这也表现在青年会对其宗旨和会务的宣传上。

在《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17日的来稿《青年会之办法》



中，就集中了青年会对其宗旨和会务的介绍和宣传。该稿认为“青年会之所以蒸蒸日上为六大洲政界学界及工商各界人士欢迎者”，在于“纯正无偏”，“用三育之功以陶铸完全人格”。对于青年会所提倡的德、智、体、群四育，青年会从青年之性情的角度给予了明确的解释：“夫知、交、名、勇，人情之公好也。青年好知，斯会则有智育部以启迪之；青年好交，斯会则有交际部以联络之；青年好名，斯会则有德育部以勉励之；青年好勇，斯会则有体育部以鼓舞之。”^⑩毫无疑问，青年会提倡的四育，渗透了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因素。那么，当青年会在中国这个只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宣传其“四育”时，究竟采用了哪些方式呢？

青年会认为德育为青年会“四育”宗旨之基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古圣贤之经传，国家之法律，皆欲以正民德，而民德终难口进者，则以无适当之宗教辅翼之也。近世无宗教者概入无神派，不究人物之大本，罔识义理之大原，尚何德行之能修、德业之能立耶？青年会有见于此，特奉基督教以为圭臬，虽无论宗教与否皆可入会，而会友之品行要非漫无检束者比也。所谓畏天命于曰明曰旦之中、不睹不闻之际，乃能畏大人而有尊君亲上之心，畏圣言绝无离经叛道之事”。^⑪

众所周知，“圣贤之经传”、“民德”、“德业”、“义理”、“天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概念；而“正民德”、“畏天命”、“尊君亲上”、“离经叛道”等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论述的，却成为青年会宣传“德育”的有力武器。既然“圣贤之经传”是用来“正民德”的，而“民德终难口进”又是为什么呢？青年会认为是“无适当之宗教辅翼”所致，于是基督教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登堂入室了。而青年会“特奉基督教以为圭臬”，“虽无论宗教与否皆可入会，而会友之品行要非漫无检束者比也”。即使国人不愿意加入基督教，也可以加入具有基督教精神的青年会，以达到“正民德”之目的。而“每岁秋间开阐明圣经大会



一次,函邀华北中西道学名家,连日宣讲圣经要理,与多数人听”⁴²也是青年会“德育”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会务活动。

进一步分析,圣贤之经传难以“进民德”,青年会就一定能“进民德”吗?尽管青年会列举了许多在德育方面的活动,但究其实质,也不过是用宣讲和研究圣经的方法来进行,这与中国传统的研读“圣贤之经传”,又有何区别!虽然青年会的这段论证不无缺憾,但是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实际上,这也是青年会本土化努力的一种表现。而这种本土化努力,可以使得长期浸染于传统文化的国人更加容易地接受青年会及基督教文化。

在“群育”方面,青年会将自己的理论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了表达: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交道之宜讲也久矣。……本会特设交际部,因友结友以广通声气,藉资观摩焉。夫人以类聚,既可以文会友,莫若以友辅仁,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非虚语也”。⁴³

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名句“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成为青年会交际部设立的佐证。这表明,有着基督教背景的青年会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的。对于这些共通之处,青年会采用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表达,显然更容易引起国人的共鸣。

在理论上本土化了的“群育”宗旨,在会务活动方面,仍不时展现其“全球化”的形象。“每年春季开纪念大会一次,广邀中西会员会友咸集一堂,听诸大名家演说”;“再年终复有一宴会,系在会友人公请赞成诸公莅会,或假座洋饭店会食之余,宣布年中会务要端,间用电影演照寰球青年会成绩以供众览”。⁴⁴

每年春季的“中西公会员咸集一堂”和年终的“用电影演照寰球青年会成绩以供众览”,可以不时提醒天津青年会的会员,他们不仅是天津青年会的一员,也是全球青年会的一员。由此可见,青年会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密不可分。



青年会中也有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进行改造的活动，比如体育。“心灵附乎身体，斯身体与心灵有密切之关系。中华士人失之文弱者居多，谅由体育素未讲求也”。中国传统文化中，体育向来是不被重视的。但近代中国，“东亚病夫”的屈辱使得中国人对于增强自身的体质抱有极大的热情。而“青年会于体育一门颇擅胜场”，于是青年会在体育方面取得了最为明显的成果，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大的。青年会发起组织了天津青年运动会，“除平日会所学堂内兵式体操、柔软体操、游戏体操外，另有跃高、跃远、竞走、掷铁饼、铁弹、铁□诸般技操”。这个在天津发起的运动大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北京、通州、保府皆有赴会赛操者”。而在运动会上，青年会所创办的普通学堂多次占优胜，“分数最多”。^{②9}

虽然在体育方面，天津青年会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借鉴不是很明显，但是，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东亚病夫”的屈辱感，却是青年会致力于开展体育活动并在体育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种角度讲，青年会在体育方面的本土化色彩也是很明显的。而体育运动的普及，必将给不重视体育运动的传统文化以极大的冲击，使国人逐渐接受“体育”这种新的文明生活方式。

青年会宗旨虽然是“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③0}似乎不存在宣扬基督教的功能，而且“虽无论宗教与否皆可入会”，^{③1}但不可否认，青年会身上仍有一定的宣教色彩。青年会的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乃是引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中的经文。其宣教色彩主要隐藏于会务活动中。

青年会在“每星期五后向于租界城内同时开会宣讲；另于星期二晚刻查经谈道，以资研究理学之功；每岁秋间开阐明圣经大会一次，函邀华北中西道学名家，连日宣讲圣经要理，与多数人听”。^{③2}很显然，这里所宣讲之经，所查之经，都是指基督教经典《圣经》；而且青年会所谓“德育”，必定是基督教之“德育”；所要培养的“健全人格”，也



应该是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人格。很明显,青年会在实行“德育”的同时,宣扬了《圣经》,也宣扬了基督教的精神。

除此之外,青年会还通过征文的方式来宣扬圣经和宣扬基督教。青年会曾在《大公报》上刊载一则广告:

“本会征作圣经论题一道刊布流传,业经数月,特以收到之卷,教中友人惠寄者,十居八九。外间作者多未交卷,与本会征文之初心,颇有未惬,兹特公议展限至五月节前,一律交齐,过期不收。望远近名硕,具有愿作未果或未完卷者尚可潜心撰结,竟成佳章,未始非立言不朽之一端也。将来必就投卷之多寡,酌广额数。另有奖格,惟因本会总董五月有赴中之行,揭晓日期亦须迟至八月初一,始能办毕伏冀,诸君子鉴谅是荷。——天津青年会谨启。”^②

从征文题目来看,该广告“征作圣经论题”,无疑是为宣扬圣经和基督教;从征文对象来看,虽然无论是否教会中人都可以参加,但征文的组织者——天津青年会显然更寄希望于“外间作者”,即非教会中人,因此便要延期。将教会外人作为征文之“初心”,也十分符合将基督福音传播于未开化之人的宣教思想。

此外,青年会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所组织进行的活动,也起到间接的宣教作用。因为这些活动都是由青年会所组织,青年会的思想观点便不可能不影响到这些活动,从而影响到参加活动的人们。同时,这些活动无疑会扩大青年会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当人们在为青年会所吸引的时候,青年会背后的基督教理念、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青年会的“宣教”色彩和功效,都十分明显。

青年会在进行自我宣传和展示的时候,努力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扩大影响,用中国的文化思想为青年会的宗旨作证明,用中国人熟悉的概念来宣传青年会的宗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同者,则借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近者,则努力融合二者,以达到传播自己思想的目的。这显示了青年会的本土化努力。



而青年会在致力于本土化的同时，也不时展现其全球化的色彩。如利用青年之普遍人性，来宣传和解释青年会的“德、智、体、群四育”。无论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化，还是利用人类共性的全球化，都使得青年会的宣传更加容易让国人接受和认同。这也是青年会自我展示和宣传的一大高明之处。

当青年会在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实现本土化的同时，青年会背后的基督教文化，正随着青年会逐渐被国人认可，而或明或暗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青年会身上交汇，使得青年会同时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色彩。

三、天津青年会会所的建立

——一个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的案例

本文所讲的天津青年会会所是指天津青年会自 1895 年创办以来所兴建的第二个会所。天津青年会第一个会所，是由天津青年会创办人米会理先生筹集资金，于 1896 年 4 月在现在的大沽路口大营门一带建立的。该会所在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之时，由时任青年会总干事的格林先生租给德国人，而青年会则搬到东门里经司胡同 8 号。由于空间有限，所以天津青年会的许多活动，都要租用场所，例如“迄今计开春季大会十有三次，皆假英工部局之戈登堂聚会”。²⁴“第因办公会所向系租用，非特租价匪轻”，²⁵规模也有所限制，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会所。但是因为建立新会所需资金太多，故总是迟延未决。

到了 1909 年春，事情有了转机。“中韩青年会总委办巴乐满君过津，与公董决议，当为本青年会建一合宜会所。其修筑费十万元允由美国善会代筹；购地一节，例皆就地筹款”。²⁶既然建立新会所需资金中的大部分已经解决，那么建立新会所的工作便很快开展起来



了。“七月上旬,于东马路已购妥地基一段,坐落适中”,“议定价银一万一千五百两,合之建修限内所缺经费,共需筹银四万二千余两”。^②这需要自己筹款的银四万多两,便成为青年会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筹款,青年会在《大公报》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造势。

1909年10月22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来稿《论青年会所》,讲道:“青年会之会所为办理会务之要图,舍此无以展布会中一切事务”,^③强调青年会会所的重要性。该文以寰球青年会所,特别是美国之青年会会所为例,对青年会的重要性、建立方式,及其规模形式作了一个具体而细致的描述。

“在北美国青年会所六百三十处,共值美金六千二百八十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元。其小会所约值数千美金,大会所值美金十数万元、数十万元不等。各处会所建造之款皆由各该处官绅商学各界人士以及局所公司捐资乐助,成此善举。斯会于泰西各国冲要通商大埠,无处不有。论其内容,则有接待室、阅报处、演说厅、游艺所、练体所、沐浴室、抛球室、幼童部、俱乐部,凡有裨益于青年幼童增长德行知识者,无不完备”。^④

青年会会所对于青年会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因为全世界的青年会会所,从其结构内容来看,都是差不多的,一般都会设有接待室、阅报处、演说厅、游艺所、练体所、沐浴室、抛球室、幼童部、俱乐部等。不同的是,大会所的规模大一些,内容设施更加齐全一些;而小会所则稍微简略一些。这样一来,青年会会所便成为青年会全球化形象的一种象征。天津青年会兴建新会所,则是其融入青年会全球化的一种标志。

青年会对美国青年会会所的介绍和宣传,不仅向国人展示了青年会的全球化形象,更希望以此引起国人对天津青年会新建会所的注意。“本埠青年会试办十有三年,规模粗具,尚未能自置地基,建新会所,实系一大缺点”。^⑤



为了筹集建新会所的银两，青年会多次以“来稿”或“来函”的形式在《大公报》上进行劝捐宣传。这种宣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明捐款之必要。

首先，说明青年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的作用和功效。“学堂不可以不立，特造就者，有限之青年；而会所陶铸者，则无限之青年也。新政不可以不兴，第号令科条，纳民于有形之轨物；而会所之功能，则潜消默化，纳民于无形之轨物也”。^⑤通过用学堂、新政与青年会所功能的对比，说明青年会所具有和学堂、新政一样的功能。无形之中，将青年会与学堂、新政置于同等位置，都是利国利民之善举。于是，这个有助于中国富强的青年会组织拥有了本地化的形象。

青年会的这种宣传，使得其为了建立新会所而进行的劝捐行为有了充分的理由和道义上的资本。“况学务政治，皆有专司，津郡次第举办者为各省冠，而于青年公所，尚未建立一处。揆以新世界新城镇应有之规模景象，不犹遗一大缺点乎？乐善诸君子，曷留意察之”。^⑥天津在兴建学堂、举办新政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对于同样利国利民的青年会会所，却未建立一处，这显然是不应该的。青年会更将其会所作为“新世界新城镇应有之规模景象”，认为缺少了青年会会所便是一大缺点。这又是青年会利用其全球化的形象，作为其劝捐行为的理由。

其次，详细介绍天津青年会成立以来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证明为建新会所捐款是理所应当的。

“就直省而论，近数年来，若许青年学士不善学东洋教育，误会天演论说，多有入无神一派者。人既萌无神之思想，则何事不可为也。苟人人肆意妄为，所谓有强权无公理矣，无公理乃乱民耳。幸有美国诸善士立青年会于津郡以匡救之，时倡智育演说，启发青年之思想；时讲体育各法，振刷青年之精神；时开德育宣讲，辅助青年之品行，救正青年人心，固结中国团体，其功岂浅鲜哉？其设立普通学堂，独开



中国风气之先，为北洋大、高各学堂之预科，特其显焉者耳”。^⑩

青年会列举其对天津，尤其是对天津青年的重要贡献，显然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所取得的成绩向国人证明，它是有益于中国和天津的一个组织。通过对天津青年会为天津所作贡献的列举，使得青年会的本土化形象进一步得到加强，而青年会的劝捐宣传也因此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再次，青年会列举社会上种种浪费金钱的举动，指出应该“节无益之挥霍，为有益之经营”。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经济困难，银根短绌”，所以无钱捐助建立青年会会所。对此，青年会认为“办公之财力不见有余，循私之财力，实未偿不足”，“即茶坊、酒肆、妓馆、娼寮，无不继长增高、竞多斗靡焉。游其中者，浪掷金钱，贾取病祸，大有流连忘返之致。聊举烟卷一宗言之。据最近确实调查，某公司进款均数口售万元，统数处公司计之，当日有数万元之消耗。其他无益之生涯，有损之嗜好，所费巨款，可以类推”。^⑪由此可见，青年会对于中国的“流俗”，知之颇深。

青年会认为“财之为物，贵用于正，正用虽多，于实际无所亏损，其源不竭；妄用虽少，于社会无所补益，其流宜节”。并用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论证，“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⑫在青年会看来，建立青年会会所是“正用”，应该有充足的财物来支持它。而青年会对中国传统财富观的利用也是十分到位的。青年会宗旨以培养具有“忠孝仁义”观念的“良国民”为目标。而中国传统刚好是“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将那些造成“不安”因素的财物，交给青年会，以支持其培养“良国民”，那么社会便可以获得安定了。这种宣传使得为青年会捐款与中国传统的财富观联系到一起，大大增强了说服力。

青年会针对中国“流俗”所作的批评，显示了其对中国情况了解的深度；而青年会对中国传统财富观恰到好处的使用，证明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而这两点又说明了青年会的本土化达到了很高



的程度。正是这种高度的本土化，使得青年会的劝捐宣传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

通过《大公报》的报道，我们知道青年会的募捐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天津社会各界名流，纷纷解囊相助。青年会会员欧阳旭德君慨捐银二万两，以个人之力独立承担一半之筹款。^⑧“邮传部徐尚书捐洋二百元，天津电报局二百元，学部左堂严范孙侍郎二百元，翰林院侍讲李子香太史认常年捐一百五十元；商会总理王竹林观察建议由房山某运煤公司捐助千金，益照临张幼安君五百元，傅学究五百元，北洋大学堂教务长王少泉君五十元，太古洋行经理郑翼之君三百两，正金银行经理魏信臣君一百元。”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其余衔名极多，不及备载”。《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新闻之后，评论道：“足见该会有益国民，人多信仰也。”^⑨青年会有益国民，是国人踊跃捐款的一个原因，而青年会的劝捐宣传之得力，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天津青年会共收到捐银三万七千两，再加上美国友人万那美克先生(Mr. Wanamaker)捐献的十一万四千美金，建立新会所所需资金全部筹齐。^⑩1913年2月，青年会在东马路为新会所举行了动土礼式，并邀请美国社会学专家海端森博士演说青年会在全球之发展状况。^⑪1913年5月23日，青年会为新会所举行奠基礼，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直隶内务司长刘仲鲁、前任直隶提学司卢木斋等参加了奠基礼。^⑫

1914年10月16日，天津青年会新会所落成，建筑为四层大楼，按照当时国际青年会标准模式建造。新会所共有房间206间，内有礼堂、阅览室、会议室、体育馆、健身房、地球房、宿舍等设施，颇具规模。其中，乒乓球、台球均为天津市第一张球台。^⑬

青年会会所是青年会全球化的一个象征，因为全球青年会的会所都有着共同的标准模式。天津青年会的新会所也是按照国际青年会的标准模式建造，自然是其全球化形象的重要标志。从建立新会



所所需资金的筹集情况来看,建立新会所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美国友人的捐助,这也体现了青年会的全球化色彩;而国内自筹的那部分资金,则主要依赖于青年会在国人心目中的被认可程度或者信仰程度。而这种被认可程度又主要取决于青年会的本土化程度,从青年会的劝捐宣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青年会在劝捐宣传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本土化的组织。而这种本土化形象的塑造,极大地增强了青年会劝捐宣传的说服力,使得青年会能够顺利地筹得所需资金。

天津青年会新会所的建立,一方面是其全球化形象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体现了青年会的本土化努力。在天津青年会新会所身上,集中体现了青年会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结合。

四、结语:天津青年会

——青年会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结晶

本文对青年会在《大公报》上自我展示的分析,主要限于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即1902年至1916年。选取这一时段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身为天主教徒的英敛之对于天津青年会始终都非常关注,并十分支持青年会在《大公报》上进行的自我展示和宣传。因此,青年会在1902年至1916年期间,在《大公报》上留下了比较丰富的文字材料。而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此一时段青年会在大众媒体上对自我形象的展示和宣传,十分重要。本文对青年会在大众媒体上进行自我展示和宣传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青年会在《大公报》上的“广告”和“来稿”进行的,其中尤其是对“来稿”的分析和研究。

通过对青年会在《大公报》上的“来稿”的研究,笔者认为,青年会在进行自我展示和宣传的时候,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青年会努力将自身事业的发达与国家的富强联系起来,力图塑造“青年会乃



国家富强之利器”的大众形象。青年会这种自我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其全球化色彩来实现的。青年会以欧美、日本等强国为例，指出“欧美诸邦”之所以能够富强，实与青年会有莫大关系也。而近代中国屡受外侮，国人渴求国家富强之愿望十分迫切，并一直以“向西方学习”为通向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青年会自我塑造的有助于国家富强的形象，正好契合了近代国人心理，十分有利于近代国人对青年会的认可和接受。这也正好说明了青年会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同时，青年会将自我形象的塑造与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国人心理巧妙联系起来，也表明了青年会的本土化努力。在这里，青年会的全球化背景被转化为天津青年会实现本土化的资源。

青年会进行自我展示和宣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注重借助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青年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度，其国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让中国人接受和认可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青年会，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或者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自身的基督教文化进行融合。青年会的这种做法，可以使得中国人通过自己熟悉的概念和思想，了解陌生的基督教文化，而不至于产生过度的抗拒。青年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也显示了青年会的本土化努力。而这种本土化努力，也有助于天津青年会赢得国人的信仰，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而当天津青年会通过本土化过程发展壮大之时，也意味着青年会的全球化得到了加强。

可以说，天津青年会是青年会全球化和本土化结合的产物。这一点，通过天津青年会新会所的建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新会所是按照国际青年会的标准模式建造，与全球青年会会所保持一致，这一点明显地体现了天津青年会的全球化形象；此外，建立新会所是由中韩青年会总委办巴尔满首先倡议，建立新会所的大部分资金由美国友人提供，新会所动工仪式上由美国博士演讲等都表明了天津青



年会的全球化色彩。而为了建新会所，在国内进行的劝捐宣传，又充分地展示了天津青年会的本土化形象，并因这种本土化形象，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解囊。正是在天津青年会的全球化背景和本土化努力的共同作用之下，天津青年会新会所才得以建立。

总之，青年会在《大公报》上的自我展示和宣传，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青年会为目的。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青年会或利用其全球化背景，将自己塑造成“国家富强之利器”的形象，以迎合近代国人渴求国家富强的愿望；或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使青年会本土化，让国人在熟悉的文化环境中，认可青年会和基督教文化。应该说，青年会的这种自我展示和宣传十分成功，它让很多国人认可和接受了青年会，天津青年会新会所的成功建立便是一例。

在青年会的自我展示和宣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结合，即天津青年会将青年会的全球化背景转化为其本土化的资源，并通过本土化过程使得青年会得以发展壮大；当天津青年会通过本土化发展壮大时，实际上也意味着青年会的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加强。这说明了全球化和本土化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密不可分的两方面，全球化是以本土化为前提的，而本土化又依赖于全球化，在本土化中实际上包含了全球化。

注 释：

①“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②“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9年10月12日。

③“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9年10月12日。

④“青年会之证书摘要”，《大公报》，1909年10月14日。

⑤“青年会之证书摘要”，《大公报》，1909年10月14日。

⑥“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⑦“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 ⑧“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 ⑨“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 ⑩“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 ⑪“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 ⑫“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 ⑬“青年会布告”，《大公报》，1913年9月19日。
- ⑭“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
- ⑮“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
- ⑯“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
- ⑰“青年会之办法”（续昨稿），《大公报》，1909年10月17日。
- ⑱“青年会之办法”（续昨稿），《大公报》，1909年10月17日。
- ⑲“青年会之办法”（续昨稿），《大公报》，1909年10月17日。
- ⑳“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34页。
- ㉑“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
- ㉒“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
- ㉓“征文展期广告”，《大公报》，1904年5月28日。
- ㉔“青年会之办法”（续昨稿），《大公报》，1909年10月17日。
- ㉕“购地建新会所募捐启”，《大公报》，1909年11月26日。
- ㉖“购地建新会所募捐启”，《大公报》，1909年11月26日。
- ㉗“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 ㉘“论青年会所”，《大公报》，1909年10月22日。
- ㉙“论青年会所”，《大公报》，1909年10月22日。
- ㉚“论青年会所”，《大公报》，1909年10月22日。
- ㉛“劝捐述言（本埠青年会报告）”，《大公报》，1909年11月8日。
- ㉜“劝捐述言（本埠青年会报告）”，《大公报》1909年11月8日。
- ㉝“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 ㉞“劝捐述言（本埠青年会报告）”，《大公报》1909年11月8日。
- ㉟“劝捐述言（本埠青年会报告）”，《大公报》1909年11月8日。



③⑥参见“慨捐巨款”，《大公报》，1909年10月24日。

③⑦“捐款踊跃”，《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③⑧“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36页。

③⑩“美博士演说”，《大公报》，1913年2月21日。

④⑩“青年会纪事”，《大公报》，1913年5月30日。

④⑪“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36、55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王建明

季羨林老先生曾多次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动力之一。”作为近代天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介和媒体，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天津青年会）从 1895 年成立后，就积极从事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大力介绍和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极力推进西方文化在天津以及全国的传播与发展，为天津以及整个中国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天津青年会的这些活动，尽管一方面是为了改变中国新一代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扩大和加强青年会在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青年会的许多会员努力向西方学习，力图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

然而当前学界对青年会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研究较少，因而本文欲在先学的基础上钩从史料，从多个方面对天津青年会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进一步加以综合地考察，期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有所助益，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与其发展的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MCA”),是旨在青年学生中培养教徒,影响社会的基督教外围组织。1844年在英国伦敦创办,后来逐渐传布到西方各国,1851年流传到美国,1885年自美国传入中国,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联系广泛的、世界性的国际性宗教团体。1895年12月,天津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米会理创办,并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外围组织,天津基督教青年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学,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青年会德育事业的核心是:向广大青年灌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宗教事工。因而它秉承基督教的教义,竭力提倡宗教活动,竭力提倡、努力实现,并采取各种方法将基督教义与精神灌输到青年学生的生活中。为此,天津青年会在会员中设立查经班、举办宗教演讲、主日会、灵修会、夏令会、退修会等多种宗教活动吸引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基督教义,学习圣经,举行宗教演说和辩论,来宣传和传播基督教。

1895年12月15日,天津青年会决定创立英语查经班,最初决定每周上课一次,由勉励会主持。其后不久,查经班还召开英语辩论会。^①1909年,张伯苓的胞弟张仲述在南开中学约集同学数十人组织成立了南开学校青年会。南开学校青年会以“以研究基督教之要道,发达德、智、体三育”为宗旨。最初他们在每星期日聚萃其室论道读经,名为“读圣经会”,后改名为“耶教研究会”。^②后来,南开学校青年会又在会员中设立查经班,每周举行四次查经活动,后改为一周三次。时间分别为周一、四和周五,领班者分别由徐雁川、余日章和胡学源。^③

天津青年会虽然不是一个教会组织,但它却是基督教的外围组织,他的宗教使命就是辅助教会传播上帝的福音,引导人皈依上帝。因而每年还要举行一些重大的宗教活动。以1935年为例,天津青年会全年开展的各种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有:

1.4月14~21日,青年会将这周定为青年决志周,复活节礼拜为



青年受洗礼拜：

2.4月21日，在其会所礼堂举行耶稣复活节纪念大会，邀请新学教授 Mr Erald Luxon 演讲，同时为了促进国际友谊还邀请犹太德国、美国、俄国、日本儿童来会进行诗歌表演；

3. 为简明基督圣道，引人皈依基督教，每季度天津青年会都要组织成立宗教研究班；

4. 组织成立青年唱歌班，每周六练习演唱一次；

5. 为给青年灌输耶稣基督的主义和精神，组织青年礼拜；

6.12月23日，天津青年会举行耶稣圣诞庆祝大会等六项之多。^④

正是通过这些活动，天津青年会向青年宣传了基督教的信仰，灌输了基督教的观念。而宣传和传播西方基督文明的同时，就是宣传和传播西方文明。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作为青年会的一个典型会员小团体——联青社，它的成立与其发展也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27年9月中旬，天津青年会在其会所内召开成年会员工作委员会上，青年会总干事郝瑞满在会上提议成立联青社，此决议得到与会的杨宽麟、杨锦奎（美国籍华人）、黎宗尧、阮渭涇、顾海田、关颂声、宋愚溪、董守义等人的一致赞同，并同意作为联青社的发起人。9月27日，青年会邀请天津各界上层人士100多人，在英租界共济大楼召开成立联青社大会。次年6月1日，该社被美国总社承认为“万国分社”之一。天津联青社以是否受过欧美教育作为入社的先决条件，不会讲英语的人是不可能加入联青社的，甚至英语说得不流利的人到了联青社也会感到吃力的。因而其会员大多都是与欧美人士有着密切联系的洋商、买办、银行经理，甚至还有美国驻津领事。^⑤此外，联青社的通信书记，还根据从美国寄来的详细表格，按季度与年度直接向联青社总



社填报活动与服务的工作,这是联青社与美国总会的组织关系。^⑥该社与美国联青社有着密切的从属关系,与基督教青年会更是如同母子。青年会干事杨肖彭赴美留学时,还同美国各地的联青社及“国际联青社”的主要人物都有所来往。^⑦

此外,天津青年会在其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得到了国外友好人士的大量的捐款。1896年4月,美国克利夫兰城的戴乐尔太太(Mrs Livingstone Taylor)来津,后为青年会捐款1万美元(另一说为14000两白银),作为建筑会所之用。不久青年会利用这笔钱建造了天津青年会的第一处正式会所。这个会所楼房,后来被称为“戴乐尔纪念大楼”(Living-stone Taylor Memorial Building)。次年6月5日,青年会举行新会所的落成典礼,埃德穆德·卡森斯也捐款1000多两。^⑧1913年5月23日,美国友人万那美克捐助114000美元,兴建青年会东马路会所。第二年10月16日,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今市少年宫)落成。其建筑为四层大楼,按照当时国际青年会标准模式建造,内设阅览室、会议室、体育馆、礼堂、招待所等,颇具规模。青年会以此为阵地,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声誉。

二、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引进和传播

天津青年会成立后,极力主张、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其体育方面的教育就是使青年养成健康体魄。因而青年会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广泛提倡和开展各种健康活泼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游戏活动,以焕发青年的精神,增强其体质。但当时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天津青年会利用各种时机大力引进西方的体育观念,传播西方的竞技体育项目,组织策划各种现代的运动会,为近代体育活动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向近代体育的转型。



1. 宣传和引进西方体育运动

由于青年会设立了体育部,美国青年会常派遣一些体育专业人员来中国负责青年会的体育工作。这些体育专业人员,除了在青年会传授运动技术以外,还到当地的学校指导体育活动,介绍西方体育的理论与方法。1903年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派出外籍干事饶伯森、盖克、沃克尔、白雅各等人分别到北洋大学、新学书院、工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普通学堂、官立中学堂等地发表重要讲演,并传授篮球游戏及田径活动,各项体育活动鹊起。^④在天津青年会的推动下,天津首先引进了一批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青年会在其会所内开展的体育活动就有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垒球、赛艇、田径等。如1904年乒乓球引进中国,天津成为我国最早流行和发展的城市,而天津的第一张乒乓球球台就出现在青年会会所内。1931年青年会成功地举办第一次全市乒乓球公开赛,这也成为了天津乒乓球正式比赛的开始。1936年,天津青年会又举办了第一届华北埠际乒乓球赛。

当然天津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宣传和引进贡献最大的是引进和推广篮球运动。1895年9月,美国人来会理博士,受北美青年会的派遣来中国天津筹建城市青年会,同年12月8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医学堂成立。会前与会后来会理表演了篮球游戏,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篮球表演。这标志着篮球运动正式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此后不久篮球运动在天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896年1月11日下午4时,天津青年会举行了中国篮球运动史上较为正式的篮球表演。在考证近代篮球传入中国起始的问题上,据1948年赴美的吴志钢博士提供,1896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曾公布以下三次英文布告,布告的原件收藏在纽约市百老汇街291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内。吴志钢博士特地将三次英文布告抄后寄回



国内。这三次英文布告的内容是：第一次布告 1895 年 1 月 11 日：一场篮球赛将于今日下午举行，所有爱好运动的青年，请于四时踊跃参加；第二次布告 1896 年 1 月 18 日：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四时举行篮球赛，来参加这项运动吧；第三次布告 1896 年 4 月 4 日：上星期六下午举行了一场热烈的篮球赛，另一场将于今日下午四时举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有关篮球活动最早的文字记载，它说明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 1895 年 12 月举行了中国近代篮球运动史上最早的一次篮球表演活动。

后来，米会理在他的《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天津青年会之最初运动，每周一次查经班、辩论会。此外，会员对篮球亦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概。但在玩球以前，他们的一番姿态很是可观，他们必须盘好自己的头辮、修短长长的指甲，把不便利的长袍脱去。这样他们就把书生的尊严放弃，而换成一副高兴活泼的姿态了。但是，这种运动只在会所草地围墙背后举行，颇有狭隘不便之概。

天津早期的篮球活动，球场设在青年会院子的后面，场地设有一定的尺寸，人数没有限制，规则也很简单。华北地区是近代中国开展近代篮球活动的最早地区，而在华北篮球活动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人饶伯森(C. H. Robertson)先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于 1904~1908 年在北京与天津青年会工作期间，积极倡导篮球运动，在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曾到京、津各校讲授“西洋体育”，同时也宣传了近代的篮球运动，使篮球运动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

2. 开展体育活动，组织体育竞技比赛

开展体育活动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四育教育方面的重要一环，也是他们工作的重心之一。从天津青年会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发起组织许多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为了方便人们进行体育活动，天津



青年会在其会所内或附近建立体育活动场所,设置各种体育设备,设立专门的体育干事(外国人和中国人),吸收各学校学生到青年会从事体育活动。

1896年1月11日,天津青年会首次举行较为正式的篮球比赛,至4月4日已进行了多场比赛。1899年,青年会组织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此次联合运动会由北洋大学主办,参加运动会的学校除了北洋大学堂外,还有天津的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校。特别是在1903年,天津青年会以普通中学堂为主,发起组织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学校有:北洋大学堂、官立中学堂、新学书院和高等工业学堂等校。此次运动初名为“天津青年会运动会”,从1914年即从第11届起改名为“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至1925年共主办了21届(其中仅有1923年暂停一次)。^③此后,外地的一些单位来参加比赛,使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形成了华北区域运动。

1910年,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张伯苓与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全美橄榄球中锋)、上海青年会负责人共同在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并任总裁判,后来国民政府追认为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会后张伯苓与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被选为董事,这是全国性第一个体育团体。紧接着在1911年4月15日张伯苓与北洋学界联合主办运动会,北京、通州、顺德(河南省)等地的运动员参赛,这是华北运动会的雏形。

全国运动会成功的创办极大地鼓舞了天津青年会组织举办更大规模运动会的决心,在天津青年会的积极努力下,张伯苓和青年会全国体育干事葛瑞联合日本青年会和菲律宾体协,组织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远东运动会”。



3. 设立体育训练班,训练体育专门人才

由于体育专业人才的缺乏,天津青年会除开办正式学校培养高级体育人才外,还开办大量的训练班,多渠道培育专门人才。青年会体育部开办的各种项目的短期培训班,时间由半个月至半年不等。如1921年11月3日,青年会童子部开会议定,设立体育师范班,其宗旨为:养成体育师范人才,以为服务社会之根本。

由于天津体育运动的迅速发展,体育裁判员的缺乏成为制约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障碍。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为培养和训练裁判员人才,开始筹备成立裁判员训练班,请专门体育家担负指导和讲师,课程规定为球类、田径、体育原理、运动规则等等。1933年3月,天津青年会在其会所内召开了体育协会裁判员全体会议。1935年11月,天津青年会筹备成立裁判员训练班。^⑬

此外,天津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的杰出贡献还体现在培养了许多体育活动家。其中最著名的两位要算董守义和王正廷。董守义,1922年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同时兼任南开学校体育教员,教授篮球及田径运动。1925年,他又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和南开体育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南开学校出现一支全国闻名的“南开五虎”篮球队。1936年他以篮球队教练身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并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成员,赴丹麦、瑞典、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中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代表团总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积极为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在国际奥委会中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正廷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学时,就成为了天津青年会会员,1904年他被青年会全国协会派遣到日本,到中国留日学生中展开青年会的宣传组织工作,1909年,他还被派遣到美国,任中华基督教留



美青年会干事,1915年他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第一位中国籍总干事。由于他们在开展近代体育运动以及外交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此二人均被当选为中国奥运会的委员。

通过传播西方体育精神和体育思想,天津青年会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重心智轻体质的“文弱书生”,“弱不禁风”的传统文化习俗。通过组织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他们又使人们开始重视身和心的和谐一致发展,并开始意识到身体的基本功能和重要性。同时,天津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介绍和传播,对促进天津以及整个中国的近代体育的兴起和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选派会员赴国外留学、观光和旅游

为提高青年会会员的学识能力,增长其见识,天津青年会多次选派年轻有为的会员赴国外留学、观光和旅游,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这在客观上加强了近代天津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为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1年6月,青年会干事宋愚溪,被青年会选派赴美留学一年。宋愚溪也成为了第一个被天津青年会选派赴国外进修学习的人。1917年,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帮助南开学校校长兼天津青年会董事会董事张伯苓,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借助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格林的介绍和帮助,张伯苓以后多次赴美进修,广泛接触到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同时还多次赴美国各地开展募款活动。很多时候,张伯苓就寄宿在美国青年会。^②1946年,张伯苓还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的学位。

1923年5月,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董守义被推荐到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春田学院的700个紧张的日子



口夜夜,他以自己的勤奋和才能,证明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并不天生就是“东亚病夫”。他成为了美国中部青年夏令营体训班网球比赛双打冠军之一,又是棒球赛的冠军成员之一。作为春田学院网球队队长,他夺得过美国东部青年会夏令营网球比赛的单打和双打冠军。他同时又是春田学院橄榄球代表队的中锋。1925年7月,董守义毅然回到天津,担任了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兼南开学校的体育指导。

1936年,陈锡三代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之职。由于他文化程度较低,资历偏浅,尽管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可他并不为当时董事们所重视。因而,该年夏在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协会与北美协会的资助之下,他被青年会送到加拿大的孟垂奥(Montreal)去留学一年。^⑬1948年,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杨肖彭也被选派到美国留学一年。在留美期间,杨肖彭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到美国各地去访问参观,了解许多美国青年会的工作情况,同时他还多次向美国同仁介绍中国青年会的工作情况。^⑭

除了派会员到国外留学进修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多次组织会员赴国外旅游观光。1935年,天津青年会以观光日本文化建设为由,组织“赴日旅行团”,到日本观光和旅行。他们这次赴日旅游观光,共进行了三个星期,足迹踏遍了日本大阪、东京等名胜古迹,使参加此次旅行的会员获益匪浅。^⑮次年7月3日~9月23日,天津青年会又组织会员组成赴美旅行团,游历西北大公园,圣保罗、芝加哥、抵托、拉哥拉城、纽约、费城、华盛顿、好莱坞、旧金山、檀香山等30余处地方。^⑯

通过选派会员赴国外学习和旅游观光,增强了他们的见识,提高了他们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他们与国外的联系。许多会员回国后,大多都成为了天津青年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为天津以及全国与国外的中外文化交流作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四、对来华的西方人士的接待

天津基督教青年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外围组织,也成为西方传教士和国外青年会同仁来华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抵津后都要到青年会中做客或进行传教活动。

1896年9月2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Christian Students Federation)的总干事和北美协会学生干事穆德(John R. Mott)来到天津,穆德在来会理的陪同下为天津青年会楼房举行的奠基礼上发表了演说,同时来会理又陪同他到各大城市游历视察,和各地教会与学校进行频繁的接触,结果是青年会很快就在全国各处成立。^⑩此外,在1907年,天津青年会就接待了16位来津做客和传教的传教士。他们在时间上先后来津的次序是:

美国纽约的穆德(John R. Mott)、北美协会总干事慕尔斯(R. C. Morse)、斯德哥尔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福米斯(Kaul Fries)、美国保提慕尔州女子学院校长哥其尔(John Gouher)、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毕奇(H. P. Beach)、纽约北美协会的克尔顿(E. T. Colton)和海瑞(C. D. Hurrey)、德国柏林的威尔森(Baron Von Werthen)和吉尔泰尔(Von Gerdell)法国巴黎的波尔泰尔斯伯爵(Count Pourtales)和苏特尔(Sautter)、荷兰的阿株安尼(H. Adrjang)、美国的柏克豪斯(B. H. Backhouse)、美国的赛威尔安司(L. H. Severance)、美国的武德华(S. W. Woodward)和司理门(J. B. Sleman)。^⑪

许多布道家来到天津后进行的布道活动和“布道大会”,许多都是由天津青年会负责安排。1918年在南开学校青年会举行的月会上,特意邀请美国布道家常德立先生讲演题目为“变化人心之秘诀”。^⑫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艾迪博士来津进行布道活动时,都是天津青年会一手负责安排的。1911年艾迪来津进行布道活动时,天津青



年会组成了以张伯苓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安排他的布道活动。后来,天津青年会又多次邀请艾迪来津进行演讲布道。特别是在1931年7月,艾迪博士受邀再次来到天津青年会,在天津艾迪博士连续举行了一周的演讲活动。7日,他在青年会会所内作了《现今世界大局对中国之关系》的演讲。11日,他又在法租界维斯理堂为观众作了《中国之危机》的演讲。^②此事轰动了宗教界,同时它还对天津各社会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青年会早已脱离了宗教范围,成为联合社会各界人士投身社会服务的总枢纽。

此外,为了学习国外青年会在服务社会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天津青年会还特意邀请许多西方基督教青年会团体来华进行访问。1933年4月27日,德国童子军世界旅行团石密特一行5人应邀来津,石密特在天津青年会会所内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德国青年会在服务社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在社会服务之中的工作方法、方式以及青年会对德国人日常生活之影响。^③

对来华西方人士的接待,不仅有利我们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同时还有利于我们加强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合作,加强我们与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五、举办许多重要文化活动传播西方文明

天津青年会为了改变中国新一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想法,加强青年会在青年一代中的影响,特在青年会会所内兴建了许多文化设施,这些对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促进青年会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联系,天津青年会组织举行了“国际音乐演奏会”、“国际联谊”和“国际武术表演会”等国际性会议和活动,来加强中外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为更好了解西方音乐,促进中外音乐的交流,天津青年会举办了多次国际音乐演奏会。如1936



年5月,青年会在法租界维斯理堂举行国际音乐大会,这次音乐大会青年会特意邀请在津美国音乐队、意大利音乐队、英国音乐队、维斯理堂歌咏队、日本怀琴会、夏威夷音乐队、英国瑞克斯太太独唱团、俄国沙振钢琴独奏队等10多个国家的音乐人才,来为中国观众表演。^②

为了增进国际友谊,了解国际武技发展的趋势,天津青年会多次组织国际武术表演大会。1931年3月7日,该会体育部在该会大礼堂举行国际武术表演大会,其中参加此次表演的团体有日本青年会武术社(10名)和美国兵营武术团(10余名)。表演的项目有美国击技、中国武术、日本柔道等。^③1935年11月20日,青年会又在该会大礼堂举行了国际武技表演大会。参加此次大会表演的各国武技名手有意大利兵营和美国兵营的拳击、日本青年会的柔术(注:为日本的柔道)和劈剑、沙俄和美国兵营的摔跤。^④

1907年3月,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派遣4名干事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韩青年会会议,会后不久,青年会又委托仲子凤作为代表赴日参加“东京万国青年会”会议。1919年11月,为了积极支持和响应美国青年会的号召,照顾一战中受伤的士官以及谋求战后的幸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津埠绅商成立欧战协济会直隶筹款部。后来到11月20日,协济会直隶省全省共捐款333944.65元,其中天津捐款212131.119元。这次共有91993人参与捐款。捐款中一大批直接捐给了法国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阿尔贝特市进行市政建设,修建医院及重建家园。为此,该市在1920年3~4月树碑“天津街”以表纪念。^⑤1935年,天津青年会举行“英文演讲会”,会员介绍西方社会的情况。这样的英文演讲会全年共进行40多场次,其讲演内容经过青年会电台向外传播,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⑥

此外,天津青年会还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先进生活方式。如为了破除旧式婚姻陋习,简化中国传统婚礼从订婚到最后结合的繁琐结



婚礼仪,天津青年会于1934年特举行了天津首次的集团结婚。为了宣传养成爱卫生的好习惯,天津青年会多次举行电影讲演会,给会员讲演卫生问题。特别是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杨肖彭和该会的许多人士,于1941年协助郭德隆组织成立了天津结核病院。后来他还担任了该院的院长,为该院成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⑦

总之,在近代天津与外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与西方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其文化交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内容也极其丰富多彩的。他们在近代天津以及整个中国的中外交流史上写下了多姿多彩的一页。

注 释:

①《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00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版,第52页。

② 崔国良:“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③ 南开《校风》,第105期。

④ 天津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1935年事工报告》,第37、38、39页。

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典型会员小团体——天津联青社简介》。第82、84页。

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典型会员小团体——天津联青社简介》。第86页。

⑦ 杨肖彭:“回忆天津联青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⑧《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00周年会庆特刊》,第52、53页。

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00周年会庆特刊》,第53页。

⑩《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00周年会庆特刊》,第53页。



⑪《益世报》，1935年11月17日。

⑫杨肖彭：“我对张伯苓校长与南开学校的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⑬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36页。

⑭杨曼莉：“我的父亲和青年会”，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100周年纪念册》，第63页。

⑮“本会近五年来工作状况”，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40周年纪念册》，第63页。

⑯《大公报》，1936年2月20日。

⑰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⑱杨肖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展简史》（未刊稿），第27页。

⑲南开《校风》，第95期。

⑳《益世报》，1931年7月8日、12日。

㉑《益世报》，1933年4月28日。

㉒《益世报》，1936年5月2日。

㉓《益世报》，1931年3月8日。

㉔天津青年会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1935年工作报告》，第34页。

㉕参阅1919年11月6日《益世报》和《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00周年会庆特刊》，第54页。

㉖“本会近五年来工作状况”，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40周年纪念册》，第65页。

㉗杨肖彭：《回忆天津结核病院的创建》（未刊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青年会与西方文化的传入

张绍祖

今年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创始于 1844 年 6 月 6 日,是英国人威廉·佐治在英国伦敦创办的,宗旨为“追求基督道德精神,避免城市青年的酗酒、生活放荡和堕落”。后来逐渐传布到西方各国,1851 年流传到美国,达到鼎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联系广泛的社会服务团体。青年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1885 年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入中国。先有学校的校会,后有城市的青年会。最早的校会是 1888 年在福州英华书院的学校青年会,第一个中国城市青年会,是 1895 年成立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人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先生,他也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创办人。是年 12 月 8 日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和平区大沽路十七中学旁)北洋医学堂召开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大会。6 天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第 1 期出版。翌年 4 月在现在的大沽路口大营门一带,建立了天津青年会的第一个会所(原址已不存在)。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有识之士正在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之道,变法维新运动也在兴起之时,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从 1895 年成立以来,对西方文化在天津,乃至全国的传入,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 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在唐朝,第二次在元朝,第三次指16世纪至18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第四次指19世纪初以来直至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华的发展。但真正使东西方文化大面积地接触、并深层次地交往与相互产生深远影响则是后两次。由于第四次的中西文化交往是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平等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基督教在华就遭到了中国人强烈的敌视和排斥,1869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就是突出代表。教案在各地层出不穷,传教活动遭遇很大阻力。这就使得传教士不得不反思以前的策略,寻求在华成功传教的良策。

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分成了四派:基要派(Fundamentalists)、保守派(Conservatives)、自由派(Liberal Wing)和社会派(Christian Socialization Wing)。前两派叫做福音派,后两派叫做社会福音派。当时福音派的代表人物是内地会的创办者戴德生(Hudson Taylor)。该派主张恪守传统的宣教方式,以传扬“纯正福音”为主要使命,至于办学校和开医院等则是附属于福音工作的。社会福音派则以广学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代表。该派主张社会服务、文字工作与传播福音应当并重。后期社会福音派甚至主张以社会服务来取代传播福音。基督教青年会就属于社会福音派。因此,青年会在华的活动,贯彻的是社会福音派的思想。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办人来会理学习的是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他与格林(天津青年会总干事)等在天津将西方文化、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传入天津。



1896年9月2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John R. Mott)博士来华视察,在天津戈登堂(Cordon Hall,今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发表了演说,介绍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以1907年为例,1月世界青年会同盟会长穆德莅津,在公园学会对各界宾友及各校学生2500余人讲演;12月26日,布朗来该会讲演。从该年起以后每周均有科学或通俗讲演,听众踊跃。同年该会职员到官立中学堂(今天津三中)、私立第一中学堂(今南开中学)及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等校讲科学与实验课,并组织公开讲演会约60次。1920年9月18日,该会开秋季大会,由梁启超做《个性与组织》的演说。1921年11月26日梁启超在天津青年会做《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的讲演。1922年6月15日,中国驻华盛顿会议专使顾维钧在该会演说。10月10日,梁启超在该会年会做《平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与价值》的讲演。1935年10月26日,该会举办“科学运动周”活动,王正路、程松生、高少白、魏明初讲演科学知识。由此可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除了由北美青年会派来的来会理、格林等外人担任总干事外,鼓励自立的原则,西干事从不表示种族上的优越,也绝对没有国籍上的区别,一切按照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章程及习惯行事,以彼此尊重与包容不同意见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干事,山王厚斋、王阁臣、王正廷等中国干事协理会务,使天津青年会工作日趋兴盛。该会组织的民主化在清末民权意识日渐兴起的形势下吸引了许多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加入该会,并接受与实践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曾任该会董事长的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创办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以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管理学校,使“南开”成为天津教育的知名品牌。曾任该会董事的王正廷是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留学美国,担任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分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籍总干事。他参加过1911年10月的辛



亥革命,担任军政府外交部长,参加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参加起草并主持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运用于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形成了早期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如五四运动前后,天津的几次大的爱国举动都离不开天津青年会。最早抵制日货的是天津国货售品所创始人、著名的基督徒——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宋则久先生。顺直省议会议长、恒源纱厂经理边洁清先生也积极抵制口货。周恩来在天津领导五四爱国运动,其中五四爱国大游行即由东马路青年会开始,绕天津城一周后回到青年会。当时邓颖超在青年会负责油印宣传品,油印工具和资料都藏在青年会。1925年5月7日,该会参加“五·七”国耻大游行活动,并担任联络工作。1926年1月24日,该会参加“天津市人民大会讨张(作霖)排日集会游行”活动。宋则久为大会主席并致开会词。1933年3月18日,为救国家危亡,该会举行国民白新大会,张伯苓、陈宝泉、王文典作了讲演。1935年,由该会组织请著名音乐家张肖虎教唱青年学生学唱《救救中国》、《要大家奋斗》等歌曲,以激发爱国热情。1948年7~8月,该会开展天津市助学运动,以配合反内战、反饥饿斗争。在近代天津人民爱国运动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始终是个中心。

总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天津近代社会在科学与民主的启迪上做出了贡献,其贡献可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该会成功的关键乃在于其掌握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个要素,即抓住了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正在寻求救国富国之路,趋向西学的时机;选定



了当时北方沿海口岸大都市天津与新兴的高等学府“北洋医学堂”、“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为工作的重点；争取许多天津的知名人士，如黎元洪、王正廷、张伯苓等对该会的支持与肯定，以及西干事来会理、格林等本身对中国文化与天津知名人士的开明态度。

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教育的传入

189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促进了西方教育传入天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创办新式学堂。1901年，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与天津知名人士高凌雯、王世芸、林墨青等在原来稽古书院旧址，即天津有名的铃铛阁，创办“普通学堂”，1903年，“普通学堂”移至东门内仓廩街会所，原校址改名“天津府官立中学堂”。山凌福彭任总办，胡家祺任监督，为天津最早的官立中学堂（《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53页）。1909年春，该会为“普通中学堂”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直隶总督杨士骧莅会演说，提学使傅增湘（沅叔）颁发毕业文凭。1911年暑假后，因经营新会所，董事会决定停办“普通中学堂”。1915年，该会将日校改名为“育才学校”，1919年开办四年制中学、二年制商科。高小毕业而英文有一、二年程度者得入中学，本校读毕中学二年可入商科。1915年8月，该会实业学校扩充正科一班，预科二班。1935年8月，该会开设商科职业学校，学制三年，预科两年。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最早创办业余学校、补习学校及各种训练班，1895年12月15日，刚刚成立一周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办起了每周活动一次的英语查经班。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该会与天津辛亥革命领导人张相文、白雅雨等人创建的革命的外围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一起合办看护急救等教练班，为革命军做战地服务准备。1915年9月9日开办童子英文晚课。10月举



办为期9个月的体育培训班。1919年2月开办英文夜校,有普通、高级、商务英文班、簿记班、英文速记、打字班及绘画班等。1930年春,智育部举办“公民教育周”和“公民教育研究班”。1929年,智育部同联青社、益友社共同协办平民补习学校,一年毕业生达300人。1932年初,体育部于英国球场内举办“拾球儿童(贫困子弟)补习学校”。1935年4月,举办书画班,隔周请曹公恕讲授中国画技法,一直到翌年初。1937年2月,该会成立美术班,两个月毕业;化学工艺班四个月毕业。1940年前后由杨肖彭主办学童训练班,授以处世和售货术等技艺知识。1946年1月6日,该会英文夜校恢复招生。1947年10月,该会福利社筹设儿童义务学校,共设两班。该会开办业余学校、补习学校及各种训练班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聘请外籍教员来津任教。1906年,清政府直隶学务处委托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美聘请两位英文教员来津任教。其中崔伯,字仰西,1881年12月5日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市附近弗吉尼亚州。1906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转年秋冬季节,他与郝瑞满先生联袂来津,郝就教于南开中学,崔执教于官立中学(今天津三中)。1911年,崔伯奔母丧而返美。1913年返津后,因郝瑞满先生已就职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代理总干事,崔伯受张伯苓校长的聘请兼任南开中学英语教师。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引进西方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1918年12月该会举行桥样会,与会75人,由童子部委办长钱博泉致开会词,特请张伯苓做最新教育法演说《桥样会之精义及其作用》。1924年3月3日,天津青年会主办之平民教育会在该会所举行会议,请直隶省省长、教育厅长到会演说,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自1895年建立至今110年来,始终坚持兴办教育。青年会夜校是该会有悠久历史的一项工作。1949年天津解放后不久就恢复开办了青年会夜校,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开办青



年会夜校和英文班。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落实宗教政策,该会又恢复开设了英文班、书法班等传统活动。20世纪80年代至今,坚持举办英语夜校和英语专修班。1987年后,英语班除讲课外,还聘请了天津外语学院、天津大学、财经学院、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外籍老师到校授课,学员达5700人次,并在正常课程外教唱英文歌曲,放映英语原版影片,举办英语晚会,深受学员欢迎。自1988年起,该会适应社会需求还举办了高考与中考助学讲座,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并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体育的传入

天津开埠后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竞技文化的城市之一。189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促进了西方体育传入天津,传入中国。190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人士发起了天津市体育运动会,此后多年,青年会保持天津体育界的领导地位。

1.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引进西方的体育活动

1895年12月15日,初创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一次集会时开始篮球运动,于会所草场围墙背后进行,当时称“篮球”,这是篮球运动首次传入中国。1896年1月11日下午4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中国篮球运动史上较为正式的篮球表演,至4月4日进行了多场比赛。当时天津青年会的会员对篮球很感兴趣,有成为大众运动的趋势。此后,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的学生蔡乐尔,于1910年来华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进一步传播了篮球技术和比赛规则。

天津的足球运动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是英国驻军引进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积极提倡,把足球列为课程。1898年从美国派来



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是位球星，来津后热心推动天津足球运动。天津第一支学校足球队是1902年成立的新学书院足球队，当时队员盘着辫子，在一起练习比赛，每每踢得兴高采烈时，辫子滑了下来，拖在脖后，因此人们称之辫子足球队。

1904年乒乓球引入中国，天津是通过青年会最先流行和发展的沿海城市之一，当时称“桌球”。1908年2月29日，该会开始组织网球比赛。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青年会体育部干事王友珍率先在“华人会员”中开展羽毛球运动。开始有杨锦奎、陶少甫、崔上齐等10余人在该会体育馆进行练习。当时在西人俱乐部内也有人参加羽毛球运动。

2.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兴建会所体育设施

1913年5月23日，美国友人万那美克捐美金11万4千元建东马路会所。直隶民政厅长刘仲鲁、参议院副院长王正廷和美国社会学家海君参加奠基礼。建筑为四层(含地下室)，楼房共206间，内设礼堂、乒乓球室、地球房、阅览室和健身房等设施。1914年10月16日，东马路新会所落成，其中健身房内设有我国第一个室内篮球场、天津第一张乒乓球台、天津第一张台球球台。1928年7月5日，该会在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新建网球场一处。

3.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介绍西方体育理论与方法

天津青年会设有体育部，美国青年会常派遣一些体育专业人员，来天津负责青年会的体育工作。他们除了在青年会传授运动技术以外，还到天津学校指导体育活动，介绍西方体育的理论与方法。如1904~1908年间，天津青年会干事饶伯森就曾到天津各学校讲演“西洋体育”。1907年该会饶伯森每周三、六在青年会教练足球技巧。



4.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多种体育活动和举办多样运动比赛

天津近代早期的体育活动和运动比赛,大多都是由青年会发起和主办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很少有人从事这种洋体育活动,参加运动竞赛的都是学生。

如 1899 年天津青年会发起组织第一次学校田径运动会,由北洋大学主办,有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电报学堂等校的体育代表参赛。1902 年,该会在奥租界运动场第一次举办年度运动会。1907 年 10 月 19 日,该会第五次运动会举行,从本届起比赛分童子与成年组,有 15 项竞赛项目,卢木斋提学使参加发奖大会。1908 年 10 月 23 日,私立南开中学堂、官立学堂(今天津一中)和普通中学堂等三所中学堂与该会联合主办“英——中”第六届田径运动会,有 146 名运动员参加,发奖仪式在南开学堂操场举行。1910 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追称“首届全国运动会”)上,天津运动员普通中学孙宝信、工业学堂李树池、青年会日校翟承修共获六项田径冠军,天津青年会日校夺得学校组团体第三名。1911 年 4 月 15 日,该会与北洋学界合办运动会,北京、通州、顺德均有运动员参赛,该会毕辅安任体育总教习。是年上半年,该会组织全市首次篮球比赛,参赛的有青年会普通中学、南开中学、高等工业学校和新学书院队。1914 年 10 月 7~9 日,该会组织的足球赛,于南开学校及法租界球场开赛。1915 年 2 月 28 日,本会发起、组织由本学期开始各校篮球比赛。1916 年 1 月 26 日,本会邀天津各校代表议定,自即日起举行天津学校联合篮球比赛,为期一周。1917 年,由北洋大学、新学书院、南开学校等发起组织天津学校足球协会,每年举办一次足球联赛。同年,董守义以会所为阵地组织“竞技篮球队”。在该会球场经常与美国驻津第 12 篮球队、西商篮球队及北京青年会“老母鸡篮球队”进行比赛。1925 年,本会体育部干事董守义与西人布鲁士发起“万国篮球锦标



赛”，并成立“万国篮球会”。董守义任副会长，组织年度比赛。1928年，天津华人羽毛球队与外侨队首次举行比赛。1929年2月24日，该会在法租界聚英球房举行全市台球决赛，9月组织天津万国甲乙组公开室内篮球赛。1930年春，该会体育部组织参加全国春季运动大会及远东运动会。1931年，该会开办“万国”长跑赛，同年举办了第一次全市乒乓球公开赛，成为天津乒乓球正式比赛的开始。转年，举行第二次全市乒乓球公开赛，增设女子项目。1934年2月17日，该会发起天津首届万国自行车赛。1935年5月26日，巴黎道分会举行天津市公开脚踏车比赛，穆成宽、林秀莲分获男女冠军。同年9月12日，该会组织“全市公开游艇比赛”。1936年青年会举办了第一届华北埠际乒乓球赛……

这些多种多样的竞技比赛对促进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在天津和中国各地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5.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率先宣传奥林匹克运动

1907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奥林匹克运动。同年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体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的演说中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建议中国加紧准备，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1908年10月，在天津青年会第六届学校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用幻灯放映了奥运会的盛况，天津青年会的美籍体育干事饶柏森还在演讲中阐述了我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激起了同学们对奥运会的极大兴趣。

1908年，天津青年会刊物《天津青年》发表文章，向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这是一个民族的奥运情结！

6.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培养体育专业人员

20世纪初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热心天津足球运动，举办训练班，培训足球运动员。1929年1月22日天津体育协会在该会所首次举行全市足球裁判员考试。1930年6月12~13日参加第四届远东运动会，总领队张伯苓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国体育落后。”主张“强迫体育教育，以养成体育之爱好”。天津青年会的体育干事董守义(1895-1978)，河北省蠡县人，中国著名的体育活动家、体育教育家、中国近代篮球运动的开拓者，中国第一位篮球留学生。他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天津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运动的普及、提高及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全国体总副主席、国家体委副司长、全国政协委员。专著有《国际奥林匹克》、《篮球术》、《足球术》、《田径赛术》等书。董守义所著的《最新篮球术》是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以董守义为代表的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对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和我国的体育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较早地传播了西方竞技文化，群众性体育活动风起云涌，体育人才辈出。如“南开五虎”在国内篮球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并战胜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篮球队与菲律宾篮球队。天津拥有一大批足球名将，不仅在国内比赛多次夺魁，甚至参加天津万国球会举办的足球杯比赛也屡次夺得冠军。南开大学排球队多次代表天津市或河北省参加国内比赛，均获得优异成绩。乒乓球队也曾夺取过华北埠际比赛冠军。天津的田径运动健儿在国内以及远东运动会上曾多次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天津的球类与田径运动的水平，在1937年抗战前



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作为天津体育领导地位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功不可没。

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文艺的传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率先将西方的电影、话剧、音乐等文艺形式传入天津。

1900年庚子事变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阿尔法俱乐部,会员大都是天津商界人士,运用电影来介绍各国的历史和各种的科学新知。1908年10月23日,在南开学堂操场举行天津青年会、南开中学堂等三校联合主办“英——中”第六届田径运动会,发奖仪式会后首次用投影机放映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片。1922年5月30日~6月4日,该会组织“卫生教育周”活动,由张伯苓会长主持开幕式,请名人讲演“卫生之重要”等6个专题,并有音乐演奏、影片、图片展览及各项身体检查等。

张伯苓校长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长。1914年南开学校创建十周年时公演了《恩怨缘》一剧,大博社会好评,南开新剧声誉渐起,师生合组之新剧团正式成立,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学校剧团。选举了时子周为剧团团长,剧团下设编剧、演出、布景三部。1915年南开学校创建十一周年时,剧团因上演《一元钱》受到社会赞誉,一时名声大振。1916年,张伯苓之弟张彭春是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他自美国来到南开任教,加入新剧团,大大增加了剧团的实力。当年南开学校创建十二周年时,上演了《一念差》及《醒》二剧。1917年南开学校被水浸入,借天津青年会公所上课,当年南开学校创建十三周年纪念,仅在青年会礼堂排演了滑稽天然剧《天作之合》。1918年南开学校创建十四周年时,由张彭春主持编成《新村正》一剧,演员技术及布景均大获成功,南开新剧之名远播海内外。



1933年4月22日,山史未丹率领的法国著名童子军一行2人来津,在该会表演“Wahde Wogel”和德国名剧《死之舞》。1935年5月4~10日,该会举办新生活运动周,有于学忠、张伯苓、王问山、郑达如、陈涌济讲演并演出新剧。

在音乐方面,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也颇有成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会举办了音乐会、钢琴演出、歌曲欣赏等各种活动。二三十年代时,该会以青年会礼堂为阵地,邀请著名的音乐团体、歌唱家、演奏家举办多种形式的声乐、器乐演出,吸引大量青少年学生和职工来此观赏。女师学院的师生演出过多种类型的音乐会;以法商学院的学生为主体组成的“一江风昆曲社”举办过昆曲专场演出;基督教的维斯理堂唱诗班多次举办以演唱“圣诗”为主的声乐音乐会。三十年代中期,该会支持天津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天,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歌咏家刘良模,在东马路会所做了关于推行救亡歌曲的讲演,并教唱了一批救亡歌曲,吸引广大青年学生来学习,对推广救亡歌曲,推动津门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1944年7月29日晚,天津的小提琴演奏家马道允请出刘金定为之钢琴伴奏,在该会礼堂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演出了莫扎特、巴赫、布拉姆斯的小提琴独奏曲。四十年代,该会的歌咏团实力充实,也举办过多场演唱会和综合性的音乐会。天津沦陷后,作为租界地区尚未被日军占领之前的几年,一些音乐会也多在广西路青年会举行,如朱起云等都曾在这里举办过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培养音乐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许多著名音乐家都是青年会培养出来的。1938年,津门交响乐的拓荒人张肖虎受聘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音乐导师。在该会总干事杨肖彭及宋昆的倡导下,组成了当时天津最大的歌咏团,共200余人。张肖虎亲任指挥,排练演出了大量严肃优美的合唱名曲和具有爱国思想的创作歌曲。在张肖虎的倡导下,天津青年会还举办了“音乐专修



课”，举办了多种学习班和多次音乐会，成立了管弦乐队，由张肖虎负责并兼任指挥，为广大音乐爱好者开辟出一个高水平的实践园地。1942年初，为了排练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在张肖虎的倡议下，将工商管弦乐队、业余管弦乐队、青年会管弦乐队等几个管弦乐队联合起来进行排练演出。起初定名为“天津联合管弦乐队”，张肖虎任指挥。1942年4月12日，在大光明影院，由工商学院管弦乐队主办的第五次交响音乐会，就是由这个联合管弦乐队演出的，上演了贝多芬的《C短调交响曲》等作品。1943年春更名为“天津联合交响乐团”，又增加了一位指挥丁继高。在两位先生的指挥下，该团陆续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海顿的《C长调交响曲》等经典性作品。

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传媒的传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将西方传媒方式会刊、杂志、广播电台等传入天津。

1895年12月14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第1期出版。1896年6月，该会主办的《中国的青年》创刊号出版。每期印刷300份，赠送给大专院校学生及商业青年。1911年，该会主办的《天津青年》杂志创刊。其宗旨是“传达会务，联络会员感情，唤起服务精神，谋求社会改进”。该刊为半月刊，16开，每期4~8页。1915年3月19日，天津青年会《会务杂志》出版创刊号。该刊为周刊，每星期五出版，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天津青年会《会务杂志》。1928年春，该会出版体育干事董守义著《篮球术》一书。该书曾几次重印，后经作者重新编订，书名改为《最新篮球术》，1932年10月，由该会之《体育周报》社再版，全书300页，图文并茂。1932年2月6日，由巴黎道分会主办的天津《体育周报》创刊，该报每周六出版。张伯苓在创刊



号上发表文章《今后我国之体育》。1935年,该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雍剑秋著《祸福之门》一书,该书收入有关人生、义理等内容文章32篇,张伯苓署书名。1943年1月,该会出版的《天津青年》改名为《会员通讯》月刊,内容贴近生活,编辑部设在巴黎道会所。是年9月,《会员通讯》编辑部出版《万丈高楼从地起》一书,杨肖彭作序。后又出版了由宋宝琨主编的《人生如我》、《西笑集》和杨肖彭所编的《英文讲演集》。

1934年11月10日,该会设立广播电台。电力为20瓦。1935年9月1日改为150瓦,呼号为XOKB,并正式播音。1935年1月16日~12月29日,本会举办英文德育讲演会,全年共举行40次,并由电台播出,1943年3月8日该会电台全部机器设备被以指定低价卖给伪天津市广播电台。

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西方礼俗的传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将西方的礼俗,如征婚广告、新式婚礼、赈灾济困、勤俭节约等传入天津,并与中华传统美德相结合。

1902年6月26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该广告与天津青年会有关。征婚者为“南清志士某君”,内容如下:“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人,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在20世纪初,一批进步知识青年效法西方通过广告寻求佳偶,实为求婚方式的创举。第一则征婚广告反映了当时的先进人士对理想女性



的看法。第一条是在生理上的自然、健康；第二条则是知识方面的要求，几乎与当时先进之男性的水平无异。至于民族、门第、年龄、外貌等反倒没有特别的期望。

在社会服务、救济事业方面，如赈灾义演义卖，青年会也都做了很多工作。在提倡新文化，提倡精神文明，移风易俗，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戒除烟酒，扫除封建迷信以及提倡集体婚礼等方面，青年会都做出不小的贡献。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著名美国教育家崔伯与何淑娴的婚礼破国家民族之界限，开社会风气之先兆，非常隆重。1915年4月5日，在广东会馆，崔伯和何淑娴结婚盛典隆重举行。新郎新娘穿的都是中式礼服，不过新郎没有披红戴花，而只戴了一个浅色（粉红色）“胸结”；新娘没有戴凤冠霞帔，而是披了西式的长头纱，并在手中拿了一束鲜花。张伯苓校长是当时社会上知名的新派人物，他不只是对崔伯的婚事大力支持，而且当了崔伯家长在中国的代表（当时崔伯的父亲病重，不能从美到华主持婚事）。在八人冰人（介绍人）中，张伯苓是男方的主要代表，请帖上也由他出名（女方出名的是何淑娴的大伯父何葵舫），而且在婚礼上张伯苓又作了重要讲话。婚礼仪式体现了“中西结合”，全部过程分为“入席、讲话、行礼、退席”四大部分，都以“鸣号”来宣布开始。婚礼由一位中国牧师和一位外国牧师共同主持。婚礼大体是按基督教仪式进行。婚礼不大摆宴席，只茶点招待，则是按照国外风俗了。真是中西合璧，美哉美哉！崔伯与何淑娴的婚礼别开生面，广东会馆内外水泄不通，盛况空前，轰动一时。

天津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婚礼是由天津青年会主办的。1935年6月15日下午，在北宁公园礼堂内外达3000余人，礼堂内，迎面礼台上悬有大红的“双喜”字，格外喜庆。礼台两旁挂着纱灯一对，并各悬“双喜”字，上楣粘有鲜红的“同心”九颗，象征着九对新人共结同心之意。宁园内小树杈上多粘有双喜红字。礼堂外，童子军维持秩序，礼



堂门首,则由警察维持。下午两点,九对新人穿戴整齐乘车从青年会出发驶向宁园。新婚礼车顶系红色绸带,简单而庄重。下午三点,市长商震、前市长张廷谔先后证婚,随后章以吴司仪带着九对夫妇在乐曲中缓步而行,两个女士持纱灯引导,缓缓进入礼堂。新人上台后分列两旁。商震市长等人开始致词,宣布新婚者姓名履历。接着,九对新人互换戒指,然后由商代市长授予婚书。新郎新娘接受婚书后,退一步行一鞠躬礼。此时的台下已是掌声雷动。摄影记者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将瞬间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仪式结束后,新人退出礼堂,片刻休息后,分乘汽车,到青年会晚餐。傍晚各自返回新居。1935年集体婚礼的结婚证和以前普通的结婚证最大的区别在于上面贴有一张两寸的夫妻结婚照。

西方大型集体婚礼的传入天津,不仅可以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新礼仪展示给世人,还可以节省开支,避免大操大办,天津青年会提倡并最早举行集体婚礼,在天津开了个好头。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倡导并致力于赈灾济困。1917年秋,天津闹大水,该会与各教会组织基督教水灾赈济会。以该会为总事务所,督办京畿一带水灾赈济事宜,成绩颇著,得前总理熊希龄赞扬,冯国璋总统题赠天津青年会匾额文:“已溺已饥”。1918年11月6日,该会与政绅商各界领袖提倡之欧战协济会中国直隶筹款部成立,到转年1月20日,全省共捐款333944.65元,其中天津捐212131.119元,有91993人捐助。捐款中一大批款捐给法国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阿尔贝特市,进行市政建设,修建医院及重建家园。为此,该市于1920年3~4月间树碑名曰“天津街”,以示纪念。1930年下半年,因西北灾情严重,该会发起“西北赈济会”联合各界人士,四个月共募洋4.3万元,普济灾民。1935年8月下旬至10月,该会参加天津各界救济水灾联合会。会址在本会,募得1.9万余元。1939年天津闹大水,该会积极开展了救济工作。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倡导并致力于勤俭节约。1924年2月18~25日,该会发起举办“节俭运动周”。抗战胜利后,天津青年会为提倡市民节俭,实行新生活,于1946年3月30日再次主办联合婚礼,纯为服务,不收任何费用,并议定以后每年元旦举行一次。

总之,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10年来,历经沧桑,与时俱进,在传播世界先进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愿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发挥自身特点,提倡四育,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社会文明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 1.《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版。
- 2.刘远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对清末社会菁英的影响——在科学智能与民主思想上的启蒙》。
- 3.陈新生、陈武:《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近代体育的兴起》。
- 4.陈嘉瑞:《解放前天津城区的音乐生活》(《天津文化史料》第三辑)。
- 5.左芙蓉:《青年会华籍干事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
- 6.1935年《北洋画报》。
- 7.1902年6月26日、1936年6月16日《大公报》。
- 8.《青年会与中国早期的羽毛球运动》。
- 9.《董守义传略》。
- 10.张绍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崔伯先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3年第2辑)。

(作者单位:天津市河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天津的平民教育

齐 君

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YMCA”),是一个旨在青年学生中培养教徒,影响社会的基督教外围组织。1895年12月,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天津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先生创办,并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它成立后,极力主张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平民教育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蓬勃发展,在这一大潮中,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的天津青年会也不甘落后,相继兴办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平民学校及社团,影响逐渐扩大,成为20、30年代天津平民教育事业中的一朵奇葩,积极奋发、光彩照人。本文简单地介绍一下天津青年会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间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事业。

一、成立社会服务团组织平民学校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杜威的来华讲学,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国内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传播,并很快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潮。而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动和推动下,这种平民教育思潮又迅速兴起并很快演变为一场教育运动。也正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影响和推动下,



天津青年会开始着手从事于宣传平民教育事业,兴办平民教育事业,为天津以及全国的平民教育事业做了杰出的贡献。

1922年,当晏阳初等在中国掀起第一次大规模识字运动的时候,天津青年会便已开始着手兴办天津的平民教育事业。特别是其会长、近代著名的慈善家雍剑秋先生“见本埠男女儿童多有未受过教育者,虽学校林立,而自各学费,贫寒儿女之失学者,实非浅鲜”。因此他决定发起天津青年会成立“专办平民学校,使贫寒儿童,皆有受教育”的社会服务团。1922年3月4日,天津青年会社会服务团召开了成立大会,当天到会者就有70多人。^①3月22日,天津青年会服务团为了提倡平民教育,决定在河东区水梯子一带借耶稣教会之处设立第一所平民义务学校。在这所平民学校中,教员及学校其他职员大多都是由天津青年会河东区各团员担任。^②据《益世报》记载,1922年3月30日,第一期平民学校开幕盛况“天津青年会社会团,自成立以来,对于提倡平民教育,惨淡经营,不遗余力,以期救我贫苦同胞,不致失学,同登畛域。并承各热心教育家补助之进行,以期早日观成。其第一平民学校业经组织就绪,及于日前(二十八)下午四钟,在河北水梯子教会行开学礼,兹将其秩序志下。(一)、振铃开会。(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三)、主席(李少莲)致词。(四)、师生相见礼。(五)、教员演说。(六)、来宾(王卓忱)演说。(七)、致谢来宾。(八)、行开学式。(九)、团会。”^③

第一平民学校的开幕,迈出了天津青年会从事平民教育事业重要的第一步,这是极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国内军阀林立,政局纷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而言,文盲、半文盲占据他们的多数,他们生活之困苦艰难,是很难被想象的。天津青年会能够以己之力,创立一所完全属于义务性质的学校,校中各职员亦为义务,此项举动在当时的天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青年会的“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精神随之远播,影响愈加广泛。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守旧思想的影响,中国女子受教育机会很低。而进入近代以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男女就学之比率仍然相差悬殊。鉴于此类情况,天津青年会在举办义务平民学校的同时,也开始尝试兴办专门的女子学校。1924年7月14日,由天津青年会所办的河东沈王庄基督教会通俗学校附设的平民女子学校开学。据《益世报》所载,开学之日,“首由主席窦英堂致词,略谓:本校自招生以来,报告求学者,非常踊跃。足见社会失学儿童之多,务请大家有始有终。继又解释国旗与国家之关系,次乃请职教员就习,众学生行一鞠躬礼。遂由王效泉君及吕秀岩女士发给书籍,分定班次,至少时散会。”^④河东基督教会平民女子学校开学后,社会反响较佳,报名入学者也很多,开学两月,即取得颇为不错的成绩。因此为了宣传平民主义教育,增大学校的影响,1925年9月13日,王效泉代表学校招集全校学生开交谊会。“其程序如下:(一)、振铃开会。(二)、主席致词,王效泉。(三)、唱诗,全体学生。(四)、祈祷,窦英堂……(六)、演说,霍炳文、方子禹。(七)、游戏,学生。(八)、故事,王锋。(九)、武术,学生赵金明、张恩强。(十)、技术表演,孙连有、强义然。(十一)、茶点。(十二)、闭会。”通过报道内容,可以得知天津青年会所兴办的平民学校,经由会员的多方努力,在提高学生的素质和施行新的教育方法方面成绩显著。

随着平民事业的发展及学校学员毕业之后在社会上取得的成绩,天津青年会在津影响遂日益增大。《益世报》曾载“平民教育毕业志盛”,平民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由此可见一斑。1925年9月12日,青年会职工部第三期平民学校毕业时,“于晚七时半,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毕业式。到会者执教员毕业生五十余人,学生家长及来宾五百余人,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其开会秩序如下:(一)、主席华捷臣开会词云,平民教育,自熊夫人晏阳初先生,费数年之光阴,倡办平民教育,始有千字课之发明,青年会职工部随之倡办,现已第三期毕



业,本部所设之平民教育,初设时居民均皆观望,成立甚难。嗣因见毕业生已有充分知识,始渐进步,故有今日之成绩。(二)、游仁淑女士演说,大致云,可幸的天津,又添一百人识字。教育的责任,尽在父母,应提倡女子教育,以维教育之根本。(三)、学生牛殿贵致答谢词。(四)、教员魏蕴德致训词,嘱学生毕业后,注意三事:一、认字宜时常反复记忆各生字;二、写字宜笔画清楚,顺序不乱;三、用字,宜遇事简括记于簿上,时常请人修改;(五)、游仁淑女士发文凭。(六)、新剧,剧名和团员。表演为该剧团华捷臣、李幽谷、王福昌、王焕庭、王兰荪、史久侨、孙必昌。诸君演毕,时至十一时闭会云”。^⑤

二、组织成立社会服务所,创办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的相继兴办,其成效随着学员的毕业而愈发显著,其社会反响日佳。在此种情况的推动下,天津青年会各会员小团体又举办了一系列面向不同人群的补习学校和半日学校,为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天津青年会联青社鉴于“津市居民辐凑,人烟稠密,教育极不普及,失学者比比皆是”,就先后协助成立了二处平民服务所。第一平民服务所设在河东沈王庄教堂内,第二平民服务所设在河北南竹林村。联青社在每一平民服务所内都设有:民众补习学校、平民半日学校、图书馆、阅报所、演讲会等平民服务机构和设施。其中第一平民服务所兴办的民众补习学校,到1935年1月,至“第八届之2月开始肄业之期,人数约为62人,至5月底毕业,共计毕业50人,又于4月25日起始,招收第九届新生入学者64人,至11月底毕业,共计毕业者50人。又于11月25日,招收第十届新生,截至12月底,第十届民众补习学校,现有学生60人,计本年毕业者100人”。^⑥平民半日学校上课时间为每天下午一点到五点半,所授课程与当时的市立小学相



同,如国语、常识、卫生、美术、工作、算术、公民等,采用复式班教授,四年毕业,分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的书籍由本校发给,不收学费。现在肄业的学生就有117人。^⑦除平民学校外,联青社还在平民服务所内设立图书馆、阅报所,供人阅读平民读物。图书馆内所有图书都是由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发送过来,每3个月更换一次,每次100本,分小说、医药、文学、哲学等,计每日到所阅览者20多人,每年共计720人到此处看书。平民服务所设立阅报所,民众可以阅读到的报纸有:《大公报》、《益世报》、《商报》、《庸报》、《午报》和《新天津报》等,每年大约有18900多人到此读报。此类设施都是为了给受过一些初级识字教育的人继续学习,增加知识创造了条件。另外,为了帮助贫苦者中不识字之民众,慰亲告友起见,服务所专人代为写信,并免费提供信封信纸。服务所每周日下午都会举行通俗演讲会,邀请名人担任讲解员,讲题都是关于卫生、德育、改良风俗等方面的问题,每次听众约有六十余人,每月共举行四次,全年计48次,听众计2400余人。除此之外,为了锻炼儿童体魄,辅导儿童服务社会,并为了儿童课外活动和福利起见,服务所举办儿童励进会,每周日聘请各校教师担任训练工作,每50人组成一团,多时有10团,团员有150人,都是附近各小学的学生。第二平民服务所所办事业与第一平民服务所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1932年初,天津青年会联青社又决定出资成立“拾球儿童(贫困子弟)义务学校”,以教育为目的,临时雇用十几个儿童,以3~5元的代价,雇用他们从早到晚为英国球场内拾落在地上的网球,同时,联青社还给这些贫困儿童开办国语、算术等课程,以资灌输教育知识。^⑧1936年10月8日,天津青年会联青社为深造该校毕业生,特增添高级班,采用上海全国青年协会出版之平民地理、历史、卫生、书信常识等课本,成绩颇佳。

除天津联青社创办的一些平民教育事业外,天津青年会福利社、



励青社和求是团等还创办了许多平民教育事业。1934年3月,天津青年会巴黎道分会励青社成立了平民补习学校。为了筹备所办学校的款项,巴黎道分会励青社借用崇仁宫,特意邀请艺专高才生工家齐先生导演话剧《裸体》及《捉奸》,来筹集补习学校所需的经费。9月23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励青社平民补习学校,举行了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这次共毕业学生约40人。10月22日,励青社平民补习学校举行新一届学生开学典礼,从这学期开始,学校分为高、初两级,招收贫苦青年入学,教师由该社社员担任。

1934年9月1日,天津青年会福利社筹创的“西沽小学校”开学。该校由育才小学校易名而来。“西沽地处乡郊,为津北重镇,学龄儿童为数众多,但学校颇少”,“且该校校址宽敞,设备周全,为一良好教育儿童之所在,故毅然接办,即改名为西沽小学校。”该校设有初级4个班,男女学生共100多人,为减轻贫苦家庭的压力,学校将学费减低为每学期只收一元钱。同时还为一些贫苦无力求学者免除学费。学校的教师由师范学校毕业者且有教学经验者担任,教材遵守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标准。此外,该校还在学校内附设平民识字班,免费招收一些中年失学者入学识字。^③

1936年2月25日,天津青年会求是团在三义庄爱育服务社附设的半日小学开学。该校共有学生34人,教师由该团团员房德印、胡宝清、王远馨等人轮流担任。学生所用的课本为商务印书馆经理施敬康先生捐助。4月26日,天津青年会求是团在三义庄所办半日小学校的教员率领全体学生,乘汽车至北宁花园旅行,同时还举行演讲、唱歌及游戏等活动。5月18~31日,巴黎道分会求是团半日小学举行募捐活动,分5组,共募集100元,作为该校近二年的办学经费。6月7日,求是团又在三义庄爱育服务社内附设的半日小学校举行第二届毕业式并游艺大会。该校男女学生演出卫生话剧,又有服务社女生扮演《少女之心》独幕剧,最为精彩。



组织平民服务社,设立平民义务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是天津青年会在社会中开展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其社会服务的主要内容,义务学校是一种类似慈善事业的教育,主要面向社会下层无力受教育的贫民,目的是给文盲和文化程度较低的成人提供一个扫盲和继续学习的机会。义务学校主要教授语文、算术和其他知识。儿童义务学校,除了教授文化知识外,还组织儿童游戏娱乐,培养他们守纪律和团体互助的意识。青年会还专门编写了“社会教育读本”,“专为各地青年会社会服务部通俗教育及补习学校、半夜学校之用”。其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一切普通知识,应有尽有,极合年长失学者之需要”。“即国民应有之常识,亦无虞其不足”。^⑤义务学校及补习学校,是青年会坚持不断、开办最为成功的一种社会教育形式,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下层民众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这些举措救助了一批因贫困而无法入学的学生,使之重返校园学习知识,对于失学儿童意义匪浅。此外,它又使广大民众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文化对于个人生活和国家强弱的重要意义。

三、利用科学演讲等形式对平民进行文化教育

为了提高广大平民的文化素质,天津青年会还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利用演讲、游行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民众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提高其知识素养。

在天津青年会会所内,开展最普通、最经常的智育活动当属所谓的“智育演讲”,其听众从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上的民众,从贫民百姓到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影响范围极广。智育演讲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讲解声光化电、天文、地理、工业制造术、环境保护等近代自然科学常识;介绍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宗教学、伦理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也宣讲防治疾病以及公共卫生等医学常识;阐述发展教育,



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等等。智育演讲给人介绍和灌输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利于启蒙头脑、开通民智,特别有利于改变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贫寒民众愚昧无知状况,提高文化生活水平。

以天津青年会联青社第二平民服务所为例,它在1934年内举行的演讲就有:3月25日,首次举办星期演讲会,邀请师范学校教授王天相先生到会演讲,题目为《有关于卫生恶习惯》。到会民众非常热烈,并有清唱助兴。3月31日,举行游行演讲,邀请各中学生作游行演讲,关于卫生及教育的问题。4月14日,举行日、夜两校同学及家长联欢会,报告工作,并有演讲、相声、双簧、魔术、国剧清唱等助兴。4月15日,举行通俗演讲,请荣昌火柴公司白鹤一先生演讲。6月1日,第二平民服务所举行学生家长会,报告学生功课、成绩、缺课情形等项,以资鼓励。^⑩天津青年会的这些科学演讲活动,在学校和社会中广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对于平民的知识启蒙教育产生了重要作用。

除了举办义务学校及进行智育演讲之外,青年会还注意从其他方面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更好地完成其“启迪民智”的理想。1922年3月12日,天津青年会社会服务团为向国民宣传平民教育事宜,天津青年会社会服务团又组织新学书院,培养义塾、义务国民学校的男女学生1000多人,召开天津平民教育运动游行大会。^⑪1924年3月3日,天津青年会在该会会所内主持召开了平民教育会。当时,河北省省长、教育厅长等人到会,并作了演讲。这次他们主办的平民学校的校址有4处:西门内福音堂,承办人为学生同学会刘明义;崇仁宫青年会职工部,承办人为该会会员傅清淮;东马路福音堂,山女青年会主办平民学校;南开美以美会。^⑫

1936年,天津青年会联青社第一、二两处平民服务所半日小学校共计学生150多人,特一区李家花园举办联合旅行会。此次联合旅行会除邀请爱育服务社周王二女士到会,并发表演讲国庆感想外,



还山两校学生共同表演唱歌、幻术、笑林、国术、相声、双簧、团体游戏等。1936年2月,为了唤起民众教育,天津青年会联青社在河东沈工庄教堂内设立的平民服务所内,组织“识字运动宣传队”,由该所主任陈德轩率领该校教员及热心教育的青年领袖10多人,到该所电影院内进行宣传,同时,他们又在街道空地处,招集许多民众,举行露天演讲会,宣传平民教育。^⑤天津青年会利用公众演讲、游行、识字运动等等大众宣传手段,开展各种平民教育活动,这些活动促进平民思想解放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使他们感受到了近代科学文明成果,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一部分民众在其带领之下开始摆脱闭目塞听的愚昧迷信,转而汲取较为先进的知识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毋庸置疑,天津青年会开展的诸多平民教育活动,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天津青年会在从事平民教育事业过程中的得失,又为后来中国平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在中国平民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注 释:

①《益世报》,1922年3月5日。

②《益世报》,1922年3月22日。

③《益世报》,1922年3月30日。

④《益世报》,1925年7月15日。

⑤《益世报》,1925年9月13日。

⑥天津青年会编:《青年会联青社平民服务所》,《193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第45页。

⑦天津青年会编:《青年会联青社平民服务所》,《193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第45页。

⑧天津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100周年纪念



特刊》，第 57 页。

⑨天津青年会编：《天津青年会 40 周年纪念册》，第 50 页。

⑩《青年进步》1918 年 10 月，第 16 册，第 106 页。

⑪天津青年会编：《天津青年会大事记》（未刊稿）

⑫《益民报》，1922 年 3 月 14 日。

⑬天津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00 周年纪念特刊》，第 56 页。

⑭《大公报》，1936 年 2 月 18 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近代天津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

任云兰

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会主办的世界基督教性质的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1885年在中国福州英华书院成立学校青年会,于1895年在天津成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即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市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以后,即在“德、智、体、群”(spiritual, mental, physical, social)四个方面培育青年,引导青年培育高尚道德,练就强健体魄,提升个人修养,养成完美人格,“使身、心、灵俱臻理想之发达也”。此外,还着眼于服务社会,济贫救急,为社会众生的生存和安宁康健积极活动,本文主要从其立会宗旨、组织设置和救济穷黎、医疗助学、赈灾救济等方面探讨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慈善和社会救济活动及其特点,并对此加以评价。

一、宗旨与组织设置

基督教主张博爱,这同印度佛教的“慈悲”和中国儒教的“仁爱”、“兼爱”、“无我”等有相同之处,这点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章程和会训中深刻地体现出来。

基督教青年会宣称其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一直遵循着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即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侍人。也就



是说,人生应该以服务社会、帮助他人为宗旨,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从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和会训来看,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社会服务团体。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秉承基督教青年会的立会宗旨,在其简章中也规定:本会以辅助青年于体育、智育、德育及交際上日有进益,勉为高尚完善之人格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其引申意思为:第一,联络青年男子,使之互相辅助,讲求德育、智育、体育、社交四方面有系统进步;第二,基督教青年会惟求大众之公益不务个人之私图,凡百经营俱以此意为主。^①从其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无论是在体育、智育还是在德育方面辅助青年,其最终落脚点是服务社会。在以后的实践中,也实现了其“以社会服务为中心,德智体群,四者并重……”的诺言,而在“实施方面,以群为进行途径,也以群为成功的目标”。^②

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设置来看,在总干事下,除设有会员部、智育部、少年部、体育部等各部以外,还设有平民服务所,以强调其为平民服务的性质。

另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下设各种小团体,如联青社、福利社、益友会、友爱团、求是团、励青社等,这些团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联青社是青年会下属的一个会员团体,成立于1927年,成员都是天津市各界的中坚人物,经济实力雄厚,有洋商、工矿和外国银行的买办、银行经理、留洋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在进出口、保险、股票市场的从业人员,还有少数大学教授、小官吏、国民党军官以及美国驻津领事等,是青年会中最有经济实力的下属会员团体,被称作青年会的“奶油”,^③因此在社会救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联青社“以义务为权利”(To acknowledge the duty that accompanies every right)的社训和“以热诚服务之方法赞助适当之慈善事业及社会活动”^④的宗旨



与青年会的会训和宗旨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强调为社会、为民众服务。

二、常态下以医疗和助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济

作为基督教外围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凛遵基督教旨以服务社会之机关也。是以所至之处，必首倡慈善，募集基金，大邑通都，层楼耸峙，俨居社会之中坚，而为青年之总汇”。^⑥这种描述虽不无自夸的味道，但青年会的慈善与社会救济活动确实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社会常态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的主要内容除了每年的冬赈以外，还包括医疗和助学，服务对象以平民和少年儿童为主。

每逢冬季，青年会都举办冬赈，向贫民发放救济食品和衣物，尤其是到三四十年代。从1934年开始，青年会每年还举行贫儿会一次，首先组织人员到贫民集中的河东小土庄、河北小树林、南关、西头、西广开等地调查贫儿数目，然后一方面向各慈善团体捐募衣物，一方面举行赈济贫儿酬款游艺会，为贫儿会募集款项。贫儿会内容有演讲和国乐、口技口琴、清唱双簧等各项游艺活动，使贫儿在娱乐中获得教育，并发放玉米面及其他物品。1934年底和1935年初举办的两次贫儿会共有2400余人参加。^⑦有时贫儿会的内容是举行宴会，邀请贫苦儿童参加宴会，参加者除了饱餐平日难得的美食以外，每人还能分得毛巾、肥皂、糖果，使平常以乞讨、拣煤核为生的穷苦儿童“欢欣饱暖，乐而忘返”。1937年的贫儿宴会共举办三天，有200余人参加。^⑧此举一方面为贫苦儿童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唤起富有儿童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培养他们的爱心。

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整个社会对下层劳动界的关注，青年会还成



立了服务人力车夫委员会,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会员募款购买车辆,提供给人力车夫使用,约期一年,还本不付息。在这次捐赠中,天津女医院院长、著名的丁懋英大夫捐助新车一辆。^⑤虽然区区数辆人力车对庞大的人力车夫队伍来说只不过是大海中的几滴水,但青年会这种社会救济的方式也颇值得称道。

在每年的秋冬之交,联青社还举行大规模的“联青夜”活动,包括时装跳舞、摇彩抽奖、戏剧表演和各种义卖活动,旨在为青年会募款,以进行社会服务工作。

利用医疗事业服务社会是基督教的传统,早在1834年第一个传教医生到中国来活动以前,就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⑥在天津的各基督教派也纷纷以医疗事业为出发点扩展其势力范围,如伦敦教会开设了马大夫医院,美以美会办起了妇婴医院。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建立以后,也继承了这种传统,虽然没有开办较大规模的医院,却也设立了诊疗所,如联青社在崇仁宫设立的崇仁施赈所,为民众免费诊疗,在11个月的时间内就应诊病人13102例,为就医无门的穷苦百姓解除了疾病之苦。1943年在62号路服务部设立的福音诊疗所,也承担起了为贫者免费诊病的任务。

此外,为灌输民众卫生常识,青年会每年在天津市内举办卫生运动一次,以举办展览、举行防疫讲演,放映电影幻灯、演出话剧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普通市民参加,并免费注射疫苗,施放暑药。从1936年开始,应天津县政府之约,青年会参加了四乡卫生运动,派人赴四乡种痘,以防天花。^⑦到1937年,市民和儿童种痘人数突破10000人,成绩显著。^⑧

天津市虽然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但由于贫富分化严重,贫苦百姓甚多,儿童失学者为数不少,鉴于这种情况,1922年青年会社会服务团在河北水梯子教会设立第一平民义务学校,“以期救我贫苦同胞不致失学,同登畛域”。^⑨青年会下属的联青社1930年在天津开办了



两所民众补习学校、两所半日学校，1937年天津沦陷后，又在西头慈惠寺与西厂开怡兴里开办了两所义校，一所是工读，一所是义小。经费由联青社捐助，青年会代办。民众补习学校，每期招收五六十人，时间7个月左右。民众补习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到各市立、私立高级学校肄业，成绩优秀者书籍学费由该校负担，按香山慈幼院办法以免儿童毕业后即面临失业。半日学校，学制四年，不收学费，免费发放书籍。学生均为贫苦儿童，每天下午上课，科目与市立小学相同，分国语、常识、卫生、美术、工作、算术、公民等，按复式班教学。^⑩

联青社还举办“拾球儿童补习学校”，即在每年夏季英国球场举办网球赛时，临时雇佣一些贫苦儿童拣拾球场的网球，由联青社资助每天给付三五元钱，并组织他们学习国文、算术等课，还免费赠送教科书和文具用品。

此外，由福利社资助的西沽小学校和儿童义务学校，少年求是团在三义庄创办的半日学校，励青社在东马路崇仁宫设立的平民补习学校，益友会在双港和大觉庵设立的民众补习学校，都在助学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7年以后，由于内战爆发，物价飞涨，交通受阻，在天津的外地学生断绝了家庭经济来源，升学遇到问题。天津市成立了天津学生救济委员会，青年会不仅派人参加，还适时地发起了救济学生的助学运动，组织学生们自救。首先借用广西路青年会学生部成立了天津市学生助学运动委员会，组织筹募助学金的宣传队，制作了“助学光荣”的铜质纪念章和纸质的“助学光荣证”，并准备了向官绅富豪和工商界人士劝募的捐启，还排练了义演的歌舞、话剧等节目，以便广泛争取各方面的社会力量作助学运动的后盾。这次助学运动后，每个参加者都分别得到了五十万元、三十五万元和二十万元不等的助学金，受惠学生近千人。^⑪



三、灾荒与战乱期间的赈灾救济

近代中国是一个兵燹匪祸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华北地区各种水旱灾害多有发生,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天津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成为赈灾救济的中心,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服务社会的宗教团体自然也承担起了这种救济责任。

1917年天津大水灾期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各教会联合组织基督教水灾救济会,以基督教青年会为总事务所,积极救济灾民。首先在河北新车站附近建造了2920间房屋,收容流离失所的灾民。青年会还独自筑造50间窝铺,请水灾急赈会安置灾民,得到了官方的赞许。^⑮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大批灾民涌入天津市。青年会与灾民救济会共同举办灾民救济募捐。这期间,救济工作从天津市扩展到天津静海、宝坻、武清等县及更远的唐山等地,而且除了救灾以外,还开展布道工作。^⑯

1939年天津再次遭遇大水灾,青年会与天主教共同筹办水灾救济募款工作,成绩颇良。

在救济本地灾民以外,天津青年会还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将爱心扩展到全国各地,如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旱,该会发起“西北赈济会”,在4个多月募洋43000余元。^⑰30年代中期,黄河长江相继为灾,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天津市各界救济水灾联合会,发起募捐运动,1935年两个月时间共募捐赈款近20万元,除分别汇往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北、河南等灾区外,余款交由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作为举办冬赈的款项。^⑱1938年成立天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灾会天津区分会,设在巴黎道青年会内,救灾范围扩大,包括了天津市



和河北省的 17 个县，一年中共放赈 56000 元，其中 41000 元投入乡村地区，15000 元用于城市。^⑧

除了直接救济以外，青年会还组织了小规模“以工代赈”，如组织灾儿擦鞋队，招募灾民子女组织擦鞋队，藉以糊口；购置 10 辆人力胶皮车，雇募 10 户灾民拉车进行救济。

在赈灾中，青年会还利用自身优势，组织体育游艺等活动，为灾区募款，如 1933 年，组织救济战区灾民募款篮球赛。由基督教青年会竞进队联合天津市各著名球队举行义赛，共举行比赛三次，收门票近 300 元，参观人数达 900 余人。同年还举办冀南水灾篮球募款赛，门票收入 115 元，参观人数 300 余人。^⑨1935 年 9 月联合各慈善团体举办水灾游艺周，门票收入加上该会会员十事捐款共约 700 元，交市水灾联合会，发放灾区。此外，还举办排球赈灾赛和平津埠际网球赈灾赛，门票收入全部支援灾区。^⑩

二三十年代各系军阀纷争，兵燹匪祸连连，天津成为华北难民逃难的重要城市。在此期间，青年会与其他慈善团体一道承担起了战乱期间救济难民的重任。

20 年代战乱期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首先联合各教会于 1922 年成立了天津基督教妇孺救济会，事务所设在青年会，收容所设在男女青年会和各教会，以临时救济妇孺为宗旨，即在面临败兵土匪骚扰时收容临近的妇女儿童。^⑪1925 年天津附近战事再起，直军与国民军交战，天津西北被划入战区，老幼妇孺群情惶恐，八善堂、红十字会纷纷到战区接运妇孺，基督教妇孺救济会再次设立收容所，青年会设在崇仁宫旧址的收容所收留了数百名难民。收容所极重卫生，向难民分发毛巾、牙刷、肥皂，并诊疗疾病，此外还派女青年会干事讲演故事，教授唱诗，以施行平民教育。^⑫

1933 年华北再次发生战事，日本在继制造伪“满洲国”之后，攻陷了山海关和临榆县城，平津岌岌可危，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各教会、



救世军和女青年会及教士医生组成了基督教救济会,准备到战场救护伤兵难民。幸亏战火未延及平津,但受伤兵士万人左右被运送到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成了伤兵服务团,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为2000名左右的受伤士兵提供服务,举办慰劳伤兵游艺会。伤兵服务工作还未结束,不堪战火骚扰的武清、宝坻、宁河、三河各县大批难民又涌入天津,聚集东局子,最多时超过了30000余人。^④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天津分会、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与慈善事业联合会四团体承担了主要救济任务,共搭盖窝棚1000间,可容纳难民50000人。其中青年会搭设窝棚200间,一月余收容难民2300余人,最多时同时收容1970余人。市各教会、救世军和女青年会职员及津北团契青年勉励会和学生团体共同担任事务工作。^⑤难民饮食方面,每口供应两餐,有窝头菜汤和米粥咸菜;卫生方面,每口派人视察窝棚清洁,喷洒防疫药水,扑打蚊蝇;治安方面,有专人维持秩序管理难民出入,晚上轮流值夜以防火患及其他意外事故的发生;教育方面,对难民儿童教授文化知识、做游戏。此外,青年会收容所还组设了诊疗所,延请名医多人到收容所为难民诊疗疾病,一个多月共医治病人2200余人。战事平息以后,青年会又会同各慈善团体组织难民乘坐由官方准备的车辆船只或持免费车票返乡。^⑥

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的特点与评价

基于以上活动,难怪青年会自称本组织是“平民幸福及劳工幸福的图谋者,是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的提倡者,是慈善救济团体及公共机关的良友”。^⑦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就是利用会员的经济优势和宗教的劝勉作用,将会员的财富分享社会,为社会造福。早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比较注重青年商人,“现在天津共有



青年商人数百人,但是除了青年会以外,当地没有别的团体注意他们的灵性生活。这般青年是全国青年中试幼最大的,……他们的目的即在赚钱,他们的思想行为自然易于为贪欲与罪恶所蒙蔽,只可惜现在没有人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援助,也没有人设法去转移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转到别的更好的事情上去”。^⑧“虽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但作为市会的青年会如果不重视青年商人,不能引起地方商人、士绅和官员的兴趣,赢得他们的支持,就得不到发展”。^⑨青年会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才将做好商人与士绅官员的工作纳入其工作范围。事实证明,对商人的工作有利于其后的社会救济活动经费的筹募,财富的占有者一旦受到人格的熏陶,心灵的荡涤,自然会成为社会慈善事业的中间力量,譬如联青社,就是一个以雄厚的财富占有者为主的组织,青年会主办的诸多社会救济活动都是由该社筹资兴办的,对官员和士绅的工作也有利于其日后的发展。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活动的特点之二是,利用自身优势,采取组织体育娱乐活动,如游艺会、球赛等形式为救济活动筹募经费。如1933年举办了救济榆关战区灾民募款篮球赛、冀南水灾篮球募款赛、赈济贫儿酬款游艺会,1935举办了水灾游艺周和排球赈灾赛及平津埠际网球赈灾赛等。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活动的特点之三是,除了物质的捐助以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帮助,如1933年对伤兵的服务,在为之捐赠衣物、施医赠药以外,还为之书写家信,布道演讲,赠送游戏品与书报、留声机,放映电影等,以解伤兵的精神寂寞。对东局子难民收容所的服务也在供应饮食以外,每周为难民讲道,教授唱诗,对儿童施以教育,组织游戏。“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⑩早期基督教的传统应该对青年会也有一定的影响。

青年会是天津基督教各会开展社会救济的中心。早期基督教青



年会属于初创时期,其工作的重点在于创建会所和发展会员,会员以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层人士为主,所以对社会下层关注不够。由于其发展会员的对象以大中学生为主,所以其早期活动多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体育、教育、辩论会等为内容。初创时期,即使募捐也是为本会的基本建设和会务服务,对社会救济工作比较漠视。直到1917年天津发生大水灾期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才开始走向规范,而且在其后天灾人祸发生后的城市社会救助活动中,青年会往往成为天津各基督教联合组织社会救济的中心,事务所都设在该会内。如1917年大水灾期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各教会联合组织的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就以青年会为总事务所;1922年成立的天津基督教妇孺救济会,事务所也设在青年会内;1938年成立的天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灾会天津分会的办公场所也设在巴黎道青年会内。

综观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20世纪前半叶的慈善和社会救济活动,虽然有时微不足道,如夏令施茶施药,但对城市劳动界阶层而言,则如久旱及时雨;在社会紧急状态下的社会救济对难民而言更如雪中送炭;以平民为服务对象的医疗救济和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的助学活动更成为青年会日常开展社会救济的重点,成效也很显著。即使在救助难民供应衣食的同时,青年会也不忘卫生常识的宣传普及和施行平民教育。这些都对城市文明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 释:

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简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二十五周年第八次大会纪念册》,1920年。

②刘廷芳:“青年会对于中国教会的贡献”,《天津青年》(106期),1936年,第3页。



③ 杨肖彭：“回忆天津的联青社”，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5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④ 杨肖彭前引文第161页。

⑤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第42页。

⑥ 《天津青年》（81期），1935年。

⑦ “贫儿宴会盛况”，《天津青年》（121期），1937年，第6页。

⑧ “本会服务人力车夫委员会征求车辆”，《天津青年》（127期），1937年，第5页。

⑨ 《中国从报》1835年12月，第386—389页，转引白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5页。

⑩ “举办乡村卫生运动”，《天津青年》（104期），1936年，第3页。

⑪ “本会协助津县府乡村种痘”，《天津青年》（127期），1937年，第8页。

⑫ “第一平民学校开幕之盛况”，《益世报》，1922年3月30日。

⑬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第23页；《事工报告》，1935年，第45页。

⑭ “天津青年会与天津市学生助学运动”，中华 YMCA YMWA 主办：《奉献》，1996年第11期。

⑮ “基督教赈抚灾民”、“本埠新闻——急赈董事开会记”，《大公报》1917年12月7日。

⑯ 霍培修：“天津基督教的联合组织”，《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1986年，第136页。

⑰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卅五周年纪念》，1930年11月，第20页。

⑱ 《天津青年会事工报告》，1935年，第10页。

⑲ 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1986年，第129页。

⑳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第17~18页。

㉑ 《天津青年会事工报告》，1935年，第18、33~34页。



②“妇孺救济会积极进行”，《益世报》1922年4月28日。

③“青年会爱护难民”，《益世报》1925年12月20日。

④“东局子难民苦况”，《益世报》1933年6月14日。

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第10页；“东局子难民苦况”，《益世报》1933年6月14日。

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第11页。

⑦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通讯丛书第一种《万丈高楼从地起》，1943年。

⑧《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第116页。

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附录
Dr. R. R. Gailey and Tientsin Y. M. C. A. p4

⑩《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1899年》第47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5页。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青年会与社会赈灾救济事业初探

王 军

基督教青年会,1844年在英国伦敦创办,后逐渐传布到西方各国,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团体。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入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十个城市也设有青年会组织。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895年12月份,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①

基督教青年会的创会宗旨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因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非常关注国计民生。每次遇到天灾或者人祸,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都会积极采取措施,把会员们组织、动员起来,一面筹款募捐,一面设法安置灾民、难民。在1949年之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参与的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1931年北美协会的传教士撤离中国,即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立初期。在这一时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国干事为了扩大影响,感化人心,于是积极参加一系列的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这类活动多由外国传教士主持,中国会员大部分只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和其他宗教团体相比较而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各种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基本上是与其他教会组织联合起来开展工作,尚无力独立主办这类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的的能力。第二阶段从1931年秋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会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具体负责组织、策划等工作,外国人更多地是起到“保护符”的功用,更为重要的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已经可以独挡一面,成为中国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组织者。第三阶段由抗战胜利到天津解放,这一时期,在美国的支持下,美国传教士重新掌握了领导权,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成为各项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的领导者。

本文将尝试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民国年间开展的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进行初步探索,以展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和它“博爱”、“爱群”、“救世”、“惠人”的伟大精神,希望能激励当代青年远追先贤,以为榜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献身社会,造福人群,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初次涉足 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参加的赈灾活动是在外国传教士的主持下进行的,而且多与其他教会组织联合开展。由于自己的力量有限,无法独立承担赈济某一地区灾民的任务,而各社会慈善赈济团体间往往缺乏必要的沟通,难以协调,结果出现一些地区反复施赈,而另外一些地区则从无社会慈善组织派人放赈的现象。为了解决好各种问题,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灾民利益为重,先后加入了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天津急赈会和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社会慈善联合团体,共同为华北地区受灾民众服务,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1917年夏,华北地区忽遭水灾,面对来势凶猛的滚滚洪水,灾民无力抵御,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相携逃难,来津者甚众。消息传来,中外各善士、各社会慈善团体立即行动起来。外国传教士召集各会中国负责人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东马路会所开会,研究水灾救



济工作。“开始时是以救济工作为中心,所以由外国传教士主持会议,中国传道人则担任调查、放赈等具体工作”。^②于是,各会各尽其力,募集赈款赈物、搭盖灾民窝铺、^③赶做棉衣棉裤、举办义卖会等,想尽一切办法赈济受难灾民。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本其“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行动特别积极,很快便动员各董事、会员积极投入到这次声势浩大的赈灾活动中来。它一面参与由外国传教士领导的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的筹备工作,另一面又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在水产学校西、新车站东北警察打靶地和河北种植园等处开工赶造灾民临时窝铺近3000间。^④由于交通不便,消息不畅,处于后方的各善士、慈善团体很难了解到灾区的具体情况,无法针对实际情形采取妥当的处理措施,使得赈灾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有鉴于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动会员奔赴灾区调查受灾情形和灾民的现实生活状况,并将所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发送回来,有助于各慈善团体放赈的顺利进行。

为了促进各社会慈善团体之间的合作,也为能给灾民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又加入了由天津警察厅出面组织的天津急赈会。天津急赈会是此次赈灾活动中最大的华人赈济团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加入增强了该会的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国传教士对自身的束缚,为华人干事在社会慈善赈济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大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爱心提供了机会。干事徐汇川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表参与急赈会每口的例行会议,他处处为灾民着想,向该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并被采纳。他还积极参加了急赈会的决策、募赈、放赈、调查、巡视等工作,不辞辛劳,确立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该团体中的重要地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表示诚意,也为了方便赈济物资的统一施放,还特别将如何分配窝棚的权利交给该会,“以资一致,并要求派警前往该工程地弹压保护”。^⑤



为了解决广大灾民衣食住行的困难,社会慈善团体想方设法筹款募物。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骨干的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想到一个办法,便是在报上刊登启示募集御寒冬衣,“启文云:迺者巨浸为灾,居民流离,房舍听其淹没,箱笼听之浮沉。苟全性命不顾,衣物即或偶有所携,皆属微细”,阐明实情后,遂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发出呼吁:“今慈善家既筑房以居之,散粟以食之,暂足以安棲棲之身,哺嗷嗷之口矣!乃身上单薄,御寒无术,连日阴雨已觉瑟缩,风雪骤至,其何以堪?”寥寥数语道尽灾民辛酸,发人恻隐之心,接着便展开宣传攻势,“仁人君子,恻隐为怀,号寒凄怆,必难坐视,及今西风初紧,急力筹备,庶使家存衣被之温,路无冻死之骨,如承施助,惠莫大焉。凡有旧棉被、棉裤以及布料棉花等等,可以制棉衣、棉被之用者,皆所欢迎”。^①在这样的号召下,加之中国人素以“乐善好施”为美德,津人又任侠豪放,故捐输者积极踊跃。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又开“设女工厂两处,专为难民赶做棉衣”,^②另“设纺线工厂一处,织网工厂一处”,并专门从灾民中招募男女工人,准备实行“以工代赈”之法,为全体灾民筹谋生计。^③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不单把募赈、放赈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还十分重视灾民的善后安置工作。正如其在《大公报》上所刊登的公启所云:“俟灾民一入(窝棚)后,本会即负完全管理及教育之责,现已派员赴各处演说,并请中外医士十数人赴各灾民住所疗治疾病,并有各校学生及本会干事分任调查灾民一切实在之状况以便速筹拯救之方”,^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认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为灾民制定了窝铺管理章程,其内容有保持饮用水清洁、不许院内大小便、常晒被褥、设警保卫治安及定时可至施医所疗治等项,另外要求“每家须持有移入凭照方准移入,个人以先须经大夫查验,如有传染病者概不准移入,由大夫送入医院安置”,^⑤如此严谨的安排,保障了灾民的身体健康和较好的居住环境。不仅如此,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就地为灾童



设立小学校一处,学生约计一百余人,授以国民常识。由此不难看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办理赈灾工作的细致周密。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们不仅计划周详、管理严格、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十分乐于将自己的赈灾经验推广出去,供各方善士参考。他们利用1918年农历正月初三、四两日下午一点至五点,在河北新车站种植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管辖的窝铺区内开展览大会,通知本会全体会员并邀请各社会慈善机关、团体派员前往参观,向公众展示其在管理、卫生、男女工厂、学校、讲演所等项事务之成绩,以便于交流学习。^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实际上并没有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骄傲或沾沾自喜,在给会员的通知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青年会创设以来,历承各界赞成,二十年如一日,未尝中止,今虽丁此浩劫,不旋踵而旧观已复。各队义务会员数口惨淡经营,贤劳备至,同人钦佩,奚似尚望努力加餐,并肩勿替,时势足以阻庸人而不足以阻豪杰,不经盘根错节,何以见匠氏利器?法国字典无‘难’字,吾人字典中岂容有之乎?”^⑪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员深知赈济工作任重而道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并大功告成,是基督教舍己爱人的救世精神激励着他们,指引着他们为受苦受难的同胞献上自己的一份份爱心。

在此次赈灾活动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表现得十分出色,却也招来了一些嫉忌的眼光。天津急赈会北区刘署长就曾报告称,“青年教会之安某在北二区界李公楼建盖窝铺137间,均已安插灾民,惟彼有强迫灾民入教情事,是以纷纷迁移颇多,而安某由英工部局要去巡捕二名,在该处守卫,特请示办法”。^⑫不明情由而又爱国心切的该会诸董事立即表示反对,怕损害国土、国权,主张即刻电知安某,速将该巡捕撤去,不然定当由急赈会联合各团体提起反对,并令其知信教自由,不得有所强迫。经调查后得知,安某实非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人,而所雇巡捕亦早已与英工部局脱离干系。



如基督教青年会会训所云：“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就是把基督的博爱精神播洒人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奋斗不息。面对同胞餐风露宿的惨景，爱国好善之士谁不心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能急人之所急，以极大的毅力，不辞辛劳，为灾民奉献爱心，充分体现了“爱群”的精义。

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慈善 赈济等公益活动的延续

民国时期，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威胁，硝烟弥漫，政治腐败，人民苦难无比深重，一旦发生天灾，更是苦不堪言。民国政府处于内交外困之中，根本无力顾及，加之官僚体制腐败，经费匮乏，社会赈灾救济的责任基本上落在了各社会慈善机关、团体的肩上。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光大基督精神，减轻民众苦难，推动社会进步，更是不遗余力，活跃在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的第一线。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包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内的各教会团体又开始忙于赈灾救济工作。工作范围不但在天津市内，并且还扩展到天津县、静海县、武清县及唐山等地。^④这次罕见的大旱遍及华北5省的317个县，受害灾民约2000万人，死亡人口约50万。^⑤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中外善士联手起来，组织起华北华洋义赈会，以便集中力量、协调各方关系，更好地完成这次艰巨的赈济任务。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继续秉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创会宗旨，积极参与其组建工作，成为华北华洋义赈会中举足轻重的一员。鉴于逃荒到天津的难民络绎不绝，“青年会成人部特应华洋义赈会之托，派员赴河北种植园及江河一带从事调查”。据其报告所云：“共有难民60余人寄属演武厅或马家园左右，大半恃乞食为生，情形颇为困苦可怜。”^⑥在得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报告后，华洋义赈会决定由办



理赈灾纪念章入手,即捐十元者赠给铜质纪念章,捐百元者赠给银质纪念章,捐千元者赠给金质纪念章,以此方法吸引好善之士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募集到大量赈款施放灾区。^⑫此外,还致函各中外商号,商以将报刊上广告地位相让以登募赈广告,各商家纷纷响应。^⑬不久,又举办游行大会,将窝铺、纪念章、受灾地区图等做成模型置于车上游街,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也列队参加此次游行活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们以“工人扮作旱灾灾民各等苦况模型,使见者如履灾区,以动善士观感”。^⑭还“有厂车两辆,一辆上装槐树一棵,上书‘灾民所食槐叶’字样;一辆上载土房及土墙并有作成灾民扶于墙上者,有躺卧于地上者,形容其受恶情形”。^⑮此次游行大会的成功举办,既振奋了精神,又募集了义款,效果十分明显。

1933年黄河大水,两岸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消息传来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立即决定定期举办游艺会,以资筹款救济灾民。为了办好游艺会,多募善款,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特约请天津市大鼓名家刘宝全及荣剑臣、张寿臣、吉评三等人演唱各种曲艺,并约请名票刘叔度、徐觉民、纪书元等人表演京剧,曲目有《捉放曹》、《孟津河》、《宝莲灯》、《辕门斩子》等,票价每张一元,售出款项悉数汇往灾区。而此次会务费用全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自行解决,不动票款一分。^⑯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于灾民窝铺的管理十分细致周到,专门设立了教育股、卫生股、登记股、饮食股、管理与公安股、总务股及诊疗所共七股来分担照顾灾民的责任。教育股负责教授灾民识字、组织灾民游戏等,并定期讲道,教授唱诗;卫生股每日派员视察棚内及院内清洁卫生状况,喷洒防疫药水,还举行灭蝇运动,曾在一个月间共捕蝇五十余万只;登记股专司负责登记难民入所,填写难民证及难民底册,并代难民家属查询找人等事宜;饮食股负责供给灾民食粮的工作;管理与公安股专管维持难民秩序及督察难民之出入,并于夜间轮



流值夜,以防火患及意外发生;总务股统理各项事务,在巴黎道青年会所设立临时办公处,曾请华北影片公司为难民各种活动摄制影片以资宣传;诊疗所负责为灾民疗治疾病,市内多名名医来此义务服务,会所每日资聘护士辅助诊疗,以尽量满足灾民的需要。^②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十分关爱少年儿童的成长,对那些灾民儿童的生活、健康、教育等情况尤为关心,设立灾童学校、派医生为灾童检查身体,还经常派员到各灾民聚居区调查,了解情况,以方便及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为此还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召开“贫儿大会”,发给每位受过调查的灾童以入场证,计有十五岁以下六岁以上灾童五百余名。由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阮涓涓报告开会意义,并有云子玉大夫讲演注意卫生对儿童成长的意义,后经会中干事数人分发每名灾童玉米面四斤,毛巾一条,肥皂一块。^③此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先后设立灾童教养所数处,如卞椒成、陈芝琴等人创办的天津临时幼女教养所和成美学校青年会创设的灾童教养所,都比较成功。这些组织不仅向灾童授以初级课程,还管理衣食等项,并传授手工工艺,如编织发网草辫、制毛巾等,以使她们能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自食其力。^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这些举措深得人心,切实保证了灾童的健康成长,为受灾家庭稍解后顾之忧,也为该会赢得了良好声誉。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磨砺中得到成长,在华北地区的各项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这也鼓舞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斗志。但抗战的全面爆发却给国人带来了更为深重的苦痛,也使宣扬“爱群”精神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活动受到限制。



三、抗战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与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活动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基督教教团组织也随着日本侵略军来到华北。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控制中国基督教教会，以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由于中国基督教教会当时多掌握在英、美等国传教士手中，其阴谋一时难以得逞。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经常请美国传教士出面，与日本人周旋，以维持青年会的正常运转，在及其艰难的条件下，弘扬基督精神。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没有被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所吓倒，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也没有放弃履行救世救人的使命。他们不仅把市内原有的窝铺区维持下来，还继续扩充窝铺区以接纳更多的难民。有些会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饱受战火的地区救济难民，充分发扬了基督教博爱的精神。1938年秋后，成立了天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灾会天津区分会，办公地点设在巴黎道青年会内，当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就把这项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加以完成。各教会的英、美两国的传教士，几乎完全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并担任着重要的职务，特别在经济方面，大权掌握在美国人柯恩兹(Hugh Mackenzie)与高张奎(A. C. Crimes)手中，一任司库，一为司账。英文秘书是美以美会的狄克逊。为了把救济工作的范围扩大到饱经苦难的乡村，基督教教会还破例把天主教的部分教区也包括在内，并联合法国神父司义芳与荷兰神父杨仁祉二人参加具体的放赈工作。救灾范围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的17个县，在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里，共放赈款5.6万元，其中有4.1万元用于乡村，1.5万元用于市内。在此期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曾利用联青社^⑤捐助的一些款项，在市内扩充了工赈学校和义务小学两处，并招募儿童组织“灾儿擦鞋队”，又作了十辆人力胶



皮车,找来十户灾民拉车,进行救济,名为“以工代赈”。^⑤这些举措虽然对于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灾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也确实为部分灾民解决了生活困难,并表现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急难民之所急的情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美国进入交战状态。于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被日本侵略军封闭。经多方努力,才于1942年8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同意接受日本和伪政权的“监督”与“指导”的条件后,重新启封。为了保存实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早已转趋低调,只是在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汉奸市长温世珍的“支持”下,勉强利用有限的救济款项为难民做些赈济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才得以重新恢复正常活动,并且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俨然成为北方各社会慈善团体的领袖。有一个例子就明显地表明这一点:美国援华二亿元,每市补助两千万元,用于救济事业。天津市为此专门设委员五人,其中两人为美国人,一为政府官员,余二人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杨肖彭和宋□卿。^⑥抗战胜利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从事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是学生救济会的成立,其中许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学生会员参与了天津地区的社会调查活动,了解饱经战火之苦的人们的生活状况。

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岁月,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排除困难,尽自己所能为受难同胞减轻苦痛,给予灾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生活下去的勇气。他们的无私奉献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天津各项社会慈善赈济等公益事业不断前进。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基督教舍己爱人的精神为指引,全心全意为社会、为人群谋福利,从不计较利益得失。面对成千上万风餐露宿、无依无靠的灾民,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赈济活动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十分注意训练及培养团体生活中的各种良好品质,如合作互助



的精神,忍耐、服务和勤劳的习惯及谦让、和平、爱善的美德等。

注 释:

①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霍培修:“天津基督教的联合组织”,天津宗教志编辑室编:《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1986 年版。

③窝铺是一种山庄稼秸秆、苇席、稻草和少量木材和黄泥建成的简易住宅,有门窗和炉灶。

④参见《大公报》1917 年 12 月 7 日。

⑤《大公报》1917 年 10 月 23 日。

⑥《大公报》1917 年 10 月 20 日。

⑦《大公报》1917 年 10 月 26 日。

⑧参见《大公报》1918 年 1 月 14 日。

⑨《大公报》1917 年 11 月 3 日。

⑩《大公报》1917 年 11 月 19 日。

⑪参见《大公报》1918 年 2 月 6 日。

⑫《大公报》1917 年 12 月 3 日。

⑬《大公报》1917 年 11 月 27 日。

⑭参见霍培修:“天津基督教的联合组织”,同引前书。

⑮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2 页。

⑯《大公报》1920 年 10 月 7 日。

⑰参见《大公报》1920 年 10 月 8 日。

⑱参见《大公报》1920 年 10 月 25 日。

⑲《大公报》1920 年 10 月 29 日。

⑳《大公报》1920 年 11 月 2 日。

㉑参见《益世报》1934 年 1 月 5 日。

㉒参见《1933 年青年会事工报告》。



⑳参见《益世报》1932年12月31日。

㉑参见《益世报》1921年7月27日。

㉒联青社是一个国际性社团，第一个联青社是由 Judge. Paul William Alexander. 于1922年在美国 Ohio 州 Toledo 市发起的，他想创立一个由 YMCA 成人会员组成的社团，以支持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

㉓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同引前书。

㉔参见《益世报》1946年8月4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体育运动发展

王兆祥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日益增多和扩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进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①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之近代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国家侵略的耻辱,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说、文化教育。近代体育运动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潮流中传入中国,并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近代体育运动传入中国大致通过以下四种途径:一、聘请外国人来中国传授,如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和新式学堂所采取的办法。二、派人出国学习,如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和西方国家学习体育。三、从国外书刊中学习。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许多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多是从这里获得有关近代体育知识的。四、外国人自觉与不自觉的传播。所谓“自觉”,即出于一定的目的,有计划地来中国传授近代体育运动;所谓“不自觉”,即外国传教士、商人、军人在留驻中国期间,开展了一些体育运动,这在客观上自然起到了传播近代体育运动的作用。^②本文介绍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是在近代体育运动的推动和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宗教团体。它在近代体育的推广过程



中,既有“自觉”的成分,也有“不自觉”的因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后,它逐渐取代了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而体育运动的发展又和宗教的传播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宗教文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因此考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宗教文化的传播中所产生的影响应以多角度给予评价。对于它在中国宣扬宗教文化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促进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的积极作用,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

一、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增强青年体质, 是青年会的办会宗旨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YMCA),1844年创建于英国,后来盛行于美国,从属于“北美协会”,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青年会进入美国以后,教会活动增添了“德、智、体、群四育”和“为社会服务”等内容,其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19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后,推广体育活动是“四育”之一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体育工作首先是从青年会内部的体育设施开始的,逐渐扩展到在校青年,然后再在社会的青年中广泛地传播。正如《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略史》中所说:“天津地当冲要,为京师门户,运河尾间,通商以还,华洋麋集,贸易繁兴,遂成北洋一大商埠。清季种种新政,多由此间倡办。青年会事业,亦于天津着先鞭焉。”^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天津这座开放城市为依托,不仅宗教事业迅速铺开,带动天津乃至华北的体育事业也得到广泛的开展。

1895年初,北美协会派遣来会理(D. Williard Lyon)来到中国,负责筹建青年会的工作。他选择了当时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和洋务教育兴盛的天津,并且将目光首先投向当时的官办学校。他组织



的第一个青年会团体不是由教会学校学生,而是由几所官立大学的学生组成,地点在天津北洋医学堂。这种做法对其他官立学校的学生影响很大,引起他们对青年会产生更多的兴趣。因此,来会理在天津筹建青年会的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很快打开局面。12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从此青年会工作的对象从学校走向了社会。20世纪初期,青年会组织迅速发展。据统计,截至1920年4月,青年会已扩展到17个省和海外华侨集居的几个地方,约有城市青年会30处,学校青年会170处。^④

根据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展体育的“四育”宗旨,会内附设体育部,所以首先要派遣一些体育专业人员,到中国负责青年会的体育工作。他们除了在青年会传授体育运动技术以外,还到当地学校指导体育活动,介绍西方体育的理论与方法。1896至1898年间,美国马萨论寒州春田青年会干事学校(即后来的春田学院)教授、近代篮球运动创始者奈司密斯(J. Naismith)的学生蔡尔尔(C. Saler)来到天津青年会,负责体育工作,并专门传授篮球(篮球)运动。1908年以后,一批美国体育专业人员来华,分赴上海、天津、北京、长沙等地青年会任职,有的还进入中国高等学校兼任教授或体育主任,从而使青年会推广体育的活动得到了较大的扩展。^⑤正如波士顿的西佛(W. A. Seaver)所说:“教会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但是,一小部分的中国人总可以得到利益。在教会的能力与政府的认识所难达的地方,青年会便出来了。”^⑥青年会开展体育活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传近代体育运动项目。如1904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伯森(C. H. Robertson)、盖克、沃克尔、白雅各等分别到天津的北洋大学、新学书院、高等工业学堂、普通学堂、官立中学堂等讲演,宣传篮球游戏及田径运动,致使“各项体育活动鹊起”。他们还到北京各校讲演,激发青年学生的兴趣。此外,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经常



联合京、沪等地青年会组织体育表演,并建造了体育馆、游泳池,以吸引各界青年参加体育活动。由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内体育设施先进而且比较齐全,从西方引进的一些体育项目首先在会内进行比赛,逐渐扩大宣传。如当时青年会内的乒乓球、台球都是天津市出现的第一张球台。^②

第二,组织中国早期的体育竞赛。如1910年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便是天津青年会和上海青年会等发起组织的,美国人爱克斯纳(M. J. Exner)任此次运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14年举行的第二届“全运会”,名义上是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还是北京青年会干事侯格兰德(A. N. Hoagland)。第一至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的筹备工作、选拔比赛等,也都是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柯乐克、爱克乐和葛雷(J. H. Gray)等人进行组织的。

第三,举办体育训练班,培训体育专业人员。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青年会定期集中进行体育工作培训,每期十人左右,为期一年。负责训练班工作的人员有富博思(美籍)、董守义、马约翰、许明辉等。通过训练班,提高了各地体育干事的工作水平,对各地青年会体育运动工作的推动与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③20世纪初,天津青年会开办“体育干事训练班”,培训青年会体育干事。课程有生理学、解剖学、运动技术、教育学、卫生学等。历届毕业生多派往各地青年会任干事,也有到大、中学校任教师的,还有少部分被派往美国留学。^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体育干事——董守义和王正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正廷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成为青年会的成员,1904年派到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中开展工作。^⑤1909年任中华基督教留美青年会干事。1915年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第一位中国籍总干事。^⑥由于他们在开展近代体育运动以及在外交方面作出卓越贡献,后来被选为中国奥运会的委员。

开展体育比赛是青年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从建会之日起,就由



天津青年会发起,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和组织各种比赛。如1899年与北洋大学主办有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电报学堂等校的体育代表参加的“体育校际赛”。1902年在奥租界举办年度运动会。1903年秋间,借天津城东南空地一段,布置操场,开首次运动会,为津埠发展体育之初步。^⑫1904年在城西南角修建一座田径运动场,吸引一些学校派队参加比赛,到1908年,每年举行运动会。1915年,开始举行天津学校联合篮球比赛。1917年组织“竞技篮球队”,在会内篮球场与美国驻军和北京青年会“老母鸡篮球队”进行比赛。当时的队员有李清安、李友珍、齐守愚、刘学连、黄子曾、周文焕、王之光、姚恩汉、刘学琦、陶少甫、尹鸿祥等。1919年举办游艺比赛,有象棋、围棋、蛙棋、跳棋、乒乓球、地球等,并在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新建网球场一处。1925年,召集扶轮、南开、汇文、同文及青年会代表开会,讨论参加华北运动会的篮球、垒球、网球、足球及其他各项运动的选手问题。1928年,青年会体育部干事李友珍首先在华人会员中开展羽毛球活动,经常练习的有杨锦奎、陶少甫、翟士齐等10余人,并且在这一年与外侨队进行了首次比赛。1929年,青年会在聚英球房举行全市台球决赛。还组织万国甲乙组公开室内篮球赛,华北男女队不下百余队参加。1931年,举办万国长跑赛。又举办乒乓球公开赛,青年会青萍队获冠军。1933年,筹办国术馆,讲授武术。1934年发起天津首届万国自行车赛,1935年,组织“全市公开游艇比赛”。1936年,举行第一届象棋比赛等等。^⑬

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介绍和推广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伯苓早年接触很多基督教青年会中的人士。自1909年他在西沽公理会教堂洗礼后,当年9月15日就当选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1911年3月31日当选为董事长,进一步拉近了南开学校与青年会的关系。青年会的许多体育活动也都是在张伯苓的具体参与下进行的。



张伯苓本人就爱好体育,曾经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思想,被誉为“中国注重体育的第一人”。⁹⁸他很早就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多人相熟识,如世界跳高名手华克(Walker),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队中锋格林(Gailey),普渡大学毕业的跳高名手饶伯森等,张伯苓经常请他们到学校指导体育锻炼。1916年,张伯苓聘请天津青年会的隆满(Longman)指导学校足球一队和二队,用幻灯演示足球规则。同时他还约请东南大学体育系主任美国人麦可乐(Meclog)和保定中学体育教员美国人克拉克(Klack)指导体育教学和课外锻炼。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具有“西洋色彩”的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已经开始蔓延于中国,其中青年会的工作功不可没。正如30年代一位体育工作者所说:中国“山友邦得到了发展体育的行动,同时复兴了故有的体育事业”,西洋对中国的贡献便是“体育之系统的发展”。而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实为介绍“现代运动”到中国立下了一个基础,“在发展体育的工作上,要让它们占第一把交椅”。⁹⁹

二、青年会对近代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介绍和推动

我国从清末开始引进西方近代竞技体育运动项目,而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活跃于各地的青年会介绍和推动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很少有人从事这种西洋体育活动。青年会在会内开展的各种体育运动首先吸引的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许多公立和私立的学校受教会学校的影响,也在课外开展田径和球类运动,并参加教会学校的比赛。如北京清华学堂参加北京汇文、协和书院的体育比赛,天津南开学校参加新学书院等教会学校的比赛,上海南洋公学参加圣约翰等教会学校的比赛等等。



在西洋体育运动的引进过程中,中国的南北方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的南部,例如厦门、香港、广州、澳门等英人、葡人势力大的地方,运动的种类自然从英国传来,运动的方式也便有同样的性质——是雍容而安稳的。英式足球、英式板球、杖球等游戏很是普遍。在中国的北部与中部,多数的中学与大学受了美国的影响,故运动的性质是正确迅捷的。篮球、棒球在这些地方可以做运动的代表,尤其篮球最普遍。田径赛也很普遍”。^⑩这其中与青年会是从美国传入的宗教团体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天津首先引进了一批近代运动项目,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内开展的体育运动有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台球、地毽、垒球、羽毛球、赛艇、田径等。其中,1904年乒乓球引入中国,天津是最先流行和发展的沿海城市之一。1931年青年会举办了第一次全市乒乓球公开赛,这也是中国乒乓球的最早的正式比赛。1936年天津青年会又举办了第一届华北埠际乒乓球赛。^⑪在这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最活跃的当属篮球。可以说,天津是近代篮球运动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也是近代以来篮球运动发展最活跃的地方,因此,需要特别加以介绍。

1895年12月,在天津青年会成立的会前与会后的活动中就有篮球游戏的表演了。在来会理写的《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中描述了天津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情况:“天津青年会之最初活动,是每周一次的查经班、辩论会,此外会员对篮球亦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概。但在玩球以前,他们的一番姿态很是可观,他们必须盘好自己的发辫,修短长长的指甲,把不便利的长袍脱去,这样,他们就把书生的尊严放弃,而换上一副高兴活泼的姿态了。但是,这种运动只在会所草地围墙的背后举行,颇有狭隘不便之概。”这段文字说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已经于1895年12月举行了中国近代篮球运动史上第一次篮球表演活动。



1896年1月11日下午4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中国篮球运动史上较为正式的篮球比赛。据1948年赴美的吴志钢博士提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曾公布三次英文布告,布告的原件收藏在纽约市百老汇街291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内。吴志钢博士特地将3次英文布告抄录并寄回国内。第一次布告(1896年1月11日):“一场篮球赛将于在今天下午举行,所有对篮球有兴趣的青年4点被邀请参加比赛。”第二次布告(1896年1月18日):“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今天下午4点举行,请来参加。”第三次布告(1896年4月4日):“上星期六举行了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篮球赛,今天下午4点还有一场比赛,请届时光临。”这三则布告在《天津公报》上刊登,有人认定是迄今为止我国有关篮球运动最早的文字记载。^⑤

在篮球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人饶伯森(C. H. Robertson)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于1904—1908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期间,经常到京、津各校讲解“西洋体育”,积极倡导、宣传近代的篮球运动。1910年,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博士的学生蔡乐尔(美国人)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进一步传授了篮球技术和比赛规则。接着上海、广州等地有了这项运动,开始仅为青年会的一些会员专有,后来才在一些大城市的学校里开展起来,但只有少数学生参加。当时一般称这项运动为“筐球”运动,场地没有一定规格,人数无严格限制,规则也极简单,而且都是通过口授和实际活动来加以传授和推广,并在全国才有了较广泛的开展。

1910年,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男子篮球运动被列为表演项目,参加表演赛的仅有天津与北京联合组成的混合队和上海两个队。当时的篮球规则规定每队上场队员为5人,每进一球后,由中锋在中圈跳球再开始比赛。1913年,华北联合运动会将篮球列为比赛项目。同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中,篮球运动被列为正式比赛项



日,中国男子篮球队第一次参加了国际性的比赛。^⑨

在中国篮球发展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人需要提及,这就是曾经长期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的董守义。董守义,河北蠡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学生时代他就爱好体育,尤其酷爱篮球运动。1922年,董守义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同时兼任南开中学体育教员,教篮球及田径运动。翌年赴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春田学院)体育系学习。1925年回国后继续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和南开体育指导。在他的训练下,南开学校出现一支由唐宝昆、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魏蓬运为首的篮球校队,被誉为“南开五虎”。1930年代表天津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获冠军。接着,又代表中国参加同年5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9届远东运动会。1936年,董守义以篮球队教练身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并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成员,赴丹麦、瑞典、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中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代表团总干事。董守义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期间,在近代中国社会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⑩

三、组织创办各级运动会,促进 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运动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对近代各种体育运动会的宣传、推动和具体组织上。如上所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宣传、组织和开展了一系列体育竞赛运动项目,为各类近代运动会的开办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青年会在直接参与或协助操办各种运动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天津校际运动



会、北方区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国际奥运会等等。

1. 京津校际运动会。1902年,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与教会学校一起举办天津城市校际体育运动会,初名“天津青年会运动会”。这次运动会观众有五千多人,当时不但在华北,就是在全国来说,也算是最早的一次。^②此后多年,青年会始终保持天津体育领域的主导地位。从1914年的第11届起,将“天津青年会运动会”改名“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一直到1925年天津青年会共举办了21届(其中1923年暂停一届)。^③

2. 华北区域运动会。在举行“学校联合运动会”的基础上,到1911年止又先后共举行过8次全市运动会。其中第7、8届运动会,是由青年会和天津官立中学、南开中学和普通中学联合发起主办的。当时,分成人、童子两级,分别进行比赛。从第7届起开始有外埠单位来津参加比赛,如河北通县的协和书院和唐山的路矿学堂等。到第8届运动会,外地参加的单位逐渐增多,除天津的学校外,还有通县的协和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唐山的路矿学堂、保定的高等学堂以及邢台县的宏道学校等,^④逐渐形成了华北区域运动会的规模。据后来形成的华北运动会会章规定,运动会在华北各省市轮流举行。可是由于当时其他各省市对于体育方面算是萌芽时期,无论在场地设备、人员配备、办会经验等方面都没有当时北京、天津的条件好。所以,第1届至第5届华北运动会(1913—1917年),只得在京津轮流举行。从已经举办过的18届华北运动会来看,其中在北京举行过5次,天津4次。为此,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指出,这一时期“青年会体育,几为全国之中心”。^⑤“此等运动会之组织,青年会之外国体育干事及教会学校之外国教员,实为其原动力。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亦占重要地位”。^⑥这与天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3. 全国运动会。1909年,北美协会派体育干事艾司诺博士来中



国协调体育工作。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理事的张伯苓联合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Gailey)、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埃克斯纳(M. J. Exner)等共同努力,借南洋工业展览会的时机于1910年在南京成功地举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次运动会分华北、武汉、吴宁(苏州和南京)、上海、华南5区,出席运动员150多人。每区由当地青年会指派体育部一名外籍职员担任运动委员长,共同组成全国运动委员会,埃克纳斯为会长,张伯苓为总裁判。在“全国学校联合比赛”中,天津青年会日校获得第三名。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规模的运动会,辛亥革命以后被正式追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从这次运动会的状况看,虽然田径比赛的具体内容和跑步的距离均不大规范和统一,但项目的设定已逐步趋向一致。1914年北平青年会在北平天坛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运动会。1924年武昌青年会在武昌举办了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并成立全国体协。一些现代运动的比赛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棒球、中国拳术、游泳、田径等都基本具备。这三次运动会引起了国家教育机构对体育的重视。许多体育团体也在全国各地相继诞生,以后的全国运动会就直接由政府部门接手举办。^⑤

4. 远东运动会。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倡导下,1913年,青年会体育干事葛瑞(Gray)和张伯苓一起联合日本青年会和菲律宾体协,组织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和第一届“远东运动会”。采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规指导工作,“其根本目的,为协助增进各种竞技运动之事业,发展各种竞技运动之组织,并增进运动之兴趣,发扬高尚之精神”。^⑥在这次远东运动会上,中国第一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田径比赛。^⑦1921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国不仅有男运动员出席这次运动会,并且有1000多女学生参加,运动会的项目达到33个。^⑧远东运动会每两年在东方的大城市举行一次,“这些运动会不只是表明了中华民族对体育的兴趣日渐增加,而且证明出



了整个的东方提倡现代体育所采取的步骤”。^②它是中国体育走向国门,参与国际赛事的重要一步。

5.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世纪由欧美国家发起的奥林匹克运动,最早也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介绍到中国来的。1904年,第3届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举行,成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人们的热门话题,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一些师生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奥运,引起张伯苓的关注和兴趣。第4届奥运会即将举办的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的第5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最早表达了中国人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愿望,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去年雅典奥运会期间,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技术水平很差,得奖希望渺茫,但他们仍然派许多选手参加。照此看来,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③1908年8月,张伯苓参加世界第4次渔业大会,会后到欧洲顺道考察教育,正值第4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他观看了比赛。转年,南开中学堂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年度运动会,在发奖仪式上,他用幻灯放映了奥运会的盛况。天津青年会美籍干事兼南开中学堂科学教员饶柏森作了关于奥运会的演讲。在演讲中阐述了我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激起了同学们对奥运会的极大兴趣。天津青年会创办的刊物《天津青年》刊登了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文中介绍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情况:“再过几个星期,伦敦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运动会……”《天津青年》还向国人提出了3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④此后,与奥运会有关的字眼在更多的刊物上出现,参加奥运会成为国人的愿望。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适值中国“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以时间匆忙、准备不足为理由,决定不参加任



何比赛。而日本则居心叵测地向主办国提出,山东北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和中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加比赛。国人闻之大哗,坚决反对。时为天津青年会董事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的张伯苓闻讯,立即与张学良进行商议,决定将计就计。张学良宣布派刘长春、于希渭二人组成中国代表队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会,张伯苓则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等报名,中国人终于走进奥运殿堂。这一举动弘扬了中华正气,写下了中国参加奥运的重要一笔。

应该看到,接受、吸收、融合,是西方近代体育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最终的融合不是中西体育文化的对等合并,而是经过被动接受和大量吸收之后,从内容和形式上都造成反客为主的结果。由于体操、田径、球类等西方竞技运动逐渐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主体,从而使中国传统体育降到次要地位,这一结局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消退或“全盘西化”。相反,由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大量吸收、融合了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之后,越发显得充实和丰富,中国传统体育经过近代的逐渐演变,终于初步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近代体育文化。^③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介绍了西方先进的体育理念,引进了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而且组织和操办各级各类的体育运动会,对于中国近代体育运动早期的形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②成都教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③天磊民:“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略史”,见《青年进步》第四十一册,1920年7月。

④成都教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1年版,第41页。

⑤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41页。

⑥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⑦《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大事记(1895—1995),第53—55页。

⑧陈维麟:“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体育活动简况”收入《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1988年版,第270页。

⑨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⑩《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⑪陈秀萍编:《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⑫天磊民:“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略史”,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1988年版,第261页。

⑬以上参见1995年版《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大事记》(1895—1995),第52—58页。

⑭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⑮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1988年版,第268页。

⑯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1988年版,第268页。

⑰“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收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36页。

⑱张建星主编:《天津细节与言行 天津600年》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①⑩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①⑪“南开五虎”，见《南开四十周年校庆特刊》，1944年10月。

①⑫董守义：“华北体育联合会的沿革”，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第441页。

①⑬《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大事记（1895—1995），第53页。

①⑭董守义：“华北体育联合会的沿革”，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第442页。

①⑮“社会体育事业发展史略”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第232页。

①⑯“社会体育事业发展史略”收入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第230页。

①⑰陈秀萍编：《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①⑱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①⑲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①⑳“中国女子的运动问题”1924年11月《女青年报》，收入陈秀萍编：《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㉑宋如海：“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见成都体育学院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1988年版，第269页。

㉒范汝强：《旧中国与国际奥委会》，转引自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208页。

㉓张建星主编：《城市细节与言行 天津600年》第5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㉔胡乃花：“试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演变与中国近代体育文化



的形成”,《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增刊,第147页。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体育运动

崔景波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国际委员会在中国创建的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在创建的第二年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从此,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遍及中华,并发展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总部发展了很多个分部和支部,在全国委员会的统一规划下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青年会在天津近代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起了引进、传播、组织、管理和指导的作用,成为近代体育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青年会创建初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就遵循着自己的“改善身体、社会、心理、精神”四项路线和“我来人间不是让人伺候,而是服务于他人”、以及“依靠中国人,属于中国人,为了中国人”的宗旨和原则,从1895年至1949年半个多世纪中,为推动天津和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系统的工作。诸如帮助制定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建立健全体育组织、竞赛和运动员训练规程,培养体育人才和体育场馆建设,大众体育的普及与体育科研的推广等等,并参与了国家体育法的制定、国家体育组织机构设置及体育领导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促使天津和中国近代体育逐步走上正规科学的发展轨道,并创造了天津和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很多个第一,为天津城市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世人皆知称赞的历史功绩。



一、青年会的创建与新项目的引进

天津近代体育运动的新项目是随着青年会的创建而引进和兴起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侵华驻军、驻华使领馆、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已陆续把田径、足球、网球等项目传入中国的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青年会引入的新项目主要有篮球、棒球、体操和排球,其中篮球项目影响最大。

天津青年会的创造人是来会理。^①他受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北美协会派遣,携夫人从美国乘船来中国。他1895年9月1日出发,10月5日抵上海,11月11日到达天津。12月1日在北洋医学堂“节制堂”,^②北洋大学校长、北洋医学堂“相互促进俱乐部”主席安德培博士为来会理召开了第一次演讲会。会上,来会理作为国际委员会的首任代表向青年们表达了爱国大学青年会的问候,并解释了青年会的作用和目的。即:“它是青年的一个团体,团结一致,帮助其他青年人沿着改善身体、社会、心理、精神回顾路线前进。”12月8日,又为来会理在北洋医学堂召开了第二次演讲会,在这次会议前后,来会理和会篮球的美国会员在“节制堂”的空场上表演了篮球游戏(篮球),天津人第一次见到篮球,这就是篮球项目的正式引入。

篮球运动项目是从教会学校开始兴起的。1896年1月11日,青年会主办的《天津公报》登载了第一次篮球比赛的消息^③:“一场篮球赛在今天下午举行,所有对篮球运动有兴趣的青年4点被邀请参加比赛。”这场比赛可能因为天气不好而延期,这可由第二天的《天津公报》的消息所证明:“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一场篮球赛将在今天下午4点举行,请来参加。”以后再也没有报道这消息。直至4月4日《天津公报》上载:“上星期六举行了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篮球赛,今天下午4点还有一场比赛,请屈时光临。”事实说明,1896年3月28日在天



津举行了中国篮球史上的第一场比赛。当时的比赛在户外，条件简陋，只是每周六下午4点举行一次。来恩太太在给来会理的信中这样写道：“正月，当篮球刚被传入时，我极清楚地回忆起那件事情的一段场面，青年人都穿着长而宽的袍子，在腰部系上腰带或一条绳子，同时他们留了辮子，一而在蹦蹦跳跳。当他们从事体育比赛时，把袍子提起来束在皮带或腰带下面，每个人把辮子盘束在头上，对每个青年人来说，至少这种服装穿着是有牵制的……春天来了，当举行像篮球这样的体育比赛时，运动员把他们的长袍放在一边了……后来，辮子也不见了。”

篮球被传播开之后，青年会又陆续把棒球、体操和排球传授给青年学生。1901年6月22日的《天津公报》记载一则棒球运动的消息：“棒球运动于上星期三在竞技场开始了，这个季节对棒球运动是太热了。但美国球队很适应。日本人费了很大的劲开展这项运动。一位日本参观者说，在每个角落，每个院里都可以看到孩子们拿着球或球棒。”棒球运动在普通中学堂、官立中学、新学书院、南开学校、北洋大学等校已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体操也是学生们喜爱的体育项目。1908年6月29日，普通中学的学生受到视察，青年会的盖利、罗伯特逊、钟某及其他老师做裁判。周先生指导学生，先是4人一组（圣罗汉等），后是全班表演，还有鼓号奏乐，对周先生的辛勤培养表示感谢。

近代体育运动的兴起改善了青年学生们的生活习俗，为了便于参加体育活动，他们开始改变“三长”，即“长袍、长辮子、长指甲”的习俗，也有利于在女青年中倡导“放足”运动的开展，这可能是体育运动的功能之一。



二、不断扩大阵地,进行全面普及

青年会设有董事会和德育、智育、体育、服务四个部,每个部设立主任干事一人,视工作繁简设干事和职工若干人。体育部历任主任干事有蔡乐尔(美)、饶伯森(美)、董守义(中)、李友珍(中)。

由于青年会自身发展和普及体育运动的需要,青年会的活动阵地不断地扩建。青年会初建时,总部是设在长者会 *Atteibung* 持上捐赠的一间小平房里,这间房子既被当作阅览室和游艺室,又被当作祈祷会址和圣经教学的课堂。这显然不适应需要,所以才决心建一座大的会所。1896年初,来会理在会员中和通过会员承办马戏来筹集资金,共得白银数百两,在海大道(今大沽路)购得空地一块。同年4月,美国富豪戴乐尔夫人来天津,为建房捐赠白银一万四千两,还有一名叫万那美克的外国商人捐资白银千两,这才开始动工建造,楼房是在1897年6月竣工使用的。青年会总部便由小平房迁移到新建的大楼内。此大楼人称“戴乐尔纪念大楼”,成为开展体育运动的中心和体育骨干培训基地。来会理除在总部设篮球、棒球、排球、体操培训班外,还请其他传教士到私立中学、官立中学、北洋大学等校结合传教传授体育知识和运动技术。

来会理在天津工作了两年多,以他的各种才能为基督教青年国际委员会在中国的工作效劳,特别是在管理、教育及培训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1898年他被国际委员会调回委以重任。天津青年会的负责工作由格林接替,格林在大学时是连续三年的全美足球明星。这个时期,青年会共有30名外国人干事和16名中国人干事一起工作。

由于发展的需要,1903年格林又将青年会所迁到新建的一个四合院内(东门里经司胡同11号),并开办了普通中学堂,以后又成立



了青年会日校、夜校等。普通中学堂是青年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常日学校,是天津和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普及篮球运动的学校。此时,格林派外国人干事饶伯森、盖克、沃克尔、郝瑞满、白雅各等分别到北洋大学、新学书院、工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私立及官立中学等校辅导篮球、田径、足球等项运动,还请美国体育专家胡格、哈伯克到各校辅导,胡格是大学体育专业毕业,参加过多种体育竞技比赛,尤其擅长足球和体操。这对提高各校的运动技术水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13年,青年会增设专职体育干事(主任)一人,由蔡乐尔担任,专门辅导篮球及其他体育活动,并组建了青年会篮球队,这是天津和中国第一个跨行业的篮球队。1913年天津女青年会成立,内设家政、查经、英文、汉文、中西烹饪及音乐、体操等教育班,成为开辟女界工作的主力军。

为了给天津近代体育运动走上正规科学的发展轨道创造条件,1914年10月又在东马路建成天津青年会的新会所(今天津市少年宫),内有健身房、淋浴室,主体建筑为一篮球场,可以打篮球、排球、羽毛球和室内垒球,还有单双杠、双环、拉力等设备;地下室有地球、台球、乒乓球室;楼上建有坡度环形跑道,有看台和运动员做准备活动的场地。这是天津和中国第一个多功能综合性体育馆(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被国家体委列为中国体育展览会的内容之一)。在这里,先后举办了多项目、多层次的体育教员训练班、业余体育辅导员训练班、学校教务长培训班以及不同年龄的体育辅导班,有成年、青年和少年班,分班定时活动,自行组队。这样,就形成了基础雄厚的阶梯形的体育骨干辅导队伍。青年会篮球队这时也更名为“竞进队”,后来的队员有李清安、董守义、李友珍、齐守愚、陶少甫、刘鹤荪、黄少良、周文焕、王之光、姚恩汉、周文煜、尹鸿祥、刘学倚等,这些队员后来都成为天津乃至中国体育界的中坚力量。

格林等特别赞赏和崇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称其是有远见



的教育家、体育权威和活动家。特别是张伯苓的“强国端在教育，强种始于体育”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进，培养完全发达的人”的教育思想，成为青年会的指导思想内容之一。张伯苓加入青年会并在南开学校成立青年会分部后，为青年会增强了领导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1915年青年会为改良华北教育，成立了体育学校，以训练中小学体育教员或同等学历的人，所学课程有体育理论、体育原理、儿童心理学和体操教法、篮球运动、游戏、步法等。1917年，西勒率全体青年会的学生及教导长参加了上海培训学校的训练。这样，又一批高水平的体育骨干人被培养出来了，形成以青年会为中心阵地，以普通中学为先锋，以南开学校为典型示范校，以社会体育大家为后盾，以运动竞赛促普及，以普及促提高的新局面。校内、校际、全市大中小学运动会和校标、区域运动会搞得轰轰烈烈，实效显著，使天津体育走在华北和全国的前列。1917年5月23日，蔡元培先生应邀到南开学校演讲，谈及篮球等运动时称：“贵校连捷华北，体育已臻佳境……体育发达者不以是自涉，且同愈倡练习之风。而贵校体育号称发达者，大型始终易怠，为国人倡焉。”当时，天津的体育教学、学校体育的普及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

三、强化体育新思想，开创培训的先河

青年会在重视培训各种体育人才的同时，还开创了培训体育领导人才的先河，输送体育领导出国深造，培养高层体育领导人才。与此同时，还贡献出了体育的宽广的原理，如“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体育大家办”等新的体育思想，并强调进行体育科研，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服务。

人的文明素质主要是由身体、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三方面的素质构成的。所以灌输新的体育思想，强化体育意识，就成为青年



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青年会刚一创建就出版发行了《天津公报》，成为全面宣传西方的先进体育思想、体育教育理论、普及运动知识、体育学术科研和现实体育竞赛活动的舆论阵地。同时，还创刊了面向广大青年的刊物《天津青年》杂志。1907年6月，基督教世界青年会主席乔治·费刹在《天津青年》上发表了“人必须运动”的文章，形象生动地写道：“我看过一个很少运动的男孩子，16岁了还不如一个12岁爱好运动的孩子高，病黄的脸，偏平的胸，没有肌肉……所有男孩子的热情的品质也都不具备。”并强调指出“哪个地方的年轻人缺乏活动，哪里就缺乏创造性和热情”，“运动可以使人们产生高级的感情。公共体育场所是培养道德的地方”。1908年10月4日，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体育指导的马克斯·艾克塞纳在《天津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体育训练”一文，详尽地阐明了他的体育哲学思想，并亲自操办了1910年的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19年格雷来到中国后，制定了由美国培训体育领导人员代替在中国培训的计划，提出“需要系统的体育教育这一点，即使是最粗心的观察者也能发现”。并建议“系统的体育教育必须是中国中小学课程的一部分，不仅要使下一代体格健壮，而且要他们具备那些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精神素质”。1926年，另一位青年会干事发表了“体育教育在中国”的文章，为完善中国体育教学大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1930年第9届远东运动会结束后，中国队总领队张伯苓和总教练董守义回津接见《大公报》记者，张伯苓指出“我国体育落后”，主张“强迫体育教育以养成体育之爱好”。董守义则提出“从根本上提倡体育，应从小学提倡”。1932年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分部主办的《体育周刊》出版发行，该报主要报道体育动态，普及体育知识和一些体育学术文章，每周六出版。1932年2月，张伯苓撰写“今后我国体育”一文在《体育周报》发表，同年11月29日，董守义编著的《最新篮



球术》一书由《体育周报》社出版发行。1932年12月31日,天津体育改进社主办的通俗体育刊物《体育学刊》创刊发行。1932年12月5日,天津黑白体育会创办《体育周刊》出版发行。上述报刊的主办者大部分是青年会的成员和骨干,报刊数量之多属于全国之首,创造了良好的体育氛围,有力地促进了精神文明的提高和发展,为出国培训体育领导提供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青年会选派体育领导出国培训的人数由少到多,逐渐增加。M U Junig 先生于1897年被派往美国深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中的第一个中国代表,表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亲自代表中国青年会了。不久,青年会的干事王正廷 S K Jsao 先生(是中国人第一个干事)被派到美国华盛顿进行了一年的会友训练。接着,王正廷被选派去美国,先后在墨西哥、耶鲁和 Cornell 大学学习。他在1912年成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副总书记(干事),1916年辞去总干事职务。1923年10月,青年会又选派董守义、刘雪松等三人去美国加州斯普林菲尔德大学(即春田大学、篮球发源地)体育系深造。董守义专攻篮球理论,成为体育教师詹姆斯 奈史密斯(篮球发明人)的得意高徒,并任该校篮球、中球队队长。董守义是1916年从通州协和书院毕业后被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蔡乐尔聘为实习干事的。1925年董守义在美国进修期满,回国后被升为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和副总干事。

董守义以青年会为阵地扩大体育班培训,有日校、夜校,有为雇员和童子军办的,有为普通成员和领导人办的。1926年天津市教育局为提高师资水平,组办了“天津市音乐体育传习所”,董被聘为兼职教员,培养出大批的体育人才。他被聘为南开学校篮球教练,培养出扬名国内外的“南开五虎”等篮球国手。1927年天津市体育协进会成立,董任专职干事,统管全市的社会体育工作。1928年6月,董守义经过艰苦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在河北区五马路租地30



余亩,建起了天津市非租界地的第一个公共体育场,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时期青年会的主要领导人是盖利、饶伯森、霍尔、张伯苓、董守义等。1927年中华全国业余体育联合会总理事由张伯苓继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有王正廷、董守义、惠民飞、宋保罗、向意进,其他青年会的领导人都当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10月,张伯苓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

这样,指导天津和中国体育的权力逐步由青年会过渡到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实现了青年会“依靠中国人,属于中国人,为了中国人”的原则,这与出国培训体育领导人规划的实施是分不开的。

四、大家办体育,走上国际赛场

体育竞赛既有巨大的、长远的潜在功能,又有极强的现实教育的辐射作用,是群众参与体育的催化剂。

1899年青年会开始发起学堂联合运动会,由北洋大学堂主办,邀请水师、武备和电报学堂的体育代表参加。1902年青年会在奥租界运动场举办第一次年度运动会。从此,青年会每年举办一次年度运动会。1907年10月24日举行了第5届年度运动会发奖大会,《天津公报》有以下记载:“普通学校对运动项目是很感兴趣的,运动场这几天热火朝天,许多人出来训练,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来了,饶伯森先生及崔克先生也到场指导,崔克先生是最近由美国来,是作为体育专家来场指导……教育部的刘特派员赞扬了天津的体育工作,并为在比赛中获奖的运动员发了奖牌……第一私立中学校长张伯苓讲述了雅典奥运会的一些情况,也给中国运动员提了建议,并指出,从中国运动员的天资来看,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现在的任务是要有技术指导。接着,张校长和饶伯森详细讲述了天津运动会已经



为大众所感兴趣。”1908年10月22日在第6届年度运动会发奖大会上,用投影机放映了伦敦奥运会的照片。罗伯特逊在会上讲述了体育运动对中国青年体育的重要性。讲到运动员,他说“这一个队参加奥运会,有助于促进各省发展学生的体育运动,介绍奥运会为的是使中国人民熟悉这项体育运动”。在那时,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用了以下三条标准:1. 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 2. 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成绩优秀的运动队去奥运会? 3. 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举行奥运会、交替在雅典举行? 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国人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体育健儿走上国际赛场啊!

青年会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国体育走向国际舞台,让天津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大展身手。1910年,饶伯森从天津青年会回国休假期间,在美国犹他州蓝湖遇见菲律宾马尼拉青年会干事埃尔伍德·布朗谈及在远东办奥运会的设想,得到支持。之后,布朗经与日本协商,同意成立远东体育协会,组成人员由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选派,每两年一届,轮流举办。从1913年至1934年共举办了10届,其中,中国办了2、5、8共三届。随着远东运动会的兴办,天津体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人家办体育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体育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1916年“天津市篮球联合会”成立。1927年10月20日,成立天津市体育协进会,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天津中国银行经理白卜眉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历任会长有章辑五、董守义、赵业夫、齐守愚,常委有李清安、侯洛荀、李发珍、赵文选、谢希云、田秩曾等。1930年9月29日天津市体育促进会成立(后与协进会合并为天津市体育联合会),1934年4月11日,天津市教育局组建了天津市体育委员会,1936年全市各中小学体育指导员联合组建了“天津联合体育会”等。行业系统的体育团体数量较多,主要有北宁铁路局体育会、开滦矿务局的“员司俱乐体育社”、《庸报》报馆“同仁体育会”、市教育局的“公务员健身会”、工矿企和个人发起成立的体



育组织数量多得难以统计。那时的比赛是常流水,不断线,甚至在报上登则广告,约某队在某时某地进行比赛,某队即准时到达,从不失约。1929年8月15日《大公报》公布“天津市业余篮球队调查,经常市级比赛的有140多个队”。青年会举办的室内公开篮球赛参加队就有108个,分男子甲、乙、丙、童子及女子共5个组,历时4个多月。

别说群众的积极性高,就连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也在自己的办公楼空场上修建了篮球场和网球场,经常与士兵玩篮球、打网球。体育不仅健身,还健心,健精神。1932年,鉴于“一二八”上海发生事变,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青年会、天津体协举办捐助沪伤兵员募款和劳军篮球赛;“十手”篮球队发起捐献救国飞机篮球赛;天津篮球界还多次举办了赈济战区难民篮球赛;天津电报局、《益世报》、天津平民防老会等也多次发起赈灾篮球赛;比赛的全部收入如数交《大公报》代转。当时,政府领导也发现,团结国家的最好办法之一,是参加体育活动和开运动会。

当第2届远东运动会决定在中国上海举行时,青年会的克洛克去北平同袁世凯及有关的阁员们会谈,袁世凯表除拨款五万元给中国棒球队到火鲁鲁去训练外,还自捐2千块大洋,副总统黎元洪捐一千块大洋,不几天又送五万元支票用于从檀香山引进垒球。

由于大家办体育的社会氛围形成,使得天津体育人才辈出。从1910年到1948年,天津篮球选手先后代表天津、华北区、河北省参加1至10届全国运动会,获得6连冠,其中,被传为佳话的是在1935年的第6届全运会上争夺冠军的南京队和河北队,参赛队员都是天津人,结果河北队以45比37胜南京队而夺魁。天津选手参加了1至18届华北运动会、1至7届华北球类赛,共获11次冠军、6次亚军、2次第3名。足球选手组“中华队”,参加了由香港、上海、天津联合举办的埠际足球赛,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足球赛。天津选手与外地选手组成“埠际队”13次参赛9次夺冠,1次获亚军。1935年“北宁



队”横扫西人球队夺得天津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万国杯”冠军，还应邀出访日本，4战全胜日本最强的4个队。1936年“中华队”从洋人手中夺得“爱罗鼎杯”赛冠军，大长了国人志气，夺冠的当晚张伯苓在登瀛楼宴请足球健儿，并合影留念。天津篮球选手入选中国队参加了1至10届远东运动会，获冠军1次、亚军8次、季军1次，其中“南开五虎”单独组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第9届远运会，天津篮球选手还远征东南亚诸国获47场全胜的战绩，大扬国威。

远东运动会的举行为中国进入奥运会开辟了道路。1923年第6届远东运动会后，中国被接受为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王正廷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代表(奥运会委员)。在1936年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14名篮球队员中有8人是天津人，他们是李绍唐、沈聿黍、王鸿斌、刘宝成、徐兆雄、于敬孝、尹焕文、牟作云(天津籍)，教练是董守义，管理是李清安。李清安还被选为奥委会国际裁判，这是天津第一个篮球国际裁判。中国足球队中有天津的孙思敬、张学光，田径队中有天津的吴必显。1947年董守义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中国第二任委员。中国从1924年参加第8届奥运会起，又参加了1928年的第9届、1936年的第11届、1947年的第14届奥运会。

天津篮球成绩全国首屈一指，田径成绩也名列前茅。在第2届远东运动会上，南开学校的郭毓彬力指对手，一人独得880码和1英里两项冠军(金牌被收入中国体育展览馆)。在第3届远东运动会上，袁庆祥、郭绍仪、陈文瑗包揽了跳高前3名，丁煦春、郭绍仪分获撑竿跳高冠亚军。1936年吴必显创造的1.871米的跳高全国记录，保持了18年，直到1954年才被打破，1935年赵恩柱创造的200米跨栏26'4的全国记录，至1953年才被打破，1948年齐沛霖创造的铁饼42.15米的全国记录，到1955年才被刷新。

由于天津近代体育运动发展的基础雄厚，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居全国前6名，大大提高了天津的



知名度。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是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一,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所以,青年会为推动天津城市文明的发展和丰富体育文化的内容,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注 释:

①来会理 1870 年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其父母都是那里长老会的传教士。1880 年他随父母一起回到美国。一年后,他进俄亥俄州伍斯特市的伍斯特大学预备系学习,并于 1891 年在该大学毕业,在高年级时他是这学院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他在 1891 年秋进芝加哥梦考米克神学院,在神学院学习的第二年,他被选为伊利诺伊州“学生志愿者运动”的通讯员,后来,他就在这个组织工作,一直到 1895 年。1895 年度,他负责夏令营工作,同年 6 月他与 Grace. E. Mc Gran 小姐结婚。1895 年 9 月 11 日,受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北美协会的派遣,作为国际委员在中国的首任书记(干事)携夫人从美国乘船来到中国,于 10 月 5 日抵上海。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在上海、汉口、烟台、北京等地专访调查,11 月 17 日到达天津。经过反复比较后,来会理决定把青年会设在天津。

1895 年 12 月 1 日,北洋大学校长和北洋医学堂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相互促进俱乐部”主席安德培博士,在北洋医学堂的“节制堂”为来会理举行了欢迎大会。12 月 8 日,又召开了第二次演讲会,这次会议前,在“节制堂”的空场上表演了篮球游戏。

来会理在天津工作了两年多,1898 年他离任回国,另有高就。天津青年会的负责工作由派来的格林接替。他在 1949 年 3 月 17 日,在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逝世。

②北洋医学堂建于 1881 年,并设附属医院中北洋医院,地址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十七中学旁),1933 年因经费等问题停办,拆除后改成摊群市场,其后建成无轨电车停车场,后来改成现今的公交一路汽车站。

③青年会公布的一则篮球赛消息的原文底稿,收藏在美国纽约



百老汇街 291 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内。

参考文献：

1. 吴志钢[美]著《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翻译稿)。
2. 天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编辑的《天津通志 体育志》。

(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局)

天津青年会与近代 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

郭晓勇

天津是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伴随着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篮球运动首先在天津扎根。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参加篮球运动的人不断增多,一些篮球强队也不断地涌现。这些球队经常参加当时天津及全国的各种篮球比赛活动,对于推动津门篮球运动乃至全国篮球运动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为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即力图对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作一细致考察。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篮球运动传入天津

(一)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的创建

基督教青年会一般被简称为青年会,1844年由英国人威廉·佐治创立于伦敦。后来青年会逐渐传播于世界,1851年北美蒙里里奥和波士顿也相继成立了青年会。不久,青年会北美协会在美国成立,其后又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世界青年会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团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的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青年会也开始在中国发展自己的组织。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



“早在 1855 年和 1886 年美国分别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两处设立学校青年会。但三处青年会各自为政,不相隶属。”^① 1890 年,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对青年会的活动进行了肯定,并要求北美协会向中国派遣合格的干事。很快,北美协会就收到了来自中国许多城市的邀请书。1895 年 9 月,北美协会正式派遣来会理(Lyon, 又译李昂)前往中国筹建城市青年会。

来会理于 1895 年 10 月 5 日到达上海。由于北美协会并没有指定他在什么地方进行工作而是让他自行选择,所以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上海、北京、汉口、烟台进行调查,征求当地传教士的意见。当年 11 月 17 日,来会理到达天津。经过反复的考虑,来会理决定把天津作为青年会的创办地点。由此,中国的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在天津成立了。

(二) 篮球运动传入天津

来会理在天津传教之初,就开始将篮球运动^②传入天津。但关于篮球运动传入天津的具体时间,却众说不一。据台湾汤铭新先生在 1963 年出版的《我国参加国际篮球赛历史》一书中,在谈到篮球运动何时传入我国时指出:中外书籍有关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时间竟有九种不同的记载,最早 1892 年,最迟 1909 年,而且传播介绍的人与地方,亦各有其说。^③汤先生后来还赴美考察,虽然得到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对于篮球运动何时传入我国仍未取得满意的答案。

1987 年,董尔智先生在《体育文史》上发表《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一文,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他认为篮球运动就是由来会理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就在“他来天津后的几个月”。^④但在篮球运动传入天津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问题上仍未能确定。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兰凤翱先生也撰文探讨。他循着来会理



在天津建立青年会的活动时间进行考察,最后确定:“第一个把篮球运动引入我国天津的是来会理,最早开展篮球活动的具体时间当为1895年12月8日,即来氏到天津后的第三个星期天,地点在北洋医学堂。”^③

来会理于1895年11月17日到达天津,12月1日来会理在北洋医学堂的“节制堂”进行讲演。12月8日,来会理又在这里进行第二次讲演,也就是在这次演讲会的前后表演了篮球活动。当时来会理表演篮球的目的在于传教,“殊不知,此后的篮球运动便在天津的两所学堂(指北洋医学堂和北洋西学堂)的学生中普遍引起了兴趣,并且广泛开展起来”。^④所以,这次篮球表演也就成了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开始。

二、基督教青年会与天津篮球运动的起步

(一)中国的首次篮球比赛

有关中国首次篮球比赛的消息,据1948年赴美国的吴志刚博士调查,1896年天津青年会曾公布了三次有关篮球比赛的布告,该布告的原文现收藏于纽约市百老汇街291号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图书馆内。这三次布告的内容和时间如下:

第一次布告 1896年1月11日

A game of basket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 all young men interested in athletics are invited to be at the room promptly at 4 o'clock in order to join the game.

(一场篮球比赛将于今日下午举行,所有爱好运动的青年,请于四时踊跃参加。)

第二次布告 1896年1月18日



A game of basket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 at four o'clock if the weather permits. Come and join the game.

(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下午举行篮球比赛,来参加这项运动吧!)

第三次布告

1896年4月4日

An enthusiastic game of basketball was played on last Saturday afternoon. Another game will be played today at four o'clock. Come and learn the game.

(上星期六下午举行了一场热烈的篮球比赛,另一场将于今日下午4时举行,来学学这项运动吧!)^⑦

关于这三次篮球比赛的布告,周元、陈金英、闻师等人在《中国首场篮球赛的布告》一文中也有所记述。^⑧但该文认为第二次布告的日期为1896年1月12日,由此推出1896年1月11日下午的比赛并未举行,并结合三次篮球比赛布告得出中国篮球史上第一场篮球比赛的时间为1896年3月28日(根据万年历,1896年4月4日前的星期六为3月28日)。关于第二次布告的时间,笔者查阅了其他一些相关文章,董尔智先生在《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一文中也提到第二次布告的时间为1896年1月18日。^⑨另外由天津市体委文史办公室编写的《天津近代体育要事记述(1840-1949)》一书中也有如下记载:“18日布告:‘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四时将举行球赛,来参加这项运动吧。’”^⑩

由上可见,周先生等人关于第二次篮球布告时间为1896年1月12日的说法恐有误。由此,1896年1月11日的篮球比赛是否举行,还有待于新的资料来证明。但我们可以确定最晚到1896年3月28日,中国最早的篮球比赛活动已经出现。

(二)天津篮球运动的初期状况

来会理在《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一文中,有着如下一段



记载：“天津青年会之最初运动，是在每周一次的查经班……辩论会……此外，会员对篮球也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概。但在玩篮球以前，他们的一番姿态很是可观，他们必须盘好自己的发辫，修理长长的指甲，把不便利的长袍脱去——这样，他们就把书生的尊严放弃，而换上一副高兴活泼的姿态了。但是这种运动，只在会所所在地草场的围墙的背后举行，颇有狭隘不便之概。”^[1]

由上引文可以想见，篮球传入天津之初尚未形成运动，篮球比赛也不正规，技术简单，对于场地、参加人数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篮球运动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期。但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在来会理夫人写给吴志钢博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记述了青年会对篮球运动的推动：“男孩子们把松松的长袍子用带子捆在腰间，春天他们可以把长袍脱掉，他们还是把长辫子卷在头上。不久，在其他学校也举行了篮球赛。现摘录《天津公报》几段如下：‘篮球运动正在盛行，学生们对此运动深感兴趣。该运动介绍到第一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及普通学校，这三校间的比赛，近期将可举行。此时这种运动在美国相当普遍。普通学校是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该校首先传入篮球。先在本校内比赛，以后又与其他学校比赛。’在1908年冬天以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改进设备。1908年12月5日《天津公报》上有如下介绍：‘在租界附近一块适合篮球赛的场地，如有对这场地感兴趣者，该场地即可用于比赛。圣诞节可望开放，计划正在制定，望租界地的成员组织几个球队，训练在中心部已经开始了。’篮球运动很快被人们接受了，证明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体育教育工作的良好开始……”^[2]由此，篮球运动在天津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三）天津篮球运动的初步发展

从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天津到1920年，这是篮球运动在天津



的初步发展时期。在天津篮球运动发展的初期阶段,篮球运动主要是在一些教会学校中进行。基督教青年会在篮球运动的推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03年,天津青年会随着不断发展的需要,在总干事格林的带领下将会所迁至东门内经司胡同11号,并设立普通中学普及篮球运动。格林还派遣外国干事包括饶伯森、盖克、沃克尔、郝瑞德、白雅各等人分别前往北洋大学堂、新学书院、工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普通及官立中学堂等校传授篮球技术。结果“由于传授范围不断的扩大,参加篮球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学校中的篮球场地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1908年12月5日,租界地篮球场为适应篮球爱好者的业余需要正式对外开放”。^⑭

1913年,天津青年会增设体育干事一人,聘蔡乐尔先生担任,专门辅导各种体育活动,其中篮球运动最为突出。1914年10月,天津青年会在东马路建造的新会所建成。这所建筑物包括一座设备完善的健身房,健身房的主体就是个篮球场。这个健身房吸引了当时许多人来参加锻炼活动,“天津的篮球运动就在这个健身房里开始发展起来”。^⑮最后,“由于参加篮球运动的人数逐渐增多,所以分成年、青年、少年几个班,并组织篮球队,经常开展比赛活动,从而带动了天津市各学校的体育活动,特别是篮球运动在天津市逐渐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体育活动”。^⑯

1916年,随着篮球运动的逐步发展,“天津市篮球联合会”于该年成立,并于这年的3月4日至25日举办了第一次全市性的“篮球角赛会”。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南开学校、水产学校、新学书院、高等工业学校、大学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六校,比赛于每周三、周六下午举行。关于这次比赛,1916年3月5日的《大公报》还进行了详细的报导,这也反映了篮球运动已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同时,这次比赛对于学校篮球运动的展开也起了推动作用。以下几次篮球比赛反映了学



校篮球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1916年9月27日，天津小学联合会篮球会假借南开中学校操场举行篮球比赛。

1918年4月20日至21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举行十二周年运动会，共设有穿环竞走、木棒操、盘龙棍、氢气球、篮球等30多个项目。

1918年9月28日，葛沽官民两学校与新城学校在葛沽镇举行联合运动会，大会设唱歌、哑铃操、竞走、篮球等项目。

1920年5月22日，天津第一私立小学校举办运动会，大会设有篮球项目。

由以上这几条篮球比赛消息，可以看出篮球运动已经走出了原来教会学校的范围，开始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不仅是中学，就是小学也已出现了篮球运动，这也就为二三十年代篮球运动在天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青年会的篮球组织与活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天津篮球运动开始走向兴盛的时期。随着从事篮球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篮球队伍的大量出现，各式各样的篮球社团也应运而生。为了推动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加强各队之间的交流，这些体育组织举办了大量的篮球比赛。这其中，青年会的篮球组织与活动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一）青年会体育部

1913年青年会设体育干事一人，聘美国人蔡乐尔担任。1915年，青年会体育部成立，蔡乐尔成为体育部第一任主任。其后青年会体育部历任主任为吴国模、罗克礼、董守义、李友珍、胡永福、李鹤峰、



李传盛等人。

早在设立体育干事前,青年会就已开始篮球运动的倡导工作,如设立普通中学,派遣青年会干事到各学堂传授篮球运动方法等,都可看到青年会对篮球运动的倡导之功。在设立体育干事后,由于有专门的人负责体育运动的传授,青年会提倡的各项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运动,更渐发达。

随着青年会篮球运动的发展,青年会体育部又开始组织篮球竞进会。据当年《大公报》报导,青年会竞进篮球会成立情况如下:

“本埠青年会所组织之篮球竞进会,业已就绪。已举定会长刘超然,副会长瑞荣长、崔允卿,顾问方安圃。第一第二两队选手亦举定,第一队队长刘学镰、周文焕,指导员董守义。第二队队长崔允卿,指导员李友珍。昨已通函津埠各校,请择期作联络友谊之游戏云。”^①

在发起举办篮球比赛方面,青年会也可谓不遗余力:“本会篮球竞进会,为提倡体育精神及联络感情起见,特与天津各学校组织室外联合比赛会,又与西人团体组织室内中西篮球比赛会。此外本会青年班,分甲、乙、丙三组及职业班一组,亦与天津各校组织一篮球比赛会。”^②从1929年起,青年会举办冬季室内篮球比赛,此后连续举行。该比赛活动吸引了当时天津大批球队的参加,以1930为例,这届青年会室内篮球赛报名参赛队伍竟达108队之多。由此,一方面可见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青年会对于篮球运动的提倡之功。

(二)青年会主办的室内篮球赛

在二三十代天津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篮球比赛活动。在这些篮球比赛中,青年会体育部主办的室内篮球比赛是很有影响的,它吸引了许多球队的参加,对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早在 1926 年,青年会就开始发起了室内篮球比赛会。据当时《大公报》报导:“该会(青年会)为鼓励各学校篮球队之精神起见,特组织一室内篮球比赛会。”^⑧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同文、商专、究真、职业班、青年会甲、青年会乙、青年会丙七支球队。比赛于 1926 年 12 月 18 日开始,每星期三下午四时,星期六下午二时半,在青年会举行。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比赛,比赛于 1927 年 1 月 16 日结束,青年会甲队获得冠军。这次比赛成绩如下:^⑨

队名	青年甲	青年乙	青年丙	职业班	究真队	同文队	商专队
比赛次数	6	6	6	6	6	6	6
胜局	6	5	3	3	2	2	0
负局	0	1	3	3	4	4	6
比例分数	1000	833	500	500	333	333	0

1926 年的这次室内篮球比赛,由于是初次举行,参加的球队也很少(只有 7 队),对加入比赛球队的制度也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这却是青年会举办冬季室内篮球比赛的开始。

从 1929 年起到 1936 年,青年会每年冬季都举办室内篮球比赛,前后共举办了六届(其中 1934 年、1935 年停办了两届)。

1929 年 11 月 20 日,由青年会主办的乙组公开篮球室内比赛开始。这次比赛共有 42 支球队参加,分一、二、三组进行比赛。比赛于 1930 年 3 月 31 日结束,青年班篮球队获得锦标。

这次比赛对于参加球队的资格也有了规定:“凡加入比赛团体,须具下列各项资格始能加入本会。一、有固定之通讯地址者;二、有固定之负责人员者;三、能遵守本会所写所定一切规则者;四、不限国际(籍)。”^⑩比赛方法,由于参赛球队达 42 队,所以分三组进行,用轮流比赛法。如果比赛中出现两队分数相等的情况,则以三赛两胜法



决定胜负。对于球队的报名规定：“比赛各队，须于报名时将该队制服颜色填明，比赛时所穿制服颜色，须按所填，否则不能与赛，如遇特别情形，得由裁判员处决。”另外，“比赛时制服背后，须有明晰之号码”。^②对于队员的参赛规定，一人只能代表一队参加，不能代表两队。为了吸引各球队的参加，这次比赛还规定不收报名费。

在发起乙组室内篮球赛的同时，青年会还发起了女子室内篮球赛。关于这次比赛的发起，“本埠女子篮球，近年逐渐发达，惟无联合比赛之举。董守义、李友珍有鉴于此，特发起女子室内篮球赛，拟致函各女校，征求答复，以便早日起赛”。^③

1929年11月23日，青年会女子公开室内篮球比赛开始，参加比赛的有星队、婴队、南开大学队、南开女中队、竞队、奋励队等6队。1930年3月22日，比赛结束，冠军为星队获得，南开大学获亚军，第三为南开女中。

自这届室内篮球赛成功举行后，青年会每年都发起举办冬季室内篮球赛。以下是历年青年会举办室内篮球比赛的一些情况：

1930年11月24日至1931年4月3日，第二届青年会室内篮球赛（以1929~1930年的室内比赛为第一届计算）进行比赛。参加这次比赛的球队共计108队，比赛分男子甲、乙、丙、丁4组，女子甲、乙两组，共计6组进行。最后的比赛成绩如下：^④

甲组冠军	隄友	亚军	孔雀
乙组冠军	高商	亚军	日新
丙组冠军	树人	亚军	南开伍队
丁组冠军	南开童子	亚军	津光童子
女子甲组冠军	津南	亚军	女师校队
女子乙组冠军	婴队	亚军	小羊

1932年1月9日至4月9日，青年会主办第三届室内篮球比赛，参加比赛的球队共43队，比赛仍分甲、乙、丙、丁四组及女子组进行。



这次比赛的成绩如下：^④

男子甲组冠军	竞进	乙组冠军	口新
丙组冠军	云龙	丁组冠军	同志
女子组(缺)			

1932年12月3日至1933年5月5日,青年会发起第四届室内篮球比赛,参加球队计有72队,比赛仍分组进行。比赛各组获得锦标情况如下:

男子甲组冠军	新学	乙组冠军	保安
丙组冠军	公余白	女子甲组冠军	南队
女子乙组冠军	圣功		

1933年11月18日至1934年3月10日,青年会再次发起第五届室内篮球比赛。这次比赛的冠亚军获得者如下：^⑤

男子甲组冠军	新学	亚军	弘德
男子乙组冠军	竞进	亚军	东棉
女子组冠军	南星	亚军	静队

从1934年到1936年,青年会主办的室内篮球赛停办。在这期间,青年会举办了其他形式的篮球比赛活动以推进篮球运动的发展。1935年5月3日,青年会发起投篮比赛活动。据当时《大公报》报导:“本市青年会,为提倡运动并增进投篮技术起见,特举办公开投篮比赛,定于五月初举行。”^⑥这次比赛的参加者共有40余人。分男子、女子、童子三组进行。比赛于5月25日结束,各组的优胜成绩如下:^⑦

男子组 冠军 刘文楨(57次) 亚军 刘文彭(53次) 第三
陈辑五(47次)

女子组 冠军 孙云卿(46次) 亚军 李佩珊(35次) 第三
陈艳华(25次)

童子组(缺)



1935年11月,青年会又开始筹备篮球锦标赛,“本市青年会近有恢复篮球锦标赛之讯,昨闻将于下月底举行篮球锦标赛,系表演性质,刻已着手筹备”。^⑧1935年12月14日,青年会篮球锦标赛开始,参加比赛的有新华、北星、津华、竞进、意工、民德、津电等七队。比赛于1936年2月8日结束,比赛成绩如下:^⑨

队名	津华	北星	意工	竞进	新华	民德	津电
胜	5	2	4	1	3	3	3
负	1	4	2	5	3	3	3
得分	255	188	267	161	181	173	219

1936年冬,青年会开始准备恢复室内篮球比赛,“青年会体育部主办之冬季公开室内篮球赛,自停办以来,迄将三届。该部近鉴于时已近冬,户外运动行将结束,惟市内篮球队之组织极繁,且过去室内赛成绩尚佳,为免冬令篮球运动停止起见,乃有于本年恢复公开赛,并扩大举办之议”。^⑩1936年12月16日,第六届青年会室内篮球赛开始进行。这次比赛分初级、普通两组共27支球队参加,比赛于1937年2月27日闭幕。比赛成绩如下:

初级组冠军 民德 亚军 津中 第三 新学

普通组冠军 意工 亚军 新学 第三 竞进

由青年会历年举办的篮球比赛情况可以看出,该比赛每届的参赛队伍都很多,在1930年的第二届室内篮球比赛中竟达108队之多。众多的球队参赛对于球员技术水平的提高,津门篮球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青年会主办的室内篮球赛在近代天津篮球运动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四、天津最早的业余篮球队——竞进队

在近代天津篮球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基督教青年会的竞进篮球



队是天津第一支跨行业的业余篮球队。该队长期活跃于近代天津篮坛,对于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篮球队队伍的组建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青年会的篮球

竞进篮球队的前身就是青年会篮球队,因此竞进队的成长是与青年会分不开的。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自1895年12月8日把篮球运动引进中国以后,就积极提倡篮球运动。1903年,青年会总干事格林设立普通中学普及篮球运动,同时又派遣青年会干事到北洋大学堂、官立中学、工业学堂、新学书院、高等工业学校宣传篮球运动。1913年,青年会增设专职体育干事一人,聘请蔡乐尔担任,专门进行篮球及其他体育活动的提倡。在提倡的各项体育活动中,以篮球运动的参加者最多,所以成立成年、青年、少年三个班,并开始组织篮球队。1914年青年会在东马路的新会所建成,该会所拥有一个设备完善的篮球场,这也是天津第一个室内篮球场。该球场的落成对于青年会篮球运动乃至天津篮球运动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二)竞进篮球队成立

竞进篮球队是由董守义先生建立的。1916年蔡乐尔聘请董守义到天津青年会担任干事。这时董守义才22岁,刚刚从通州协和书院毕业,但很快董守义就在工作中显示出了他的才干。

1917年,董守义将青年会篮球队改组为竞进篮球队,自己兼任教练与队员。1925年,又成立青年会篮球竞进会以推动篮球运动的发展。关于青年会篮球竞进会的成立,当年的《大公报》还特别做了报道:“本埠青年会所组织之篮球竞进会业已就绪。已举定会长刘超然,副会长瑞荣长、崔允卿,顾问方安圃,第一第二两队亦举定,第一



队队长刘学镰、周文焕，指导员董守义。第二队队长崔允卿，指导员李友珍。昨日通函津埠各校，请择期作联络友谊之游戏云。”^⑧

（三）竞进队的比赛活动

竞进队成立之初仍是以青年会篮球队的名义进行比赛活动的。青年会篮球队经常与各支球队如新学书院篮球队、扶轮中学篮球队、究真中学篮球队、官立中学篮球队进行比赛活动。另外该队也经常与一些外国驻津球队如美国驻津部队十二连、十五连进行比赛。1924年，在青年会体育部发起的各学校联合篮球比赛中，青年会还夺得第一组的锦标。在1926~1927年青年会举办的室内篮球联合比赛中，青年会篮球队再次大获全胜。比赛成绩如下：^⑨

队名	青年甲	青年乙	青年丙	职业班	究真队	同文队	商专队
比赛次数	6	6	6	6	6	6	6
胜局	6	5	3	3	2	2	0
负局	0	1	3	3	4	4	6
比例分数	1000	833	500	500	333	333	0

1925年，青年会篮球竞进会成立后，竞进篮球队的名字就开始频频出现。1925年11月6日的《大公报》就报道了竞进队与高等工业学校进行篮球比赛的消息，结果高工队以63:10大胜竞进队。此后，竞进队与各队比赛篮球的消息就经常见诸于报端。

1927年4月7日至9月，第三届华北球类比赛在天津举行。竞进队以青年会篮球队的名义参加了比赛。当时队员有：黄少良（队长）、李清安、刘鹤荪（刘学镰）、周文焕、陶少甫、张春霖、胡世荣、招寿昌、孙敬钰、刘季仙、骆传泰等10人。^⑩结果青年会队以22:27不敌新学同门队。

1928年12月3日，天津第四届“万国”篮球赛开始，参加球队共



计有 10 队之多。竞进队也报名参加了这次比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竞进队的比赛成绩如下:^④

队名	南开	十五连	青年会 (竞进)	新学 同门	西商	汇文	扶轮	新学	美水 兵	意水 兵
得胜次数	29	25	25	23	20	14	12	9	9	7
失败次数	4	9	10	10	16	19	24	25	27	29
得分率	879	735	714	697	556	424	333	265	250	194

此后,竞进队仍继续参加一些重大比赛,如“万国”篮球赛、青年会主办的室内篮球赛等,也经常与各球队作友谊比赛,但竞进队的战绩并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1929年3月13日的《大公报》中《竞进队之精神与技术》一文有如下一段分析:“竞进队在华北数执篮球牛耳,全队精神足可领袖全津篮球界。并非以比赛胜负而定其高下,乃评其提倡体育之精神。复次竞进全队之技术,亦可称华北实力最雄厚者。近二年来,虽未得天津公开比赛之锦标,原因竞进队不如学校球队有苦练之时间,且因均届成年,更有身家之累,当然气力稍为减退。然当其驰驱战场之际,一往直前,敌人披靡。如战胜北平出席远东之师范大学,击退北平室内球王之‘老母鸡’,又胜美兵十五连。最后与南开一战,以最后五分钟之稍懈,竟使南开得志。其所以不能居冠军者,实由于有职业者参加比赛,缺乏练习之故。因此参观者对于有职业球队应当另具一副眼光。”以李清安为例,李清安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即在天津美国领事馆任职,后来又任“万国篮球会”委员、天津体育协进会会计、委员,另外,他还在许多篮球比赛中担任裁判员职务。如此多的事务自然影响到个人的训练,所以《竞进队之精神与技术》一文的分析是有一定见地的。

为了重振竞进队,1933年竞进队进行了重组。当年的《大公报》也对此做了报道:“本市竞进篮球队,为市内历史最久之劲旅,人才济



济,声誉素著。惜年来久欠活跃,极近星散状态。最近青年会体育部新聘干事李鹤峰履任后,向各方极力斡旋,决重新整顿成军,以期恢复既往地位。”⁵⁵经过改组后的竞进队果然实力不凡,在1933~1934年举行的第五届青年会室内男女篮球赛中,竞进队获得男乙组冠军。在1936~1937年第六届青年会室内篮球赛中,竞进队获普通组第三名。

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以促进篮球技术的共同提高。竞进队每年都与北平的青年会篮球队“老母鸡”队进行比赛,双方互有胜负。以下是摘自《大公报》的一些竞进队与“老母鸡”队的比赛情况:

1921年12月31日	北京“老母鸡”来天津战竞进	21:17	“老母鸡”胜
1927年2月5日	竞进赴北京战“老母鸡”	45:41	“老母鸡”胜
1929年2月11日	“老母鸡”来津战竞进	36:33	竞进胜
1930年1月31日	“老母鸡”来津战竞进	25:29	竞进胜
1930年12月25日	“老母鸡”来津战竞进	42:40	竞进胜
1931年3月7日	竞进赴平战“老母鸡”	27:17	“老母鸡”胜
1932年12月31日	“老母鸡”来津战竞进	32:26	竞进胜
1934年3月31日	“老母鸡”来津战竞进	46:22	“老母鸡”胜
1937年1月1日	竞进赴平战老母鸡	41:32	“老母鸡”胜
1937年3月27日	“老母鸡”来津战竞进	26:22	竞进胜

此外,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竞进队还曾发起赈灾篮球赛。1933年1月27日,竞进队发起救济灾民篮球赛,邀请蓝白、黑白、新华三队参加。

(四)竞进队对天津篮球运动的贡献

作为津门一支老资格的篮球队,竞进队对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竞进队为天津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球员。像李清安、齐守愚、周文焕、黄少良、陶少甫、招寿昌、何步云、姚恩汉、刘学□、刘鹤荪



(刘学铤)等人都是当时天津的著名篮球运动员。

其次,推动其他球队的发展。竞进队的组建模式,成为其他一些球队的效仿对象,一些球队纷纷按竞进队的模式组建篮球队。另外竞进队的一些队员还直接参与了一些球队的建设,如何步云就是“黑白”篮球队的发起人之一;招寿昌后来加入开滦矿物局俱乐部篮球队,成为其中的主力队员;陶少甫则进入北宁铁路局体育会俱乐部,为北宁篮球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次,参加比赛,推动篮球运动的发展。竞进队从建立之始就经常进行各类篮球比赛。这对于天津篮球运动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同时,每年定期与北平“老母鸡”队的比赛,对于地区间的篮球技术交流也起了很大作用。

五、小 结

天津是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而篮球运动的发展又是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分不开的。来会理将篮球运动传入中国,其本意是为了在中国传教。但也许令他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他选择天津作为传教事业的中心,就使得篮球运动最早在天津传播开来并逐步走向兴盛。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会的篮球运动对于天津篮球运动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而其组建的篮球队更是为天津篮球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故而,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天津篮球运动乃至全国篮球运动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其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注 释:

①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25页。

②篮球运动发源于美国,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学



院(旧译春田学院)的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博士于1891年发明的,其后篮球运动即向全世界迅速扩展。值得注意的是,春田学院当时为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这表明篮球运动一开始就与青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篮球运动能很快传入中国的一个原因。

③汤铭新:《我国参加国际篮球赛历史》,转引自董尔智:《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体育文史》,1987年第2期,第66页。

④董尔智:“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体育文史》,1987年第2期,第67页。

⑤兰凤翱:“篮球运动引入天津之考证”,崔景波主编:《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⑥兰凤翱:“篮球运动引入天津之考证”,崔景波主编:《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⑦这一次布告的内容转引自李辅材、文福祥、董尔智、中恩禄、钟添发:《中国篮球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⑧周元、陈金英、问师:“中国首场篮球赛的布告”,崔景波主编:《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⑨董尔智:“对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体育文史》,1987年第2期,第66页。

⑩天津市体委文史办公室主编:《天津近代体育要事记述(1840-1949)》,第9页。

⑪来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转引自董尔智:“对中国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一点考证”,《体育文史》,1987年第2期,第67页。

⑫来会理太太写给吴志钢博士的信转引自吴志钢、崔景波、陈金英、苏长来、周元、徐彩桐:“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篮球的传播”,崔景波主编:《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页。

⑬崔景波、崔照京:“天津的辉煌,辉煌的天津——天津篮球发展



史略”，崔景波主编：《中国篮球运动的故乡》，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 页。

⑭李清安、李友珍、王锡良、刘学□、姚恩汉：“天津篮球运动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 148 页。

⑮李清安、李友珍、王锡良、刘学□、姚恩汉：“天津篮球运动发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 148 页。

⑯《大公报》，1925 年 10 月 23 日。

⑰《大公报》，1927 年 2 月 11 日。

⑱《大公报》，1926 年 12 月 18 日。

⑲《大公报》，1927 年 1 月 18 日。

⑳《大公报》，1929 年 11 月 5 日。

㉑《大公报》，1929 年 11 月 5 日。

㉒《大公报》，1929 年 11 月 5 日。

㉓《大公报》，1931 年 4 月 4 日。

㉔《体育周报》，第一卷，第十一期，1932 年 4 月 16 日。

㉕《大公报》，1934 年 3 月 10 日。

㉖《大公报》，1935 年 4 月 25 日。

㉗《大公报》，1935 年 5 月 15 日。

㉘《大公报》，1935 年 11 月 17 日。

㉙《大公报》，1936 年 2 月 29 日。

㉚《大公报》，1936 年 12 月 11 日。

㉛《大公报》，1925 年 10 月 23 日。

㉜《大公报》，1927 年 1 月 18 日。

㉝《大公报》，1927 年 4 月 2 日。

㉞《大公报》，1929 年 3 月 26 日。

㉟《大公报》，1933 年 8 月 31 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青年会二三十年代的体育活动

郭风岐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海大道(现在的天津市妇联址)建立,总干事为来会理,该会是北美协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

1914年10月16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新会所在东马路(现在少年宫址)落成。其楼内建有一个不标准的篮球场,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室内篮球场。袁世凯的代表曹嘉祥、朱家宝的代表王麟阁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等出席揭幕式。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天津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据有关史料记载,该会组织和参与组织了很多项体育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主要体育活动有:

1. 组织参加万国体赛。青年会历年有万国六项运动比赛之举,就是将各国青年会运动员的比赛成绩,汇总后由各该青年会全国协会转交美国青年协会体育部,以规定其优劣。其六项比赛是:60米赛跑,160米赛跑,掷10磅铁球,腾越比高,急行高跳,立定跳远。其奖品分3种:如中国得胜,则得1盾牌;中国本国青年会在互相比赛中,独占优胜者,得协会赠1银杯;在中国个人比赛中最优之运动员,赠以奖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各会员参加练习,每星期三晚8时为比赛练习时间,并于3月15日以前将个人分数汇总,交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以兹评定分数。



如 1921 年天津青年会的六项运动比赛,于 3 月 9 日在青年会体操室内举行。比赛次序为:腾越比高,有李少甫等 6 人参加,所越最高 5 尺 10 寸;立定跳远,有刘明义等 6 人参加,所跳最远 9 尺 1 寸;其他 4 项比赛此后在仓敖街私立第一小学校操场进行。

2. 筹划准备体育赛事。如 1921 年,为了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热心体育事宜的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董守义,在青年会内开设训练班,组织各校体育教员参加,互相研究,共同提高,然后转教学生,以便比赛取得好的成绩。并特别重视篮球运动,每星期二、四、六等日从事练习,预备向北京赴赛,然后再往上海比赛。还注意选拔培养尖子选手,比如南开学校有一姓邓学生,长于赛跑,每一英里需要时间不过 4 分 54 秒;还有一姓郑的学生,特长掷标枪,青年会便对他们加强训练,作为远东运动会比赛名角。

为了选拔参加远东运动会的选手,天津学校第十八次联合运动会,于 1921 年 5 月 14 日在南开操场举行。参赛学校有北洋大学、高等工业学堂、新学书院、省立中学、扶轮中学、成美中学。运动场中,高搭彩棚,西为参观席,南为运动休息席,中为省公署军阅队席。场中秩序,由新学书院、南开、青年会 3 校童子军维持。运动会的裁判员由青年会体育干事董守义担任。

远东运动会于 5 月 30 日在上海开幕,虽然适逢大雨如注,但参观者仍有 2~3 万人。该运动会主要有中、日、菲等国运动员参加。董守义等人及时向天津电告比赛情况。大会锦标共 8 种,菲律宾得其四,中国得其三,日本得其一。天津运动员袁庆祥取得跳高决赛第一名。袁庆祥是华新纺织公司职员,1911 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次远东运动会上,他就曾取得过跳高第一名。

3. 开展日常体育活动。青年会不仅有篮球队,而且有足球队,并且经常进行赛事活动。1921 年 11 月 9 日晚 8 时,该会篮球队在美国兵营操场与美国兵营篮球队进行比赛,该会篮球队得 16 分,美国



兵营篮球队得 28 分,差距并不很大,足见该会篮球队实力之强。此后不久,该会足球队,在南开操场与天津西人俱乐部足球队比赛;在英国球场与英国军队足球队比赛。虽然 2 场都败北,但是西方的篮球、足球,历来都比我们强,从该会球队的表现看,实力相当不错。在该会篮球队与官立中学篮球队比赛时,便可以看出。二者 1 队比赛为平局;2 队比赛,青年会队得 22 分,官立中学队得 10 分。11 月 26 日晚 8 时,青年会篮球队与成美学校队,在青年会体操室比赛,围观者数百人,竞争激烈,至 10 时才结束,结果青年会队胜 2 球。

1922 年 5 月 23 日,青年会童子部特别会员开会,议决成立励进篮球队,暂以 8 人为 1 队,如果以后人数增多,则分为 2 队。每星期练习 3 次,公推王瑞麟为队长,并拟定规则十余条。

青年会篮球队成长很快,1923 年 2 月 25 日 8 时,在青年会体育场与北京美国海军篮球队比赛,参观者 300 余人,公正人罗克礼,比赛 1 小时之久,结果 47 比 14,青年会队大获全胜。

青年会设立了篮球竞进会,并开展篮球比赛活动。如 1925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7 时,在美国兵营操场,组织了与美国陆军比赛篮球。

青年会还成立了幼年班篮球队,1929 年 6 月 22 日下午 7 时,在青年会健身房与黑队进行友谊赛,结果 28 比 11,幼年班获胜。球员是:左锋卢味庄、左锋褚金城、右锋陆铭添、右锋姚文起、中锋刘铭昌、右卫何景荣,左卫刘学琦表现最为出色,独得 10 分。

4. 举办武术训练表演。1922 年 1 月 12 日,青年会成人部会员王学古,在东马路青年会组织了武术会,特请张占魁担任教练。凡会员等愿意学习的,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每星期二、四下午 8 时练习。

为了倡导中国武术,青年会还成立了国术委员会,积极开展武术活动。1934 年 6 月 20 日晚,在青年会健身房,举行国术表演大会。参观者满坑满谷,盛极一时。先后进行了多项表演:摔跤之精彩、太极拳之纯熟、龙头剑之精湛、八仙剑精深、新武术英气、绵拳之内刚、



太极昆吾剑之玄妙、八式拳之功夫、醉仙拳之神奇、太阳拳之纯深、杨家枪之出奇,特别是曾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冯陆均的表演,更加精妙绝伦,备受赞许。表演一直到晚9时才散。

青年会并邀请武术家进行讲演和表演。1934年10月,第十八届华北全运会在津举行,国术家、国民政府秘书长褚民谊前来担任国术总评判。青年会请其下榻该会,并于10月8日晚7时,请其在青年会礼堂作武术讲演和表演其发明的太极球、棍,青年会会员500余人参加。褚氏表演后,放映了太极操,11时才结束。

青年会还举办国际武术表演大会。1934年11月28日晚8时,在该会健身房进行的国际武术表演大会,有中、美、意3国武术家9人参加。首先由教育厅体育督学赵文藻致开会词;然后有美、意之拳斗、摔跤和中国剑术、刀枪对打、八卦散手、皮条杠子等。表演颇为精彩,参观者1000余人,场内围得水泄不通,至11时方散。

5. 进行会内体育竞赛。为了以资鼓励体育运动,全国各地青年会均于1922年1月,举行六项体育比赛。为此天津青年会于1月18日晚8时,在青年会举行160米赛跑和腾越比高、跳远;1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南开学校举行60米赛跑和跳高、掷铁球。凡青年会会员及学校青年会会员,皆可随时报名参加,并有4类不同的奖品。

(作者单位: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

张伯苓：天津青年会活动家

梁吉生

张伯苓先生(1876~1951),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民办教育的旗手,倡导新式体育的先驱者,也是天津有影响的具有基督化人格的领袖人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家。他于1909年当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1911年选为董事会董事长,直到20年代末,并长期担任天津青年会董事。早在1934年他就说过:“兄弟与青年会有三十多年的关系。”^①从1910年至1936年的26年间,每月向教会捐款10元,从无间断。在全国青年会组织中,张伯苓也是有影响的人物。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21年,1932年他都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成员,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张伯苓把青年会理念和精神融化于思想,并具体地践履在人生的各个方面,特别在其献身教育事业中支撑和鼓舞着他永不畏难,永不停步地前进。不仅使他成为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府辉煌业绩的推动者,也使他成为令人钦佩的道德人格的典范。

张伯苓为什么加入青年会?又为什么选择了基督信仰?他那思考人生与国家问题的坐标受到什么影响?青年会思想在张伯苓构建的教育思辩中起了什么作用?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一

基督教是与西方殖民者同船来到中国的。作为基督教外围团体的青年会约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中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张伯苓正在清朝海军服役。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过西方社会学说和科技知识,属于戊戌变法前后那批接受西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思想敏感,很少保守,倾慕西学,主张以新的价值观和思维趋向改造落后的国民性。1898 年秋,张伯苓回到天津执教于严修家馆。

张伯苓是在办学过程中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开始往来的。正如台湾学者吴相湘所说:“当张在严馆执教,已经与美籍干事多人熟识,其中两人乃著名的运动家,当时均在华北工作:一名盖莱(Rodert Gailey,即格林)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另一名罗勃生(C.H.Robertson,即饶伯森)是普渡大学毕业的跳高名手。”^①张伯苓的学生,后来长期担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的杨肖彭也说:“1901 年以后,在严修、王奎章家中教私塾的张伯苓先生,主张‘教育救国’,把严、王两家馆合并,成立了敬业中学。后来改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当时格林一眼便看中了这位‘中国文人’,亲与过从往还。”^②张伯苓娴熟英语,又爱好体育,常请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干事饶伯森等教学生玩足球、篮球。1904 年张伯苓与严修等创办南开学校后,先后聘请格林、格林太太、饶伯森、韩慕儒、郝瑞满、崔伯等人来校讲授英文、化学、物理、地理等西学课程。1907 年后,南开学校在天津城西南乔迁新校址。学校对面空地就是青年会建立的新操场,这更方便了张伯苓与美籍干事在体育上的联系,经常邀请他们指导学生体育运动,传授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技术,把近代西方体育观念和体育方法引入南开。



应当说,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张伯苓等青年知识分子对于青年会的宗旨、青年会的工作方法、青年会人员的服务精神是很感兴趣的。就青年会本身而言,它不是教会,不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20世纪初年的基督教青年会已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一个相当活跃而有影响的组织,它并不局限于宗教生活,而积极倡导一种新的精神追求,关注各种社会问题。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教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善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它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意即青年会不是坐享他人为自己服务,而是要诚心诚意为他人服务。青年会的日常活动是以培养青年的德、智、体、群四育为中心,造就青年的完善人格,做人伦之坊表。青年会特别强调社会服务,经常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活动,服务于社会民众。青年会的这种性质和行动,客观上顺应了中国近代转型社会的精神要求,因此能够受到进步人士和青年的欢迎。难怪梁启超、严修、晏阳初、王正廷等知名人士都加入了青年会活动。就连孙中山先生也对青年会的宗旨及其改造人格的社会理想给予很高评价。1923年中国青年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临发表演说:“兄弟对于青年会是有很人希望的”,“青年会的宗旨,注重体育、智育、德育等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国家是人类凑合而成,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造成一个好国家,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都有好人格。中国的团体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会!所以青年会是造成好国家的好团体!”^④

在与青年会美籍干事密切接触中,张伯苓不能不受到这些人在宣传西学中所挟裹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们鼓吹宗教救国论正是以诱人的道德说教和改良社会的种种行动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此时的张伯苓又恰值处于精神苦闷之中:甲午战争失败了,戊戌变法破产了,义和团斗争被绞杀了。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使他无时不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努力寻找或建立新的精神支



柱。美国传教士们敏锐地看出了中国青年文化人的苦闷彷徨，格林提出要“作一种与中国文化接近的试验”。他们正视并尊重张伯苓的心理世界和内在需要，鼓励他走出认知障碍，并且将基督教价值规范与张伯苓的个体需求相结合，努力构建一个互动、对话的良好福音环境，促其思想和心理深处的感悟。

1908年8月16日，张伯苓曾以“我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为题畅谈他思想转化的过程。

那是秋季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日，张伯苓在天津官府的大厅做了一次“我为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演讲，听他演讲的人很多，有基督徒，有他的老朋友和老学生，有学校师生和当地的官僚，“都渴望听到张伯苓关于皈依基督的事迹”。张伯苓首先介绍了他的南开学校及其少年时代情况，而后谈了自己过去的思想苦闷和对人类前途的关心。但是，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产生极端的想法，认为人类灭亡是人类最终结束痛苦的途径。思想的郁郁寡欢导致了对生活的厌倦和精神的不振。他竭力想找到可以解脱的答案。1902年，张伯苓参加一个由格林指导的在普通中学堂举办的查经班，虽然当时中文版圣经文字艰涩难懂，但他仍然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1904年中学堂创办后，他先后请了格林、韩慕儒、饶伯森、郝瑞满等到他的学校兼课。长时间的相处，使他不仅看到了这些美籍青年会干事的先进科学知识，而且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一种宗教的虔诚和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以伟大精神和基督化的人格所支撑的力量。他感到这是当今中国最缺乏的。他开始在思想上有了朦胧的希望。1907年春，张伯苓因伤寒病住院治疗，饶伯森和青年会的西方人士经常去看望他。在饶伯森的建议下，他开始阅读《实际理想主义》。这本书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接着又读了《他（耶稣）的生活》。

1908年秋，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要去美国参加渔业博览会。



出国之前，应饶伯森邀请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息一周。那种安逸舒适的环境，给他提供了读书、与人交谈和思考人生的有利条件，他又一次认真研读了《圣经》。经过几年的学习与思考，已经给了张伯苓关于基督教的足够知识和机会去观察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现实中的表现。他开始从内心的苦闷中走出来，决心走向无私无我的境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拯救。就在张伯苓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天下着大雨，他本来已向北戴河火车站走去，又突然折返回来，他郑重地向饶伯森表示，决定加入基督教。

基督教青年会对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十分重视。青年会总干事赫慕儒(R. M. Hersey)在1907~1908年向“北美协会”的年度“报告”中说到：私立中学堂的张伯苓先生成为基督徒这件事，使我们对将来抱有很大希望。这位青年教育家皈依宗教无疑是在天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张先生是有能力的青年，以前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他组织和发展了这个城市最先进的中学校，他在中国北方的年轻教育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十年来他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很密切，他公开承认他信仰基督教是通过青年会而达到的。当他成为基督徒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便像以前那样继续学校工作，他决定辞校长职位，没有得到允许。在张先生变成基督徒几个星期以后，直隶教育部门决定派张先生到华盛顿参加渔业大会，并考察美国和欧洲教育。我们认为，张先生正在率领青年人前进，他们加入基督教必然会加速这个伟大国家的重建。^⑤

张伯苓准备辞去学校监督(校长)一事，在《严修日记》上多有反映。1908年上半年，张伯苓多次往返京津，到学部面见严修。7月29日，他向严修正式提出辞去中学校长职务。严修听后颇感突然，当晚即约陈宝泉来商议此事，谈至夜二点钟，又电话召严智崇、智惺从天津赶来。7月31日晚，王劭泉、胡玉孙、李芹香、陈宝泉聚于严修寓所，“共议张先生学堂事”，^⑥一时都提不出好的办法，也找不到比张



伯苓更合适的人选,不得已“许明口往见学台,请改归官办”。^⑦8月3日,王春江、陈宝泉、严智崇、严智惺又来京与严修商谈。当年中学创办时,是由严馆、王馆合并而成。王春江一直作为王馆代表在中学工作。他这次来京,实际代表了王家的意见。他表示坚决不能官办,中学全体人员亦不同意官办。接着,陈宝泉报告了会见直隶学台的情况,学台表示:时下“私立学堂方患其少,岂有改私为官立之意”。^⑧于是决定按王春江意见,在学堂内公举一人暂时代张伯苓为校长,署理学校事务。8月8日,严修为张伯苓写介绍信分别致伍朝枢、颜惠庆等人,以为其去美国提供方便。

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十年后,曾经再一次谈起他入教的事情。

1929年2月,张伯苓在纽约接受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采访。那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冬日,在摩天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他靠着桌子,深情地回忆起他的思想历程。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很悲观,我们人民的痛苦与贫穷,令人耻辱的外国势力的侵略,官僚的腐败,所有这些都使我悲痛不已。我很绝望,感到无路可走,我有时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那时候是个年轻的海军军官。我很快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关键不在几个武夫,而在于人民。我放弃了官场生活,投身于教育事业,我相信教育可以改造和革新国家。所以我和著名学者、官绅严修一起在天津他的家里创办起新式学校。那是一十一年前,新的教育方法在当时的中国还不流行。但是,直到我接触基督教以前仍然很悲观,基督教使我变成乐观的人。

我最初听说基督教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饶伯森和格林。他们两位那时刚从美国来到天津,我非常崇拜他们的精神。我想,假若我能得到这种精神,我就能使我生命更有价值——我就能真正地为我国人民服务。因此,我开始很认真地学习领悟基督教,发现了基督教伟大的特质在于他的奇特性格和牺牲精神。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张伯



苓最后说：“我接受基督时，我的生活才有了真正的意义。犹豫不决和悲观消失了。所有一切都焕然充满新意。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正在尝试按照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我不愿让我们的年轻人自私，也不愿我的国家被自私的民族主义所驱动。我不相信孤立主义。中国属于全世界大家庭，并注定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⑩

无疑，张伯苓从基督教教义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受和力量，这使他同时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在1925年10月应北京协和医学校邀请发表《基督教与爱国》演讲时说得更清楚：“我信宗教的原因，就是发生于我的爱国心。二十九年以前，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人夺去。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色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所以我自受这次极大的激刺，直到现在，还在我脑海里边很清楚的。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后来，我回到本城兴办学校，遇见种种的困难，并且有时候我还抱着一种悲观，我知道这种人生观，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人终究要死。以后我常读《耶稣言行录》，看见耶稣的为人，很受感动。这一本书帮助我很多，我所以借着他的鼓励总算是还没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种困难，还要办我的教育；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改造我们的中国人。我希望受改造的中国人，再和他们外国人比较的时候，就不在他们之下。我因为得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才起始信宗教。所以我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实发生在于我的爱国心。”在这次演讲中，张伯苓还强调说：“敝人今天所谓的宗教，也就是宗教的真义，并非仅仅的演讲神灵，祷告上帝。我



们还用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会,使国家的地位不在外国之下。”^⑥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张伯苓是1908年加入基督教的,而不是多年来一般所说的1909年。第二,一方面,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可以说是“基督教会面临使中国福音化的伟大事业中”一个“成功”例证;另一方面看,张伯苓加入基督教并不是寻求个人精神安慰与充实。他作为有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又有较多生活阅历的人,对基督教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独立思考 and 判断,最终选择基督教不仅仅为个人的信仰,而是希望找到拯救中国的药方,用基督教这种西方特质文化形式,解读中国社会改造与重建问题,表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第三,他早期与青年会的密切接触,青年会的宗旨和理念,青年会美籍干事初创时期所表现的服务、奉献精神 and 人格风范,是触发张伯苓思想变化的重要原因。这对他早期的办学实践及其教育良知的萌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青年会改造社会的种种言行中看到了一种力量。对青年会关于改造人格的主张,对中国传统道德一向重私德轻公德种种弊端的剖析及其改良国民道德,强调“德育是四育之首”的立论极表赞同;对青年会从国家积弱积贫现实出发,强调传播科学文化,发达国民智育,提倡体育运动,开展卫生教育的具体做法,都表现了由衷地感佩;对青年会坚持社会福音立场,关心社会问题,开展社会服务和救助,进行社会改良所表现的责任感和社会良心,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兄弟最佩服青年会的组织,以基督的精神,推行社会服务事业。”^⑦

二

研究张伯苓早期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不难发现,他从青年会思想中吸收合理内核,创造性地指导其办学实践,激活了他的教育理念,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如他提出的“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



育”、“以德育为万事之本”、“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熏陶人格是根本”、“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体育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等教育名言，都能看到青年会思想对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溯源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与青年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就是立足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基础上，既包蕴着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精髓，又不断地吸收了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对国内外优秀文化养分不断学习、鉴别、吸收、消化，为我所用的过程，是一个吐故纳新、不断扬弃的过程，照他的说法，是把外来东西“土货化”即本土化的过程。

就青年会而言，自 1885 年中国开始建立青年会组织，到 20 世纪 20 年代其发展达到鼎盛，走过了一条不断本土化、世俗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它的活动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媒体，并且在清末民初众多的社会团体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固然，青年会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是在维护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的小打小闹，属于社会改良主义。但是，它的大量社会活动为青年会事业增添了活力，开拓了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它的服务、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关爱社会的责任感，参与社会生活，提倡文明进步，改良国民道德，传播社会风尚，开展社会救助，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青年会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改良实践，成为社会的润滑剂，是构建社会和谐的一个积极因素。

张伯苓的社会思想也是受到青年会的影响。张伯苓早年在南开设立平民学校，组织学生到天津各宣讲所读报、宣传科学知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设立防疫站救治灾民，设立战地救护队救助军阀战争中受难百姓；南开大学开办暑期补习学校、南开中学、女中和大



学增开社会视察课,组织南开大学学生参与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平民教育活动等,都反映了他的以教育为手段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张伯苓作为青年会的骨干,热心参加青年会的活动。特别是1914年东马路新会所建成后,青年会成为他社会活动的基地。青年会对他很重视,每次向“北美协会”的报告书,几乎都提到张伯苓。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刊《天津青年》也对他多有报道。现以早期的“报告书”为主,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1906年11月22日,张伯苓在青年会演讲“学生的义务和责任”。

1908年8月16日,张伯苓在青年会演讲“我为什么变成基督徒”。

1908~1909年的报告书郝瑞满(R. S. Hall)写到:中国人有积极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用私立第一中学堂(即南开学校前身,张伯苓是校长——引者)的学生乐队以吸引听众到天津市的一个讲演所来听讲座,每星期一次,讲座题目有鸦片的邪恶,赌博,社会的纯洁,缠足,香烟的害处,奢侈的丧礼,中国社会的弱点等。张伯苓先生现在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主任。他继续参加基督教的工作并产生很大影响,这给我们很大鼓励。

1908年12月19日出版的《天津青年》称,张伯苓在美国考察的情况,陆续写来几封信。他在华盛顿青年会演讲,给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讲话,并在纽约研究美国这个最大城市的社会服务设施。

1908年12月12日,青年会《星期报》在“会员行踪”栏报道,本会会员张伯苓前赴美国已迭志本报。兹闻张君至华盛顿、纽约城该处官绅学各界无不欢迎接待。

1909年2月26日,张伯苓在一个学生宇宙祈祷日庆祝上演讲祈祷日的意义和价值。

1909年3月7日,张伯苓在天津新学书院演讲“我为什么变成基督徒”。



1909年6月，张伯苓在第二次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北方学生大会上演讲“基督徒对祖国的义务”。

1910年11月22日，张伯苓在反鸦片社直隶分部的会议上担任主席。

1911年7月，第四次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北方官立学校学生大会报告书写道，大会最感人、最有效的讲演是出席会议的知名中国人士发表的“天津的私立中学堂校长和本次大会主席张伯苓发表了有关‘教师’的很有鼓舞性讲话”。

1912年7月12日，张伯苓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华北夏令营会上演讲“教育家之机会”。

1912年12月16日出版的《天津青年》报道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大会时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和基督教堂领导人张伯苓先生是这次大会主席。他的社会活动家的领导能力和友善的性格，是提高大会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会上作了“青年与国家”的演讲。

在1912~1913年的年度报告书中，韩慕儒特地汇报了张伯苓领导的南开中学创办青年会的情况。

1913年秋，在天津青年会组织的圣经学会上，张伯苓讲“圣经与社会”。

在1913~1914年度报告书中，韩慕儒介绍了南开中学青年会开展活动的情况，介绍了张伯苓的社会名望，“我们的朋友张伯苓先生日益显赫的影响是我们在天津最满意的事情”。

1914年1月，天津青年会第二次学生部训练大会上，张伯苓演讲。

1914年6月29日~7月7日，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北方学生大会上，张伯苓演讲。

在1914~1915年度报告书中，韩慕儒报告了“张伯苓先生与别



的有兴趣的人创办了青年会童子部”。

1915年5月,童子军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张伯苓当选全国童子军董事会董事。

1916年10月,张伯苓到东北吉林、哈尔滨、双城、丹东、沈阳等地青年会演讲,9日在沈阳青年会以“中国不亡有我在”为题演讲,张学良趋而往听,“志气为之大振”。

1918年,张伯苓在美国留学研修期间,多次出席美国青年会或华人青年会活动,发表演讲。

1918~1919年度报告书中,郝瑞满报告指出,张伯苓被选为天津青年会董事会董事长。

1920年4月,张伯苓担任第八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主席,并在开会致词中说:“近代基督的精神就是奉献之爱,不是政治上的诡辩”。

1920年9月18日,在青年会秋会上致词,要求积极推进和引导青年为社会、为国家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以上仅是张伯苓早期青年会活动的一部分。

纵观张伯苓的青年会活动,始终贯穿着服务社会,改革社会的无私奉献精神,具体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学生认识国家形势,为救国贡献力量。这是他在南开、在青年会或外地演讲的主要话题,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一贯行动。

二是开展道德人格教育,引导青年敦品修身,加强社会责任感,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有特色的青年思想教育体系。

三是努力提倡科学,以之开通民智,破除迷信,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促进物质文明的发达。

四是重视体育,要求青年会每年都要举办体育训练班,体育技术与体育道德并重,同时协调各方面社会力量,重视竞技体育,开展体



育交流活动，多年与青年会合作举办运动会，促进国民运动风气。他还敢于打破青年会对体育比赛的垄断，维护了中国的体育自主权。

五是移风易俗，提倡文明风尚和公共卫生，扫除吸毒、缠足、赌博、纳妾、嫖娼等社会积弊，焕发民族精神。

张伯苓作为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家，他的献身和工作热情，他的广泛社会联系，扩大了青年会的社会影响和品牌效应，同时也为青年会树立了一个榜样。

值此纪念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全党全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应当学习、借鉴和发扬张伯苓的青年会精神，进一步发展青年会事业！

注 释：

①“张伯苓博士在本会基本会员退修会演讲词”，1934 年 4 月 30 日，《天津青年》，第 69 期。

②吴相湘：“张伯苓彭春兄偕弟随”，台湾《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

③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④“孙中山先生对于青年会之言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1930 年 11 月 15 日。

⑤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藏。

⑥严修：《严修日记》，第二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版，第 1470 页。

⑦同④。

⑧同④。

⑨Frank B. lenz The Mystery of Personality.



⑩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44页。

⑪“张伯苓博士在本会基本会员退修会演讲词”，1934年4月30日，《天津青年》，第69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天津青年会会长雍剑秋^①略论

李 纳

雍剑秋是近代天津历史上的知名人士，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大军火头办，与外国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从事宗教的宣传和实践活动，并创立养真社，提出许多大胆的口号，促进了社会风俗的改良。纵观雍剑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内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都是与其基督徒身份密不可分的。

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混乱不堪，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北京政权多次易手。1918年，雍剑秋移居天津。在津期间，雍剑秋对天津的基督教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长期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长，并领銜青年会各项运动，成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地方绅士阶层的头面人物。“1933年10月10日~11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提倡国货大会’，雍剑秋任名誉会长”，^②“1935年11月16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40周年大会，雍剑秋时任会长，致开幕词”，^③“1936年1月1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基本会员年会，雍剑秋被公推为全国协会协委”，^④“1942年6月6日，雍剑秋资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服务部，扩展学生救济工作”。^⑤他赠送给教会学校和圣经会大批传教书籍，出任伦敦会天津马大夫医院的



常务董事,捐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以美会、中西女中、汇文中学、新学书院、维斯理堂等。后来,在美国基督教会于旧金山举行的基督教十届年会上出版了一本名为《弗兰克雍涛》(他在新加坡读书时,英文名字叫弗兰克雍)的小册子,表彰他热心基督事业,由此进一步得到英美人士的重视。^⑬

雍剑秋倡议成立基督教协进会,争取中国教会的自给自足。基督教会的中国牧师,一向仰给于英美基督教会,华人牧师、教徒与外国传教士在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存在着一些差别,冲突事件时有发生。雍剑秋认为只有中国人建立属于自己的教会,将坚定的爱国精神融入到外国宗教文化中去,才能达到宗教爱国,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目的。雍剑秋挺身而出,担当起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一职,并慷慨解囊,拨出巨资作为协进会的启动基金。所有属于协进会的中国基督教牧师每月享有若干生活补助费,以期将来基金充实,实现教会经济自给自足。后来,由于国内外战争局势的紧张,基金日益枯竭,协进会半途而废。但是,他仍然坚持接济经济上有困难的中国牧师。

雍剑秋勇于任事,慷慨解囊,大力资助社会弱势群体。他长期出任江苏会馆、广仁堂的董事长,捐款给江苏会馆、浙江会馆、安徽会馆、广仁堂等福利机构,为江苏义务捐款购地、埋葬乡人。雍剑秋担任南开学校的董事,斥巨资支持学校的发展,还以基督教会的名义捐款给燕京大学。为了救济生活贫苦的孤孀寡妇,雍剑秋创立恤嫠会,定额一百人,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十元、面粉两袋。据统计,从1918年到1937年,在历次公益捐款中,雍剑秋私人捐款居于第一位,连续被选为天津慈善联合会的常务委员。

雍剑秋等人负责筹备和推动天津“基督化家庭”的活动。到了20世纪4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提倡“基督化家庭”运动。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下设的家庭委员会把1947年10月规定为“基督化家庭”运动月。1947年4月24日召开天津基督化家庭会议,安排具体活动内



容和办法,还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雍剑秋等人是小组的主要成员,提出了家庭民主,服务邻人,预防疾病,建立快乐环境等,还在滨江道中原公司的橱窗内陈列出基督化美满家庭的模型,在广大市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⑦

雍剑秋虔诚的基督情怀与实干的宗教行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35年5月12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昨举行模范公民选举,到会投票民众约千余人,每人可自由选举自己钦佩之天津市公民十人,投票结果,得票最多之前十人发表如下:一、张伯苓,二、刘孟扬,三、李仲吟,四、雍剑秋,(注:原文似缺第五人姓名),六、祈云五,七、陈宝泉,八、叶文楼,九、赵鹤舫,十、时子周。”^⑧

二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国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基督教青年会在华工作日趋成熟,1916年又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这个号召是基督教精神在中国发展的结果,因此也非常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它要求实行基督教的信望、爱、牺牲、服务等诸德性,把个人、国家、社会结合起来,以个人基督化的人格尽其所能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它是基督精神与爱国思想的结合体。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大力提倡“人格救国”,成立“人格救国运动会”,捐资出版大量书籍。雍剑秋对“人格救国”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在天津市许多报纸上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基督教思想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祸福之门》一书。该书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题写书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雍剑秋在序言中谈及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感于道德的废坠,天理的消沉,惧国家种族沦亡之痛,追求天理人欲的源流厉害,敬述此篇,名曰《祸福之门》,以为临渊履冰之戒。”^⑨《祸福之门》共收录有关人生、义理、国家、民族



等内容的文章 32 篇,从中不难看到雍剑秋大力宣扬基督教青年会所提倡的“克制人欲、顺应天理、服务社会、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等主张,引导青年养成健全人格,建立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国民意识,起到一定的开发民智的作用。

在《祸福之门》的自序中,雍剑秋开宗明义的论述到:“宇宙自有它严密的组织,这种组织都受那一定不变的天理为之保障……在某些时候,天理与个人的欲望,又有一些冲突……要求个人克制自己的欲望,顺应天理。否则将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之中。”^①“天理是大公的,大公为幸福之源……自私为痛苦之源……惟顺从天理的人能廉洁自律,廉则无争,无争则平,而幸福生焉……”^②

雍剑秋认为既然人与天理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违逆的,那么每一个爱国同胞都应该顺应天理。他进一步指出:“天理是万物存亡的枢纽。宇宙内的万象无一不受天理的支配。盖天理者,天律也。人为万物之灵,故能独秉天理以治万物,因物之宜,尽地之利,以利用而厚生,循此以行,是为顺理,逆此以行,是为悖理。或顺或悖,基于一心,而天律之施,赏罚以定。人如自甘假冒,随非逐恶,违理而从欲,其衷心所受之天理制裁必大。物若逆理,物必毁,人若逆理,身必丧,家必败,国必亡。天理者,万物之生机也。故欲促进人生之幸福,必须遵循天理而后可。”^③

雍剑秋认为人必须努力开发潜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才能顺应天理。“宇宙万物各有其职……人为万物之灵……故人类之天职,即谓之为努力于此种增进人生幸福之文明的推演,……是要人用灵魂来辨别天理,用思想来发明天理,用力气来建设天理,将这洪荒的土地,造成幸福的世界,使人人得到快乐”,^④“人是世界的主人翁,万象的变化递嬗,皆凭人的活动而显著。万物不藉人工的施为,幸福无以显现于人类,人若不于发明上有所努力,万物也不能彰显他的天工。但人既为物质所构成,受物质的重重包围,而赖物质以养之,以



至只重视物质生命而轻视精神生命”，^⑩“人生在世，白生不死，如逆水行舟一般，挣扎挺进，力争上游，方不致随急湍而俱陷……人生之幸福，惟自强不息者乃可取得之……若纵欲毁身，盲动无的，不惟人生之幸福不可期，其贻害邦家亦甚大也”。^⑪

雍剑秋提出：人类进步需要竞争，竞争必须以服务人类为标准。“世界是个竞争场，不竞争不能进化，竞争而后有优劣，优胜劣败，此仆彼继，互相迭代，……竞争的标的就是美和善，美善欲于前，竞争起于后，于是善者美者存，恶者劣者亡，……或曰：佛说无我，老倡无为，是痛绝竞争也；不知竞争应由其道，竞争于占有，则人我相侵而世扰乱，竞争于创造，则人我相需而世进化。竞争的道途不同，其功用亦大异，故竞争的标准不可忽也”。^⑫

雍剑秋在《祸福之门》中系统地阐述了“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大声疾呼青年们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宇宙是个闷葫芦，世界是个万宝囊，惟人能识破这个闷葫芦，能享受这万宝囊中的一切幸福……神工虽然奥妙，天理虽然高深，人类独能凭借之以发明创造，促成世界之进步。所谓文明就是人类的智慧日近于天理的证明，……善于修身的民族，其种自强，丧身的民族，其种自弱。……爱国同胞，请你担当起你的天职，表现你的功能，来完成人生的使命”，^⑬“人受生于天，为万物之灵，其所禀赋的权能，可以说是宇宙惟一伟大灵妙的权能。人如能保守天真，必能成天之所未成，发天之所未发，因为他富于思想，长于智慧，内畜精神之爱，外伏物态之贪，喜新厌旧，进取无穷，用能促进世界精神的和物质的文明，同时并进。……应尽量保持天真，发挥他的能力，中国今日之祸，谁能说不是数十年来人之失真所造成的？谁能说不是上天因为我们失真而施惩罚呢？同胞，我们快快回头，不要再毁坏我们的身体，软弱我们的灵魂，使世界不能进化，辜负上天的生成啊！”^⑭“人因为富有竞争的本性，所以在人的思想中时时刻刻有竞争，每动一念，竞争立起，是即



所谓理欲之争。欲之为性，贪而无厌，……若一念之动，理欲相争之际，理竟控不住欲，欲将在人心中作了主宰，妄自尊大，无所不为，久而久之，欲焰滔天，为害必无底止。故当国者若不能克制他的欲，虽一时声势赫赫，终必为欲火所焚，倒塌下来，甚且招来压迫，被人征服。诚以国家命运的强弱，个人命运的祸福，皆凭个人理欲之胜败而定也”。^⑩

雍剑秋看到民众懒散懈怠、政治流弊丛生，大声疾呼，针砭时弊。“自爱爱人便是善，自害害人便是恶。……人若爱人，就是成全天的爱，天必嘉其善行而赐之福；人若害人……天必惩其恶行而降之罚。爱人的人为人造福，自己亦必受福，因为他是合乎天意的。……爱国的同胞，请你一切皆以自爱爱人为本，则天人交欢，幸福将不求而自至矣”，^⑪“世人有权者能造法律，……但人造的理，若更不合乎天理，上天必按其违理的程度，施以相当惩罚。……天理泯灭，人欲横流，终至疆土不能保，种族不能存。人生幸福，本是顺天理者所应得的赏赐”。^⑫“顺天理，克人欲，就是要人克去种种伤害身体的邪恶，保留那有益于进化的种种，……如果大多数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不但可救国家的危亡，并可使国家兴盛”。^⑬

从这些基督教论说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有二点可贵之处：

第一，基督教青年会秉承基督精神，结合中国本土国情，提倡“人格救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一种青年的团体，所以他的目标是要指导青年的生活，培养健全的人格，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来培养青年具有高尚的品德，聪明的才智，健康的体魄，以及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目标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讲求以德育教育为本，将普通之道德伦理容纳其中，对各国圣贤固有之精义微言，主保持不主破坏，而求心灵完备之发达”实际上就是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主张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贯穿在日常的行为之中，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人格。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怀，以基督化的完满人格，来



救亡图存。雍剑秋详细论述了基督教教义中“顺应天理、克制人欲、服务社会、待人谦卑、劝人向善等等基本理论。例如：“天理是大公的，大公为幸福之源，情态是自私的，自私为痛苦之源，放纵情态的人比贪得无厌，贪则争，争则乱，而痛苦生焉。惟顺从天理的人为能廉洁自持，廉则无争，无争则平，而幸福生焉，故迷乱莫先于窒息，直至莫要于从理。”要求人必须顺应天理，克制自己的欲望，“若纵欲毁身，自动无的，不惟人生之幸福不可期，其贻害邦家亦甚大也。”

第二，雍剑秋是“宗教救国”论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倡导爱国，政说政言，认真培养青年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国民意识，积极开民智。他在没有接受洗礼之前，长期从事与基督教有关的宗教活动。受洗之后，雍剑秋以基督徒的标准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并把国民责任感融会到自己的宗教生活之中。他在《善与恶》中说：“爱国的同胞，请你一切皆以自爱爱人为本，则天人交欢，幸福将不求而自至矣。”在《智慧是进化的根源》中，他又说：“爱国同胞，请你担当起你的天职，表现你的功能，来完成人生的使命。”对于当时的法律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法律必须顺应天理，天理通常是与人的利益一致的，是否顺因天理，与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他这样说：“世人有权者能造法律，……但人造的理，若不合乎天理，上天必按其违理的程度，施以相当惩罚。……天理泯灭，人欲横流，终至疆土不能保，种族不能存。人生幸福，本是顺天理者所应得的赏赐。”²³“顺天理，克人欲，就是要人克去种种伤害身体的邪恶，保留那有益于进化的种种，……如果大多数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不但可救国家的危亡，并可使国家兴盛。”²⁴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祸福之门》中的言论。雍剑秋是大军火买办，借助外国势力，获得高额的经济利益。他接触教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拉拢、利用之嫌。但是，在他接受洗礼之后，全身心地参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教活动，无论是青年会的宣传还是具体活动，他都



亲力亲为,以基督精神来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标尺,把传播福音、服务社会等教义付诸于行动,以近似于“赎罪”的宗教情怀,实践着基督信仰。可见,他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是以基督教为最后归宿。《祸福之门》正是他基督信仰确立之后,表述他的宗教思想的文本。

三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除旧布新的重大变革。基督教青年会大力宣传新观念、新思想,提倡现代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促进新风尚、新习俗的普及。1919年,雍剑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董事的同意下,借维斯理堂楼下,独资创办“养真社”,^⑤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李燕豪主持养真社的有关事宜。养真社秉承基督精神,提倡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家庭民主,丧礼从简,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和现代科学的生活方式,成为当时天津地区家庭、婚姻、丧葬制度等方面社会风俗改良的巨大促进力。

1923年,养真社在《大公报》上公布了婚姻组织俱乐部章程^⑥:

1. 本组依据本社章程第十五条第三项之任务而组织此项俱乐部。
2. 此项之俱乐部,以增进智能,提倡社交生活为宗旨。
3. 此项俱乐部之主任,以本组之主任兼任之。
4. 此项俱乐部之会友,须符合左列各项:(甲)女自十八岁以上。(乙)男自二十岁以上。(丙)女子至低须在高小学校毕业。(丁)男子至低须在中学肄业。
5. 前项之会友,须先行加入养真社,而后始有加入此项俱乐部之资格。
6. 此项俱乐部之会友,不限人数。
7. 次向会友加入之程序如左:(甲)缴验文凭证书。(乙)自填家庭状况表,过去历史,及未来支援。(丙)缴纳入会金1元。
8. 本部为增进部友智能计,随时组织各项学会。
9. 前项之各种学会,部友可任意加入。
10. 本部为增进部友友谊生活计,



于每礼拜六晚七钟半组织欢聚会。11. 前项之欢聚,部友可自由加入。但应遵守左列办法。(甲)男女部友到会时,需填写固定的时间表,退席时依然。(乙)女部友之来会者,须有父母弟兄姊妹亲戚师友各项之一人同来。12. 本部为部友当然之辅佐,得将家庭会同时举行。13. 本部如有部友行为,实行出部之必要,交由本部解决之。14. 本部主任,如发现部友不合于本章第四条各项之一者,应立即免除其部友资格。15. 本部存留之部友履历,其他部友可随时提取,但应得主任之许可。16. 部友对于欢聚会应按规定交费,每人每次大洋一角。17. 本章程如不适宜,可提交本组修改。

1923年,养真社在《大公报》中多次宣传新婚约,^②新婚约的条款摘抄如下:一、双方认定家庭为国家社会基础。二、双方认定彼此以爱结合,协力同心,使家庭实现精神上之快乐。三、双方认定男女二人是为一体,既作之和不可分离,同心同德,富贵贫贱,终身一直患难与共。四、双方认定各守贞操,终身不渝,以为家庭道德之本。五、双方认定子女均享有继承财产之权利,至分配之法,由双方合意定之。六、双方认定个人行动,均须互相了解,经济出入,应以节俭为主。七、双方认定男子有养家责任,女子有治家责任。若男子有需要女子协助养家,或女子有需要男子协助治家的时候,均愿互相尽力之所能,以养成坚固之家庭,为国家社会之本。八、双方认定以上各条,彼此情愿遵守,不符初衷。

同年,养真社在“家庭联欢会章程”中规定男女双方未婚前所应注意之要点:1. 男女皆应以25岁为适宜。2. 男女各方面性情之善恶应特别注意。3. 男女资格相等。4. 学问相等。5. 呼吸眼口鼻等皆应注意。5. 经济以仅能供给将来之家庭生活费为度。6. 以正当职业为限。7. 志愿宜相同。8. 宗教宜相同。9. 其余如交际籍贯嗜好等,皆应调查加以注意。如果各条件适宜。而无真正精神上之爱情,不能有婚姻之结合。即有精神上之爱情,而条件有所欠缺,仍



不得牺牲屈从云云。

在推动“丧礼改革”^②方面,养真社提出新口号。例如:1. 父母丧服从旧。2. 夫妇丧服各一年。3. 寿衣从俗从简。4. 取消殉物。5. 开追悼会。6. 提倡清明扫墓。7. 讣闻文字,宜实在,不应说谎。8. 女儿宜载在讣闻。9. 丧礼以送钱为主,有余就为亡人捐助社会公益事业。10. 本主上去“神”字,取其可以纪念之意。11. 取消影而代以照片。12. 死忌日全家吃素,不赴各种集会。13. 取消昭穆旧制,采用公莹办法。14. 墓前筑以石碑。15. 用丧车,则行人应脱帽示敬。

雍剑秋深刻地认识到社会陋俗不仅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还会阻碍国家民族的发展。他苦难的童年就是“一夫多妻”制所带来的恶果。雍剑秋的母亲在大家庭里失宠,母子二人被迫另立门户,以母亲做女红度日,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从国家的方面来讲,婚姻、家庭、丧葬等陋俗,直接影响到种族的健康繁衍、国民素质的提高,事关民族危亡。因此,他一生都坚持一夫一妻,即使原配妻子逝世,也没有再娶。养真社的活动,他几乎每次都到场,发表演讲,并倾力资助。

综上所述,雍剑秋所创办养真社,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雍剑秋认为:基督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群”的精神。要求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别人,人们积极团结起来,凝聚任何一个兄弟姐妹的力量,组织社团,用团体的力量,帮助弱者,服务社会,并且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使更多的人得到感化,向善的方向发展,得到更大的“群”,最后扩沿到整个社会,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养真社就是一个“群”,它提倡社会风俗改良,利用《大公报》等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并躬亲示范,在社会组织形式、人际交往方式、人与人结合的方式等方面除旧布新,以此“服务社会”——富强国家,振兴民族。国家能否富强,是取决于主、客观两方



面的。他认为客观因素,非人力所能及,只能从主观因素做起。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的因素,一个人只有具备完满的人格,才能够更好地担当起“服务社会”的责任。养真社可以说是一个“培育完满人格,推广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婚俗习惯,建立新的社会风俗”的试验场。

第二,提出要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既有新事物、新观念的破土而出,又是旧习惯、旧思想的“负隅顽抗”。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观,被介绍到中国来,使人们耳目一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其中对此宣传最力的一个组织,养真社所提出的观念、契约、方式等,都是这一主题的真实反映。例如:婚姻俱乐部,家庭联欢会章程,规定男女的年龄适当,要求在生理上达到能够恋爱结婚的健康年龄,从心理方面男女也到了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成熟程度。婚姻俱乐部规定:女子受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学历,起码可以保证她们具有经济独立的资本。经济能够独立,进而可以取得经济地位上的对等,这就保证了女子具有对婚姻、家庭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具有了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能力。新婚约规定:子女均享有继承财产之权利。这表明:在财产继承权上,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肯定了女子个人的独立经济地位。“新丧礼”规定:女儿同样具有载在讣闻中的权利。这肯定女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不再需要以“父”或“夫”作为说明书。

第三,提倡现代的择偶标准,健康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科学的婚俗、丧俗。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改良风俗方面一直不遗余力。“1924年2月18~25日,基督教青年会提倡‘节俭运动周’,提倡储蓄、丧嫁、家庭预算等”,^④“1936年10月24日,举行集体婚礼,宗旨为改良风俗、提倡节约、尊重婚礼”,^⑤“1946年提倡市民节俭、实行新生活、特主办联合婚礼,纯为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⑥养真社要求一切传统礼仪皆从简,以节约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在丧礼改革



中,提倡采用公墓,墓前立碑,可以节约土地资源;杜绝跪哭,实行脱帽致敬的现代致敬礼仪。这不仅是方式的改革,也是观念的转变。

养真社在“家庭联欢会章程”中规定男女未婚前必须慎重考察对方,不但要求年龄相当、外貌合意,而且必须有相同的志趣、信仰,受过一定的教育,有共同语言。“新婚约”规定婚姻应该实行自愿的原则,婚后双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恪守贞操,终身不渝。这表明择偶观的巨大变化。男女双方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要求婚姻自主。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更看重精神层面上的共同性,把共同的爱好、追求作为共同生活的基础,以科学的道德观来规范彼此的生活。这与以社会地位、家庭背景为最终取舍标准的“门当户对”的旧婚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婚姻俱乐部举办健康的交流方式,例如欢聚会等,提供一个轻松、健康的交友平台。它是一种现代的社交方式。“新婚约”认定家庭为国家之基础、社会之根本,这是认识到个人对“群”的责任,是“国民意识”的初步觉醒。

养真社所提倡的新观念、新风俗,都是时代的声音,向民众展示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准则。很多民众(大多数是部友)也亲身参与其中,成了最早的受惠人群。但是,这些主张与口号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全体国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更谈不到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对他们的这些努力一概否定,要知道在中国这样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中,要成功传播一种新的思想或是方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从长远来看,它满足了思想、理论建设的特殊需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养真社所探索的问题都具有超越具体目标的深远意义。所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养真社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并论证了基督教的某种理论,或举行了某个活动,还在于在人们的头脑中洒下新观念的种子,这些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温度,就会破土而出。



四

20世纪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广大国民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甚为忧虑。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将基督精神与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基督教义的本土化,提出了“人格救国”,利用《大公报》、《益世报》等的大众媒体,以及举办活动、组建社团等方式,实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和使命。雍剑秋深悟基督精神,又具有强烈的国民意识,把基督精神与救亡图存融会贯通,探索宗教救国之路。《祸福之门》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雍剑秋尝试着用基督精神来宣扬爱国思想。在《祸福之门》中多次大声疾呼“爱国的同胞,振作起来,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大公报》上也有他的大量爱国言论,以基督教的角度切入,在鼓吹自己的宗教主张之同时也宣扬了自己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增强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养真社是一个集灌注基督精神,健全青年人格,改良风俗等多重使命为一身的社会团体,通过具体形式——各种社会活动,全方位的宣传、实践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雍剑秋在养真社的创立、确定方针政策、组织各项活动、对外宣传等阶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养真社的建设过程中,雍剑秋的个人思想倾向与行为规范,已经完全融入了养真社的宣传与行动之中。

雍剑秋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养真社为自己活动的“场域”,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制度中的糟粕,推动天津开民智的社会运动。20世纪上半叶,国人普遍存在着散漫懒惰的萎靡之风,雍剑秋激于民族大义,在《祸福之门》中大力倡导国民必须爱国,必须以振兴国家与民族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国民责任感。他自幼深受封建家庭制度所害,对旧制度深恶痛绝,在养真社中大力提倡建立现代的择偶观、男女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婚姻自由、丧礼从简、家庭和谐等,这些新观念使人们耳目一新,对天津地区民俗、民风的改良起到



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雍剑秋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表的宗教主张和他所从事的宗教实践,既表现出基督徒的宗教情怀,又可视为国人探求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之举。

注 释:

①雍涛,字剑秋,江苏高邮人。早年随母亲移居上海,在上海读书学习英文,后到香港英国教会学校念书,考入新加坡大学,学习德语。23岁大学毕业,英语极为流利,德语次之。回国后,投身于社会福利事业,曾与上海道余联沅和大买办盛宣怀组织了一个“救济”北方难民的慈善团体。适值义和团拳乱与八国联军侵华,由于雍剑秋擅长英语、德语,并在参与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买办和外国人,经常周旋于社会名流之间,与中国上绅和外国军人、政客交往较多。后来他皈依了基督教,并身体力行,实践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他的基督徒生涯,主要是集中在天津生活的这段时光。

②《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57页,1995年。

③《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58页,1995年。

④《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58页,1995年。

⑤《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59~60页,1995年。

⑥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的一生”,《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68~97页。

⑦霍培修:“天津基督教的联合组织”,《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61~162页。

⑧《益世报》,1934年5月13日。

⑨雍涛:《祸福之门》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



行,1935年。

⑩同上。

⑪同上。

⑫雍涛：“天理与人生”，《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⑬雍涛：“人类的天职”，《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⑭雍涛：“工作是幸福之源”，《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⑮雍涛：“人生贵有目标”，《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⑯雍涛：“竞争须有其道”，《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⑰雍涛：“智慧是进化的根源”，《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⑱雍涛：“贞固足以下事”，《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⑲雍涛：“以理控制成功之基”，《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⑳雍涛：“善与恶”，《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㉑雍涛：“顺理真义”，《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㉒雍涛：“顺理与克欲”，《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㉓雍涛：“顺理真义”，《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㉔雍涛：“顺理与克欲”，《祸福之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行，1935年。



②⑤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的一生》，第 68 ~ 97 页，《文史资料选辑》第 50 辑。

②⑥《大公报》1923 年 1 月 29 日。

②⑦《大公报》1923 年 3 月 6 日。

②⑧《大公报》1923 年 3 月 12 日。

②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 56 页，1995 年。

③⑩《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 59 页，1995 年。

③⑪《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 60 页，1995 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宋□卿与天津青年会

张继祖

宋□卿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杰出的实业家。他创办的东亚毛纺织公司生产的“抵羊牌”毛线在上个世纪几乎家喻户晓。他创立的东亚公司企业文化更是融东西方文化之精髓，成为当时的典范，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同时，宋□卿还是一位慈善家，热心于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他领导的东亚公司也成为职工青年会基层活动的出色单位，在基督教青年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早期青年会的职工活动

1.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于1895年传入和创办的。清末的天津处于洋务运动的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正是在这时派人来天津组建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培养青年完善之人格、建设完善之社会。它本着耶稣奉献己身、服务人群的无我精神，强调“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奉献社稷之原则来提供社会各种的服务。为了完成这样的宗旨，它发展出“全人教育”的目标：以培养青年人的德、智、体、群四育为具体目标。这其中又以德、智、群三育最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该



会以社会名流作为重点,以学校中的青年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得到社会的公认。青年会之所以把工作中心放在学校,是和北美协会的发起人力图通过青年会“感化中国的思想界”的意图有关。况且,基督教在学生中已有一定的基础。其后的事实说明,青年会的工作方针是对的。到1914年,青年会在文化教育界,其势力几乎已渗入到许多官立和私立学校。

尽管如此,青年会也没有放弃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开展工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有利于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诸如工商各界知名人士的工作,吸收他们到青年会中来并获得他们的赞助,特别是得到他们的资金支持,更有利于青年会的发展。当时负责推动中华青年会会务发展的总干事巴乐满(Fletcher S. Brockman)在接触许多中国仕绅后,指出仕绅们对当时社会道德衰退的挂虑与欲重整道德的使命感:“许多有见识的中国人对沿海大型口岸城市中的道德状况有所挂虑,像广东、上海与天津这些城市,在这些地方东、西方的混杂瓦解了道德对品德的防护,繁增两种文明中的罪恶。”以培养青年德行的中华青年会正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并且受到仕绅的欢迎与支持。北美协会既提供工作人员又提供活动经费,加上在津各基督教团体的人力和财力的全力支持,青年会的工作有了人才和资金的雄厚基础。

2. 早期青年会的职工活动

早在天津青年会成立之初,1896年6月,青年会就将自己主办的《中国的青年》创刊号赠送给商业青年。1900年上半年,格林总干事联络各商行人士赞助,扩充青年会公所,修缮并添盖寄宿舍。“1901年2月,中韩香港青年会总干事巴乐满来津,协助天津青年会建立城市职业青年支会,从而把学生青年与城市职业青年活动联结起来”。1914年,青年会在东马路新会所对面的崇仁宫,增设青年会



职工部。这标志着天津青年会正式将工商界的青年工作纳入自己的日常工作内容。

正是有了工商界的基础,从1918年至1920年青年会在学校和工商界能够广泛活动为协约国募捐。1918年11月6日,青年会与天津政绅和商务界领袖提倡的“欧战协济会中国直隶筹款部”成立,在青年会会所内设办公处。11月13日,举行有54所学校及工商界共25000人参加的游行大会,并组成由几个协约国命名的团,人人手持各国国旗,9种模型花车,为捐款做准备。至1919年1月20日止,协济会直隶省全省共捐款33万余元,其中天津捐款21万余元,占全省捐款的三分之二。该笔捐款中的一大批款捐给法国的阿尔贝特市进行市政建设,修建医院及重建家园。为此,该市于1920年3~4月间树碑名“天津街”以示纪念。作为协约国一方的参战国,中国曾派大量劳工赴欧洲的协约国工作。青年会于1920年夏调查天津赴欧华工的情况。

青年会利用自身在知识界的深厚根基,在职工中开展成人教育。这应该是天津最早的成人教育了。1924年3月3日,青年会主办的平民教育会在该会所举行开幕式。其校址有四处,分别由青年会下的组织承办。其中,青年会职工部的傅清淮承办崇仁宫夜校。1929年,青年会智育部同联青社、益友社共同协办平民补习学校,一年毕业生达300人。可见其规模已相当可观。转年,智育部还举办“公民教育周”和“公民教育研究班”,请专门人才讲授课程。青年会对城市青年的影响已举足轻重。再就其教授的科目内容而言,也是切合当时都市中的在职青年工作上之需要,像外国语文、商业实习、簿记、商业法、速记、打字、甚至如急救这类实用的课程也包含在内,这在当时还十分保守与封闭的社会中可谓首开先例。此外,青年会也在其会所设置阅览室,提供各种的书刊给当地青年阅读。不仅如此,青年会也借着各种交谊性的社团来增进会员之间以及会员与外界的交谊。



这类的社团对青年会与外界的接触帮助颇大。例如,天津青年会在庚子事变后即组织阿尔法(Alpha)俱乐部,会员大都是天津商界人士。该俱乐部运用电影来介绍各国的历史和各种的科学新知。

在社会服务、救济事业方面,如赈灾义演义卖,青年会也都做了很多工作。在提倡新文化,提倡精神文明,移风易俗,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戒除烟酒,扫除封建迷信以及提倡集体婚礼等方面青年会都做出不小的贡献。青年会的活动受到包括工商界在内的大众的欢迎。

早期青年会之所以在天津的工商界能顺利的开展活动,是和青年会负责人顺应当时天津社会实际,努力赢得上层人士的支持分不开的。例如,1935年,青年会在宁园举行的集体婚礼,就是由当时的天津市长商震做主婚人,在天津引起不小的轰动。近代的天津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不仅新式学校多,新式工厂和各种新型企业不断出现。人们对西方文化较之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上层社会的有识之士,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也力图借助青年会这样的团体来促进社会进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前期。

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此期间青年会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经济困难,人员退缩,工作只能维持现状。这期间,天津青年会和实业界爱国人士接触增加,搞募捐,发展会员,这方面的活动相当活跃。

二、宋■卿与基督教青年会

1. 宋■卿的“基督精神”

宋■卿(1898-1956)本名显忱,字■卿,山东益都人,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宋传典的长子。他从小受洗加入基督教。中学时就



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1916年，18岁时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1918年，20岁的他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西大学商学院，主修商业和工商管理。1921年，33岁学成回国，协助其父经营批发商号。1931年倡建“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宋□脚接受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东亚公司企业管理之中。例如，他制定的“东亚铭”，内容包括了东亚公司的“主义”和作事为人的准则，分别悬挂在各办公室。职工每人一份，挂于个人家中。“东亚铭”中的第九条是耶稣圣训“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宋□脚认为企业职工对公司的正确态度应遵循“信、望、爱”三个字。而其中的“爱”即指爱护公司的名誉，爱护团体利益，爱护同工友谊，爱护新工女工等。这无疑都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体现。

宋□脚在讲解“不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的圣训时，谈到“所谓的服事人，就是无代价为旁人服务的意思。”他说“我国晚近社会风气腐败，道德旁落，人多养成自私自利之恶念。故鲜有肯为大众服务效力者。故久而久之，人们彼此间同情心愈趋脆薄。除了本身利害之外，社会国家之公益，均置之度外。此种情形，言之下令人痛心。故必须奋起唤起国人之服务精神。因服务精神的基础，乃是责任心和同情心。大家如能贯彻此意，必能本热诚同情，负责任之心理忧天下之忧，为大众服务。一扫今日自私之风气，如此社会国家方能安定有望。”宋□脚的这些思想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从东亚公司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中也能体现宋□脚的“基督精神”。例如公司规定职工的医疗待遇：公司自设厂医，对员工的一般伤病免费医疗，还可到宋□脚赞助开办的一所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因该院对“东亚”公司的治疗有数量限制，员工就诊，需经公司介绍）。宋□脚还特邀他本人参与捐助兴建的我国第一家结核病防治



病院每三个月为“东亚”公司员工做一次结核普查,发现结核病患者,“东亚”公司负担三个月的治疗费用;还与人合资共建了一所疗养院,位于北平西山一棵松(当时尚是郊区),职工经医生鉴定可免费三个月往该院住院疗养;通过宋□卿个人友好关系与资金支援关系,女职员可免费到水阁医院(前身是有名的妇产科专科“洋女医院”)定期体检,发现妇科病亦可免费治疗。

公司的福利制度同样体现着“基督精神”。其中规定:正式职工实行夜班补贴,并提供免费夜餐一顿。病伤补贴:每月内不超过三天者工资照发,超过三天者,酌情处理。伤亡抚恤:发给固定的金额,并可推荐一人入厂做工。疾病疗养:发给一定数额补贴,工龄三年以上者,因病休工一个月,工资照发,超过一个月扣工资,三个月内发放疾病疗养金。婚丧补贴:给以一定数额补贴,并有相应的休假规定。另外,还设有生活困难补贴、工衣补贴、子弟奖学金等等。

探亲待遇:家居外地者,每年有固定日期的探亲假,照发工资,公司并承担路费。还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宿舍,每日提供三餐集体伙食,只收取较少的一部分费用,超支补贴,不限量,每星期改善两次,有肉(这在当时实为难得)。正式职工还每日免费供应两餐。休假待遇:“东亚”公司的职员每年可休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休假期间,可以到北平的西山或香山休养,并定期到协和医院体检,费用亦由公司承担。春假待遇:每年春,由公司出资,组织全体员工到北平春游。宋□卿亲自带队,游览,参观。赏名胜,循古迹,登长城,上西山,开展形式新颖的各式各样的竞技游艺,共进野餐,尽兴而归。

退休待遇:养老补贴按工龄计,工龄在五年以下者,以每年一个月工资计发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两个月工资计发放;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三个月工资计发放;二十年以上者,以一年四个月工资计发放。

家访制度:由人事部审定专人,称家庭专员,均为女职员,慎审



定,严要求:不准烫发,不准涂脂抹粉,也不准穿绸着缎,常年的短发、蓝衫、布裤、布鞋,极其简朴。依每月公司下达的固定指标,深入员工家庭,详细体察情况,发现有特殊困难者,由女专访员直接代向公司为其中请困难补贴,还负责排难解纷,调节员工的家庭矛盾,维护和睦。设有专门的夜间接待室,对于那些在家庭中不易或不便调解的纠纷,就将其请到厂里,转请熟人、感情亲近者协助调解,由公司出资款待。

婚丧料理:“东亚”公司将员工的婚丧大事的料理,纳入人事部的正式工作议程,遇有发生,当即有人事部派人出面协助料理,并以公司名义致送礼金,以示关怀。员工双亲中逝世者,可享受“一七”带薪丧假,并补贴给相当于员工本人一个月的工资,以示公司尊重人伦之情。对一些事父母至孝者,宋□卿必身着素服,登门吊唁,哀戚如亲,行礼如仪,并个人赠金,以示哀痛与敬重……通过东亚公司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由基督教阐发的西方平等博爱的理念贯穿东亚公司的企业文化之中。

2. 宋□卿与基督教青年会

宋□卿本身就是基督徒,回国后即加入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团体——“联青社”。联青社是天津上流社会的团体,当年在10区小营门维格多利聚会。每周三请专家讲演,并讨论财经、税收、工商、物价、教育、风俗、见闻及婚姻法和国际形势等问题。该社社长是朱继圣(仁立公司总经理)、副社长李之楠。北方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永利久大集团的李烛臣、陈调甫,大陆银行副理胡哲甫,西湖饭店经理、大买办雍剑秋等都是“联青社”成员。

宋□卿非常支持青年会的工作,不仅经常提供资金给青年会,而且在他经营的东亚公司成立了职工青年会。东亚职工青年会在宋□卿的支持下,全面开展活动,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即使在日伪统治时



期,青年会遇到种种困难,不得不减少活动以维持局面,而东亚公司却能坚持开展活动。到后来,连时任青年会总干事的陈锡三也到东亚公司当了副经理。

宋□卿经常捐款捐物给青年会。同时,他领导的东亚公司为救济贫苦同胞,于1943年曾在公司附近设立第一施诊所,专为贫民义务诊病免费赠药。其后东亚公司又在天津的谦德庄,设立第二施诊所,成绩亦好。东亚公司经常向慈善团体捐款捐物,并向救济院、慈幼院、育婴堂、慈善医院和教会等提供服务。特别是1939年天津闹大水,公司组织救护队将在津受灾的眷属全部接来公司,给予安置照顾。这是一项困难和危险的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最终收容职工眷属人数达346人。

从1934年起,宋□卿任天津青年会候补董事,翌年任董事,直到1950年他离开国内。

三、东亚公司的职工青年会活动

东亚公司人事部福利组下设东亚职工青年会,由公司为其提供活动场地和经费。该会设有德智体群四部,分别开展这四方面的活动,其宗旨是培养职工高尚的道德,提高职工文化水平,增强职工体质,调剂生活,增加职工的工作兴趣,使职工成为人格高尚的好公民。他们除配合市青年会活动外,亦独立开展活动。其德育部下,又设有几个小团体,如“读书会”、“道德研究会”等,主要活动内容是研究、宣传、推广公司的“东亚精神”与基督教义,旨在强化员工队伍的道德意识。

智育部,顾名思义,旨在努力于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与认识水平,以期使整个队伍的文化素质提高到一定的水准。他们热心地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与现有队伍的文化水平,



编写了一些深入浅出的工人课本与教材，组织起职工夜校。他们开办了四个民众教育班，依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甲级班设有国文、数学与普通英语，修完全部课程，学员的文化水平可达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乙级班开设的是国文、算数、常识、初级英语，通过补习可使学员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丙级班与丁级班其实都接近于扫盲班，开设的也只有国文、算术、常识，通过补习冀使学员文化达到初小（四年）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丁级班是女工，国文也只开《千字文》。教师来源有二，一是以厂内员工能者为师，一是从社会上聘请知名教师代理任教。丁班教员主要由东亚公司的董事、经理夫人担任。丁班教员有宋□脚太太李景芳、徐董事太太、邹牧师太太、赵经理太太等人。夜校之外，公司还设了图书馆、阅报室。藏书上万册，报纸十几种，书购精华，报选正大。

宋□脚非常看重职工教育。他曾谈到：欧西各国注重国民教育，故人民素质甚高。我国教育不普及，故人民质素、工作能力均较低……异日我国亦能进步至机械化之生活时，我职工则不得不预先充实自身学识，以备争取生存，庶几不落伍于时代。东亚公司为提高优秀职工的知识水平特规定制度补助他们深造。补习课程以英文、算术、国文为限。而所上学校即是市青年会办的夜校。应该说宋□脚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体育部、群育部则分别负责厂里的文体活动。将全厂员工依其不同爱好编组为三十六个运动队：除足、篮、排、网各种球类之外，尚有体操、武术以及各种田径运动，由公司出资购置了足够的运动服装、器械与各种球类。几乎是不成文法则：每天至少训练四十五分钟。公司还特地出资租养鱼池并雇人养鱼，供员工于休闲时垂钓寄趣。

文娱活动方面，由京剧业余爱好始，渐次发展成了以颇具名气的“劳品话剧团”为主的多种文艺形式的业余队伍，全公司百分之八十



的员工介入了活动之中。也山公司出资购制服装、乐器、道具,提供良好的场所,演出时公司还组织送慰问品,员工们情绪很高。经常而有效的文体活动,收效甚著,各项活动在天津都甚负盛名,很具实力。如厂篮球队全盛时,队员多达八十余人,多次与其他厂或专业队竞赛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名气很大。其他的几个队,如体操、排球等,抗战爆发前一直是天津极活跃的民间体育劲旅之一。文艺活动甚为经常与火爆,话剧团曾成功地演出数场好戏,受到各方面的好评。例如1946年的“五一节”,该剧团演出“回春之曲”——田汉著的三幕剧,得到相当的好评。

东亚合唱团有六个歌咏队,总计队员共有180人。每队每月练习四次,所练习的是一支较冗长的歌曲和一些短小精彩的歌曲。每到月终六队举行联合大练习一次,石小东先生为合唱团指挥。共同练习的歌曲,尤为精彩,例如: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与光明赞、大家唱、红彩妹妹等。此外,东亚公司还成立有话剧社和国剧社等。

东亚公司办有刊物《东亚声》报道公司内社团活动的情况。该刊物于1947年发行,为双周刊。上面经常刊登公司内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报道,职工普遍阅读。

宋□卿曾向员工们强调说:“在东亚做工,我就要让工友们得到这样两个好处:一个是要让大家成为股东;一个就是大家学到真本领,就是某个人离开了东亚,也能利用在东亚学到的本事在社会上自立。在公司做工,大家会记得公司的好处。我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卿,但要求大家爱公司。爱公司不仅是热爱你们的今天,也是热爱你们自己的未来。”社会上对“东亚”公司也是高看一眼,一致给以好评,特别是认定“东亚”公司从职员到工人,总体的文化与道德素质层次高,训练有素,技术、劳纪都属上乘。因此,“东亚”始终是同行企业挖人才、挖职工的最佳目标。有人说:“东亚的职员到哪儿都能独当



一面,东亚的工人到哪儿都能升上一格!”因此,哪怕是只在“东亚”工作过几个月的“口工”(即临时工),再寻纺织活路也较条件相等者为易。将钱花在文体事业上,而且是花了大钱。从表面效益看,是只图了个热闹;倘从长远的实际效益看,却不是那些花掉的钱所能衡量万一的。员工们身体健康、情绪好是企业的最有效的保障,而心理效应,所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进的动力与持久的活力,却是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东亚公司人才济济,甚至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博士,这充分说明东亚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

东亚公司之所以能在公司内外开展青年会活动并取得显著成绩,这和宋□脚是分不开的。东亚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典范,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借鉴和学习的必要。东亚公司的青年会活动在培养职工品行、丰富职工业余生活、提高职工自身素质等诸多方面起到十分良好的作用。这也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和发扬。

百十年来,天津青年会由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引入,因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开展受广大青年喜爱的文体活动,将西方文化介绍给天津,对天津的社会风气产生良好的影响,得到天津上层人士的支持,北美协会不仅派出得力人员领导初期天津青年会的工作,而且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在津的基督教团体均给予青年会人力的支持。青年会也得到天津工商业界名流以及广大会员的鼎力赞助。即使在口伪统治时期,青年会已得不到美国方面的资金,却依然得以维持和工作,正是得益于工商业界热心青年会工作的人们的经济支持。解放后,青年会继续本着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开展活动。

今天,进入21世纪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社会环境和新的历史任务。人类正面临着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现



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并存,许多企业一改过去对职工大包大揽的做法,许多原来由企业承担的职工工作都转向了社会。青年会作为青联下属的一个组织,有必要发挥其以往发挥过的作用,联系企业职工,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在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的事业中,运用青年会广泛的国际国内社会联系,开展适合青年人的各项文体活动,培养青年良好的道德品质,促进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青年会历史的意义所在。希望青年会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再创青年会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大事记》

Fletcher S. Brockman, I Discover the Orient.

刘远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对清末社会菁英的影响:在科学智能与民主思想上的启蒙》。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

《东亚企业文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中国百年商业巨子》中的《宋□卿和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文,肖舫著

“宋□卿在职工欢迎会上的讲话”,《东亚声》第22期1948年2月出版的东亚公司刊物

(作者原系天津利达集团工作人员)

英敛之、《大公报》与 天津青年会的关系述论

侯 杰 孔菁菁 秦 方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天主教徒英敛之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二者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英敛之在他所创办的《大公报》^①上,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进行了持续而密切的关注,对其组织参与的各种类型的活动都进行了宣传、报道,如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天津学校辩论会”、“野餐游行”、“科学演说”^②、“天津青年会第三次运动会章程单”^③等等。同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非常看重英敛之及《大公报》的社会影响力,将自己的许多宣传材料尽数交给英敛之在《大公报》登载,如“青年会学务夜课广告”^④、“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⑤等,并经常邀请英敛之到会演讲。

本文即以《大公报》刊发的各类文字为中心,努力揭示英敛之、《大公报》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并希望通过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来探讨一下大众媒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不遗余力——英敛之、《大公报》对天津 基督教青年会的报道及其宣扬

在《大公报》上,关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文字,主要分布在“时



事”、“广告”、“来稿”(或“来函”)、“论说”或“附件”(后又称“白话”)等栏目中。其中,“论说”或“附件”主要是刊登一些近代中外著名人物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表的演说,内容丰富,价值较大,可惜的是这种文字相对较少。“广告”和“来稿”(来函)则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动要求刊登在《大公报》上的,属于青年会主动宣传,更能反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自身的想法和意愿。“时事”类主要是指英敛之、《大公报》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报道。这些报道文字虽然简略,但数量较多,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在时间上具有很强的的延续性,显示了英敛之、《大公报》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密切而持续的关注。

英敛之、《大公报》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宣传报道,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演讲、演说为主的各类聚会;第二类是以体育为主的运动大会。除此之外,还有对于学校辩论会、野餐远足等活动的一些报道。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英敛之、《大公报》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以演讲、演说为主的各类聚会的报道情况。在聚会之前,英敛之、《大公报》一般会以“青年会期”^①、“青年盛会预闻”^②等标题向读者进行预告,以唤起人们的注意。例如:

“法租界青年会定于晚七点半钟举行第九次大会,仍假座英国公部局戈登堂。中刻已编发请帖矣,赴会贵利如下:

一、本会仍在戈登堂举行;

二、本会于堂内设置客位有座号,欲赴会者必先在中国租界巴黎路四十六号本会公所或城内经司胡同同志学会社领取座票;

三、凡入堂者盖须有票;

四、凡来索票者须在三月二十一日以前,过期不候;

五、凡本会会友除自领一票外,可再领两张以赠友人;

六、非本会会友者前来索票,亦必赠给。惟座有定数,票定之后,恕不再发。又经司胡同同志会社学堂亦于是日午后一点半钟开演



说,盛会有驻京美钦差赴派来汗(汉——笔者注)务参赞官卫君代致词,并有军乐以助兴致云。”^⑩

由此可知,英敛之、《大公报》在预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召开会议的消息时,对于会议举办时间、地点、参与形式,以及与会人物都有介绍。介绍会议时间、地点,可以方便人们赴会;而介绍与会人物,如“盛会有驻京美钦差赴派来汗务参赞官卫君代致词”,并特别提及“有军乐以助兴致”,其目的显然是想引起人们的兴趣,俱往赴会。有时,《大公报》还会在这类报道之后,加上一句评论,“想中外人上当有一番盛会也”,^⑪或“想届时赴会听演者,座为之满云”。^⑫这几乎是在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做广告了。

聚会之后,英敛之、《大公报》又会以“青年大会纪盛”、^⑬“青年盛会”^⑭等标题向读者通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会的具体情况。例如:

“昨晚天津青年会假英工部局戈登堂开第十一次大会,到者甚众。今将其演说秩序记录于左:一,督署乐队奏纪念忠君爱国之乐;二,圣道堂甘牧师演说开会;三,大会副会正连警斋先生演说;四,大公报社长英敛之演说;五,再奏军乐;六,美国华盛顿城司礼门先生演说;七,三奏军乐并唱歌;八,会中友人致词;九,四奏军乐;十,本会总董格林先生演说;十一,卢木斋学台演说;十二,徐静润观察演说;十三,五奏暂别后会之乐,闭会。”^⑮

透过这条报道,可以看出英敛之、《大公报》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聚会消息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对与会人物,尤其是发表演讲的人物,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在这条新闻里详列发表演讲的人物,如“圣道堂甘牧师”、“大会副会正连警斋先生”、“大公报社长英敛之”、“美国华盛顿城司礼门先生”、“本会总董格林先生”、“卢木斋学台”、“徐静润观察”。虽然这只是一次会议上的演讲者名单,但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为这些人物的身份和类别,恰好是近代几乎所有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过演讲的人物类型之代表。“圣道堂甘



牧师”代表了基督教教会中人,其他曾经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演讲的还有“美以美会崔润生先生”¹⁹等;“本会总董格林先生”代表基督教青年会中人物,其他还有“清韩香港青年会总书记巴乐满君”²⁰等;“大公报社长英斂之”代表了社会贤达,其他还有“天津西医艾君”²¹、“新学大书院教员谭焕庭先生”²²等;“美国华盛顿城司礼门先生”代表了外国友人,其他还有“美国社会学专家海端森博士”²³、“美国大博学家罗基君”²⁴等;“卢木斋学台”、“徐静润观察”代表了中国官府中人,其他还有“直督所委四品顶戴李君”、“铁路总办梁观察”。²⁵这些演讲者,从国别上看,中国人、外国人皆有;从身份上看,有宗教人士,有政府官员,还有社会贤达。可以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的人物都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无形之中也提高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扩大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影响。

英斂之《大公报》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聚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为会议助兴的音乐特别关注,并予以强调,如“督署乐队奏纪念忠君爱国之乐”、“三奏军乐并唱歌”、“五奏暂别后会之乐,闭会”等,《大公报》不仅详细记录奏乐次数,而且还分别记载了乐曲名目。由此不难发现英斂之《大公报》对各次聚会中演奏音乐之关注。为什么英斂之《大公报》在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议时,一般都会不厌其详地注明“并有德国军乐以助其盛云”²⁶、“并奏西国音乐,验试奇妙灯影”²⁷、“加以电光演照寰球著名青年会所,并请法国音乐以助雅兴”。²⁸主要原因是这些“西国音乐”、“奇妙灯影”和“电光”无一例外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新事物、新文明。在英斂之、《大公报》看来,这些新事物、新文明意味着现代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英斂之和《大公报》所极力倡导的。故英斂之、《大公报》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展示这些代表西方文明的新事物。



此外,英敛之《大公报》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聚会的演讲主题也多有介绍,如“请学务处留学日本各员至会演说日本学堂情形,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之进步”²⁷¹、“请天津西医艾君,乃天津最著名之牙医生,至会演说,保卫牙齿之要理,并医治之妙法”²⁷²、“特请美国人博学家罗基君在东门北路西新置会所内演讲新科学”²⁷³、“特请美以美会崔润生先生登台宣讲,以基督之热心服役为题”²⁷⁴、“特请新学人书院教员谭焕庭先生演说教授儿童之善法”²⁷⁵等。这些演讲主题包括学堂、留学、健康、科学、宗教、儿童教育等不同方面的内容,同样可以归结到一点,即西方文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想将这些西方文明传输给中国人,而英敛之《大公报》也希望国人能够了解和接受这些西方文明。正是由于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故英敛之《大公报》乐于报道有关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新闻。

除了报道以演讲、演说为主的各类聚会之外,英敛之《大公报》还比较多也非常细致地报道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体育运动大会。例如,1905年,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第三次运动大会的时候,英敛之《大公报》就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1905年10月26日,当运动会即将举办之时,英敛之《大公报》先刊登了《天津青年会第三次运动大会章程单》,公布了竞赛项目:“1. 阻物赛跑;2. 掷十二磅铁弹;3. 第一次赛跑百码;4. 百码慢自行车;5. 跃高;6. 衔鸡子羹匙赛跑;7. 末次赛跑百码;8. 跃远;9. 拣山药豆赛跑;10. 囊中赛跑;11. 植竿跃高;12. 接力赛跑;13. 拉绳。”并详细介绍了参加运动会的报名条件、报名方式、计分方法、赛场规则,以及对优胜者的奖励措施等等,²⁷⁶俨然成为运动会的对外宣传机构。当运动会正式比赛之时,英敛之《大公报》再以《洋洋大观》对运动会赛场上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本埠青年会举行第三次运动会,出奇决胜,观者如堵,莫不鼓掌叫绝。”²⁷⁷运动会结束之后,英敛之《大公报》又以《记运动会》为题,开列出运动会角胜分数清单,每一项竞赛的前二名或前三名,都分别刊



登出姓名及所在学校。通过英敛之《大公报》的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二次运动大会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英敛之《大公报》通过对运动会的报道,也向人们展示了体育运动这种有益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此外,英敛之《大公报》还报道过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天津学校辩论会^③、野餐远足^④等等各种活动。无论是演讲、体育,还是辩论会和野餐远足,都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开风气”之举动。这些举动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如演讲、音乐、幻灯、电光、体育、辩论会、野餐远足等等,而且在内容上也体现了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如提倡科学、教育、健康等等。

“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⑤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奉行的宗旨。也正是出于这个宗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才举办了如此之多的活动,用宗教名家的演说来感化青年,用学者、博士的演讲和辩论会来增长青年的智慧,用医生的指点和体育运动来增进青年的身体健康,用茶话会和野餐远足来提高青年的交际能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期望通过举办这些活动,以培养青年的健全人格,使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人群造福。

同样,英敛之、《大公报》所以大力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这些活动,也是由其宗旨决定的,即“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以开我民智,化我陋俗而入文明”。^⑥英敛之所确定的上述《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决定了他热心介绍和宣传西方事物和文明;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各项活动,恰好符合英敛之、《大公报》之办报宗旨,于是英敛之、《大公报》不遗余力地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加以报道和宣传。



二、志同道合——天主教徒英敛之 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说

不言而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对英敛之和《大公报》的社会影响力也是十分看重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自我展示和宣传的稿件都是寄给《大公报》刊发的。例如:介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办原因的《天津青年会缘起》,^③介绍世界青年会缘起、发展状况的《青年会缘起》,^④列举青年会所享盛誉的《青年会之证书摘要》,^⑤介绍青年会宗旨和会务的《青年会之办法》^⑥等等。而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将自己为建立新会所而发起的劝捐宣传,刊登在《大公报》上。这些劝捐宣传在英敛之、《大公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新会所以顺利建成。

更为重要的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还多次邀请英敛之赴会发表演讲。这些演讲体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对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认识;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英敛之和《大公报》重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某些原因。

英敛之每次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都会在演讲的开始,陈述其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演讲之原因。“开会大意无庸再述,近口所到诸君俱属高明,仆不学无识,迫于会中数君之切嘱,来此演说。今不得已谨将愚见陈述一二,望诸君进而教之”。^⑦“如今在下既蒙贵会嘱咐演说这个题目,也不得不按着自己的愚见,敷衍敷衍”。^⑧从这些话中,除了可以看到英敛之为人谦虚之外,也可以了解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邀请英敛之演讲之诚意。而且还透露出一些信息,有时连演讲的题目都由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预先给英敛之规定好的。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嘱咐英敛之演说的题目之一就是“改良风俗”。^⑨从这个题目的选定,即可以看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英敛之



的关系之密切。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目的之一即“化我陋俗而入文明”。其在办报过程当中，对于中国的陋俗，如缠足、赌博、厚葬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又对新的文明的生活习俗，进行了大力提倡，如放足、剪发易服、音乐、电光影戏、体育、卫生等。实际上，其中的很多属于现代文明的生活习俗，正是通过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举办的各项活动与《大公报》的相关报道来加以宣传，从而进入中国人生活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请英敛之来演说“改良风俗”，自然十分合情合理。

英敛之在关于“改良风俗”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中国的蛮风陋俗太多了，几乎无事不当改，无处不当改”。为此，他提出了改良蛮风陋俗的办法，即从个人做起，形成社会风气，由少数人逐渐延及多数，进而形成好的社会风俗。“凡是一切坏风陋俗，事情不论大小，情节不论轻重，请众位要深恶痛绝，特立孤行，不可顾世俗的讥笑，要给社会做个开风气的人。要知道一国强盛的根源，起首时亦不过发于二三豪杰，由少数延及多数，漫漫（应为慢慢——笔者注）的就成了风俗了；一国所以不振的缘故，皆因没有豪杰肯出头，彼此的互相观望，互相推诿，这才委靡成风，颓波日下”。^⑥

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展的各项活动来看，确实有为社会“开风气”的功效。英敛之的演讲对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来说，自然就是一种赞扬和肯定。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提倡改良风俗，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则在实际行动中实践“改良风俗”。二者在“改良风俗”上的共识与某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合作，通过英敛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得到了体现并有所加强。正是由于这种共识的存在，才使得英敛之、《大公报》大量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也使得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十分看重英敛之和《大公报》。

英敛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更多地传扬了他的宗教思想。在演讲中，英敛之十分强调宗教的作用。在他看来，宗教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宗教是长治久安的保证，“然苟具良知之人平心论之，以今之国家社会若屏去宗教，其能久安长治否乎”？^④宗教还是国家和社会团结进步的基础，“岂知一国之中，人类虽众，然庸常之辈每占其多数，至上智之才及下愚之质，百分中未必即占二三。凡此中才可善可恶之辈，倘无一纯正宗教为之维持联合，即不能固结团体，日进于善”。^⑤宗教甚至是国家发达、富强的源泉，“各国之发达进步、日臻富强者，皆宗教之导其源，断非诬语”。^⑥对于人群而言，宗教是增长人群幸福，预防苦害的办法，“所谓增长幸福、豫（预）防苦害，关于一群之乐利者，岂有逾于救世教者乎”？对于个人而言，宗教具有促人奋发有为、坚持不懈，为众人谋幸福的作用，“古典克云：‘造时世之英雄必具超群卓绝之才，勇敢直前之气，穷人所不知之事，入人所不履之地，热诚博爱，虽侮辱苦痛，无所顾虑，使多数人类得生于光明空气中。’按此云云，则此等人物出于笃信宗教之英雄豪杰，多不胜数，而其他未见前仆后继有如此者”。^⑦

英敛之对宗教之作用的强调与宣扬，既充分显示出其作为教徒的身份，又扩大了宗教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乃至中国社会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英敛之在演讲中提到宗教时，或者笼统地称为“宗教”，或者称为“救世教”。如“宗教不同，宗旨各异，要以通行最广、益世最大者为最上乘。按李提摩太光绪十八年时所著之《救世教益》一书，在彼时，救世教人数已达四百十五兆，其冠于地球各教可知矣。至救世教如何益于国家，该书述之甚详，不必烦叙”。^⑧英敛之在演讲中，不用自己信奉的“天主教”这个名称，也不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基督教”这个名称，而是使用可以包含“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救世教”，显然是为了突出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共同点，及其对中国人来说所具有的“救世”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英敛之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都是相信宗教的，并且都是信仰耶稣基督可以“救世”。



在演讲中,英敛之还曾对哲学与宗教进行了一番比较。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世之崇尚哲学者流,动斥宗教家之固执迷信,有障真理,然请观历史上之大英雄、大豪杰,建奇功、立伟业者,强半出于宗教之人,而哲学家肯损己利人、泽及后世者有几人乎?善乎!培根之言曰:哲学如深闺处女,虽美丽不能生子。其意即谓为空高无补而已。”^⑧通过这种对比,英敛之一方面强调了自己的教徒身份;更重要的是,当英敛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表这番演讲时,实际上就更加突出了自己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共同点——信仰宗教。

在演讲中,英敛之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至‘明哲保身’一语,为社会中无公德之起点,虽舍生取义、杀身成人(仁)者,间有其人,然保身一语既为规则,适中个人之私怀,不期奉行而自奉行,此中国之于合群、团体、公德等事,万难发达之原因也。”在英敛之看来,正是由于中国事事与西洋相反,才使得国家不振。“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因事事无不与西洋相反。人尚实际,我务虚名;人凡事必研究其底里;我则浅尝辄止、自诩已足,颠倒错乱,轻其所重,急其所缓。”^⑨

总之,英敛之相信宗教是可以救国的。这在《大公报》上有很多表述。在《和民政策》一文中,英敛之就写道:“中国不欲振兴则已,倘欲振兴,当此纷扰涣散之际,非认定一至善之宗教,使民知所趋向不为功!”^⑩而英敛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中,对宗教有益于国家的作用大加称赞,显然也表明了他希望能够用宗教来拯救中国的意图。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进行自我宣传的时候,也竭力将自己塑造为有助于国家富强的一个组织,与英敛之的演讲有异曲同工之妙。“罔是邦青年会兴盛,则国势亦必因以兴盛,此理应无俟烦言而解。苟全国皆忠孝仁义之人,即人人有忠君爱国之忧,如此,即国欲不富强也,岂可得乎?试观欧美诸邦,其所以致富强者,莫不得力于良国



民也。而国民何以能良，实赖少壮时有好习尚，以端其品行，虽至老大，壮志未消，忠君报国之心为其所固有也。夫青年何以有好习尚，是非多立基督教青年会则不能。故欧美诸邦青年会所林立，举国皆视为要图者，职是故也。”⁵¹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有助于国家富强的形象，与英敛之希望国家富强的愿望也是十分契合的；而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教活动趋向，与英敛之的“宗教救国”思想更为接近。因此英敛之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十分紧密。英敛之愿意强调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自己有共同的宗教背景，并希望借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实现自己“宗教救国”的理想；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希望借助英敛之和《大公报》来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以扩大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因此，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对于英敛之和《大公报》，还是对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这都是非常有益的。

通过对英敛之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演讲的分析，可以知道英敛之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张具有许多共同点，如都相信西方的宗教，都致力于西方文明的传播，都致力于改良中国传统的社会风俗。因为这些共同点，使得英敛之坚信，可以通过报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并十分乐于在《大公报》上刊登关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文字。

三、结语：相得益彰——英敛之、《大公报》 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互动

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又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因此它不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也是反映社会内在需求、引领社会发展变化的利器。它在社会中具有一种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者可以通过它宣传自己的理念，



影响读者和社会大众。英敛之、《大公报》就是这样，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它通过及时迅速的信息扩散，使各种信息成为世人关注的中心，从而引导舆论方向，对社会进行干预。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无法亲身力行成为英敛之、《大公报》的很大局限。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与英敛之、《大公报》相同或相近的方针指引下，举办了各种社会活动，如演讲、演说、辩论、体育等，引证了英敛之、《大公报》制造或宣传的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大公报》舆论导向下实践层面的“Model”。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某些实践活动也正是通过英敛之、《大公报》而为更广大的人群所了解和接受。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十分必要的，起到了增强大众传媒、社会团体与广大民众的沟通联系和引导呼应等多重关系。因为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大众传播受到三方面的限制：其一，传播媒介多用印刷文字符号（书刊报纸），由电子机械媒介实施的音像传播尚未问世（如广播电视）或影响甚微（如电影），而文字符号的接收还原，比较音像符号要求更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解能力；其二，印刷、电讯、邮政事业落后，传播范围狭窄，速度缓慢；其三，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大多数”。^⑩显然，这就造成了受众接收与理解传媒发送的各种信息的严重障碍。讲演的风行，不仅大量增加了直接受众，而且形成有利于下层民众理解传媒信息的接转中介。通过演讲，演讲者不仅充当发送者，把信息传达给不识字，理解力不足，或处在偏远闭塞之地的广大群众，而且可以把获得的信息反馈再转达给传媒，从而影响着传媒不断改善的意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为英敛之、《大公报》宣传自身价值观的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将自己提倡的西方文明具体直接地呈现出来，而这比空洞的说教更能吸引人。

另外，报刊等大众媒体对人的影响往往都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看法。英敛之、《大公报》大量报道天津基



督教青年会所举办的活动,使得人们能够经常看到这方面报道,从而熟悉和了解这些活动,进而接受其理念和精神。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这些活动,又常被英敛之、《大公报》冠之以“文明”的符号。这就可以使得人们将这些活动视为时尚和文明的象征,心向往之,从而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而英敛之、《大公报》也因此而更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以开我民智,化我陋俗而入文明”的办报宗旨。当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因为英敛之、《大公报》的报道,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文明、时尚的形象,从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感,得到人们的支持与拥护。

透视英敛之、《大公报》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二者在互动中取得了双赢的结果。一方面,英敛之、《大公报》通过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报道,更好地贯彻了自己的办报宗旨;另一方面,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通过英敛之、《大公报》的报道,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同时,《大公报》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良性互动对社会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风俗改良,开启了民智,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注 释:

①《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

②分别见“辩论会又开”,《大公报》1914年5月25日;“游行队伍出发”,《大公报》1914年6月8日;“演说会纪事”,《大公报》1914年9月18日。

③“天津青年会第三次运动会章程单”,《大公报》1905年10月26日。

④“青年会学务夜课广告”,《大公报》1905年2月16日。

⑤“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⑥“青年会期”,《大公报》,1902年10月23日。



- ⑦“青年盛会预闻”，《大公报》，1905年4月22日。
- ⑧“青年盛会预闻”，《大公报》，1905年4月22日。
- ⑨“法界盛开青年会”，《大公报》，1906年2月10日。
- ⑩“西医演说”，《大公报》，1906年12月15日。
- ⑪“青年大会纪盛”，《大公报》，1905年4月29日。
- ⑫“青年盛会”，《大公报》，1907年5月8日。
- ⑬“青年盛会”，《大公报》，1907年5月8日。
- ⑭“宣讲会纪闻”，《大公报》，1914年5月25日。
- ⑮“纪青年会”，《大公报》，1902年12月6日。
- ⑯“西医演说”，《大公报》，1906年12月15日。
- ⑰“演说会纪闻”，《大公报》，1914年6月19日。
- ⑱“美博上演说”，《大公报》，1913年2月21日。
- ⑲“特别演说”，《大公报》，1909年12月29日。
- ⑳“青年大会纪盛”，《大公报》，1905年4月29日。
- ㉑“青年盛会再志”，《大公报》，1905年4月27日。
- ㉒“法界盛开青年会”，《大公报》，1906年2月10日。
- ㉓“周年大会”，《大公报》，1909年6月5日。
- ㉔“夏季演说”，《大公报》，1906年7月7日。
- ㉕“西医演说”，《大公报》，1906年12月15日。
- ㉖“特别演说”，《大公报》，1909年12月29日。
- ㉗“宣讲会纪闻”，《大公报》，1914年5月25日。
- ㉘“演说会纪闻”，《大公报》，1914年6月19日。
- ㉙“天津青年会第三次运动大会章程单”，《大公报》，1905年10月26日。
- ㉚“洋洋大观”，《大公报》，1905年10月29日。
- ㉛“辩论会又开”，《大公报》，1914年5月25日。
- ㉜“游行队伍出发”，《大公报》，1914年6月8日。
- ㉝“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史”，《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34页。



- ⑭“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 ⑮“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 ⑯“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9年10月12日。
- ⑰“青年会之证书摘要”，《大公报》，1909年10月14日。
- ⑱“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17日。
- ⑲“青年会为格林、巴乐满两君开欢迎大会演说”，《也是集》大公报馆光绪年刊，第50页。
- ⑳“青年会演说改良风俗”，《大公报》，1910年10月21日。
- ㉑“青年会演说改良风俗”，《大公报》，1910年10月21日。
- ㉒“青年会演说改良风俗”，《大公报》，1910年10月21日。
- ㉓“天津青年会戈登堂春季大会演说”，《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 ㉔“青年会为格林、巴乐满两君开欢迎大会演说”，《也是集》大公报馆光绪年刊，第50页。
- ㉕“天津青年会戈登堂春季大会演说”，《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 ㉖“天津青年会戈登堂春季大会演说”，《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 ㉗“天津青年会戈登堂春季大会演说”，《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 ㉘“天津青年会戈登堂春季大会演说”，《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 ㉙“天津青年会戈登堂春季大会演说”，《大公报》，1907年5月9日。
- ㉚“和民政策”，《大公报》，1902年9月6日。
- ㉛“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 ㉜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马千里与天津青年会

胡 伟

马千里是天津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在南开中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达仁女校等多所新式学校中任教或担任主要领导责任，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青年时期，马千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不久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其满腔的爱国热忱与报国壮志联合会内有志青年和社会各种力量，积极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爱国运动的持续进行而奔走呼号。在感念马千里先生一生功绩的同时，也应该探循宗教信仰对其人格和行为塑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纵观马千里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社会的理念对马千里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不断弘扬百折不挠、不计毁誉、辛勤奉献的精神。换言之，或许正是因为他自身具备了这些优秀品质，才使他在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怕困难，奋发努力。无论如何，马千里先生树立起来的的善良坚毅、淡泊名利、克己节俭等精神风范，多多少少是受益于基督宗教的洗礼。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力行的联合各界青年、培养健全人格、勤俭乐群、爱国助人、服务社会等等，在马千里先生的身上也得到生动体现。



一

马千里,名仁声,字千里,1885年生于天津的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卒于1930年。生性悲天悯人的他,自幼就耳闻目睹了国家贫弱和社会的不安定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给国家民族所造成的深刻危机。在他的身上,并没有一般官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反而他从少年时期开始就逐渐坚定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为此,马千里勤奋求学,在私塾求学期间屡考第一名。之后,他又陆续在俄文馆、北洋大学俄文专科班、上海私立振华学校和天津私立敬业中学(即南开学校的前身)读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学习与教学之余,广泛参加演说、运动会、学会、校刊出版、新剧表演等各种课外活动,不但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并形成某些特长,为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和社会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他聪明智慧、具有爱国热忱和为人正直,所以深得校长张伯苓的赏识。张伯苓不但将妹妹张冠时介绍给马千里,还向他宣传基督教劝人为善的精神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社会服务、人格救国的宗旨,深深地打动了马千里。

在两位内兄弟张伯苓、张彭春的影响下,马千里于1911年9月3日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随着他的信念笃定,认定“无宗教帮助之人,甚为危险,甚不可靠”。同年10月5日,马千里又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①此后他便常常参与会内各种活动。由于马千里擅长演讲,所以经常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内做公开演讲,教导青年要积极向上,担负起救国为民的责任。^②遇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辩论会,善于思辩的他就担任评议。1912年9月3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召开辩论会,题目为《今日中国教育军事与道德何重?》,就聘请马千里担任评议长。^③1915年4月5日,马千里还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演出新剧《橄榄案》,饰国王一角,以欢迎直隶各县办学人员^④,对推



动新式教育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在社会公益和慈善救济等方面,马千里也是不遗余力,不甘人后。1921年2月19日,全国急募赈款大会天津支部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会,马千里于是便以红十字会干事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八职员之一。^⑤他积极组织、参加各项活动,为促进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顺利有效地开展启发民智、服务社会、推动城市文明进步等方面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以教育救国为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马千里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和人格救国的精神融入自己的教学工作中,特别注重对学生多方面的培养和塑造。^⑥在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马千里不但重视对各科教学的改进,还经常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既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同时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师生之间的了解与感情。他还十分重视开展学生文体活动,到校不久就添置了游木、乒乓球、篮球等多项体育设施,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这对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体格强健的新青年具有很大好处。马千里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曾亲自讲授修身课,经常给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教育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⑦此外,马千里还善于联络社会上的志同道合者,向其宣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教育和爱国宗旨。每逢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游艺会、展览会等活动,他便邀集社会人士前来参观,借此机会展示办学的成绩,宣传办学理念。^⑧

二

1919年,当中华民族处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众多爱国人士纷纷挺身而出。在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



爱国运动和抵制口货运动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不但提供活动场所,还发挥其影响力,争取社会上各种爱国力量,积极推动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的一员,马千里也与其他同仁和学生一道,为救国奔走宣传、出谋划策。凭借出色的口才,马千里在津多次组织演讲宣传,号召群众提倡工业、抵制日货,使广大人民深受感动。6月18日,马千里凭借其在教育界的威望和社会活动能力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他在当时的演讲中大声疾呼:“今日成立斯会,原赖各界热心国事,惧中土之沦亡,然必须同心协力,相辅前进,无论何种党派或官僚派如何设法从中破坏,我等必竭力抵御之。”^⑩怀着坚定不移的决心,马千里终日不顾个人的安危,不计自己的得失,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各界联合会的工作之中。

6月25日,天津各界联合会通电北京政府,反对签署和约,强烈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密约,请求政府严厉惩办卖国贼。但是,这种正义之声却遭到政府的冷遇。在各界联合会三次派出代表赴京请愿未果,却反被官府拘留的情况下,天津各界爱国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表示强烈抗议。10月12日,全津学生二千余人,公民一万余人聚集在东马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共同声讨、抗议警厅暴行。各界人士公推马千里、时子周等人作为代表面见直隶省长。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被捕代表终于获释。^⑪

紧接着马千里又积极筹备召开了国民大会,天津抵制口货运动由此开始。1920年1月23日,当学联调查委员发现魁发成料器庄私藏口货后,奸商竟然还公然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学生。当国民大会众委员欲惩办奸商时,遭到警厅干涉,并拘捕了马千里等人。不仅如此,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查封。周恩来等人为此前往省长处请愿,遭到大批军警镇压而被逮捕。^⑫

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包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内的社会有志人士的共同抵制和抗议。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宋则久等人不但继续积极



进行抵制日货的各项活动，张们苓等九名士绅还公开以教育家、基督徒等身份加入遭到封禁的各界联合会，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爱国人士的声援，并对当局施加压力。南开学校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职员们亦纷纷辞职，以示抗议。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对后来马千里等代表的获释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千里等人在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面对警方妄图消磨爱国意志的种种行径，不被动摇，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尤其是马千里，身处逆境却仍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不仅利用争得的读书和聚会机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开展演说等活动，使大家在狱中也能得到继续学习和锻炼，而且还为将来的教育工作和社会活动提前做出计划安排。如要对少年军事教育提出建议，改造天津体育社；扩张商团；提倡中等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提倡高等小学兵式操；并考虑将来要办新闻报纸的发刊词内容；介绍世界之新潮流，改进社会之旧习；主张国民有民主的参政权和自由权；奖励爱国的执政者；提倡男女教育之普及；介绍社会舆论及讨论问题等等。深陷囹圄的他仍能如此不顾自身安危，心系国家和社会，不能不说是宗教的无我、隐忍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人生皆为大众服务”的高尚精神在其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如此坚忍不拔。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感染了其他的人，大家一齐“化郁愤为愉快，集愉快为力量”，不仅精神上更加振作，也更增强了大家斗争到底的决心。^⑫

在代表们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7日审判厅不得不释放全体代表。天津各界人士皆为其庆祝，公教徒、基督教徒慰问团还送上特制的纪念章给每位代表，上刻“为国牺牲”，以表达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及广大社会同仁们对马千里等人爱国之举的嘉奖。^⑬



三

中年以后的马千里由于工作繁忙,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参与较少了。但这并不代表二者由此完全割离,而恰恰相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宗旨和爱国乐群、节俭奉献等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理念,扎根于马千里的心田,使他无论身处何地,历经何事,都秉持着这一信念奋力前行。无论是从他之后的性格养成还是教育等实践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青年会之精神对马千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应该说,马千里自小就具有悲天悯人、敢于破旧立新的性格因子。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参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但对其提倡的移风易俗,建立城市新文明等却心向往之,并身体力行。在第一任妻子高氏病逝后,马千里反思个人的婚姻生活,深刻地感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包办婚姻给青年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就曾写道:“予与予之亡妻虽为夫妻,不过形式上之夫妻,非精神上之夫妻也,较之朋友,如普通中之普通之朋友也,除客气以外无他话。……不与之谈,情之一字由何生耶?”^⑭因此,他决定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子作为终身伴侣。于是他给大哥去信,反对家里的再次包办,并提出了对婚姻的五项要求:在校求学五年以上;天足;婚礼去旧制等等。^⑮后来,他如愿以偿,和张伯苓的妹妹张冠时结合。婚礼时,他又带头破除旧式礼俗,到礼堂举行新式婚礼,成为津门首创。此举对当时繁文缛节的传统婚姻形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以致后来很多人皆“慕而效之”。^⑯当年的天津《醒俗画报》以《结婚新礼》为题加以报道,称其为“未始非改良风俗之一端也。”^⑰马千里还在24岁时带头割去发辫,并在日记中袒露心扉,多次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进行猛烈的抨击,^⑱提出“予深愿中国



之女子得此权利(选举权),予甚愿助之”。^②由此可见,在马千里的思想中敢于挑战传统。在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后,马千里敢于破旧立新的思想与当时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提倡新文化、提倡集体婚礼等等不谋而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他还养成了节俭、乐群和助人等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对其后来的人生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马千里十分积极而且广泛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社会上担任很多职务,如《新民意报》总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干事长、中国拒毒会天津分会副会长、崇德女校董事、中国基督教会董事、南开校友总会主席、天津县议会议员、教育会评议员等等。显然,这其中很多职务都是纯义务职,没有任何报酬。他曾说,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必须减少人类的痛苦,增加人类的快乐。^③正是秉持这种服务社会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宗旨,马千里工作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他还将这种乐群、爱国和服务社会的理念传达给他的学生们,教育他们“人生最高目的是提高人生的理想,减少人民的痛苦……君主国时代讲忠君,民主国时代注意服务社会,有益人群。必须代替一群人作事,虽受很多人埋怨亦绝不推辞,这才能作出一点事业来”。^④为了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助人思想,马千里把学生们组织成“幼年团”,又名“小狼队”,立誓要“尽国民的责任”、“随时随地扶助他人”。幼年团有十二项规章、条例:诚实、忠义、助人、友爱、好礼、爱物、服从、快乐、勤俭、勇敢、清洁、虔敬。^⑤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马千里的薪水向来不多,他不仅要负担母亲和小家庭七口人的生活,还常常接济亲友。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他却始终甘之如饴,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而正是有了信仰的支撑,才使他获得苦行者的乐趣,并能高瞻远瞩,淡泊名利,不追求物质享受,不计较眼前成败。马千里一方面自奉俭约,在省中任职的二年里,只穿灰色的布中山服,冬季加一件灰色的棉大衣,而他的一双旧棕色皮鞋,则一直从



他任教开始穿到逝世。^②另一方面对于他人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帮忙,丝毫不计回报。当周恩来欲赴日本留学但却囊中羞涩时,马千里立刻到南开学校找到张彭春、华午晴、时子周等人为周恩来捐助路费,他自己就带头捐出十元。^③1917年9月,天津大水灾时,马千里不辞辛劳,组织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师生四十余人前往灾区调查慰问,了解灾情,并以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为联络点,邀请天津社会名流严范孙、林墨卿、崔玉书等人共同发起召开女校联合水灾急赈会,到社会上积极宣传和组织募集赈款,并且发动自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每人义务做棉衣一套以馈赠灾民渡过寒冷的冬季。军阀混战时,他又组织战地医疗队和红十字会医院救护伤兵。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马千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召集红十字董事紧急会商,决定救济日本灾民灾衣一千套,分配给各女校同学去做。马千里不仅是领导者,还是行动者,曾在达仁女校亲自帮忙裁衣。他谆谆教导学生们,要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普通日本国民区分开来,这足以体现出他救世为怀的宗教人道主义精神。^④而这些也正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助人为本精神的充分体现。

在达仁女校因军阀混战而停办后,马千里继任河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继续在教育岗位上忘我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结 语

孙中山曾评价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是“以德育、智育、体育为职务,吸收青年有志之士以陶冶之而造成其完全之人格,此本耶稣救世之苦心行”。^⑤而马千里作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员,深受“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基督教青年会精神的感召,一生奋斗于教育青年成才和服务社会、为国为民的事业中。他曾任教于多所新式学校,为社会培养了许多爱国人才,值得称颂;而他在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



中的敢为天下先,也是值得敬佩的。他人格的高尚,待人的诚恳和敬业节俭、乐于助人的品质也为熟识他的人所铭记。纵观马千里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直在为教育、救国而奔波劳苦,从未有过半刻轻闲,虽屡次受挫却又不屈不挠。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为国而死,死有荣焉。”而他在每一年的年终都寄予来年希望有机会能对社会国家多尽一分责任,^①他这种心系国家和社会、无私忘我的胸怀不仅得益于基督宗教精神的滋养,也是与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宗旨对其青年时代的影响、鞭策分不开的。

在感念马千里辛劳一生的同时,也应该从他培养人才、救国为民的业绩中感受到其精神世界中那些闪光之处:敬业节俭、破旧立新、服务社会、爱国助人和坚强不屈。不可否认,马千里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得到力量,创造出属于他的那些辉煌;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正是由于拥有了马千里这样的社会精英而对天津、乃至中国现代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16~17页。

②刘嘉猷:“良师益友——马千里先生”,《日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1月版,第61页。

③“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17页。

④“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18页。

⑤“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34页。

⑥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宗教资料选



辑》(第一辑),第115页。

⑦《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⑧马翠官:“先父马千里先生为振兴中华战斗的一生”,《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1月版,第15~16页。

⑨“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24页。

⑩“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24~27页。

⑪“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28页。

⑫“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31页。

⑬“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10期),第32页。

⑭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1月版,第89页。

⑮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1月版,第90~91页。

⑯侯杰、秦方:《百年家族——张伯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32页。

⑰侯杰等:《清末民初社会风情——〈醒俗画报〉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7页。

⑱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



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89、91、93 页。

⑩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94~95 页。

⑪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125 页。

⑫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126 页。

⑬王振华:“纪念天津达仁女子小学马千里校长百年诞辰”,《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68~69 页。

⑭汪桂年:“‘高山仰止’——怀念吾师马千里先生”,《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75 页。

⑮“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 10 期),第 20 页。

⑯“马千里先生年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 10 期),第 37 页。

⑰郭凤歧主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第 1413 页。

⑱马翠官:“马千里先生日记摘抄”,《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 1885~198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年 1 月版,第 130 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从梅贻琦略述天津青年会 对近代中国教育的贡献

李 钊

当代学者葛兆光教授曾写道：“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性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①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一直也有类似于思想史研究的纰漏——特别注意人物的成型的思想表达与“宏大的事业”，常常忽略历史人物那些“底色和基石”性的东西。而这些相对更为潜隐的因素，其实才真正起着实际作用。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②是一位重要人物。这位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著称的清华校长，自1931年接掌清华之后，便为将清华发展成赢得“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盛誉的著名学府而不懈努力。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梅贻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深刻地影响了其道德品格、做事作风、教育理念与人生旨趣，甚至连其教育思想最核心的“通才教育”观，也隐约透露出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子：要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知类通达”的训练，为的是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的任务，而“新民”的任务即为“化民成俗，改造社会”。^③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即为书写梅贻琦宏大历史背后的文化底色。



一、梅贻琦的生命历程从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

梅贻琦的青少年时代正逢近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天津固有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处在不断的嬗变之中。1904年，15岁的梅贻琦进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南开中学的前身）学习，奠定了梅贻琦日后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南开中学的恩师张伯苓的言传身教，也给梅贻琦以深刻的影响。1908年，作为私立第一中学堂的首届学生，梅贻琦毕业了。^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张伯苓、梅贻琦师徒二人后来同为基督徒，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共事，同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堪称一段佳话。

1910年，接受了多年新式教育的梅贻琦，成为“庚款留美”的首批受益者，10月赴美，在吴斯特工业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⑤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基督教。根据曾经与梅贻琦在吴斯特工业学院的同班、同组、同住一室多年的同学杨锡仁之回忆：梅贻琦在校期间学业成绩优良，热心参加该校“世界会组织”，性极温良，并且笃信基督教。杨锡仁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梅很少错过周日的礼拜。有时，我们同马歇尔一家去协会的教堂；有时，我会在星期日和周去邻近的波士顿参加1910级同学会，他则和张彭春一起去南吴斯特作礼拜。1913年春天，梅、张和我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组织。”^⑥由此可见，留学美国期间，梅贻琦不仅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组织。1914年夏，梅贻琦从吴斯特工业学院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

然而，对于梅贻琦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其归国之后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的经历。



1915年秋,梅贻琦返抵津门,旋即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服务。根据1919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原始资料记载,1914年“10月本会聘梅贻琦、刘鉴堂为干事”。^⑦直到1915年9月应母校清华之聘征回校任教,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一职将近一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梅贻琦历时一年的锻炼,不仅是借服务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来报乡土之恩,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服务社会的经验,坚定了信念,影响了他一生的抉择。据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回忆,“月涵回国后,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那时的总干事是美国人”,^⑧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干事为组织、开展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很多贡献。

查阅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原始档案,不难发现在梅贻琦的任期内:

1914年

该会出现了第一张乒乓球台(当时称“桌球”);

秋,艾迪来津,在广东会馆演说;

绅商学界入查经班者1300余人;

是年,购得新会所对面的崇仁馆,遂即增设了基督教青年会职工部;在崇仁宫内开办民国义务学校一所,由会员数人担任教授,由协会代请陈敏修先生为智育科主任,宁约翰先生为学校部主任干事,饶伯森先生为童子部主任干事;

本会口校改名育才学校;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又联合天津、唐山、保定以及河南、山西省的一些学校,举行了第二届华北运动会。^⑨

1915年

1月22日,本会组织天津学校第二次辩论会,有北洋法政、高等工业、新学书院、交通、水产、德华、南开和官立中学等学校参加;

2月28日,本会发起,由本学期开始组织各校篮球比赛;



3月19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务杂志》创刊,该刊为周刊,每星期五出版;

7月15日,本会组织北戴河夏令息游会,严范孙、张子安、孙子文、陈芝琴等参加;

8月,本会实业学校扩充正课一班,预科二班;

9月9日,本会童子英文晚课开班。^⑩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秋,基督教青年会特别邀请美国基督教布道家艾迪来中国各地举行布道大会。^⑪艾迪抵达天津之后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说,大力宣传美国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神学家饶兴伯的思想。他对中国青年说:“我们的事业不单单在乎赢得或改变个人,而是在乎使整个的生活灵性化。”^⑫这些思想主张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如吴耀宗、潘光旦等人产生过很大影响,当然也包括作为这次演讲活动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梅贻琦。

更为重要的是,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的这一年,还成就了他一生美满的婚姻。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职时,韩咏华小姐已经从“幼师毕业,任教于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儿园,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找梅月涵联系,也曾邀请梅先生来女青年会演讲,并劝他妹妹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这才正式与他相识”。^⑬韩咏华是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重要人物,非常活跃。在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了解不断增强,感情日深。而随着双方感情的加深,他们对于天津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活动更加投入。因此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了梅氏伉俪的月下老人,并使他们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梅贻琦、韩咏华二人于1918年订婚,婚礼在北京城东基督教青年会由牧师主持。这样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提出批评,因为韩家的哥哥姐姐都是采用传统方式缔结婚姻的。^⑭这样的婚礼及其引起的某些争议,也正好成为基督教青年会改良社会风俗、引领时尚的一



个例证。

与梅贻琦同时代的很多人都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着某种联系,而在他所交往社会的网络中,很多人,包括青年人也都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而结缘。梅贻琦本人不懈地追求着基督教青年会“所陶冶者,则无限之青年”^⑩的理想,还有很多生动的实例。1923年梅先生赴美考察时,就曾影响孟治博士的就业选择。孟治与梅贻琦之间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孟治在清华上中等科四年级时,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服务团。在美国留学即将毕业时,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已经有了四个年头。孟治在《梅校长对于一个学生的影响》一文中写道:“我向梅先生请教,梅先生说‘stick-to-it,作出成绩来!’我那年决定后,一直锲而不舍地贯彻了梅先生的教诲三十多年。”^⑪坚持不懈的基督精神其实也贯穿于梅贻琦的一生之中。

透过梅贻琦的基督教青年会背景和基督徒身份,我们更容易发现梅贻琦的闪光之处。他一生都恪守着基督徒的精神——寡言慎行、自律甚严、忍耐宽容、诚实,奋力前行。对他来说,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从事哪些工作,仅仅是场域的转换,丝毫不影响他弘扬基督教青年会的精神。

二、梅贻琦弘扬的基督教青年会精神

梅贻琦一生的最大“杰作”,则非清华莫属。自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之后,梅贻琦与清华之间的“血缘”关系便从此开始。在半个多世纪里,梅贻琦将清华从一个学术地位不高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著名学府之一。其间,既经历了三十年代的“黄金时期”,群贤毕集,又有抗战八年西南联大时代的弦歌不辍,更经历了台湾新竹的清华时期。梅贻琦尝自省:“以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



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①

这位有着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经历的校长把“德、智、体、群”带入了清华大学的发展历程之中，这尤其体现在梅贻琦执教清华大学初期。梅贻琦在清华一方面积极弘扬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的精神，成功地走出了“三赶校长”的困境；另一方面，梅贻琦得以将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社会”精神实践继续下去。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清华成功的体育教育和童子军团练。

1948年以前，清华一直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体育大校”。它不仅是全国及少数把体育列为正课的高等学校之一，而且从体育设施、师资配备、人才造就、教学和测验制度以及体育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对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中间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长期担任清华体育部主任的马约翰，一个便是校长梅贻琦。他们二人除了具有相同的信仰基督教宗教的背景之外，还有共同的理念，因此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地发展着清华体育事业。

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只有清华的体育课是普遍（四年）必修课，且明文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②学校的档案中至今还存有严格体育达标的记录：“本校体育部基于上述目的（提倡学生吃苦耐劳），自前年起，于上体育课时，加授一英里之长程跑，跑时之快慢，按个人力气大小随意进行，以跑完全程为止。”^③

1935年，清华大学拥有二个足球场、十二个篮球场、一个角力场、二个溜冰场，一个带四百米跑道的大运动场，有各种运动器械，其规模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可以与发达国家同一类型的高等学府相媲美。这期间清华经常举行班际或校际体育比赛，召开全校性的运动会。梅贻琦经常到操场观看和参加体育活动，有时“还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们一起练习比赛，他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④



他认为鼓励学生广泛参与体育锻炼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普及体育精神的良策:“吾国提倡体育,近二十年,所以尚离普及甚远者,……个人禀赋不同、环境不同,因上述原因,故不能强人人以能代表某团体向外比赛为惟一促进体育之方法,……故本校体育部,极力鼓励学生各人对于自己比赛,但有进益,即嘉勉之。……久之养成人人能比赛,随时随事是比赛,则普及目的自达矣。”^④而对于体育的提倡无疑与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接受的“国人改造”思想有关,“心灵附乎身体,斯身体与心灵有密切之关系。中华上人失之文弱者居多,谅由体育素未讲求也”。^⑤

在梅贻琦和基督教青年会看来,体育运动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办法,所谓高尚人格就是“群育观念”、“团体精神”等品格。“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借此养成团体合作的精神。……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⑥本着这样富有特色的基督教青年会精神的思想,清华大学体育部确定“从事运动者,道德为重,精神尚次之”^⑦的基本宗旨。这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树立自身形象时提出的“时讲体育各法,振刷青年之精神;时开德育宣讲,辅助青年之品行,救正青年人心,固结中国团体,其功岂浅鲜哉”^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约翰、潘光旦^⑨、吴泽霖等人在纪念和回忆性的文章里都念念不忘梅贻琦担任童子军教练的经历。“梅先生当时的对于体育非常热心,他在教课之外还担任童子军教练,国内童子军事业清华算是首创的了。”^⑩“梅先生与一些年轻教师王文显、林语堂、巢昆霖等都相应参加充当中队长,与学生共同操练,并不时同他们远足旅行或宿营,在这些破费时间的活动中,梅先生始终认真负责,我当时就是他那个中队的队员。”^⑪这种源于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带有半军事性质,注重训练青年人长途跋涉、野外生存的能力,童子军组织被引入清华无外乎锻炼青年学生耐力、意志力和团队精神。而这些也体现



着早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提出的锻炼青年“知、交、名、勇”^②的理念。

无论是开展体育活动,还是组织童子军训练,作为梅贻琦实践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归结于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群育”观。而这个思想则完完全全来自于基督教青年会的理念和精神。在他看来,群育是文明青年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通也”。^③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的最初因由和旗号就是为了养成国人“合群”的习惯,“中国仍似是而非、若存若亡者,无他,人心涣散,群学不讲,不能固结团体故也。……居今日而讲群学,其惟自小群以成大群欤。此天津青年会所山起也”。^④

事实上,梅贻琦能够继续顺利地实践自己带有基督宗教色彩的教育思想,与当时清华大学的基督教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20世纪前期,基督教青年会在清华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时在校的美国教师、中国教师多具有基督徒的身份。学生中也有些是虔诚的信徒,吃饭睡觉,按例需祷告一次。清华学校的校长、教务长,要能在清华待得长,除了留美这个条件(后期又加上是否是清华毕业的条件)之外,是否基督徒也很重要。^⑤

清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会员二百人,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归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直接领导。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许多课外的“查经班”。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聚读一两次,读英文圣经,学生是自愿参加的,一些中外教师被聘请来担任指导,梅先生也曾接受邀请指导一个班。吴泽霖和潘光旦都回忆说曾参加过他的班。^⑥

可见,梅贻琦、清华与基督教青年会都有着渊源的关系。在清华园,梅贻琦仍然秉持着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的理念,对于中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梅贻琦的基督教青年会理念

关于梅贻琦,学者们往往关注的是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并展开论述,常常忽略了梅贻琦教育言论知识性表达的背后,有着特殊的信仰经验。这种“底色”的东西,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的背景与基督徒身份。因此,在学者们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鲜有对其宗教思想与活动的直接表述,偶尔会见到师友门生故人对其基督徒品格的赞赏性文字。

人们在描述梅贻琦的时候使用最多的文字,除了“儒者”之外,便是“无我”和“忍耐”：“他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不用宣传什么小我大我的,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于朋友尤其对于学生、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③1}“无论坚持或犹豫,梅先生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为了要实现他的理想,他养成了一个无‘我’的人格,他淡泊谦恭、不求名利的作风就是这样一个人格的表现。”^{③2}“他兼教育部长,乃秉承忠孝传家,始终其事的儒家精神与基督教徒的修养,明知是一杯苦酒,他也接受了。”^{③3}“忍劳耐怨的精神……一言一行,在是以影响青年的行动和社会的风气。”^{③4}

仅仅依靠时人的评价毕竟不足以说明梅贻琦对基督精神的认识和他对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经验的推广、实践。在笔者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一本前人或许未曾作过解读的、直接体现梅贻琦基督教理念的文本睽违于世——胡貽谷编辑,梅贻琦等记述的《欧游经验谈》,1923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按照清华大学的定章,1921年梅贻琦获公假再度赴美进修一年,获工程硕士学位,1922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回清华。这本书就是梅贻琦、刘湛思、沈隽洪、朱斌、林武煌、胡貽谷六人按照他们游历欧洲的行程,将共同的观察、彼此



所得的感触,每人分别撰写一部分,集结而成的一册性质特殊的游记。但这本游记与普通游记有所不同,梅贻琦等人是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托,详细考察在欧洲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并且还要关注欧洲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情况。尽管作者们书中也说,“不但欧洲各国的政治、民情,就是在欧洲留学的数千中国青年处境怎样我们也觉得极其模糊,无从做有效力的互相提携的工夫”,⁸⁸但是,这本书对于后人了解留学生、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还是不无裨益的。

在游记中,梅贻琦等人共介绍了五个基督教青年会的情况,分别是伦敦青年会所、全英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设在巴黎的留法学生青年会、世界青年会事务所、美国青年会事务所。在介绍全英基督教青年会时,着重评价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卫良佐治以及现任全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耶波氏(Sir Arthur Yapp),指出“他是一位勋爵为人精明强干,但很和气知礼。学生运动总事务所是在一处很清静的地方,……办事人的精神都很好”。⁸⁹这几处笔墨颇值得玩味,作者不仅仅是随意介绍人物,而是着意表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气质”和“精神”,无疑是在揭示基督教青年会健康、向上和服务于人的精神面貌。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梅贻琦等人在欧洲游历的食宿等一般是由欧洲各国基督教青年会负责解决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此行是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要求,所以考察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情况时颇为细心。作者着重介绍了全英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情况:“最近在市外工厂繁荣之区普兰斯笃开办的红三角俱乐部,倒是青年会的一种破天荒事业。他所注意提倡的各种事工,莫不以迎合人生繁殊的需要为惟一目的,它的会员是不分男女一例看待,会所内举行的运动、演讲、影戏、跳舞、音乐等都是活泼而有深意,能使庄重有礼贯彻于浓厚的兴味之中,所以我们去参看了以后,便得了一种良好的印



象。以为他的计划和程序是健全无害的。至于他为会员擘画讨论的问题,如工业问题、社会主义、美术问题,或箫伯纳(加尔韦塞等名人名著),不是对人生的需求便是专学学理的研究。……在试办之中正颇得一般的重视和赞许,预料他必能日益发达呢。”¹¹³羡慕和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着意重彩描绘基督教青年会的健康、时尚的活动,使人自然而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固是邦青年会兴盛,则国势亦必因以兴盛。……故欧美诸邦青年会所林立,举国皆视为要图者,职是故也。”¹¹⁴这一方面是为了介绍给国内的同仁,一方面也是向读者宣传基督教青年会的丰富多彩。这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成立之初的做法非常相像,是在树立基督教青年会的现代形象。作者提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设在巴黎的留法学生青年会,“虽在新创之初,办事多有困难,但学生在实际上,正大得帮助,凡明达的人,都该作他的援助,使他的实力扩充,为留法以至留学全欧的中国学生,做有力的保障,这才真正是国际的幸福呀。”¹¹⁵

这部尘封清华大学图书馆多年的珍贵游记,无疑是梅贻琦留下来的,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言自明。

四、梅贻琦为什么选择了基督教青年会?

从确立选题到落笔成文,有个问题一直搅扰着笔者,那就是为什么梅贻琦选择了基督教青年会?梅贻琦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宗教信仰?如果一定要选择基督文化,又为什么一定要加入青年会?为什么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周围的很多人都选择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情理上,一切似乎都能够说得通:梅贻琦,一位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受教于有基督教背景的老师,如张伯苓,接受基督精神;留美学生,更多地接受基督教文化,成为基督徒,加入青年会,似乎是顺理成章。但追问下去,这几个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命题:梅贻琦为



什么选择了基督教青年会？

这要先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近代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历史说起。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正式派遣干事来华，并且帮助中国建立青年会是在 1895 年。这一年正是中国败于日本，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青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积极学习西方为中国的强盛而求索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愿。基督教青年会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这自然吸引了中国青年。后来新政时期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仕途中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心理落差巨大，“疏离感”向不少知识分子袭来。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其冷漠的外表后面，仍藏有一颗忧国爱国之心。^④1911 年以后，有识之士认识到最重要的改革是中国人，破除中华民族心理上的羁绊，基督教青年会提出的精神即为“需要之需要”。“我们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个人修养基督化的人格——一种坚贞不移的，在这生活斗争的过程中能担当得起最严酷的实验的人格，把这班具有这种人格的人集结起来，才是中国民族最坚固的基础”。^⑤1915 年，基督教青年会提出“人格救国”的口号，这些虽然是基督教精神的一种逻辑的延伸，然而却比较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分成了基要派(Fundamentalists)、保守派(Conservatives)、自由派(Liberal Wing)和社会派(Christian Socialization Wing)四类。基督教青年会就属于社会福音派。不可否认，基督教青年会是教育、卫生和福利计划的先锋，所推进的改革是都市现代不可缺少的动力。^⑥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⑦男女青年会则是本着基督的精神，为社会服务，做荣神益人的工作。不仅为城市青年提供了排遣忧郁和空虚的精神文化，而且为有志之士创造了参与改造社会、实践救国理想的机会；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专门学校，



使年轻人在城市社会转型——由封建城乡向近代都市的转变——时期，能够迅速掌握实用的技能与知识，利于其在近代城市的生存与立足。换言之，“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城市改良运动，将人格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⑳

基督教青年会采用了有效的传教策略，与传统的以教堂布道为主的传教方式不同，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通过电影、幻灯等现代声光技术、体育活动和社会服务等手段吸引青年，使后者因受基督教精神的感化而自愿信教。^㉑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公民教育、社会服务和学生运动等事业，即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而培养模范公民。^㉒

另外，诚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李提摩太秉承的是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而来会理采用的是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走上层路线，介入中国社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使其在中国的事业更加顺利，这是社会福音派传教士的策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人物王正廷在给穆德的一封信中就坦言：现在我们很容易为基督教青年会集资，因为各部的领导都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学，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他们求助。^㉓同时基督教青年会也鼓励中国干事投入政治，提出“拒绝对政治感兴趣是荒唐的……基督徒必须对政治和国家问题感兴趣”。^㉔基督教青年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这些可以说明为什么 20 世纪初一批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基督教青年会。一方面，基督教青年会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适应需求的空间和条件，以实现他们服务社会、拯救民族危机和摆脱自身困境等长期、短期的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成为一种象征和标识，以开展演讲和各类活动引入全新的观念。在梅贻琦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婚礼完全是一种冲破世俗的公共事件。乒乓球、篮球、电影、幻灯、新式学制……这些事物的出现可能在当时会带来闪亮登场的“震撼”。“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已然变成了“时尚”的另一个称谓。这就无怪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



现较大的发展。

注 释：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②梅贻琦(1889-1962)，男，汉族，字月涵。天津人。著名教育家，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③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④侯杰、秦方：《百年家族张伯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⑤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⑥S. Z. Yang, Dr. *YI - CHI ME In Worcester' Tech*, 《清华校友通讯》第2期, 1910年。原文如下: As a devout Christian, Mei seldom missed church on Sundays. Sometimes, we went to the Union Church with the Marshall family; at other times, he would join P. C. Chang to worship together in South Worcester while I would go off to nearby Boston to spend Sunday with other members of class 1910, including the Late Z. Y. Chow. In the summer of 1913, Mei, Chang and I together attended the Y. M. C. A. conference in Northfield, Mass.

⑦《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报告》(1919年)

⑧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报告》(1919年)。

⑩《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版。

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⑫江文汉：“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先知”，《回忆吴耀宗先



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第37页。

⑬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⑭韩咏华：“我与梅贻琦”，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⑮“劝捐还言(本埠青年会报告)”，《大公报》，1909年11月8日。

⑯孟治：“梅校长对于一个学生的影响”，《清华校友通讯》第2期，1919年。

⑰“抗战中之清华二续”，《清华校友通讯》第七卷第1期，1941年5月。

⑱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⑲《清华副刊》第39卷第7期，《二十周年纪念特号》，1933年4月29日。

⑳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㉑“二十周年纪念特号”，《清华副刊》第39卷第7期，1933年4月29日。

㉒“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7日。

㉓《清华大学校刊》第612号，1934年11月12日。

㉔《清华副刊》第39卷第7期，《二十周年纪念特号》，1933年4月29日。

㉕“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㉖参见潘光旦：“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清华校友通讯》第9期，1940年第6卷。

㉗马约翰：“梅校长任教母校二十五年经过述要”，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㉘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⑳“青年会之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16日。

㉑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㉒“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㉓清华大学小时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㉔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㉕叶公超：“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传记文学》第6期。

㉖樊际昌：“梅先生的无我精神”，《校长梅贻琦先生六十寿辰纪念文集》，出版地不详，出版时间不详，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㉗赵废□：《梅贻琦传稿》，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年版，第480页。

㉘张静愚：“怀念梅校长月涵先生”，《清华校友通讯》第2期，1919年。

㉙胡貽谷编辑，梅贻琦等记述：《欧游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出版，第2页。

㉚胡貽谷编辑，梅贻琦等记述：《欧游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出版，第42页。

㉛胡貽谷编辑，梅贻琦等记述：《欧游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出版，第43页。

㉜“天津青年会会友启事”，《大公报》，1909年12月1日。

㉝胡貽谷编辑，梅贻琦等记述：《欧游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23年出版，第59页。

㉞王成勉：“余日章与公民教育运动”，《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4年版。

㉟袁访贇：《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第48页。余日章又说：“救中国不可不明其实原因，真原因不在政之不良，而在国民



人心之不良，自救中国，非从解决国民问题，挽数人心不为功；挽救人心，必须依赖耶稣基督。”同上，第 51 页。

④ Shirley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 1895 – 192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⑤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6 页。

⑥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城市改良》，王旭、黄柯可编著：《城市社会的变迁》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⑦ 吴梓明、吴晓新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第一届国际年轻学者讨论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2003 年版，第 424 页。

⑧ Keller, Charles Andrew. *Making Model Citizens: The Chinese YMCA, Social A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17 – 1937*.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6, Ph.D Dissertation).

⑨ See, Shirley G. Garre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 (1895 – 192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19.

⑩ See, Risedorph, Kimberly Ann: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 – 1935*,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P259.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早期天津青年会的总干事略

刘桂芳

189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城市青年会发轫于天津，到今年天津青年会历经沧桑地走过了110个春秋。其创办人米会理先生，也是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委办第一任总干事，1898年格林来津担任天津青年会第二任总干事，为天津青年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总干事人选多有更迭、交替。在早期，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909年，才有了以张伯苓、王后斋等九人组成的第一届华人董事会，接理会务。1923年王化浩成为该会第一任华人总干事。

近代中国，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期，作为天津青年会总干事和中外领导层人士襄协鼎力，为天津乃至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天津青年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成就了天津青年会的辉煌历史。

多年来，在研究、介绍天津青年会的著述和文章中，对该会领导者的情况交代阙如。笔者翻检、辑录新旧文献，就解放前历届天津青年会总干事事迹加以整理，撰为此文，供相关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做以参考。

在迎接天津青年会1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奉献，以示纪念。



一、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 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

来会理(D. Willard Lyon):(1870~1949)美国人。中国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和全国协会第一任总干事。出生于杭州,后回美国学习。

1895年10月5日,受北美协会派遣,25岁的来会理携夫人来华,寻觅适合建立青年会的地点。在他来华之前,北京、上海、武汉、烟台等城市的传教士曾致信邀请过他,一个月内,他先后走访了这些地区。在他还没有到达天津之前,又接到了天津方面的邀请信,经过反复考虑比较,他选择了中国政府推行新教育的基地——天津作为发展青年会的工作地点。11月8日在他写给北美总干事莫尔的信中,陈述了六条理由,大致为:天津方面更为迫切;北洋医学堂、北洋大学堂内有一些基督徒学生组成的“文学会”,会员会讲英语,可以在这些学生中做些紧急的工作;天津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在这些学生中提倡青年会,就是对“新中国未来的伟人做些感化工作,其影响最大,自可不言而喻”;天津为华北布道的推广区域,交通便利,凡来华北的传教士大都经过天津,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接触交流,便于发展青年会事业。11月中下旬,来会理和夫人来到天津,12月1日,参加了由医学堂教授安德培(B. C. Atterbery)组织召开的由百余名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会上来会理发表了演讲,对青年会的宗旨、事工情况作了详细的阐述。会议决定立刻在天津建立青年会。12月8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天津青年会成立后,就积极开展活动,如辩论会、篮球运动等,以一种新的时尚吸引了不少青年人参加。12月15日在会所草场的围墙后举行了一场篮球赛,标志着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开端。针对中



国学校学生体育运动项目的缺陷,来会理请求北美协会派体育干事来华工作。为解决会所问题,他在会员中首次发起募捐活动,得银数百两,购得北洋大学附近一块地。1896年4月,美国富豪戴乐尔夫人来津,来会理为她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夫人捐助美金万元用于建筑青年会会所之用。第二年,天津(也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个会所正式落成,名为“戴乐尔大楼”(Living Stone Taylor Memorial Building)。

同时,来会理着手天津青年会的组织工作,首先广征西方传教士及侨商,襄理其事。1896年7月10日,来会理主持召开了天津青年会第一次董事会,确立了第一任董事人选,他本人当选为第一届董事部董事和秘书。

8月,北美协会学生干事兼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John. R. Mott)来华,来会理陪同他在华游历宣传了三个月,与各地教会和学校广泛接触,颇有影响,各地纷纷建立青年会。同年11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会议决议成立“总委办会”(即全国协会的前身),推举来会理为首任总干事。

已身负全国范围内拓展青年会工作的来会理,对亲手创办的天津青年会仍十分关注,看到天津青年会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他认为必须“要抓住时机发展的重要性”。1897年2月致函北美协会要求派遣一个总干事来天津,以便“把这个工区尽量发展”。他说:天津在新教育界中既居领袖的地位,若能在天津办一个强有力的青年会,那么,此后在国内其他各处的官立学校内办青年会就要容易得多。“天津是解决青年会在官立学校内设立青年会这一问题之钥匙”;天津商界中有许多会讲英语,除了青年会外,没有别的团体注意他们,而他们“在全国青年中试诱最大”;此外,天津青年会所优美,地点适中,便于与其他地方接触,“足以发展大规模的工作与进步事业”,“这是国内其他青年会所不及的”。因此,他认为“天津是值得每个有资格的



人才来为它服务的”。故 1898 年 4 月北美协会派格林到天津担任总干事职务。来会理则专职中国学塾青年会总干事,至此,结束了他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天津青年会的工作。

来会理作为中国城市青年会创始人和全国协会的第一任总干事,对中国青年会的设计,和对以后的青年会工作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4 年退休回国,著有《在华新教差会史略》、《中国的福音教化》等书。

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二任总干事格林

格林(R. R. Gailey):(1870~1948)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1898 来华,继来会理担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起初按着来会理的策划,会务工作进展顺利。但不久庚子事变爆发,青年会大楼被德、日军占用,北洋大学迁到了西沽。这样格林就很难有机会接触所谓“新中国未来的领袖们”,因此“感化中国思想界”的工作受挫。

而对新的形势,格林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天津城厢里边去”,开始做“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在 1901 年第三次全国大会上,格林提及这种实验的重要性,以引起整个青年会的注意。为此他一方面在离城内较近的法租界巴黎道赁得楼房一所,另一方面在城内积极寻觅新会所。由于义和团运动,国人对传教士多有芥蒂,格林遇到不少困难,直到 1903 年才在上海关道唐邵仪的帮助下租到东门里经司胡同一所宅院为会所。

为缓和华人与教会间的敌对情绪,便于在中国官绅、商人、文人中间进行活动。他开始聘用两个中国人仲伟仪和张用川做干事。又邀请洛河神学院毕业的宋愚溪协助工作。同时通过北洋大学总教习丁家立结识了天津知府凌福彭,由凌推荐他与宋愚溪一起到官立中学堂担任英文教师,有机会与城内文人和官僚交往,认识了不少官绅



名士,如严修、高彤阶、刘筑生、陈栢圃诸先生等,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适宜地进行宣传。

1901年格林在本埠官绅的支持下在城内创办了一所普通中学,专门招收士绅及文人的子弟入学,该校1905年立案,这在全国的基督教会中,是惟一的被视为具官立学校资格的学校。也是格林进行“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的据点。另外,他还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演讲会、查经班、夜校等活动,设法引起人们对青年会的兴趣,参加者踊跃,青年会因此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和支持,会务工作顺利进行。

这时期,格林最成功的范例就是对张伯苓的工作,格林与时任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南开中学前身)监督的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相识后,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一人选,相互的关系日渐密切,在他的鼓动下,1909年张伯苓在西沽公理会教堂接受洗礼,此举轰动津门。之后,格林帮助张伯苓去美国留学,获得美国名誉博士,归国后当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本人成为天津青年会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曾担任董事长和多年的董事。青年会在南开中学中也成为最早的一个学生团体。

为引起国人对体育的重视,格林支持青年会传授体育方法,举办球类和田径活动,提倡和联络各校举办运动会。1903年发起举办了由北洋大学堂、官立中学堂、新学书院和高等工业学堂参加的校际运动会,影响深远。后改为全市大中小官私立学校参加的“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为全国之创举。1904年青年会会所出现了天津第一张乒乓球台,为乒乓球引入中国之标志。对天津体育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907年,格林着手北京青年会的筹建工作。1908年离开天津担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可以说在他离开天津时已为天津青年会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工作得已拓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举凡社会服务事业,如放赈、卫生、节俭、家庭幸福、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等运动。天津



青年会工作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离开天津的格林仍心系津沽,1911年到南开中学帮助成立“青年乐群会”,1936年为南开学生讲演,并赠送自藏的天文镜仪器。此外在西山租赁卧佛寺,为两会人士及学生作消夏避暑之所,渐次推广到保定各处。应该说格林对京津两地青年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7年退休回美。

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和神话传说在西方人眼中,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如同巨大的磁铁,吸引着许多年轻人的传教士到华工作。这时期,经北美协会选派,有不少美国干事来津,以加强天津青年会工作,这也是中国青年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一大特点。从1908年春格林辞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后,到30年代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替换比较频繁,先后有饶伯森(G. H. Robertson)、韩慕儒(R. M. Hersey)、郝瑞满(R. S. Hall)、王治平(华清)、宋愚溪、海士(Newton. Hayes)等。

三、190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代理总干事饶伯森

饶伯森(G. H. Robertson):美国人。1905~1906年格林回美休假期间,由饶伯森、韩慕儒主持会务。饶伯森是美国普都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1902年12月和夫人来华,开始在南京作科学讲座试验,曾向参加乡试的举子们进行科学演讲,获得成功。为有针对性,他把入场券有选择的送给官绅、教师和新式学校的学生,并由他们带来了许多未受邀请的学生,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的儿子们。后来他又扩大了科学演讲的范围,包括教育、卫生、农林、实验等项目,还赴欧美收集题材与仪器。

1905年夏饶伯森来津,这时天津已成为袁世凯推行新政、开办新式教育的试验地。饶伯森到天津之后,发现科学讲座深受天津各



界人士的欢迎。于是举办系列性的科学讲座,内容包括医学、电报、航天、蒸汽原理、回旋仪和其他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他还通过现场演示和幻灯片等方式启发听众的科学兴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有时听者达千余人,就连官立学校校长也带领学生们来听讲。他的讲演给识字或不识字的听众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因此对学界及非基督教徒的学生影响日益扩大。饶伯森还应个人团体和官方之邀,为他们修理各种仪器,如帮助军队修理电报设备,为医学堂修理 X 光设备等。同时和中方助手为政府和新式学校培训科学讲演人才,使科学演讲为天津社会民众广泛接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05 年 10 月,饶伯森协助来访的美国大学总教 Parhwarel 在普通学堂作教育演说,会后和张伯苓等陪同总教拜访了严修。同年饶伯森在南开电车公司附近,主持筹办了天津市青年会举办的田径运动会,有 20 多个学校参加,共 12 个竞赛项目,参加者不下五千人,最终普通学堂获得优胜锦标。11 月该会购得法租界巴黎路会所,除办公室和活动室外,其余为宿舍。这里环境幽雅,设备齐全,价格适中,住宿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学生、职员等。宿舍管理严格,为知识界青年人提供了高雅和规律的生活氛围。

这期间,由于对科学和运动的共同兴趣和爱好,饶伯森与张伯苓经常接触,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受张伯苓的邀请,饶伯森在私立第一中学(南开中学前身)担任物理教员。1907 年饶伯森被张伯苓邀请出席了南开中学新校址的落成典礼,并发表讲演。他和张校长又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热心宣传者。1907 年张伯苓就曾向学生们作过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讲演,饶伯森鼓励他们培养参赛选手,并和青年会人士积极筹划组织这一运动会。因此,张伯苓对基督教和青年会的欣然接受,与饶伯森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

后来,饶伯森到全国各地作巡回讲演,所到之处引起轰动。1912 年 3 月饶伯森在南京演讲时,政府内阁人员均赴会,一致表示应该提



倡科学。不久,饶伯森调往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科学讲演普及工作。其新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培养了人们的科学意识和钻研科学的兴趣,其影响不言而喻。

考察饶伯森科学讲座和实际活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方式上都令青年人耳目一新。由于饶伯森讲座的显著成功,使青年会领导人深信科学讲演的重要性,1912年12月第六次全国大会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决定成立“讲演部”。饶伯森任格致部主任。此后,讲演成为青年会的一项常规性智育活动。这是当时在中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饶伯森的讲演模式也成为青年会的样板。

四、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韩慕儒

韩慕儒(R. M. Hersey): 1905年12月由北美协会派到天津,和饶伯森代理休假的格林负责青年会工作。期间,饶伯森不时到外地讲演,不久又去了上海,青年会工作主要由韩慕儒负责。1906年,由该会派曾为天津青年会同宗会员的王正廷和西干事可林顿到东京组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扩大了青年会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1908(见《基督教青年会全国二十五周年第八次大会纪念册》)年春接任格林担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

为适应民族主义的潮流和昭示青年会是中国人自办的团体,这时期,天津青年会改定新章,开始聘请华人董事接理会务,此时董事为张伯苓、刘建侯、王厚斋、朱荃臣、刘铭泉、张佐庭等人。随着天津青年会事业的扩大,原会所已不敷使用,1909年青年会举行募捐会,湖南籍富商欧阳旭德捐银2万两,在东马路购买空地一方,建立青年会会所。1911年春召开了首届华人董事会,商讨建设会所问题。这时期,青年会工作双管齐下,一方面扩建会所,一方面拓展工作,将青



年会的社会影响渗入到文化教育界,特别是官立、私立学校。暑假期间,组织北洋大学堂、医学院堂、南开学校等学生参加的华北基督教青年会西山夏令营活动,内容有查经班、讲演会、择业会和体育运动,培养了学生们的情操和团契精神。1909年和1910年普通中学分别举行首届及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聘请学究傅增湘颁发文凭,引起社会的关注。

为提高人们的体育运动意识,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1908年青年会积极组织网球比赛,并联合私立第一中学校、官立学堂、普通中学堂联合举办第六届田径运动会,有146名运动员参加。会后首次用摄影机放映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片。1911年4月联合北洋学界合办运动大会,北京、通洲、顺德都有运动员参赛,观众达一万五千余人。是年还组织了普通中学堂、南开中学、新学书院、高等工业学校参加的全市首届篮球比赛。1911年秋后韩慕儒回国,由郝瑞满(R. S. Hall)代理天津总干事职。

1912年韩慕儒回津继续担任总干事职。1914年东马路会所落成,内中娱乐、体育、生活等设施齐全,便于开展各种活动,举凡游艺、球赛、讲演、夏令营等活动,以及社会服务事业,如放赈、卫生、节俭、家庭幸福、公民教育、平民教育诸运动,扩大了社会影响。如所举办的足球、乒乓球及台球活动为津门之开端。1914年聘任南开学校首届毕业生,美国英司德大学毕业,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为青年会干事。是年,重订入会规则和组织法,分成人、童子、学校三部,智、体、庶务、文牍四科,规定每年征会员一次,从而完善了青年会的组织结构。为了使会员了解会务情况,1915年3月青年会出版了《会务杂志》创刊号。9月韩慕儒受邀到南开学校演说《社会问题》,连续三天,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后来,其演词连续发表在南开《校风》上。1917年陪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亚洲部干事艾迪(G. S. Eddy)在华作巡回布道演说,不久回国,赴法办理华工青年会事宜。



五、1911年、1917年、1928年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代理总干事郝瑞满

郝瑞满(R. S. Hall): 1907年来津襄助青年会工作,担任官立学校教师,并由张伯苓邀请到私立第一中学任教。曾分别于1911年秋和1917年夏韩慕儒回国期间,代理总干事职。

民国元年,为了从文字上作好宣传,以配合青年会的各项工作,该会主办的杂志《天津青年》半月刊创刊。宗旨为“传达会务,联络会员感情,唤起服务精神,谋求社会改进”。该刊一直连续出版,到40年代易名《会员通讯》。

郝瑞满主持会务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天津青年会均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武昌起义时,该会组织会员参加红十字会,开办教练班,派会员或学员赴前线看护、营救。1917年京畿一带发生大水灾,它与各教会组织基督教水灾赈济会,以该会为总事务处,在河北搭建窝棚,安置灾民八千余人。因成绩显著,得到督办熊秉三的赞扬,并获冯国璋大总统赠匾一方,上题“已溺已饥”。

1919年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五四运动,当时由郝瑞满主持的天津青年会,对天津人民和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支持,并组织学生讲演,多次为市民及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场所,当时一些爱国集会往往以东马路青年会所为集合点,因此得到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的好感。同时对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也是积极提倡,在引进新科学、传播新思潮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与善团联合倡办“拒土会”、“拒毒会”,联合津市政、商界领袖在本会设“欧战协济会”等。

“救国”、“爱民”为时代主题,贯穿在青年会“德、智、体、群”等“四育”之中。该会的工作,得到各界的认同,其社会声望日益提高,亦为



全国青年会所注重。1920年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第八次大会在天津召开,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1271人,盛况空前,是中国青年会历次全国大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此外还经常组织会员开展文娱、体育、救灾捐款活动,首次举办友谊比赛,包括象棋、围棋、蛙棋、跳棋、及乒乓球、跳球等。开办英文夜校,扩充宗教教育,举办德育演说会、卫生教育会等,各项活动引人入胜,如聘请名人讲演,曾先后邀请梁启超作《个性与组织》、《平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与价值》、《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等有价值的演说。1922年6月,驻美公使顾维钧应邀在本会演说,受到热烈欢迎。

1928年郝瑞满再度接任宋愚溪总干事职,同年冬返美。

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华人总干事

王化清(治平)(1878~1964),天津青年会第一任华人总干事。北京人,原籍浙江绍兴。毕业于京师汇文大学堂。曾在山海关、北京等汇文学校任教。1911年北京青年会所建立,任会长,不久赴福建、汉口等处工作。1914年被派到美国纽约州司瑞库司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汇文大学教授。1919年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来津,曾担任青年会总务科干事、宗教事业委办、副总干事。期间,在南开大学任讲师。五四运动时期曾热心支持和参加天津各界进行的爱国运动。1923年出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

王化清任职期间,对会务工作颇尽心力,天津青年会工作稳步进行。1924由该会发起“节俭运动周”,宋则久、林墨青、马千里、王晋生等商学界人士20余名参加。提倡平民教育,又设立平民教育会,开办平民学校4所。为启发学生研究学术起见,该会童子部发行了一种半月刊。为参加同年在河南召开的华北运动会,该会召集南开、



汇文、新学、扶轮、同文等校代表开会，讨论选拔各项选手事宜。为活跃会员生活，该会召开复活节庆祝会、播放电影、举办体育、武术、音乐表演，以及组织会员旅行参观，浏览祖国名胜，陶冶情操。1926年王化清辞职到北京卫理公会任亚斯理堂主任牧师，1930年当选为卫理公会全国大会首任中国会督。30年代退休居京，晚年寓居天津。

七、1926、1931年天津基督教 青年会代理总干事宋愚溪

宋愚溪：通州洛河神学院毕业，庚子事变后，在天津协助格林开展青年会工作，曾担任铃铛阁官立中学教师，是最早为天津青年会服务的中国人。1911年6月赴美留学，1926年继王化清代理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期间会员中组织了联青社、益友会等，对公务工作帮助甚大。1928年春辞代理职，由陈芝琴署理3个月。董事部委派郝瑞满接任，冬郝返美。由杨宽麟任名誉总干事，董守义任执行干事。1929年海士任总干事，宋为副总干事。1931年海士回国，宋愚溪代理一度总干事。进入30年代，国内外形势不靖。西干事逐渐减少，会员缩减，青年会工作处于维持阶段，加上会中出现“经济危机”，诸事繁多，宋愚溪难以应付，1932年乃以年老托词退休。

八、1929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海士

海士(Newton. Hayes)：1927年由上海协会派到天津工作，1929年秋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此时，津门风气大开，青年会公务内容很多，尤其社会服务工作更多。1930年我国西北地区灾情奇重，该会特发起“西北筹赈会”联合各界名人加入委员会，朱庆澜将军为委员长，向各地募捐，得津门民众的支持，在4个月内共募得捐款4万多，



悉数汇及灾区，普济灾黎。同时对会所进行改建，扩充宿舍、修建游泳池，并拟定建一园地，专门为培养青少年人才、发展少年事业之用。

这时期，虽然青年会工作有一定扩大，但随之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北美协会面临经济困难，加上1931年中国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局势日益恶劣，北美协会不得不将美国干事陆续撤回，天津青年会工作受到了影响。1931年冬作为最后一个美国干事的海士托病回国。

九、193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

陈锡三(1897~1967)：1929年和宋愚溪同为天津青年会副总干事，协助海士工作，1932年任青年会总干事。

陈锡三资历浅，文化程度低，没有受过专门学校的教育，只在东马路青年会夜校学习，以勤奋努力，被学校留用，后任校长。1930年为青年会执行干事，又因其精敏能干，得到美国干事和董事会的赏识，1931年被派到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进修，一年后回天津继任总干事职。

陈锡三任职时，会中历年积欠外债甚多，会务工作几乎无以支持。面对困难，陈锡三勤劳不懈，力谋挽救之策，多方筹措，积极联络上层人士，大搞征友募捐运动，争取有钱人参加。在董事部人士和会员的热心支持下，活动轰轰烈烈，一炮打响。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王文典、银行经理卞白眉和黎元洪之女黎绍芬等加盟，更使声势大造。之后，多届征友成功，所得捐款大大超过原定目标。又得陈芝琴慨捐基金万元，会中经费得以解决，工作顺利开展起来，影响逐渐扩大。当时青年会成为青年人以及绅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摆脱传统束缚，接受新思想、丰富新生活、投身社会服务的园地。

抗战前夕，青年会已受到社会各界推崇和赞誉，并得到各界人士



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会员人数口增,对社会服务的范围扩大,内容增多,各部工作及活动有序而精彩。

会员部利用会员余暇时间组织各种小团体及讲习班,如伉俪社、福利社及法律班、医药班、摄影班、书画班、文学研究会、父母会、夏令会等,以及每周六举行全体会员大会或家庭宴会、野外旅行、市内参观等活动,既丰富了会员生活,又适合会员的身心发展,培养了情操。除此尚有卫生运动大会、学术演讲、宗教生活运动、父母教育运动,集团结婚等项。为提高国人体质,本会本着复兴民族,必先强种之旨,除每年组织会员进行各项运动外,经常举办平津埠际球赛、排球赈灾赛、乒乓球公开赛、国际武术表演大会、全市游艇比赛大会,篮球观摩会。1934年本会发起天津首届万国自行车赛,陈宝泉和张伯苓、邓庆澜分任名誉会长和副会长。此外开办各类体育班,培养了许多体育人才,津门体育一时享誉国内外。

这个时期,该会积极联络会员及各界热心人士办理各种社会服务事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大批难民拥向本市,本会联合各教会成立基督教救济会,在东局子设窝棚收容难民。长城抗战中,又组织伤兵服务团,协助救治抗日受伤将士,受到各界的称赞。1935年黄河决口,联系各界发起水灾救济会,在本会设会所,先后募得捐款20万,分汇灾区,颇得社会人士的好评。为提倡老百姓购买国货,1933年10月本会举办了“提倡国货大会”,由陈锡三为副会长,在崇仁宫开辟陈列室及售卖处,并在会所内举办演讲,平均每口参观者达万余人,一定意义上来说,对唤起民众的国货意识有着积极的作用。为了反对奢华,提倡节俭,1934年由天津青年会提倡举办首届集团结婚,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引导青年学生深切了解治学之法,以及提倡普通社会对学术的重视,1935年3月2日至8日在本会礼堂举行学术讲演周,除请本市学者南大教授何廉博士、李适生教授、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法学



专家赵鉴堂外,还聘请北京清华大学潘光旦、北大校长蒋梦麟等来津逐口讲演,听者异常踊跃,其中大多为高中以上的青年学生。此外又有科学运动周,包括科学演讲、组织参观展览、并借《大公报》16版发行“天津青年会科学运动周特刊”,以广播科学知识。可以说抗战前夕,在陈锡三任总干事这段时间,天津青年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1936年夏,在上海协会和北美协会的资助下,陈锡三被派到加拿大留学一年。1937年天津沦陷时,陈锡三回到天津,为应付时局的变化,采取“裁员减薪”的紧急措施,把青年会干事、职员和工友,从227人减至7人,以维持会中事务。工作对象和范围缩小,主要是在会员内部进行。1941年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被日军查封,面对形势,他感到棘手,1942年8月应东亚毛纺公司总经理宋□卿之聘请,辞去总干事职,到该厂担任副经理。

十、1943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杨肖彭

杨肖彭:(1906~1987)河北胜芳人,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青年会工作,其才干深得青年会干事的赏识,1934年受陈锡三聘用,担任天津青年会少年部主任干事兼英文秘书,从此在天津青年会工作,奉献了一生精力。

初期,杨肖彭负责少年部的青光、四育养成团等一些团体,经常开展一些文体活动。他思想灵活,富有创新精神,各项活动力求新颖别致,讲求实效,是天津“集体结婚”这一新风尚的首创者。又鉴于天津是个工商业城市,一些人的科学知识贫乏,于是他在青年会屋顶开了一个中秋赏月会,请教师讲解关于月亮的神话,以及宇宙知识等,令参加者兴趣盎然。

1935年天津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陈锡三着手准备出



国,杨肖彭承担了青年会的诸多工作,并代总干事参加联青社的活动。工作中显示了其非凡的工作能力,先后举办学术讲演周,由张伯苓主持,曾邀请蒋梦麟、熊佛西、陈同哲等名人演讲。杨本人也写文章宣传青年会工作,发表在中英文报刊上,并负责出版了《天津青年会四十年纪念册》,对于研究天津青年会很有史料价值。1935年和1936年主持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烟台和威海卫夏令营活动,给青年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陈锡三留学国外期间,天津青年会的工作多由杨主持。1936年冬代表青年会参加长城抗战慰问活动,为战士们拍照和放映《秋瑾》等进步影片。因慰问宣传活动搞得好,受到傅作仪将军的款谢。

青年会的歌咏活动是1936年由杨肖彭和刘良模合作开展起来的,后逐渐趋于正规。1945年成立了百人合唱团,其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合唱,每每演出获得成功,通过演出募集的捐款,不仅救济了贫民,而且活跃和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为天津培养了众多的音乐人才,在天津传为佳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天津青年会在东马路的会所大楼查封,时任总干事的陈锡三无计可施,杨肖彭担起与敌伪交涉的重任,通过八个月的多方奔走,终获得启封,这是他对青年会立下的一大功。

1942年8月,陈锡三辞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职,阮渭泾代理,后由杨肖彭代理总干事,维持会中工作。

1943年杨肖彭任总干事,为解决经济困难,他在“联青社”发行债券,购买楼房出租,把礼堂作为讲道、讲学和市民结婚礼堂之用;临街开设文具店、理发店;体育馆举办球赛等,这种方式适合近代经营模式,既充裕了青年会的活动基金,又活跃了会务。此外,组织工商界名流参加“联青社”,资助会中工作,如举办贫民学校、补习班、组织拾球失学儿童学校、施诊所等公益事业,扩大了青年会的声誉。为蒙



蔽敌伪耳目,1943年将本会出版的《天津青年》,改名为《会员通讯》,内容贴近生活。该编辑部还出版了《万丈高楼从地起》一书,该书由杨肖彭作序,收入了他的《我们的社会使命》一文。另外,他还将青年会英文德育讲演会上的讲稿汇集为《英文讲演集》出版。

由于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政策,人们的思想遭到禁锢,文化活动沉寂,杨肖彭和青年会排除外界干扰,在艰苦的形势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召开时事讲演会、音乐会、儿童健美比赛、征友大会,举办夏令营、卫生周,成立武术班、以及兴趣团体摄影、口琴、法律常识等。还和青年会的周乃森、张肖虎等音乐爱好者组成合唱团,举办各种音乐活动,有时也邀请平、津有名的歌唱家参加演出,深受群众欢迎。使青年会成为培养津门音乐之殿,给死气沉沉的天津文化界带来了生气。他们还组织学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救救中国》、《大路》等歌曲,以灌输抗日思想,激发青年人的抗日热情。

此外,杨肖彭还冒着日伪强化治安的危险,和刘良模搜集日本人毒害中国人的罪证,偷拍日本人贩卖烟具和开妓院的照片。

抗战胜利后,杨肖彭参加了接收敌伪产业委员会工作,曾帮助母校南开学校的复校做了许多工作,得到南开人士的称赞。1947年杨肖彭受在青年会北美协会的资助赴美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院学习。1948年7月回到天津,受郭德隆邀请,代理结核医院院长。

解放后,杨肖彭接受我党的领导,1950年到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首先倡导“三自教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三自爱国道路,天津青年会工作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1958年杨将东马路会所交给天津市青年联合会,改为天津市青年科学技术宫(后少年宫)。1960年天津青年会停止活动,杨肖彭从事天津青年会会史的撰写工作,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天津青年会留下了珍贵史料。1981年青年会恢复活动,天津青年会在杨肖彭总干事



的主持下,为天津市的改革开放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期间,杨肖彭曾兼任天津青联副主席、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名誉主席、市人大常委会等职,1987年病逝。

附: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干事及职员一览

1895年12月

工作人员

会长卡森斯(Edmund. Cousins)、副会长孙望(Wang. Hsun)、书记沈望(Wang. Shen)、司库庞崇文(Chung. Wen. Pang)、总干事米会理(D. Willard. Lyon)

1896年7月

第一届董事会

董事长美以美会白雅各(James. H. Pyke)、董事:英国伦敦会赫立德(Lavington Hart)、美国公理会安德文(E. E. Aiken)、合众教会安指南(A. S. Ammand)、伯利小礼拜堂伍约翰(John. Wood. berry)、秘书米会理

1898年

总干事:格林(R. R. Gailey)

1903年

总干事:格林

华干事:仲伟仪、张用川(Y. J. Chang)

1905年

代理总干事:饶伯森(G. H. Robertson)、韩慕儒(R. M. Hersey)

西干事:贺嘉立、柯和璧

1908年

总干事:韩慕儒

1909年

第一届华人董事会——为中国人主持青年会之始



张伯苓、刘建侯、王厚斋、朱荃臣、刘铭泉、张佐庭、夏松藩、曾伺忱、全绍清

总干事：韩慕儒

1912年

(1911年秋——1912年秋)代理总干事郝瑞满(R.S.Hall)

西干事：国履善、魏德谟

华干事：仲子凤、沈子实、瑞麟甫、贾次山

秋，总干事韩慕儒

1917年

夏，代理总干事郝瑞满

1920年

董事部：张伯苓(会正)、王晋生(副会正)、陈芝琴(司库)、戴练江(书记)、朱季柳、王厚斋、宋则久、王右丞、雍剑秋、吴清泰、陈宝禾、卞倬成

宗教事业部委办：陈宝禾、何铭周、雷舜生、李安素、王崇光、王佩明、杨醒愚

成人部委办：宋则久、阮渭涇、俞蔼青、何铭周、瞿允卿

智育科委办：卞倬成、凌冰、唐宝桐、梁文兴

学校部委办：戴练江、杨学羔、王见心、章辑五、史译宣、崔恩华

体育科委办：朱季柳、方安圃、钟桂丹、郭梦楼、章元善

童子部委办：钱博泉、王明甫、王晋生、孙继丁、侯学成

编辑科委办：王右丞、胡英甫、戴练江、余口宣、李道南

庶务科委办：吴清泰、王晋生、章元善

经济科委办：陈芝琴、聂管臣、雍剑秋、卞倬成、王厚斋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韩慕儒(见《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



总务科：韩慕儒、王治平、郝瑞满

宗教事业委办：王治平

成人部委办：宋愚溪、杨立民、贾连山、王墨樵

智育科委办：陈敏修、张锡鸿、陈锡三

学校部委办：宁约翰、林仁旺、纪树屏、关叔和、刘明义

体育部科办：罗克礼、吴国模、董守义

童子部委办：饶伯森、陈学敬、张濯泉、张玉星、徐子明

编辑科委办：仲子凤、张晓斋

庶务科：沈子实、李智泉、么绍庭、蓝恩天、瑞麟甫

经济委办：韩慕儒、仲子凤、郝瑞满、王治平

1922年

董事部：张伯苓(会长)、王厚斋(副会长)、王晋生(书记)、陈芝琴(会计)、雍剑秋、王右丞、聂管臣、卞倬成、朱季柳、乔锦堂、王恭宽、王崇光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郝瑞满、副总干事王治平、顾问干事韩慕儒

成人部：宋愚溪(主任)、杨幼遽、王福昌

智育科：张溪鸿(主任)、陈锡三

学校部：蓝恩天(主任)、刘明义

体育科：董守义(主任)、蓝恩天、李友珍、罗克礼

童子部：饶伯森(主任)、陈学敬、张玉星、王寅生、王寿昌、蔡景琳

庶务科：沈子实(主任)、瑞麟甫、高丹忱、郭凤翔

职工部：侯感恩(主任)、傅清淮

社会服务团：李燕豪

1923年

董事部：张伯苓(会长)、王晋生(书记)、陈芝琴(会计)、雍剑秋、王右丞、聂管臣、卞倬成、朱季柳、乔锦堂、王崇光、钱博泉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王治平

顾问总干事：韩慕儒

成人部：宋愚溪(主任)、杨幼遽、王福昌

智育科：张溪鸿(主任)、陈锡三

学校部：蓝恩天(主任)、刘明义

体育科：董守义(主任)、蓝恩天、李友珍、罗克礼

童子部：饶伯森(主任)、王寿昌、张玉星、王寅生

庶务科：沈子实(主任)、瑞麟甫、高丹忱、郭凤翔

职工部：傅清之(主任)吕庆瑞

1926年

代理总干事宋愚溪、副总干事郝瑞满、执行干事董守义

1928年

春，署理总干事陈芝琴，三个月后由郝瑞满代理总干事

冬，名誉总干事杨宽麟、执行干事董守义

1929年

秋，总干事海士(Newton Hayes)，副总干事宋愚溪、陈锡三

1930年

董事部：杨锦魁(会长)、阮渭涇(副会长)、王晋生(司库)、奚东曙(书记)、雍剑秋、张伯苓、陈芝琴、金伯平、周贤颂、张周新、张子翔、周瑞山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海士

副总干事兼会员部主任：宋愚溪

副总干事兼执行干事智育部主任：陈锡三

体育部主任：李友珍

庶务会计科主任：钟嗣庭



文牍科主任：李亦青

少年部主任：王子英

智育部：岳世坤

会员部：王锡昌

事务科：毛骏民、邵金榜、励国勋

体育部：胡永福、吴世昌

少年部：马学桐

各部委员

智育部委员：奚东曙、张季高、杜芝良、丁鹤年、张建新、王晋生、
金峻轩

体育部委员：杨锦魁、陶少甫、章辑五、董守义、吴质夫、李壮飞

会员部委员：雍剑秋、杨宽麟、金伯平、郭玉山、董守义、刘建伯

少年部委员：张子翔、阮涓泾、王见心、饶伯森、邓君康、任述源

分会所委员：阮涓泾、杨宽麟、奚东曙、林桂生

1932年

存，总干事：陈锡三

1933年

董事部：雍剑秋（会长）、杨锦魁（副会长）、王晋生（书记）、卜倣成（司库）、张伯苓、金伯平、陈芝琴、陈筱庄、黄子诚、周瑞山、王鹏云、阮涓泾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陈锡三

会员部主任干事：王子英、干事王锡昌

智育部干事：岳世坤

体育部主任干事：毛骏民、书记吴世昌

会计科干事：邵杏题

事务庶务科主任干事：钟嗣庭、书记崔耀华



少年部主任干事：戴云峰、助理干事王云泼、书记陈鸿保

文牍科主任干事：桂逢伯

平民服务所管理员：杨鹤筹

分会所书记：莫家鼎、干事毛骏民

各部委员

会员部：陈芝琴、张周新、郭玉山、李竞雄、王晋生

德育部：雍剑秋、金伯平、杨锦魁、王晋生、卞倣成、阮渭涇、陈芝琴、张伯苓、陈宝泉、黄子诚、周瑞山、王鹏云

智育部：张伯苓、金峻轩、杜芝良、王鹏云、于鹤年

体育部：章辑五、陶少甫、阮渭涇、杜用文、王鹏云

少年部：阮渭涇、刘志丹、张子翔、饶伯森、王见心

财产保管部：陈芝琴、雍剑秋、关颂坚、杜芝良、卞白眉、黄作霖、金平伯

国术委员：张兆东、郝金佩、杜絨三、魏明初、杨十三、赵佐尧、李子扬、张务滋、吴苾臣、马骥昌、张远斋、魏美如、邱树林、蒋新三、刘善清、张耀东

征友委员：王文典、章以吴、杨锦魁、卞倣成、阮渭涇

1934年

董事部：连任张伯苓、陈芝琴、卞倣成、金伯平

新选董事部职员雍剑秋(会长)、杨锦魁(副会长)、卞倣成(司库)、王晋生(书记)。候补董事宋□卿、张兰格、关颂坚、张周新、黄作霖、林桂生。

各部委员长

会员部：陈芝琴

德育部：雍剑秋

智育部：陈宝泉

体育部：杨锦魁



少年部：阮涓涪

财政部：卞倬成

会所：陈芝琴

1935 年董事

名誉会长：商震(启予)、程克(仲渔)、张廷谔(直卿)、雍剑秋(会长)、杨锦魁(副会长)、卞倬成(司库)、王晋生(书记)、张伯苓、陈芝琴、阮涓涪、金平伯、陈筱庄、黄子诚、宋□卿、王鹏云

各部事业委员

德育部：雍剑秋、金伯平、杨锦魁、王晋生、卞倬成、阮涓涪、陈芝琴、张伯苓、陈宝泉、黄子诚、宋□卿、王鹏云

智育部：张伯苓、金峻轩、杜芝良、王鹏云

体育部：杨锦魁、章辑五、陶少甫、阮涓涪、杜用文、张兰格

会员部：陈芝琴、张周新、郭玉山、李竞雄、王晋生、倪念先

少年部：阮涓涪、刘志丹、任述原、王鹏云、刘树藩、刘谟璇

财产保管部：陈芝琴、雍剑秋、关颂坚、杜芝良、卞白眉、金峻轩、

金平伯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陈锡三

会员部：王子英(主任)、王锡昌、王云波

智育部：王正路(主任)、岳世坤

少年部：杨肖彭(主任)、方大曾、陈鸿保

体育部：毛骏民(主任)、钱灵甫

宗教：张益三(主任)

事务科：钟嗣庭(主任)、吴世昌

文牍科：桂逢伯(主任)、莫家鼐

会计科：邵杏题(主任)

分会：陈德轩(主任)、崔耀华



电台：钱仲政(主任)、赵铁城

平民服务所：杨鹤筹、陈璋贤

财产保管部：陈芝琴

1937年

董事部会长：杨锦魁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陈锡三

副总干事：师渡尔

会员部主任：王子英、干事王锡昌

少年部主任：杨肖彭

事务科主任：钟嗣庭

会计科主任：邵杏题

巴黎道分公事务助理：崔耀华

1938年

部分董事及干事：杨锦魁(董事长)、霍培修、李瑞禾、杨肖彭、王锡昌、邵杏题、任永康、钟嗣庭

总干事：陈锡三

副总干事：狄克逊(Edward E. Dixon)

1941年

部分董事：杨锦魁(董事长)、卜倣成、宋□卿、阮渭涇、陈芝琴、王晋生、房质彬、施敬康、王鹏云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陈锡三

干事：杨肖彭(主任干事兼巴黎道会所主任)、钟嗣庭(事务主任)、邵杏题

1942年8月

阮渭涇代理总干事



1943年

董事部：阮渭泾(董事长)

总干事：杨肖彭

1945年

董事部：阮渭泾(董事长)、王晋生(副董事长)、宋□卿、房质彬、王厚斋、卞傲成、冯子堰、周启圭、杜用文、乔维熊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杨肖彭

干事：少年部许斌生、会员部李振声、学生部谢纪恩、体育部王树楷、宗教工作谢维仲

1949年

干事及职员

总干事：杨肖彭

干事：谢纪恩、谢维仲、徐彬生、崔耀华

参考文献：

- 1.《天津青年会会务杂志》24期 191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
- 2.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二十五周年第八次大会纪念册》1920年。
- 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192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行。
- 4.《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报》，1923年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行。
- 5.《天津青年》1932~1937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
- 6.《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1930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
- 7.《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1933年、193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



8.《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

9. 杨肖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史》初稿,天津市宗教界史料研究委员会,油印本,60年代。

10. 杨肖彭:“北美协会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11.《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1995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编。

12. 崔国梁:“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7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作者单位:天津市图书馆)

附录一：

回 录 忆

我对天津青年会的认识^①

乔维熊

一、基督教青年会的性质及概况

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 YMCA)是基督教的社会活动的机构之一。创始于 1844 年 6 月 6 日,是英国人威廉佐治(George Williams)在英国伦敦创办的,距今已有 143 年了。开始时在英国伦敦青年职工中进行活动,人数不多,后来流传到美国,非常盛行,逐渐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活动机构。青年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提倡“德、智、体、群”四育。青年会活动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很多青年会干事就是在大学学会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的。青年会引用《圣经新约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 45 节的经文“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说明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以此作为青年会的宗旨。

1885 年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入中国,最早只有学校的校会和城市的市会,最早的校会是 1885 年在通县协和书院(我的母校北京通州潞河中学前身),这是第一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二个是 1886 年福州的英华书院,在那里也建立了学校青年会,之后,杭州长

^① 本文写于 1989 年 9 月,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老会的一所学校也成立了青年会。第一个中国城市青年会是 1895 年成立的天津青年会,创办人是第一个总干事——来会理(Willard Lyon),他也是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创办人。解放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经济上和人事与美国的“北美协会”关系密切。美国的北美协会管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美国与加拿大,而且包括中国、日本及印度,中国青年会在人事上、经济上和它都有来往。

二、解放前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解放前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自 1895 年到 1949 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 初创时期(1895~1908 年)13 年

1895 年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列强相继进入中国,美国大讲“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益加紧插手侵略中国。1888~1890 年北美协会总干事魏夏往(Luther D. Wisha)来华,先调查两年,在上海、北京、汉口、烟台进行调查,五年后派来会理来华。来会理来津后,首先召集学生百余人开会宣传青年会,决定先在学校办青年会,筹集资金、建立组织机构和会所。1896 年 4 月在大沽路建立了第一个会所,在小营门一带,现已不存在。1896 年 7 月 10 日开第一次董事会,在英国伦敦会(马大夫医院)传教士赫立德(Lavington Hart)的书房开的,选出美国美以美会的白雅各(James H. Pyke)为董事长,来会理为秘书。1896 年 8 月北美协会派学生干事穆德(John Mott)来中国天津,并发表了演说。同年在上海成立青年会全国协会。1898 年格林(R. R. Gailey)任总干事。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格林把大沽路会所租给德国人,会所搬到东门里经司胡同 11 号。1903 年格林请仲伟仪(子风)任天津青年会第一任中国干事,后又约进宋愚溪



为干事。张伯苓与格林熟识后,格林帮助张伯苓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校长,并且一直多年被选作青年会的董事长。1908年格林去了北京。回顾这一阶段,天津青年会在初创时期的工作为:筹划基金,建立董事会,筹办会所,在学校里开展工作,并与社会上层人士建立联系。

2. 发展时期(1908~1931年)23年

这一时期主要工作是:

(1) 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定大政方针和工作方向,筹集资金。北美协会出钱,中国人也有资助。董事会有张伯苓、王厚斋、刘建候、朱荃臣、刘铭泉、夏松藩、全绍清等人。

(2) 建立新会所。1914年10月16日,东马路新会所落成,四层大楼,内有会议室,阅览室,体育馆,礼堂,宿舍等。

(3) 开展工作。天津青年会是宗教团体,但在反帝爱国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天津的几次大的爱国活动都离不开青年会。抵制日货最早的是国货售品所,宋则久先生很积极,边洁清先生(恒源纱厂经理)也积极抵制日货。那时工人阶级还未登上历史舞台,工商界起了很大作用。五四大游行,由青年会(东马路)开始,绕城一周又回到青年会。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很大作用。周总理在津读书时搞革命活动,与邓大姐在青年会搞油印等,油印东西都藏在青年会,在天津人民爱国运动中,青年会是有贡献的。

其次,青年会业校,培养了许多人才。青年会办业校最早,一直办到今天,是有优良传统的。

天津的篮球队当时是很有名的,董守义、李清安、李友珍、齐守愚等参加培养篮球人才等活动,对天津的体育事业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在音乐方面,青年会也是有成绩的,直到现在,许多音乐家多是青年会培养出来的。在社会服务工作、救济事业方面,青年会也都



做了很多工作。在提倡新文化、提倡精神文明、移风易俗方面的贡献，青年会也是不小的。

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困难，外籍干事全部离华，青年会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3. 抗战时期(1931~1945年)14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猖狂侵华，“冀东自治政府”、冀察政委会相继成立，直到芦沟桥事变，青年会受到影响很大，经济困难，人员缩小，工作只能维持现状。总干事宋恩溪百般应付困难后请辞，请陈锡三为总干事，后陈去东亚任副理。为了应付日本人，请卫理公会美国狄克逊牧师任副总干事，专门应付日本人。上海全国协会指示，各地青年会会务上维持最低限度之人员，干事减少。工作主要有，以巴黎道会所为中心搞救灾活动，组织会员小型参观，又组织百余人的歌咏团。青年会和中国实业界接触增加，搞募捐活动，发展会员，会员活动相当活跃。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封闭了东马路会所，董事会召开紧急董事会，出席董事王晋生、宋□卿、阮渭淦、房质彬等人，并有总干事陈锡三及干事钟嗣庭、杨肖彭、邵杏题。大家多方奔走，1942年8月启封发还会所，1943年青年会电台贱价售与日伪的广播台。

4. 抗战胜利后时期(1945~1949年)4年

抗战胜利，美军来津。国民党回来接收敌伪产业“五子登科”，物价飞涨，发金元券。张廷谔任市长，杜建时任副市长，得到他们支持，青年会恢复活动。此时主要活动为：放映美国电影，请美军来体育馆打篮球，成立学生部和学生救济委员会。谢纪恩任天津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并担任学济会的执行干事，谢维仲任广西路会所负责人。



董事会改组,董事长为阮渭涇、董事为宋□卿、王晋生、王厚斋、房质彬、卞倣成、冯子墀、周启丰、杜用文、乔维熊(当时28岁为最年轻的董事)10人。1948年杨肖彭总干事去美,同年美国人艾迪来津讲演,北美协会又派来美国人华展谟(James Hall)任干事,在解放天津前夕,华展谟回国,结束了从来会理到华展谟(1895~1948年)前后54年北美协会控制天津青年会的历史。

综观解放前天津青年会的工作,大体上是:①在输入西方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开展文体活动上起到一定作用。②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不抽烟、不喝酒、不纳妾、不嫖妓、不堕落,对青年讲道德,讲精神文明,讲爱、讲服务。③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在天津近代爱国运动中起到作用。④开展中美和世界朋友的联谊活动。因此,天津青年会在全国是比较著名的,也是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基督教社会服务性组织。

三、解放后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和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1949~1952年三五反运动开始)4年。解放后,董事会基本未动,阮渭涇为董事长,后来宋□卿走了,总干事为杨肖彭,干事为谢纪恩、谢维仲、徐彬生、崔耀华。主要活动是联青社,用聚餐会方式联系实业界知名人士及各界上层人士;老友会活动;办业校。礼堂仍演电影,宿舍逐步停办。1950年,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大运动开始,全国基督教会议切断与美国的关系,宗教界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对奥斯汀宣言活动(美国人奥斯汀反对中国),宗教界举行爱国大游行,在青联的领导下,青年会积极参加,发挥了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1952年三五反运动开始,青年会工作也受影响,可以说解放初期青年会是维持阶段。



第二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共13年,青年会工作逐步走上正常。第一项工作就是积极参加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的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是从青年会开始的。吴耀宗先生发出宣言后,天津市几位基督教领导人,霍培修、郑锡三、乔维熊和杨肖彭积极响应,青年会积极参加。第二项工作是董事会改组,增加爱国爱教的社会知名人士担任董事,乔维熊被选担任董事长。第三项工作是:由于女青年会都是青联的团体会员,在青联的领导下,青年会联系对象为团结基督教青年展开爱国活动,同时,开展会员活动,继续办英文班,业校及老友活动等。1958年,由于情况的变化,东马路会所出租了,以租费维持开支,会所只有广西路,干事积极参加镇反、肃反、反右、整风、大跃进,一直到四清等政治运动,积极参加学习。可以说1953~1966年是天津青年会工作比较正常发展的13年。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1966~1978年)13年。

“文革”开始,工作停顿。青年会活动停止,干部参加劳动,之后搞史料,集中在大悲院写有关宗教界史料。

第四阶段:三中全会后(1978~1988年)10年。

这十年是统战工作的黄金时代,也是基督教青年会恢复工作后的十年。主要活动为①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董事会人员改变,请刘清芬牧师、苏汉均长老为董事,这就是和三自爱国运动加强联系。②开设英文班、书法班。③老友会活动比较经常。④组织旅游参观,节日联欢。⑤外事活动,接待工作,与燕京大学校友会、联合业余大学共同搞海外联谊活动。

十年来成绩很大,这都是由于:①党的领导和关怀,青联的指导以及有关方面的支持。②董事们的支持,干事的努力,董事会辛勤工作。③会员老友共同的努力。回顾过去,今天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与全国各地比较,天津青年会工作还是不错的,是有一定成绩的,应



当珍惜和巩固。

第五阶段：(1988~1993年)6年。这是天津青年会又遇到困难
的时期。特别是杨肖彭总干事于1987年逝世后，谢维仲干事又于
1989年11月辞世。这中间，董事中刘畅跃、陈洁清、杨骏昌、杨思慎、
苏汉均也相继逝世，工作急需开展，而会所迄今尚未落实，经费困难，
总干事一直无人，作为董事长不得不亲自过问，又增加新的同仁，相
互团结协作，工作如助学讲座，青友合唱团，老友会参观与海外联谊
会等，均有新的开展，但与形势要求及兄弟地区青年会工作差距不
小，这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四、对今后青年会工作的几点想法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信心倍增。回忆干什么？回忆过去是为了
温故知新，为了总结有哪些对的，有哪些经验教训。解放前，青年会
的确有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一面，和教会一样，过去所谓自立教会也不
是自立的，都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有关。另一方面，青年会又有反
帝、爱国、为社会服务、促进文化事业和社会进步的一面，比如青年会
文体活动，培养许多进步青年，忽视这一方面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比如爱国方面，美国人在中国设置许多
基督教大学，共有13所，包括燕京大学在内，设教会学校就是希望能
有许多人信教，但教会学校培养了很多反帝爱国人士，这是帝国主义
所不能预料的。因此，不能说中国教会学校一点成绩也没有，因此要
历史地看，实事求是地看。我们青年会，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作了许
多工作。目前世界上参加青年会活动的很多，国际上也知道天津青
年会。“文革”后恢复了天津青年会，董事长、总干事的名字在香港报
上一登，当时反应很强烈，基督教青年会还能恢复，说明中国宗教信
仰自由不是假的。



今天我们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对天津青年会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关头。今天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爱护。记得李瑞环市长常说:“历史人干历史事”,我非常赞成这句话。过去的事没参加,今后如何管不了,现在就要干好这段历史赋予我们的工作。我是董事长,就管董事长应管的事。各位老友热情参加青年会活动,这就是“历史人干历史事”。这里谈两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1)青年会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忽然有的,历史发展产生青年会这个组织,今后根据历史的发展还要向前发展,基督教青年会是国际性的社会服务组织,而且是相当活跃的国际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和世界不少服务组织都有关系。因此,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青年会这个组织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她不是可有可无的。周总理说过,青年会应当发挥她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摆设。一句话,青年会在新中华、在历史的今天、在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方面仍有一定的作用。

(2)青年会的工作,在青联领导下,宗教局的支持帮助下,做好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围绕中心。青年会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进行工作。如培养人才,培训外语人才等。

第二,从实际出发,从天津市青年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会所等实际情况出发。

第三,量力而行,我们人少、年老,不能做好多事,德智体群各方面都开展起来是不行的,要量力而行。

第四,要认真,要讲求实效,不要讲漂亮话,不能只提口号,搞形式,要围绕中心,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根据上述的几点要做哪些事呢?

第一,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宗教是长期的,宗教也是



一个很长的历史产物。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今天不是已经完成了使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而是差的很远。不要外国人干涉教会，中国人自己完全会搞得了，但真正做到三自，问题很多，青年会要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促进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不是短期的。

第二，继续办好系列助学讲座、英文班和其他班，开展业余教育的同时要坚持青年会四育的传统培养青年。参加英文班的不只是学英文，应当帮助他们不吃喝嫖赌，目前青年人的问题不少，要帮助青年做老实人，说诚实话，教书育人，培养真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现在很重要。

第三，继续联系老朋友，搞好老友会，开展活动。报告会、座谈会、旅游参观节日联欢等都可以搞，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开展活动，青年会的活动有许多传统的作法，没有你高我低，你上我下，要坚持大家团结友爱的精神。

第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社区服务工作和对台胞及海外同胞的接待工作，以及开展海外联谊工作。恢复工作后，接待了很多人。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已深入人心。港澳和台湾同胞及海外友人到大陆探亲访友。我们要帮助党和政府做好接待工作。这些年已接待不少，效果很好，今后还要继续搞好。此外，继续办好京剧社、口琴班、青友合唱团等活动，对青年团契和联青社的活动，要有准备地由小而大逐步进行。

第五，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开始准备纪念天津青年会建会一百周年（如史料、资料、日期、地点、参加人员活动内容和经费等）。青年会目前人少、老友也少。自身组织建设主要是今后董事、干事和义工接班问题，需要有合格的接班人。思想建设是加强学习，学习很重要，我们要努力学习时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业务和信息工作。总之，青年会要给人民办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青



年会今后要多做贡献,要围绕中心,突出特色,发挥优势,量力而行,不要怕少,但要做好,要讲质量,要有实效,我们要团结奋斗,分工负责,共同协作,建立请示汇报、经费开支、安全消防等制度,严肃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并按期出好《会刊》。

回忆天津联青社^①

杨肖彭

解放以前,天津有三个影响较大的所谓国际性的服务社团(Service Clubs),即扶轮社(Rotary Club)、狮子会(Lions Club)和联青社(Y's Men's Club)。扶轮社和狮子会的成员多是外国人,只有联青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些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人士。该社与美国的联青社有着密切的从属关系,与基督教青年会更是如同母子。

我于1934年8月1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6年加入了联青社,并一直参加该社的活动。1940年以后,我开始担任该社的通讯书记和董事。1947年我到美国留学期间,还同美国各地的联青社及“国际联青社”的主要人物有所来往。因此,对联青社的事情知之较详,现仅就记忆所及,将一些活动片断追记如下。

一、联青社的起源与组织概况

约在1919年间,美国俄亥俄(Ohio)州特利多(Toldeo)城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一个会员小团体,名为“布斯特尔社”(Booster's Club)意为促进),专门协助青年会推动公务活动。由于该社与当地青年会的关系过于密切,遂改名为“特利姆卡社”(Tolymca Club)。不

^① 本文写于1964年。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收入本书时个别内容做了删节。



久在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社员倡议下,该社正式改名为联青社(Y's Men's Club)意即青年人或青年会的社团。在以后的两三年中,美国和加拿大先后成立起十七个联青社。为了进一步向外扩展,1923 年联青社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青社(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Y's Men's Clubs),亚历山大当选为社长,柯兰姆斯(Henry D. Grimes)担任书记兼司库。亚历山大是一名律师,柯兰姆斯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他们在联青社的职务都是义务性的。

中国的第一个联青社于 1924 年的上海成立,它也是美国的第一个海外联青社组织。1927 年 9 月,天津青年会的总干事郝瑞满(Ramond S. Hall, 美国人),在东马路青年会召开会员工作委员会时,特别提出成立联青社的要求。当时到会的会员有杨宽麟、杨锦魁(美籍中国人)、黎宗尧、阮渭涇、顾海田、关颂声和干事郝瑞满、宋恩溪、董守义等人。会上讨论通过后,于 9 月 27 日邀集了天津上层人物一百多人,在英租界的规矩堂(Masonic Hall)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由杨锦魁担任主席,并请颜惠庆到会演讲,会上人家还一起聚餐。天津的联青社就算正式成立了。1928 年 6 月 1 日,美国国际联青社发给天津联青社一个许可状(Charter),表示天津联青社已取得了国际间的合法地位。从这天起,天津联青社在每礼拜三的中午聚餐、开会,不论遇到什么节日,从不间断。在 1927 年到 1952 年的二十五年中,除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联青社不得不停止了四年的活动以外,其余二十一年中一直未间断过,这期间先后入社的有百余人。

一般的周会,到会的社员总是三十多人。此外社员们可以邀请亲朋一起参加,作为“来宾”。例会由全体社员轮流担任主席,讲员的餐资,由当日的主任负担。主席的面前放着一个红色的木鱼,用以维持秩序,类似惊堂木的作用,这可以算是中国联青社的一个创作,开会前大家一起唱《嘿,嘿,这一群都在这儿》(Hail, Hail, The Gangs Are All Here),闭会时再一起唱《分别歌》(Parting Song),这些歌都是国际



联青社统一印发的英文歌曲。

参加联青社的社员，要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否则很难参加活动。仅就例会来说，每星期三中午要在一起聚餐一回，这就需要一笔开支。1936年前后，天津联青社经常在法租界的大华饭店聚餐，餐费是一块大洋。青年会的干事出席联青社的活动，算是办公，餐费可以报销。餐费还算是较为固定的开销，周会上还有许多额外的开支则是无法估计的。例如，社员在入社时必须报清家庭成员及生日，这些材料由福利委员会主席保存。每当一个社员本人或家庭成员的生日接近开会的日期时，周会上就有一位被指定的司仪官向这位社员道喜。一道喜，这位社员就得拿出相当数目的钞票来捐款，除过生日道喜外，生孩子、搬家、买新房子或汽车、工作上得到提升、生意上赚了钱等等，都要道喜。反之，如果有社员在会上办错了事或说错一句话，甚至叫错一个名字，司仪官马上会来罚款，被罚的人只好掏钱认罚。这些“收入”在例会结束时，都交司库入账。记在“捐款与罚款”的名目下，除此之外，都要钱。这众多的开支，单靠固定薪金收入是难以支付的。

表面上看，联青社是极端自由散漫的，其实它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组织办法，它有六项宗旨：（一）增进本社社员与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之友谊。（二）使社员对有关公民、经济及社会之切近问题，得有更优之启迪。（三）以热诚服务之方法赞助适当之慈善事业及社会活动。（四）提倡以活泼、公正之精神，办理公民事务，而不涉政治，不分党派。（五）建立健全之人格，以发展真实之爱国心，使之形式上的爱国心有别。（六）以勤慎、活泼之服务精神，单独与团结施行基督教青年会所定之各项工作。此外，联青社还将“以义务为权利”定为联青社的社训。



二、天津联青社的组织机构概况

天津联青社在组织、领导和纪律、成规等方面,都比较严密。天津联青社有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董事部,它包括社长、副社长、司库、记录书记和通讯书记以及四名董事。此外还有一个由上海“区(中国)监督”指派的“华北监督”,管辖北平、天津、济南和青岛四处的联青社。华北监督由一名深受众望的天津社员担任。区监督则由美国的“国际联青社”从上海或香港的社员中指派一名合适的人选担任。区监督经常同美国的国际联青社保持联系。天津联青社社长每年年终要向华北监督报告一年来的社务工作;华北监督要向区监督报告他所管辖的四个城市联青社的活动情况;最后区监督再向美国国际联青社报告中国各地联青社的工作情况。当时中国的联青社除华北外,还有华南(包括香港、福州、广州、厦门)、华中(包括上海、南京、苏州、芜湖、汉口)、华西(包括重庆和昆明)。除由区监督向美国国际联青社汇报外,国际联青社还有印好的固定表格,直接从美国发往各地,每半年一次,由各地联青社的通讯书记填报。表格内容是详尽地调查各城市联青社的各项活动情况。我从担任天津联青社的通讯书记之始,就负责此项工作,一直干到结束。

天津联青社董事部要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的前两天(即星期一)的晚上召开一次会议,会议由社长主持,九位董事轮流做东,在自己家里准备一桌饭菜,饭后开会。会议一般是商量会务活动,如吸收社员、经济开支、会程安排及组织各种委员会等等。现就其中一些内容简述如下:

1. 合理安排。每年年初的第一次董事会,要把全年五十二个礼拜三的周会日程安排下来。每月的第一次例会都是事务会议,这一天不请外人演讲,不约亲友参加,专门讨论社务,或是吸收新社员入



社。但一月份的事务会议又固定为新社长(社长任期为一年)就职典礼,12月份则为选举社长、书记及董事。此外还将年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指定为年终报告会,由社长与各执行委员向全体社员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2. 组织各委员会。联青社内部将社员分别组成几个委员会,各委员会由一名董事任主席。这些委员会是:学习委员会、民教委员会、会程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联谊委员会、体育委员会、音乐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出版委员会。此外还有中外会务联谊委员、会员委员和财产保管委员会三人,分担各项具体工作。

3. 吸收新社员。天津联青社有一度红极一时,一般人想加入是不大容易的。联青社的社员都是天津各界的中坚人物,同这些人结交,可以路子广,吃得开,有的甚至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因此不少人想挤进联青社。加入联青社,首先要有两个社员作书面介绍,写明被介绍人的职务和履历,交给会员委员作初步审查,然后提交董事部作初步研究。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在社员例会时把个人的姓名书面提出,征求全体社员意见,并要求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如有一个人不签字,叫作罢论。全社社员同意后,再交回董事部,在下一一次董事部会议上,以投黑、白豆的方法表决。赞成者投白豆,反之投黑豆。投豆后由社长当众打开。如有一粒黑豆,即作罢论。如全体通过,由会员委员通知介绍人并转告申请人,填好入社志愿书后,在当月的事务会议上正式参加入社仪式。入社仪式由社长主持,新社员在介绍人陪同下进入会场,全体起立,由社长提出如何遵守社规、出席例会、忠诚参加服务工作以及支持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工作等问题,新社员一一作了肯定回答之后,社长宣布“某人已被本社吸收为正式会员”,此后才开始其他活动。这时还得给新社员起个社名,经本人同意后就永远在社内使用。此后这个社员每次出席会议时,都要佩带印有自己姓名、社名、职业分类的社徽。



天津联青社对职业分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社员中每一种职业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但实际上所要吸收的社员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都适合于联青社的要求,联青社便另外找些理由吸收该员入社。例如银行业原有花旗银行买办金峻轩和交通银行买办章以吴两人,当金城银行副理杨固之加入时,就以他兼任的太平保险公司经理职,划入保险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资耀华划为商业储蓄业,等等。总之名目越分越细,以避免违反联青社的规定。

在美国的“国际联青社”每年要召开一次国际性年会,邀请各国各地区监督参加,并依其路途远近,给予旅费补助。天津联青社的发起人之一阮渭涇曾于1948年8月15日至20日,代表中国华北区参加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滨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国际联青社年会。那次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出席代表,增进各地联青社之间的友谊,并重申要在世界范围内,凡是有基督教的城市都要推广联青社运动。

在宣传方面,国际联青社有一个月刊,名《联青世界》,按期发到世界各地。天津联青社也一直编辑出版一份英文季刊,名为《天津联青社季刊》,专门报道天津联青社的活动,除社员人手一册外,还分发到全国各城市联青社,并送美国的“国际联青社”。

三、天津联青社的一些活动

1933年我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平青年会做训练干事,当时常听到有关联青社的一些情况。一次,领导我受训的美国人甘霖约我参加北平联青社的周会,地点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那年的社长是北平花旗银行买办孟广礼。餐后由齐如山先生讲梅兰芳的戏曲艺术。由于我从小就喜爱京剧,所以听起来备感兴趣,因之对联青社开始羡慕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联青社的活动。

1934年夏,我被聘来天津青年会工作,担任少年部主任干事。



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的英文秘书。由于少年部的工作是联青社社员们所支持的，加之兼做陈锡三的英文秘书。因此陈时常带我到联青社去作客，有时候我还在会上作演讲。记得1934年我在联青社作过介绍在青岛燕儿岛举办的第四届太平洋沿岸国际少年夏令营活动情况的演讲。这次夏令营都是中学高中生，除中国学生外，还有日本、菲律宾青年。这次活动由北美协会主办，由甘霖担任指导。以后在1935年和1936年分别在烟台和威海举办两次天津青年会少年夏令营，均由我主持，所参加的营员多为联青社社员的子弟。正是这个原因，我每次为筹备夏令营而举办募捐的国际音乐会时，联青社社员都乐意解囊。

1934年和1935年冬天，天津联青社在西湖饭店举办过两次“联青夜”活动。我和其他几个能讲英语的青年会干事，都被约去参加招待工作。当时西湖饭店是天津最考究的第一流饭店，房价昂贵，一般人很难涉足。但由于该饭店老板雍剑秋是青年会董事长，因此对联青社的活动是免费借用的。“联青夜”那天，西湖饭店门前一反以前之冷清，变得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几百位“名门”豪贵携带女友去参加盛会。会上除聚餐、跳舞外，还有一位从檀香山来的女人，表演了一段夏威夷草裙舞。另外还有摇彩和各式各样的大赛卖。办法很特殊，所有到会的人在进门时必须到“联青银行”换买临时通券，其他钞票禁止使用。因此所有带朋友去的人，一进门就尽量买足流通券，否则我用钱时拿不出，显得小气。但有一条规定，所换临时流通券必须当夜用完，不得退换，否则作废。总之，这一夜的活动收入，足够维护天津联青社所办一切服务事业的全年开支。

1936年初夏，陈锡三在北美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留学进修，于是由我代表总干事加入联青社，正式成为天津联青社社员，我的主要任务是保持青年会与联青社的关系。因为联青社的成员，无论是从经济或是从会务活动方面，都是青年会的重要支柱，有人把他们比



作是青年会的“奶油”。

1937年天津沦陷后，天津联青社的例会迁到旧法租界新华大楼银行俱乐部去举行，其他各种活动照例进行。服务工作除原来在沈工庄和鼓楼西两地开办的一所诊疗所及两所儿童义务学校外，又在西头慈惠寺与西广开怡兴里开办了两所义校，一所是工读，一所是义小。由我直接领导，一直办了几年。所有经费开支，统由联青社捐助，青年会代办。

这期间“联青夜”还照旧举办，不过内容有了一些变更，把草裙舞一类的节目改为小蘑菇等人的相声了。一次梅兰芳先生来津演出，联青社社员赵道生通过私人关系，将梅先生请到联青社。大家闻讯喜形于色，都想看看梅先生着便装的样子，同时想听他演讲。那天银行俱乐部里大有人满为患，连青年会最老的董事陈芝琴也出席作客。席间由章以吴主持仪式，当他请梅先生演讲时，梅表示只是来参加聚餐，没有准备讲话。结果使很多人大失所望，不了了之。

一次联青社在银行俱乐部举行“公开论坛”，这是按联青社的惯例，在一个月中碰到第五个星期三时，便要举行一次范围扩大些的例会。这次会议采用辩论会形式，辩论题目是“妇女应否在家庭？”由联青社社员王鹏讲妇女应该留在家理的道理。另外把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请去，由他讲妇女不应留在家庭的道理，经过辩论，结果郑汝铨获胜。

1941年以后，日本人的势力逐渐渗入到银行俱乐部，联青社的聚餐例会又改到旧英租界马场道的美国俱乐部。一次，我约燕京大学校医郭德隆到联青社讲肺结核病的防治问题，当场激动了社员朱继圣，因为他的长女不久前因患肺结核，发现较晚不幸夭亡。于是朱大力支持郭的防痨建议，通过青年会组成了专门委员会，促使天津成立了结核病防治院，由郭德隆任院长，朱继圣一直担任该院董事会的董事长。郭院长出国期间，我曾代理了几个月该院院长的职务。



联青社的活动直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在天津进入租界，才停止活动。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天津联青社很快恢复了活动。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杜建时，兼任招待盟军委员会主任，我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该委员会当时的任务就是把美军招待好，为此经常举办大规模的跳舞晚会，联青社的许多上层妇女和人家闺秀常常作为舞伴去参加舞会，当时联青社主持其事的是杜用文，为此他很得杜建时的赏识。

1947 年 10 月 9 日晚，天津联青社为庆祝成立 20 周年，在天津胜利联欢社举办了庆祝晚会，到会的除联青社社员及其眷属外，还有市长杜建时。一些年龄较老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益友会的会员也参加了晚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杜建时在会上作了演讲。益友会的老会员向联青社赠送了“以友辅仁”的锦旗，并请来宾在旗上签名留念。会后的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1947 至 1948 年间，我先后访问了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城市，多次参加了那里联青社的聚会和活动。在波士顿时，“国际联青社”通讯书记柯兰姆斯热情地约我到他家和他的海滨别墅共度周末。他让我看了他办公室的各种档案，我也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天津联青社的活动情况。在回国途中路经格兰莱比斯 (Grand Rapids) 时，“国际联青社”国际联络工作负责人麦克利曾约我回去参加了几处联青社的聚会，他向社员们介绍我时说：“在联青社没有‘外国人’，只有‘海外社员’”。在美国其他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参观时，我还曾通过青年会的同事们了解了有关美国联青会的活动情况。总的来讲，美国联青社给我的印象是，美国各地的联青社都没有中国联青社的社会地位高。

天津解放后，联青社仍然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1952 年“三五反”运动开始后，联青社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天津联青社从此也自行



解散了。

附录：天津联青社历任华北区区长的社员

年份	社员姓名	社名
1933 - 1935	阮渭涇	Dollar
1936 - 1938	杨锦魁	Paul
1939 - 1940	章以吴	General
1940 - 1947	阮渭涇	Dollar
1948 - 1952	杜用文	Hull

（作者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原总干事）

怀念乔老

罗世龙 牛冰峰 崔 胜 傅雁秋 祁铮娴

2005年是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110周年，在11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有多位先贤担任天津青年会的董事长，他们为天津青年会的发展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而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干事会，心中最深的怀念是乔老。

乔维熊先生28岁被聘请为天津青年会的董事，1981年天津青年会恢复活动后担任董事长，至2003年2月被聘为名誉董事长。一生60余年的时间为青年会做着奉献，我们都十分尊敬的称他为乔老。

乔老对青年会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曾言“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就是义工运动，我虽是董事长，但我和董事会的全体成员都是义工”。他从青年时代在企业任职时就积极为青年会的各项事工捐款捐物，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想方设法积极维护青年会的利益，1981年我会恢复活动后，他不惧众意，挑起天津青年会董事长的重担。1987年我会原总干事杨肖彭先生病逝。乔老虽身为董事长，但为天津青年会的发展，对会里的各项事务性工作具体筹划，日夜操劳。为天津青年会落实房产政策、人员编制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呼吁奔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给罗世龙总干事打电话，询问东马路会所问题的落实情况。天津青年会董事长的职务，是乔老一生中诸多社会职务中最后辞去的社会职务。

乔老十分关怀青年会干事的成长，他曾撰有《我对青年会的认



识》一文来作为新干事和新会员的学习材料。当时乔老担任市工商联专职主委和市政协副秘书长,诸事缠身,但无论多忙都坚持组织干事会学习,学习青年会的历史、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前辈爱国主义的精神,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派干事到外边学习。当时的年轻干事几乎没有什么开展青年会事工的经验,乔老亲自教干事会如何策划活动、如何组织活动、如何撰写文章,对青年会的文字材料逐字逐句的加以修改。乔老 80 高龄时,有时间或将干事叫到他的办公室或叫到家中谈心,鼓励我们要积极向上,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去学习。

乔老一生尊师重教,他在天津青年会“文革”后恢复活动后的第一件事工就是开展教育。乔老当时为青年会制定了“急文化之所急,拾遗补缺,应急求新,要为天津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更要为天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的教育方针。乔老还要求我们“办学为国育才,聘师为贤,不断适应社会需求,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办出质量,多出人才”。恢复初期,乔老发动老干事、老会员、老校友们开展了当时社会最急需的英语教学,学生最多时有一千多人在同时上课,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实用人才。

随着社会的发展,英语培训的市场已渐渐饱和。乔老又带领我们一班年青干事开展了新的创业。乔老请来了有着丰富教育经验的邸永生校长担任培训部主任,又聘请了数位特级、知名教师开展针对当时社会最需要的高考辅导讲座,后来逐渐增加到中学各年级的全科培训。在这期间乔老除了教导我们各种工作技巧外,更身体力行地教导我们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尊师重教。乔老虽已高龄,但对待每一位教师,不分级别、长幼都非常尊敬,礼遇有加,认真听取在教学及管理上的意见和建议。教师在生活上的困难、问题都要尽力帮助;逢年过节都会宴请教师或到教师的家中探望。通过这些真心的努力,团结了大量的优秀教师,拴心留人,使这些教师都能使出最大的力量来为社会培养学生,为青年会赢得赞誉。



三十余年来,天津青年会共为社会培养了十余万的各类人才。同时乔老言传身教的尊师重教之情也在我们年轻干事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乔老始终把握着青年会事工的发展,他坚持三自爱国的原则和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带领董事会、干事会,按照青年会的宗旨和功能开展事工。“文革”后恢复的首届董事会的董事,因年龄偏高,为了完善青年会的组织机制,乔老多方协调选聘了一批对青年会有感情、有贡献的贤达人士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在乔老的指导下,青年会开展了社区服务、贫困地区夏令营、下岗职工技术技能培训、群众性文化活动等一系列事工。1995年时逢天津青年会的百周年华诞,在当时一少人、二少钱的情况下,乔老主持了天津青年会百年庆典的筹备活动,并亲自主编了《天津青年会百周年纪念刊》。百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会几乎没有了任何历史的档案和资料,乔老亲自带领我们发掘史料,疏理史料,历经艰难,终于成书,而且使天津青年会百周年庆典获得了成功。

2001年3月,乔老曾赋诗以表达自己对天津青年会的感情与希望:

我会发展 仰赖同仁 躬逢盛世 正值良辰
 坚持宗旨 爱国助人 发展四育 德智体群
 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 精诚团结 遍地芳芬
 服务社会 造福人群 紧跟时代 再报佳音

回忆乔老,他的爱国热情、崇高品德和务实精神,特别是对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功绩,无不历历在目。

乔老,我们怀念你。

忆肖彭^①

王宗舆

肖彭由 1933 年至 1987 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43 年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直到他 81 岁时离开人间，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青年会事业。

我和肖彭结婚 61 年中，深深体会到他为人正直、热情，遇事深思熟虑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更是钦佩他对青年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的献身精神和工作才能。肖彭的个人经历和工作事迹和青年会的历史紧密相联，他的名字将和青年会永远连在一起。

今天，在天津青年会庆祝成立 100 周年纪念的前夕，我更加思念肖彭，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谨以我 85 岁时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对肖彭的纪念，并以此作为向天津青年会百岁生日的献礼。

学生时代

肖彭出生于 1906 年 1 月 4 日，河北省文安县人。他七岁时父母双亡，在家乡和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以后投考了高等小学和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后，由于不甘心受继母一家人的虐待，在被录取入燕京大学读书时，就把我和三

^① 原载《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



岁的女儿曼莉接到北京，从此断了和老家的联系。我们全家三口人的生活靠他每学期110元的助学金和自助工作的收入维持。他曾经做过《平西报》的编辑，担任过北京《世界日报》的驻燕大特约记者，向该报提供学校新闻，并为报纸招揽广告。他也为教授们打字，每小时三角钱，代卖口香糖，每盒可得酬金两毛钱。以这些镢铢收入来维持学业和家用。

肖彭性格开朗、乐观、活跃、健谈，善于人际交往。因此，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然拮据，但是生活得很愉快。肖彭对家庭和女儿十分关心，他每天骑车送女儿上幼儿园。他所在的社会学系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参观精神病院和听熊佛西教授讲课等，都让我和他一起参加，至今仍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肖彭在燕京大学毕业前不久，有一天，他的同学张德生约他去未名湖岛亭参加一个会。散会回来，他对我说：“今天参加的会和往日的会不同，参加这个会的有梅贻宝等不少中国和外籍教授，还有学生和校工。大家同桌吃饭，互相交谈，不分上下，亲如一家人。原来这叫做‘基督教团契会’。”不久的一个星期日，肖彭在岛亭里领洗参加了基督教。

早年的青年会少年部工作

1933年肖彭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一方面参加了北京青年会工作，同时仍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1934年夏，天津青年会聘请他任少年部主任兼总干事的英文秘书。于是，我们带着女儿迁居天津市。

1935年，肖彭任少年部主任不久，就以“对青少年进行德、智、体、群多方面发展、教育”为方针，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那时参加活动的多数是小学生和初、高中生。除每年夏天照例组织



夏令营活动外,经常在东马路青年大楼内的游艺室和体育馆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各项活动都力求新颖别致,讲求效果。例如,一次中秋节活动,组织青少年在青年会大楼楼顶赏月,并邀请了两位老师参加。一位老师讲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另一位老师讲宇宙间作为地球卫星的月亮的神话故事;另一位老师讲宇宙作为地球卫星的月亮的有关科学常识。会后,参加者一致认为很有兴趣,收获不小。记得肖彭晚年卧床养病时,有一位当时参加过这次赏月活动的会员来我们家看望他时,还提起这件事,他说:“杨先生当时讲月亮是什么,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今我也没忘。”

肖彭很重视青少年的社会教育工作,曾经在河东和西开两地各办起了一所义务小学,还在北京开办了一所义务诊疗所,免费入学、免费看病。由于他热心教育事业,曾被任命为青年会中级文化学校兼职校长和天津新业小学校长。

1937年至1947年间,青年会在新华路体育场内为会员设立了四个网球场,雇用了几名失学儿童在场内拾球。肖彭用募捐来的钱,在球场旁边搭了一个棚子,请了一位教员办起了“拾球儿童学校”,专门教这些失学儿童读书,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教科书和文具用品。

肖彭十分敬佩他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两位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和司徒雷登先生,他多次对我说:“张伯苓和司徒雷登两位校长,既有学问,又有本领,他们忘我劳动,积极到处募捐,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或发财致富,而是为了培养教育年轻一代,他们不愧是著名的教育家。”几十年来,肖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这样发扬着南开、燕大两校的办学精神的。

广交益友,为会员多做贡献

益友会是青年会的组织之一。早年天津著名人士雍剑秋先生是



益友会会员，也是青年会董事，并曾经担任过董事长。由于工作的需要，肖彭经常和他联系。久之，彼此间更加了解、熟悉，雍先生遇事喜欢和肖彭谈谈，听听他的意见，甚至私事也让肖彭帮忙，如给他介绍家庭财务管理人等等，肖彭都十分认真地为他办妥当。

雍先生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广西路 10 号原是他的私产，他曾经想在那里办一个私人礼拜堂，结果没有成功。然后，又想在那里开办一个私人诊疗所，就找肖彭参加意见，肖彭再三考虑后，很诚恳地向他建议，把房子交给青年会开办社会服务活动比较好。雍先生相信肖彭，又热爱青年会，于是欣然允诺，把广西路 10 号房产赠送给了天津青年会。这就是现在的广西路青年会会址。1947 年肖彭赴美国深造和考察前夕，雍先生特意邀请肖彭和我在桃园饭店吃饭，为肖彭送行。

肖彭处处为会员着想，工作细心周到，善于发挥自己在会员间的桥梁作用。解放前，青年会经常组织会员去北京香山、八大处、卧佛寺一带旅游，由于路途远，缺少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肖彭听说关太太在那里有一座别墅，由于她家人少房子空闲的时候多，肖彭就前去找关太太联系，希望她能够把这个房子借给青年会，作为会员旅游时休息处，得到关太太的大力支持。于是肖彭请人粉刷了内部，安装了淋浴，添置了一些铁床等设备，不少会员都去过那儿，对此十分满意。

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36 年冬，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绥远一带和日军作战，伤病员住在当地医院里。当时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建议天津青年会派人参加长城抗日战争慰问活动。天津青年会决定由肖彭和工子英干事参加。他们在绥远住了约一个月，为部队放映了《秋瑾》等进步影片。当时协会干事刘良模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慰问活动，他带去了一



张唱片,是美国黑人著名歌星用中文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了教部队唱进步歌曲,他们在广场用木头搭了一个台,刘先生在台上教唱和指挥,战士们在台下学唱,肖彭不断地为他们照相留念。后来,刘良模先生把那次照的一些相片投寄到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了出来。由于这次慰问和抗日宣传工作搞得好,事后傅作义将军特意邀请肖彭和刘良模先生吃饭表示谢意。

“七七”事变前夕,肖彭邀请刘良模先生一起商量决定办两件事,一件是利用刘先生在天津,由青年会组织青年们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中国,大家来奋斗》等进步歌曲,以激发青年抗日救国热情。并在各中学张贴布告,欢迎学生踊跃参加。当时参加学唱的人很多,在听众中混进了特务,为了青年们的安全,决定只教《义勇军进行曲》,效果很好。另一件是刘良模先生想拍一些反映日本军国主义者毒害中国人民的相片,由肖彭协助。刘先生乘人力车,肖彭骑自行车,到当时妓院、鸦片烟馆和贩卖吸毒具最多的地方——东南城角。肖彭指哪里,刘先生就对哪里拍照,这样,刘先生拍下了不少镜头,这些都是日军毒害我国人民的铁证。

为了提倡老百姓购买我国产品,抵制外国货,青年会曾举办了中国货展销会。会上展出了天津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抵羊牌”毛线、仁立公司生产的呢绒毛料、盛锡福的帽子、宏中酱油公司的红钟酱油和百货售品所的全部国产商品。一时顾客盈门,热闹非常。在会场上买两磅“抵羊牌”毛线,赠送一磅,以资鼓励。这次展销活动,在抵制外国货的宣传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天津结核病防治院的奠基者

从1937年到1941年,燕京大学每年都在天津招生,每次招生都由肖彭协助工作。地点就设在巴黎道青年会。当时郭德隆大夫是燕



京大学的校医,有一次来天津为新生体检,肖彭请他到联青社讲肺结核病的危害性。由于天津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的大女儿死于肺结核。这次演讲立即引起了这位经理的重视。肖彭借着这个机会,由青年会出面成立了一个防痨委员会,请郭大夫来往于京、津两地,做业务指导工作。由青年会会员捐款购买了一台价值3.6万元的X光机器,安装在巴黎道青年会,开始应诊。肖彭帮郭德隆大夫一起又继续进行扩大完善门诊工作,后来在黄家花园成立了门诊部、住院处,结核病院初具规模。这就是初期的天津结核病院。

郭德隆大夫出国一年期间,肖彭曾经担任该医院代理院长职务。

冒险维护青年会

1941年陈锡三总干事已经去东亚毛纺厂任副经理兼任青年会总干事。12月8日以后的一天,日军突然把东马路青年会会所封了起来,不许进入,想从此封闭青年会。肖彭闻讯马上找陈总干事,陈说:“我没办法。”肖彭又去请示董事长阮渭涇先生,并向他请示:“为了保护青年会,我来跑这件事。”阮先生同意他去办。当时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天津老百姓是没有生命保障的,肖彭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到天津、北京日本宪兵队等日本特务机关联系,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联系和周旋,当局才给青年会启了封条。启封后,特务又来了一次麻烦。但是青年会终于战胜了这一次惊涛骇浪,又恢复了正常公务。

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带头人

1950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宗教界人士代表,天津由肖彭、霍培修牧师、郑锡三牧师三人参加。

总理第一次接见是在晚上12点钟。总理先了解各地基督教工



作情况,与会者一一汇报。然后,周总理第一个问肖彭说:“你们青年会的西餐还卖八角钱一份吗?”又说:“贵了些,一般人吃不起啊!”当时,肖彭十分惊讶,周总理的记忆力太强了,他心里想:总理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1919年五四运动时,周总理正在天津从事爱国运动,他那时曾经在青年会宿舍里印过传单,所以了解当时青年会的一些情况。

总理第三次接见是在国务院,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这次总理批示的基本精神是:宗教(包括基督教)信仰自由。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所以在解放后,有神论者的活动要在礼拜堂里进行。总理还提到基督教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认为中国人应当自己办教会,反对帝国主义者控制宗教等。

肖彭和崔、郑两位牧师回到天津后就开始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的新途径》的宣传工作。9月23日,全国各地40位基督教人士联合签名发表了“基督教革新宣言书”。天津市只有肖彭一人参加了这个宣言发起人的签名。接着《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基督教三自爱国联合运动从此开始了。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奥斯汀发表了诬蔑中国人民、诽谤中国基督教徒爱国运动的演说。为了将反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到底,肖彭以东马路青年会为基地,亲自领队游行,谢纪恩干事带领呼口号,反对无耻的“奥斯汀谰言”,参加游行的牧师们越来越多。运动期间,青年会还组织基督徒在东马路会所开展了基督教反帝爱国的学习活动。在这次运动中,肖彭团结了信徒参加,充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爱教的感情。记得他带队游行的那一天,我正患胸膜炎发高烧,有位女教士到我家看望我,她跪在地上祈祷说“求主保佑杨干事不要脱离主”。当时我听了莫名其妙,事后肖彭对我解释说:“这是因为她对革新运动还不理解,国家并不要取消宗教,而是提倡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



通过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天津市广大基督教徒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几十年来,肖彭一直积极宣传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广大基督教徒一起,为天津市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提倡新风尚

肖彭工作富有创新精神,办事灵活、认真。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可是解放前,老百姓是没有很多钱操办婚事的。怎么帮助青年们把婚礼办得既隆重、热闹、有纪念性又节省开支呢,肖彭在青年会创办了“集体结婚”的形式。

记得第一次约有十对青年报名参加,其中包括两位青年会干事。肖彭邀请了市长做证婚人,山市府乐队伴奏,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仪式,并准备了茶点招待双方家长和来宾。天津市各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大家都非常满意。

第二次“集体结婚”在北宁公园大礼堂举行。门口高悬红灯,宾客甚多,办得更为隆重。人们对“集体结婚”的创始者——肖彭和青年会的印象更深刻了。这一新风尚在天津市一直持续至今。

青年会的歌咏活动

自1936年肖彭和刘良模先生合作在青年会开展歌咏活动以来,青年会把这一工作逐渐向正规化发展。1945年在广西路青年会成立了百人合唱团,邀请著名音乐家张肖虎先生(以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谱曲,请原燕京大学神学院教授赵紫宸先生填词。青年会主办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合唱,演出非常成功,在天津传为佳话。接着,周乃森干事和男高音歌唱家李洪宾先生也来参加这一工作,演出的曲目更加多样和丰富。当时还在东马路青年会公演了《弥赛亚》。音



乐会所得款项全都用来制做了冬赈棉衣发放给了贫民。

青年会通过多年组织歌咏活动,不仅救济了贫民,活跃和丰富了广大会员和天津市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在培养天津市音乐人才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晚年生活

肖彭在 1987 年走完了他 81 年的人生道路,安息了。

他晚年时常和我一起回忆往事。每逢想到解放前经历的艰难坎坷的岁月,和现在对比就更加感到解放后生活的美满和幸福,更加体会到组织上给予我们全家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

“文革”后,肖彭已经年逾花甲,但是组织上不仅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和关心我们的生活,而且让他担任了重要的职务。肖彭多年来担任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天津市青联副主席、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名誉主席和副主席、天津联合业余大学董事和天津南开中学董事等。他不仅愉快地和青年会同仁同工们一起工作,而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方面尽量发挥余热,一方面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他经常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视力不好了,但是,我仍然愿意把我的余热贡献给伟大的祖国。看到国家繁荣富强,我从心里面高兴,我愿意多活几年啊!”但是,他终于因为上班乘九路公共汽车,不慎跌伤腿部后,在未痊愈时,又坚持去乘车上班,第二次摔伤了腰部,无法挽救,不幸离开了人间。

肖彭生前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当我们把一个个子女送进高等院校,又看着他们先后被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做出了优异成绩的时候,肖彭经常说:“咱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国家培养起来的,他们有的是科学工作者,有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从小的时候,就知道你追我赶,力争上游,这是咱们最大的安慰。希望咱们家一代比一



代强,希望他们为祖国多作贡献。”我和肖彭一样,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牢记老一辈的教导,不辜负祖国对他们的期望。

(作者系杨肖彭先生夫人)

体现天津中华基督教 青年会宗旨的两次赈济工作

郑汝铨

历史的车轮进入 2005 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成立 110 周年了。我向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10 周年的纪念表示衷心的祝贺。

一百多年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历经沧桑,不论在艰难困苦的时刻还是在风和日丽的时代,都坚持不懈,精诚团结,努力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继承前辈开辟的事业,坚持“本基督精神,促进德、智、体、群四育,培养高尚健全之人格、团结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简称“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作光作盐,尽力奉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努力地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坚持德、智、体、群四育活动,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面向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活力。

遵循“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一百多年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社会奉献爱心,在遭到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灾难的时期,积极开展社会救助、赈灾义捐等各项社会公益服务事业。我讲两件历史上我所知道的赈济活动。



其一：1930年赈济西北各省大灾。

1930年，西北各省普遍大灾，上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先开展募捐活动，支援西北地区。据1930年8月《天津特别市各界赈济灾民募款委员会会务报告》记载：“津市因感西北灾情重大，群谋所以拯救。于是前乎本会者，青年会组织募款会。后乎本会者，又有临时急赈会，其成绩斐然可观。”当时天津特别市赈济灾民募款委员会是一个临时的行政组织，全市各类组织所筹集的赈灾义举钱款和物资都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送往灾区。中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是最先往这个委员会送交赈款的团体。报告中提到的中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募款会是以董事会的成员为基础，号召当时社会上的工商企业家、知名人士和慈善家等人物参加的西北筹赈会。青年会的干事、会员、义工和其他热心社会工艺的人士也都解囊相助。当时的商铺例如义发和福裕等大多捐大洋一元，也有捐几角的，例如福兴长捐洋四角。捐款数额最多的是大公报，为大洋两千元，个人捐款最多的是杨慎初先生，捐一千大洋，程觉民先生捐一百大洋。当时属天津教区的沧县教会捐大洋七元。这次赈灾活动，青年会西北筹赈8030.14元，其中现大洋7788.14，晋钞242元。从商铺捐大洋一元或者几角来看，这次赈款的募捐范围相当广泛。

这次赈灾组成的青年会西北筹赈会各位委员后来应天津特别市各界赈济灾民募款委员会所邀，全部参加该会。据《天津特别市各界赈济灾民募款委员会会务报告》记载，1930年3月19日天津特别市各界赈济灾民募款委员会致函青年会西北筹赈会称：“贵会热心募捐，至为钦佩。昨日本会筹议募捐事宜，多数委员咸以贵会所筹半之西北筹赈会，目的相同，性质相同，劝募委员又多数兼充两会职务。事同一律，似乎合则两美，以免应募者有重叠之嫌。闻贵会已捐有成数，并拟于月底结束。本会拟请贵会于下月起，所有贵会委员均聘加



入本会继续进行。”1930年3月20日,青年会西北筹赈会复函天津特别市各界赈济灾民募款委员会称:“贵会筹议募捐事宜,规定统一办赈机关,意美法良,钦佩无似。月之二十日,敝会委员集会,对于合并问题一致表示赞同,并照来示提议,决定于三月底以前将一切会务完全结束,四月一日起如有所得,无论赈款赈物,均送呈贵会接受,一清界限。将来凡敝会有能力之处,自应追随诸大君子之后,勉效绵薄也。”

其二:抗战初期的赈济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入我国华北地区,京津和河北省都成为沦陷区,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使人民惨遭杀戮,饱受欺辱。1938年,京津和河北省又遭天灾,沦陷区的人民遭受天灾人祸之害,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天津教会在1938年建立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灾会天津区分会”,实施对难民的赈济工作。称为“分会”,是因为1937年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灾会”,各地的救灾会都称为“分会”,是通过救灾的行动,把沦陷区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尽可能地联合起来。“中华基督教协进救灾会天津区分会”有时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主任的杨肖彭为总务组主席,郑汝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善祥(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平民服务部兼会员部干事)、狄克逊(美国牧师,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为组员。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四位干事王锡昌为书记(相当于文字秘书),邵杏题为会计,任永康担任宣传工作,钟洞庭担任庶民工作。还设立了经济组、调查组、施放组三个小组负责全部具体的救济工作。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美籍华人杨锦魁任经济组组长,公理会老牧师霍培修任调查组组长,维理会公会老牧师李瑞禾任施放组组长。请狄克逊和有英美背景的人出任救灾会的各层职位,主要目的是为了和日本侵略军周旋,因为抗战



初期,日本和英美还有交往,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多少还收敛一些。

这次赈济工作涉及的地区比较广泛,除了天津城区,还在乡区建立了 11 个中心点,包括当时天主教天津教区所辖河北省的 17 个县。因为涉及到天主教教区所辖的范围,所以又请司义芳(法国神甫,驻天津西开教堂,负责天主教天津教区的事情)和杨仁趾(荷兰神甫,驻静海县)担任赈济调查和赈款施放工作。

这次赈济活动的赈款来源于三部分,其一是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募捐款。其二是天津各社会团体,例如狮子会、扶轮社、联青社等的募款。其三是英国公理会救济款。当时英、美两国的传教士设立了华北赈款分配委员会,总部设在北京。天津的办事处设在当时英租界的马场道 53 号,由公理会办公室柯恩慈(Hugh Mackenzie)代办。

这次赈济活动,天津市区主要由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共施放赈款 15000 元,其中玉米面与棉衣 4000 元;夏赈 10000 元;冬赈 1000 元。

在 11 个乡区中心点以现金、种子、粮食的形式共施放赈款 41000 元。

这次赈济活动施放赈款合计 56000 元,其中天津狮子会、扶轮社、联青社三个团体捐款 8436.44 元;华北联合救济会送拨 27000 元;英国公理会救济 5000 元;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募捐款 15500 余元。

虽然这两次赈济活动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算不得十分突出,但是表现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

在新的历史时期,祝愿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携手共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天津“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为构建和谐社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



统一和繁荣昌盛,为世界和平贡献我们的力量。

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我们同在,并引导我们服务社会,荣神益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张澜生

步入老年，记忆力自然退化，很熟悉的朋友突然地把名字忘掉了，但是童年事物却永铭心中，印象仍然十分鲜明。我也不例外。1930年我参加青年会，当年少年会员只能参加少年部活动，打乒乓球、弹棋、市内旅游参观、四育养成团等。其他成年会员活动，保龄球、台球、室内篮球以及务东图书馆，少年会员都不能参加。少年部会员都是小学生，很少组织什么集体活动。我偶尔去打乒乓球，大部分时间看青萍队练习。另外，还有两处对我有吸引力。一处是食堂，专卖西餐。我们小孩子没有资格吃，但经常花上四个大铜板买一片抹好山楂酱的面包，足有二两，既可解饱，又能解馋。另一处是东青商店，所谓商店其实就是对着大门楼梯下面最多二平方尺的小屋。窗户就是柜台，以中档文具为主兼营一些小食品。经营人胡先生是个知识分子，精明强干，对人和蔼。主要到客是夜校学生。代售各种英文课本，修理自来水笔。每逢举行室内篮球和乒乓球公开赛，还出售冰淇淋和汽水。抗战期间迁移到劝业场，专营进口钢笔，字号改称东青钢笔店，在天津小有名气。80年代胡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在新中国文具店负责修理部，那架美国刻名机器依然使用。青年会成立后，新式体育运动才传入中国。体育干事董守义、李靖安、李友珍都是天津乃至华北体育界的先行者。他们都是燕京大学前身通州协和医院出身，留学美国春田体育学院。毕生致力于体育事业。董



先生指导下的南开五虎,打遍远东无敌手,解放后他欣然代表新中国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李靖安是天津市体委第一任副主任。李友珍长期任人民体育馆副馆长,八十多岁才退休。多项球类、田径规则完全由上海协会刊行。一直到解放前篮球比赛计分册都是英文。华北、全国运动会的裁判长永远由青年会董事长张伯苓先生担任。可以说没有青年会就没有中国体育。我上中学后加入以巴黎道分会的箭影乒乓球队。到东马路的次数少了。但有些重要活动下课后还骑自行车赶忙参加。例如河北省教育所长李琴湘、燕京大学校长唐志事,河北女师学院教授留法戏剧专家侯擢、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三条羽卿博士等所做演讲,我聆听过,对初中生来说,每次都是一次超前教育,是提高自己的难得良机。最值得纪念的是青年会的奉献精神。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感召下,每位干事都能独挡一面,在工作上创出新意层出不穷。例如夜校最多时十四、五个班,负责教务和全部行政工作只有一个人。巴黎道会所一位干事包揽宿舍、食堂、民乐队、乒乓球队、阅览室、联青社,益友社等多项管理组织工作,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对当时社会有远大影响。在我记忆当中,我们燕京大学校友先后担任干事的至少有五位。30年代总干事陈锡三曾在燕大宗教学院短期进修,而以后陆续加入有杨肖彭、谢维仲、谢纪恩、周乃森、张国梁等。40年代为数不多的女青年会干事当中就有孙幼云、刘行宣、王惠珍三位校友。充分证明燕大学社青年会在服务人民方面是同心相知和同志相从的。我已经八十八岁了。当年乒乓球队队友、泰山旅行团团友除我一人外,已经全部离开人世。喜看今天青年会几经波折终于重整河山,欣欣向荣,相信必定继续发扬光大,进一步为构造和谐社会再立新功。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独具风采

王仁风

1918年，我出生于天津东门外宜家胡同内，这条胡同的东口通宫北大街（现古文化街），西口通东马路，若春季时，站在天后宫后楼上往前看，可看到我家院内大桑树顶上的绿色枝叶、紫色桑葚……

1926~1932年，我在位于东马路上的民立第四女子小学校（简称民四）读书，民四的正门恰在青年会对过。当时，家父——王祖光，工作于北宁铁路局（办公楼即现北站附近之铁路局新楼所在地），业余经常在青年会的球房内锻炼，又因为是南开学校校友，常在青年会内开展校友活动，并为母校及青年会筹募捐款……我常随父亲入青年会参加联欢会，多是在大礼堂内（舞台很大，观众席分楼下楼上，楼上即二楼，座位处是由大厅二楼的门出入）看电影、听讲座……

1932~1937年，我考入河北女师读书，虽然女师地处河北大纬路，学习科目多，课余也多文艺体育等活动，我仍经常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如：

* 曾参观过：青年会在对面（民四小学北侧崇仁宫牌坊近旁）文化馆展览厅内，举办的珍贵古文物展览会，内容丰富！至今我还有印象！（小玻璃瓶内装有彩塑模型等文化、医学珍品！）

* 青年会设广播电台，我家及亲友们常收听。

① 我参加过此处电台的徵文比赛，写的是鸦片战争之勇将——林则徐，颁奖会是在青年会屋顶夜花园中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我



坐在座椅上特兴奋,接受了被评为第二名受奖者的奖金后,还于一天上午被邀请入电台播音室内,朗读原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电台播音室),家人戚友均按时在家收听。

② 我常收听此处电台播放的抗战歌曲,并随着唱。我二妹——王和玉参加了电台组办的歌咏学习班。

* 在要求抗战的热潮中,女师的师生们曾在青年会礼堂内举办文艺晚会。台上有歌有舞有呼吁抗战的话剧,台下两侧墙上悬挂着要求抗战的标语。

* 青年会临街的南侧小院曾开办过理发厅,我进入过那间不怎么大的房间内理发,小院内还摆着许多大盆小盆的花草呢!

……

1937年,天津沦陷后,家父为了女孩子们的安全,为不让孩子们受敌伪学校教育,即安排我们姐妹们迁入租界,分别转学入圣功女中、耀华中学读书,课余我曾到过青年会临时会址(法租界马大夫医院,新学书院)。我看到了杨肖彭总干事,在狭窄的办公室内办公……1938年,我高中毕业后,入天津学院进修,课余参加了青年会由杨总干事亲自主持的英文查经班。至今,我仍记得“说话时,别脏了自己的舌头”……获益良多!

1939年暑期中,我参加了燕京大学来津在英租界办的招生考试,被录取。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学生们被日寇赶出燕园!许多师生赴西南、西北我何尝不要“走”啊!然而当时家父由于悲愤,已突然病逝!我须照顾全家老少!即在津参加工作,无论是进教室,还是进办公室……都认真努力干,就是不在由敌伪控制的地方献力!业余坚持进修……

先是二妹参加了广西路青年会开办的英语学习班,由外籍教师任教。男女同学们课余还在会内二楼礼堂演出英语话剧呢?



不久,我也入了广西路青年会英语学习班教课。同学们学习努力,我很受感动,即在原教学安排的基础上加讲古典英文——莎士比亚的剧本,同学们很欢迎。日寇投降,美军入津。一个晚上,我正和女友在街头散步,遇到也在散步的几位美军战士,在用英语交谈中,他们听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有英语学习班很感兴趣,战前他们在美国也接触过莎士比亚剧作。不久我正在青年会教室内讲课,灯光中,忽见一位美军在教室门外的通道上朝内观看,我理应开门欢迎,但担心会影响教学,只好听其自便,任其去留。

1945年,燕大在北京复校招生,我促二妹报考,由于入学考试英语成绩好,入学后,竟得校方榜示,免修英语课。可见天津青年会的教学水平高啊!

1945年冬,由于在唐山学医的二妹——文玉突然患病,我自津去看望她。在火车上,意外的看到外国人不让乡土气浓的中国农村男子汉与他们同坐一个车厢内,我在气愤中联想到:欲求国富民强,须加强普及教育工作……即和几位男女至交组办儿童福利社,加强培育新一代工作,出版儿童读物、开办儿童义务识字班,在市广播电台开播儿童文艺节目……1946年,为听取建议,以助进一步切合实需开展工作,我们邀请了有关方面的代表开座谈会(也请报社记者到会),地点就在广西路青年会的楼下大厅。

1946年,由于日夜忙于儿童福利社的工作,我不得不先后放弃其他工作(保险公司工作、铃铛阁中学教学、市电台外语广播……),天津青年会英语学习班的课,也不得不……啊!于抱歉中,我介绍了一位辅仁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女教师代替我,同学们竟到我家看望我,希望我继续任教,我感谢大家的盛情,更感谢好几位同学继续和我联系,热诚帮助儿童福利社开展活动!

1947年秋,我考入天津电信局工作,1948年曾随电信系统的干部职工们,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内参加一位科长的婚礼,当我登上青



年会大门前的高台阶，步入礼堂外的大厅时，瞻新忆昔，好激动啊！

解放后，广西路成为青年会、女青年会的总会址，我虽于 50 年代初迁居于小白楼浙江路，仍常回桂林路、广西路……忆旧。

80 年代，天津燕大校友会成立，我才知道：原来青年会杨总干事乃燕园学长！（1941 ~ 1946 年间，我在广西路青年会未曾见到过杨老！）

天津联大组成后，杨老是校委会中燕友代表之一，我在协助办学中，得和杨老常会面！天津联大在拥有校舍之前，曾在广西路二楼礼堂内摆茶点，召开过校委会扩大会议等。

一次，燕友联欢会上，杨老在大会致辞中谈及：自己自 1934 年燕大毕业后即在天津青年会工作，在天津联大组办之前，多少年来，青年会即燕大校友会的在津之家！我听时特激动。

80 年代，我参加过男女青年会在广西路开展的老友会，在复兴公园内召开的诗义会，还参加旅游……见到谢维仲干事热诚的奋力为大家服务，特感动！90 年代还参加过男女青年会在音乐厅召开的音乐演唱会。

听说，杨总干事早即培育谢纪恩为接班人，不料他患了病，工作担子即由谢维仲担起。每看到谢纪恩执着手杖从河西区步行到和平区广西路上班，我即无限激动！这位诗词能手仍在发挥着燕京校训——“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光采！

五四返校节，我随在津燕大校友多次往返津京两地，期间多靠天津青年会的帮助。一次在由燕园返津的车上，谢维仲学长与身边的燕友谈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即将迁回原址……”我听后特激动……

我喜好京剧，但自知水平有限，不敢奢谈什么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尽力。为了向学长们学习，为了保健，我每周参加天津燕友京剧活动，已有五年了（自 1987 年开始，地点在广西路基督教青年会，主持



人是田荫渠学长)。久居世界各地的燕友也时来参加,开展中西文艺交流,是啊!青年会热诚为燕友活动提供场地,也是要促祖国大业兴旺再兴旺啊!

往事随忆^①

崔约翰

谨以这篇简短文字献给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祝贺她的 100 周年生日。

我的父亲崔伯(Percy B. Tripp)是青年会会员，我从小对青年会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譬如说，我进出于青年会的大门非常自如，就好像是进出于自己家大门一样。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办过正式的入会手续，但我好像很自然的就是一个会员，正如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

1907 年我父亲从美国来天津官立中学教授英语，就是通过青年会的介绍促成的。而且从此以后我父亲就爱上了中国，和我母亲何淑娴结婚，并加入了中国籍，定居津门，创造了我们这个天津市独特的崔氏家族。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和青年会分不开的，也是因为这个原故，我父亲对于青年会的工作一贯支持，他自己成为青年会“永久会员”，而且还介绍我母亲成为女青年会的“永久会员”。我小时候不明白，人已经老了怎么还算是“青年”会的会员，但后来听说“心不老，则永远年轻”，也就不再疑惑了。

1918 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父亲把他的英文藏书存放在青年会的图书室里。1928 年我们从河北区仁田西里迁居河西区伟夫路

① 原载《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



以后,我父亲曾在巴黎道青年会开设英语班。另外,我父亲也参加了联青社,并经常按期参加他们的午餐会。

至于我个人和青年会的关系,我记得在丁懋英医院私立小学的时候,就曾在东马路青年人礼堂参加过圣诞节庆祝会,在新学书院上初中时,我父亲带我去参加过一次联青社的午餐会。上新学书院高中时,在东马路青年会开过几次“天津联”(天津市基督教育年联合会)负责人的会议。我进入北京燕京大学的时候,曾到金鱼胡同东口,北平青年会的宿舍里看望住在那里的同学,或在阅览室看报,在餐厅吃饭以及在大厅等待从青年会发出燕大校车。总之,我从小就与青年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4年夏天,我在天津新学书院读高中二年级,暑假我参加了青年会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时间大约是一周,人数约100多人(包括北京各方面的参加者)。在那幽静的环境中,夏令会的各种活动使我得到了有益的感受,并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们的活动是在卧佛寺的“领地”内进行。寺的东侧有一些跨院是供我们住宿的,跨院北端的三合院(包括正房的一座二层楼)分配给男生住;中部的小院子里住女生;南端的一些房间是食堂和办公室等;跨院东侧再往外则是一个操场,可以在那里打球或做游戏;寺的西侧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敞亭,可以在那里开会;还有一个方形露天水池,可以游泳。

每天的活动都是先从在东操场上举行的升旗仪式开始。升旗时,大家要唱一首“祝我国国旗飘扬到世界各方”的歌。每当此时,我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为了我们的祖国而骄傲并情愿为之献身的心情。接下来,在早餐时,大家要唱那首《谢饭歌》,而每次唱到那句“更赐灵粮”时,我心中都好像增加了无限的力量。我们每日简单的三餐是应该感谢其“来之不易”的,而精神上的“食粮”则更是特别宝贵。

吃完早餐就要开始每天的主要活动:一般都是集体听讲演,然后



分成小组进行讨论。主讲的人都是宗教界或教育界等方面有名望的人,而主题则是提出有关青年人所负“使命”方面的一些见解或论点。大家在讨论时也是围绕这个主题而提高各自的认识。虽然不一定有什么结论,但总是有些收获的。

下午的活动就比较松散一些了,可以在操场打排球或篮球,可以在游戏场游戏,也可以到香山碧云寺等地去爬山、游览。另外,也组织过“公益劳动”。譬如有一次我们 20 多人拿着锄头和铁锹去整庙后上山的一段小路。在那紧张的劳动中,我为把“造福人类”的远大理想付诸实施而感到特别愉快。

晚上一般是在东操场上举行篝火晚会。有时是少数人的表演,有时是全体参加的游戏,讲故事、唱歌和“丢手绢”等,各种节目都是相当精彩的,并使大家沉浸在一片欢笑之中。我们每人都领到一个小歌本,其中有前面提到《升旗歌》,还有鼓舞人心的进步电影主题歌,例如《大路歌》、《天伦歌》。另外,也有一些一人领唱或大家轮唱的有趣的小歌,如“三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两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等等。当然还有那首充满团结气氛的《欢乐颂》,大家轮回唱完几遍之后,真是感到了友爱的快乐。

每晚熄灯前,还有一次“灵修”,可以自由参加。时间不长,人也不多,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个小亭子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圣坛,上面有十字架和点燃蜡烛的烛台,留声机播放着幽雅的音乐。人们没有发出祷告的声音,而是分散地站在亭子外围不远的地方,这时在场的人已把自己的精神与万世之主融合在一起了。

“天津市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实际上并不是“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即简称的“青年会”,而是由青年会组织起来并加以辅导的一个团体。那时,在一些教会(如伦敦会)和教会学校(如中西和汇文)有一些比较松散的基督教青年小组,而且在一些官立学校中(如法政学校)也有类似的组织(或称团契)。把它们统一起来、联合起来,这样



就成了“天津市基督教青年联合会”，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活动，例如晨祷、查经以及郊游等等。而从整体的“天津联”来讲，则可以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活动，例如春季联欢会等。

1935年上半年，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在伦敦会的青年股和唱诗班，以及在新学书院的小团契里都很活跃。于是我就作为新学书院的代表参加了联合会的“总部”，然后又在那里被推选为全市的“主席”，并主持这些工作。例如在中西女中开了一次大型春季联欢会，在新学书院小礼堂里办了一次复活节纪念活动，一次小型座谈会，欢送了我们的顾问饶宾孙先生回国等。但最繁重的一项工作，则是负责组织天津的代表队去参加卧佛寺夏令会。虽然我们到了北京以后，一切事务转由北京市青年会方面负责办理，但把20多人的队伍组织起来，带到北京再平安地带回来，这个工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当个“主席”不只是一件可以“自以为了不起”的事，而是一种需要尽心力为人们服务的事。

1935年初秋，以联青社为首的几个社会团体举办了一个叫做“联青夜”的晚会。我父亲带了我们全家去参加。会场是在西湖饭店的二楼。在大舞厅中有化装跳舞和一些歌舞表演，同时还为参加者评奖并颁发各种奖品。在大厅周围的小套间里还安排了一些活动，如照相馆和投票室等。我父亲那天穿了一件工作裤，肩膀上还扛了一把锄头，说是要化装成花匠，并在照相馆照几张相片留念。而我最感兴趣的则是到一个小黑屋子里去“探险”。那里黑洞洞的，起初有些害怕，但每人发给了一个可以发出微光的小手电灯泡，我找到了一面镜子，并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狼狈相，这时便禁不住哈哈大笑了！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晚会除了尽量让大家感到好玩以外，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多多地掏腰包，当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某种很有意义的慈善事业或救灾工作去集资。晚会的节目单印成了相当厚的一本册子，其中除了节目单之外，有介绍联青社组织和工作情况的图片



和文字,而其余大部则是很多资助者厂商的祝词和广告。看来,那次晚会得到了不少的收入。

1934年以后,我曾多次参加广西路青年会组织的外地旅游,初次去清西陵,以后又陆续去过潭柘寺、成台寺、云水洞以及西安等地。另外,也多次在广西路青年会参加一些活动。

往事如烟。转瞬间,60年过去了,一些老相识已不知奔向哪里去了。但或许碰巧会有几位老人看了这篇小文之后能引发某种知音之情?对于众多来者呢?是否会感到一点“有趣”?或者也会感到有一点值得参考之处?

我和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任永康

记得那是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平津两大城市，正继续向南方推进。那时我正困居天津，没有正式工作，暂时在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的补习学校担任干事。

当时天津青年会有两个会所。一个在天津旧城东马路，一个在法租界巴黎道。由于日本侵略军把东马路会所封闭了，青年会只好退居法租界，进行会务活动。当然会务就减少了很多。那时青年会的总干事还是陈锡三先生（由于陈锡三先生当时已经担任东亚毛纺公司的副经理，青年会的日常工作就由杨肖彭先生负责），为了支撑这种局面，陈锡三先生每星期一早上都到青年会和青年会的同仁一齐做晨祷，并且安排每周的其他工作。

到了五月初，由于青年会方面的多次催促，日本军事部门决定启封，将东马路会所发还给青年会使用。

说到东马路会所，它建成于1914年，除了地下室以外，上下共三层。地下室有锅炉房、淋浴室、更衣室，还有抽水厕所等。地下室的上面有办公室、接待室、阅览室、室内篮球场，还有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另外还有餐厅等一些附属房间。礼堂及室内球场有二层楼那么高，在其周围还有十几个房间，作为招待客人的客房，设计师十分巧妙地把这些房间都安排在一起，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真是一座庞然大物。



有了会所，当然需要工作人员。于是陈锡三先生决定派钟嗣庭先生主持东马路会所工作，并且指定由我（任永康）及陈鸿保协助做好工作；并指派杨顺、李作勤、刘文汉三个工人每天清扫整个大楼。这三位工人一直忠心耿耿地为青年会服务。杨顺年龄最大，刘文汉次之，李作勤一直工作到解放后。

很快，我们就把补习学校恢复起来了。除了英语补习班，还办起了日语班，中文打字班，英文打字班。当时我们的骨干教员有赵尔诚先生、屠化南先生、杨文泉先生等。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到了1939年8月中旬，天津市遭受了一场特大洪水的袭击。

记得那天大约下午两三点钟，忽然听见如牛叫一般的吼声，不一会儿，全市就被洪水淹没了。还好青年会的地势较高，洪水的水位没有超过青年会的地基。那时，我出于好奇心理，想到马路上看看。我慢慢地走到东南角，看见洪水只有两三寸深，顺着马路往南看去，只见日租界的水已经很深了，转过身向西看，南马路的水也已将及膝盖。当时，我见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真是国破家亡啊！

我赶忙回到青年会，和人家一起商量救灾问题。首先是接纳难民，让一些会员家属，特别是让一些妇孺老人住进青年会的篮球场；其次是准备食物。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小船，满载着馒头、大饼等食品，摇向南市及南开等低洼地。南市的水深已经超过房屋的房檐，许多居民都躲到房顶上，见我们送来食品，万分感激。由于我们散发的食品数量太少，不大的时间，就发完了，我们只好回青年会去取。沿途，不时遇见水面上漂浮着的尸体，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就这样，我们收纳了二百多户无家可归的人，并且天天出外散发食品，帮助了不少难民。过了一个月，水势渐退了一些，难民们开始准备回家。基于当时的情况，青年会成立了长期救灾委员会，上海等



地也汇来了捐款，给予支援。该救灾委员会由杨肖彭先生任主席，南关教会的狄克逊牧师也自愿参加了救灾委员会。大水退后，委员会又在法租界设立了粥场，由王子英先生负责。后来，青年会还到天津郊区发放了棉衣、棉裤。到1940年救灾工作方告全部结束。

1941年暑假，燕京大学从北京派来了四位毕业生支援青年会的工作。谢纪恩先生、谢维仲先生、周乃森先生三人留在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工作，由杨肖彭任代总干事。张国良先生分配到东马路青年会担任干事工作。至此，青年会的人员已足够用了，工作开展也不用发愁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青年会各种计划全都成了泡影，东马路青年会的顶楼上原有的无线广播电台（七七事变以后被日本军部没收）也由钟嗣庭先生主持拆除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当天东马路青年会所有的干事一大早就被日本人全都拘留了，经过三四天的审查，才准予放行。同时被捕的还有青年会的王子英先生及日本青年会的中村三郎牧师（中村三郎牧师曾在美国大学学习了七年，当时是受东京青年会之派遣来支援天津青年会工作的）。他们在监狱中曾遭受严刑拷打，受了一个月的折磨才被放出。

1944年3月3日，我离开了天津青年会，转赴四川成都。天津青年会的工作，由其他几位干事继续进行。

我与青年会^①

卢稚宗

1902年我在保定上学时，在老师带领下到保定市基督教青年会参观。大门两旁是花形绿色铁栏，进门两侧白壁上写有八个大字“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老师问，你们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吗？我们说不知道。老师说：“就是不使唤别人而为别人所使唤，也就是树立多替别人干事的思想。”这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进入大厅内，见有许多衣着整洁和蔼可亲的青年谈笑、打台球，有人指导我们参观和游玩，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亲热友好关系，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从那时起，我经常参加青年会的各项活动。1927年我到日本留学，在东京中华留日青年会会所住了两三年，会友们热情帮助我解决生活上许多困难。我做礼拜时认识了许多会友，增加了许多知识。1942年我在山东烟台毓璜顶教会医院工作之余，也做礼拜听圣经，在亲切热诚的会友们的影响下，我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着急、患得患失的脾气，不疾言厉色，而是平心静气地为病人服务，关心病人的疾苦。在会友们的帮助和影响下，解放后，虽经多次运动，却未做过丝毫有损国家人民的事，遇有求于我者，必诚心诚意帮助解决其困难。1978年退休后，因生活孤独无所事事而苦闷。1983年我参加青年会老友会后，时常聚会，听老师们讲课座谈。老友们都是学识渊

^① 原载《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



博、经验丰富之士，在老友们高尚品德的薰染下，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增强了人生的愉快及工作的勇气，更愿多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这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百年来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指导下，使千百万人奠定了人生观，解决了苦闷与困难。

我一生追随青年会受益良多，青年会是我的良师益友。参加青年会各项活动，使我心身愉快。天津青年会成立 100 年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希永世发展壮大，谨以此献给天津青年会百周年纪念。

难忘的五年^①

周乃森

说来话长，那是55年前的事。1941年6月，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老校友天津青年会干事杨肖彭到校招聘干事。我和同届经济学系的张国良由我的导师关瑞梧及郑林庄介绍加入天津青年会。在去津前，有幸参加了由上海总会在燕京大学蔚秀园举办的华北区青年会的退休会，进一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青年会的知识，同时也结识了北京、青岛、济南、烟台等地的同仁们。回到天津后，张国良被分配到东马路青年会体育部工作，因为那里有较好的室内健身房。我被分配到巴黎道青年会负责中英文打字班及各种补习夜校教务，同时负责组织音乐活动。

1943年天津宗教界人士雍鼎臣代表他父亲雍剑秋，把他私人盖的小礼拜堂捐助给青年会作为一个会所，改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62号路服务部（即现在的广西路青年会）。青年会委派我为服务部主任干事。事实上会所只有我及一个家住在会所后面福音里的老工人。楼上小礼拜堂有时出租为结婚礼堂。每周合唱队在此排练，舞台上架立式钢琴，出租给刘金定、李菊红、张肖虎等教学生们练琴。每月都在此举行各种类别的音乐会，参加演出的有著名小提琴家马道允、方道光等人。音乐家张肖虎所创作的《木兰从军》、《苏武

^① 原载《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



牧羊》、《圣诞曲》等著名作品，都在此礼堂中演出过。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大型合唱曲《镇魂曲》也在此排练过。中国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袁效先等人，在儿童时期都曾在此小礼堂内演出过。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洪滨在会所楼下开设了一个声乐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即在此受到了启蒙教育。62号路青年会成为天津市的音乐活动中心，颇受喜爱音乐的大中学生们的欢迎。服务部还特请到前协和医院著名儿科徐庆丰大夫定期为患者医疗。丁懋英大夫还捐献了数百册儿童读物，为小读者们阅读。每年还定期举办儿童健康比赛，邀请天津市著名大夫及心理学者为儿童检查身体及心理测验，颇受会员家属们的欢迎。此外，服务部还开设了夜校补习班，其中有德籍犹太人麦格那斯(Magnus)教授德文及英文。

巴黎道青年会还邀请到前燕京大学校医郭德隆大夫开设了肺结核诊所，免费为会员们检查身体。此外由杨肖彭组织的“联青社”(Y'S Men Club)及王子英主持的“父母会”，每周都定期开会进行联谊。联青会大多为医生、工程师、公司经理等著名人士。父母会都是由年长的夫妇们参加。我曾在这两个组织讲解过《青年学生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颇受他们注意。

总之，在青年会工作的五年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与张肖虎教授密切合作，组织乐队、合唱队，排除外界干扰，演奏古典音乐，演唱高尚严肃歌曲，培养一代青年音乐爱好者。我们曾为我国最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施义贵、小提琴家马思聪、音乐家老志诚、伍正谦、李洪滨等人举办演唱及独奏会。与女青年会、维斯理堂唱诗班举行一年一度的《弥赛亚》演唱会赈济贫苦市民。其中著名独唱者有池元元、祁玉珍、严仁萱、伍忠业、王复生、刘峻峰、齐耐群、严仁覃、池湘、茅爰立等人。另外在巴黎道青年会中，还设立了天津中华基督教会音乐专修学校，教师有刘金定、刘海泉、张肖虎、德人哈路巴、无国籍人士劳伦斯等。在同学当中，韩敬庸(韩里)、高学誉(苗



青)、赵行达、王毓芳等人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音乐界专家。我在青年会工作期间,还在前工商学院、市立第三中学(前新学书院校址)等处辅导合唱队及管乐、管弦乐队,为我以后从事音乐教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点滴^①

焦承恪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注重德、智、体、群四育，举办多项教学学科，培育人才供应社会各界需用。从 20 年代起就先后创办有英文夜校、商业簿记、英文打字和各种科学讲座、口琴演奏（当时有王庆烈、王庆隆昆仲，后又有石人望等任过教师），以及室内篮球教练、小学生篮球公开比赛等等，在教育界独树一帜，为社会各界所推崇赞誉，并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赞助。记得在 30 年代，青年会曾增设英文打字班，上学学员甚多。同时汇文中学教师王正路先生在青年会任天文知识课主讲，我校许多同学都去听过课。1934、1935 年间青年会曾两次请美籍的艾迪博士来津讲演，一时轰动津门学界。讲演后还加演独幕剧，尤受听讲者欢迎。1936 年间，上海青年会总会干事刘良模先生来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先后在东马路青年会、南开中学等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救亡歌曲，有《救亡国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把当时的抗日救亡情绪推向空前高潮！教完歌有时还演出一出独幕剧，有一次在青年会演出了抗敌英雄故事《马耳计》，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

1932 年我在汇文小学部读高小二年级时，曾参加当时青年会举办的“天津市中小学篮球公开赛”，我校汇星校队终因不适应室内球

^① 原载《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



场的规则打法而被淘汰。那是我第一次迈进青年会大楼，山董守义先生率领我们参赛的多样队员到全楼各层进行参观，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对青年会的环境、设备十分惊羨。

30年代青年会还办有广播电台，节目内容既有通俗易懂的，也有知识界欣赏的阳春白雪。记得当时每周有一次“福音广播”，解放前夕，乔维熊先生在《新生晚报》主编每周一次的宗教版，时常有讲道、释经等文稿披露。

1939年天津水灾期间，南门外一带以及汇文、中西两校皆变成一片泽国，学校无法开课，遂借用青年会大楼上课，使当时许多同学学习未遭延误。

1948年“天津学联”组织全市各校进步学生起来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向当局提出抗争。不料几个集会点皆被冲击，只剩下广西路10号的青年会社会服务部的一处了！在不断的斗争下，终于也被发现，当时社会服务部的谢纪恩干事被逮捕。无论在抗日斗争还是在爱国运动中，青年会总是走在前列。

解放后，在全国基督教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时，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高举“三自”爱国旗帜，走爱国爱教和提倡各教派联合团结的道路。杨肖彭总干事和郑锡三牧师、霍培修牧师三人代表天津基督教界到北京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召见的宗教界代表座谈会。后来由各派信徒参与的“信徒代表大会”于广西路10号会址成立了“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促进天津基督教派遵照求大同、存小异，在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逐步由联合走向合一教会的道路，对此基督教青年会作了很大的贡献。

1979年末，随着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会重新开堂布道，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务与青年会同址办公，许多活动都合作进行。几年来，我和前任谢纪恩、谢维仲两位干事同舟并桨地协同工作，在组办纪念庆祝会，为老会友举办讲座联欢、会餐、旅游参观、办



学的各种活动中,蒙受了两位谢干事的很多教益。回忆这些欢聚,情谊依依,无限感慨!

可喜的是青年会今天又健全了董事会,增加了青年干事,后继有人,并重新开展会务,服务社会,前景无限!虽见昔日会友多白发,更祝今后会焕发青春!

祝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松柏长青!

回忆三十年代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①

王士斌

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所，设在住宅区一座小花园里的二层别墅式住宅楼内，院内绿树成荫，花草幽雅，很是宁静。楼内除办公室和活动室外，其余约有 10 余间房为独身男宿舍，每人每月房金 20 元，有凉水和热水洗浴，宿舍内家具和寝具都是既简单又实用，同时还有中餐食堂，价廉物美，甚为方便。在此住宿的大都是知识分子、职员、大学生等。宿舍管理最严格的一条就是不准带女人入内，以保持高尚的风格。

1936 年我曾居住在巴黎道会所，约有一年之久。在法租界，遍地是烟、赌、娼和流氓的活动场所，只有青年会这块净土是出污泥而不染，在闹市之中使青年人能过着有规律的生活，给青年们提供了自信、自爱、自强的信念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树立青年“德、智、体、群”四育的情操。青年会为防止青年们的堕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青年会住宿这一年的生活和活动，使我这一生受益匪浅，每每想起昔日在巴黎道青年会住宿的情景，印象颇深，至今不能忘怀。在青年会百周年纪念之际，写此回忆短文，以表怀念之情。

^① 原载《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百周年会庆特刊》。

青年会音乐专修科

马道允

1942年,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了音乐专修科,这在当时为天津的音乐艺术教育填补了一个空白,使得很多有音乐才能的青年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从而走上了音乐岗位。

音乐专修科共设有理论作曲、钢琴、提琴、声乐四个组,应邀到专修科执教的有张肖虎、刘金定、周乃森、马道允、刘海泉、陈子诚等以及外籍音乐教师谢西(Sierch)、卡尔尼斯加(V. Tschernietzka),提琴教师(V. F. Lorens)、哈路巴(Chalupa)、史特恩(S. Stern),声乐教师苏柯(Sokol),大提琴教师曼恩(E. Mayne),管乐教师波修(Pereu),音乐专修科还组有管弦乐队和歌咏团。专修科为了使學生得到实践藉以提高音乐水平,经常办音乐会,节目由师生和音乐界朋友或外籍音乐家参加演出,如郎毓秀、茅爱立、劳伦斯、哈路巴、斯特恩等都参加过音乐会的演出。这些音乐会的演出不仅使學生得到实践锻炼,同时也为音乐爱好者们提供了欣赏音乐的机会,在当时对天津的音乐普及和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音乐专修科在办学的年代里曾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如赵行达、赵行道、陈克强、韩里、崔铭、张国华、李菊红、方正凯、刘光亚、宋学睿、陈文和、王锡琛等,后来他们很多都成为知名的音乐家,并在音乐事业中肩负着育人的重任。

青年会广播电台

贾振中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华北只有一个华北电台,大约设在河北省保定市。当时天津还没有电台,约1932—1934年间,天津市陆续出现了“仁昌电台”(系仁昌绸丝庄成立的首家私营商业电台,除为该店作商业宣传外,还招揽各家商业广告代为宣传,广告费收入用于电台的各项支出,简称“仁昌电台”)、“中华电台”、“东方电台”和“青年会电台”。当时各家电台分别邀请文艺界人士,如刘宝全、荣剑笙、张寿臣、常宝□、乔清秀等以及各家名票演唱京剧,节日中插播广告,竞争激烈,颇极一时之盛。

青年会电台约于1934年下半年筹办。因为青年会本身没钱,就由当时的“正兴德”、“盛锡福”、“东亚毛织公司”等四家公司共同出资4000余元,作为购置机器及安装费用。当时约定,青年会电台应为出资的四家公司免费播放广告,满四年借款作为清结,机器归青年会所有。当时承担青年会电台技术工作的是“中华电器公司”。

青年会广播电台地点设在青年会东马路会所内。该电台除面向社会、面向群众播放青年会本身的工作外,还邀请文艺界和名演员轮流演唱,以便插播广告。同时,每周末还邀请当时社会各界的名票友演唱京剧,颇为活跃。

青年会电台筹办初期,按规定须向当时的南京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申请领照,初时申请未被批准,后改加“试播”二字,始被批准,一直



沿用至最后。

1937年,因日寇侵华,搞“七七事变”而停播,后全部机器由日本人作价收购,至此青年会电台结束。

我与青年会的情缘

杨今豪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就在我家附近。当我尚在初三、高一读书时，就经常去青年会图书馆阅览各种报刊杂志，有时还购票去青年会礼堂观看话剧和音乐会演出；也曾领票去青年会体育馆观看各种球类比赛。高二、高三时我还参加中青（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圣歌团，排练过清唱剧《圣诞夜》；还参加了中青剧社，排演过独幕剧《财狂》，虽均未正式演出，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从此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上海租界后，青年会的活动不得不要受到限制。抗战胜利前夕，在男女青年会学生干部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基督教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联”。1945年新年至春节期间在“上海联”推动下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助学义卖活动，义卖市场就设在青年会体育馆内。我作为三江大学工学院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自始至终参加了该项活动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不久，“上海联”还组织了一次大学生营火晚会，当时已显示出“求和平，反内战”的进步政治倾向。

1946年在男女青年会学生干部的推动下，各教会大学都成立了学生青年会，我又担任了三江大学青年会的副会长。后来青年会又开展了学生救济工作，我也享受了历时一年左右的学生救济，通过用半工半读方式每月发给若干生活补助。

抗战正式爆发前，先是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成立了“中华歌



咏会”，山青年会干事刘良模负责，他自己经常于各种场合（甚至大至体育场）指挥群众高歌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思想，深受上海群众欢迎和拥护。天津的工莘同志（《歌唱祖国》作者，天津音协名誉主席）和上海的孟波同志（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和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等人，就因参加这项工作而后决心奔向解放区投身革命。而刘良模本人不得不于抗战爆发后去美国避难，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国外回来，继续从事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工作。

1946年冬，上海青年会又提出开展这工作，更名为“大众歌唱班”，因缺少合适的歌咏指挥人员，经人介绍就由我去担任。“大众歌唱班”第一期共五六十人，为期三个月，学唱世界各国民歌、进步歌曲，宣扬了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第二期扩大招了一个班，一个月后作了两场汇报演出，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捣乱。当时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翰臣先生，他曾留学美国，信崇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因而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特务迫害人民的行为也非常痛恨。每逢我们的事工遇到警察当局的“麻烦”时，一般都由总干事出面去和市长等当局周旋处理。

因为我的工作较有成绩，青年会就动员我干脆直接参加青年会工作，当时我离大学毕业还差一个学期，陆总干事就让我先去上班，名为 Pre-Training Secretary（先期干事），每天上午上班半天，领一半工资，下午仍在大学修毕课程。

1947年大学毕业后即加入了市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主办的“青年会干事训练班”（参加者必须是大学毕业）进修一年。协会的外籍干事 Bishop 先生当知道我是机械工程系毕业生时，对我大感兴趣，常找我共同研究如何开展青年会 Vocational Education（职业教育）的有关事项；协会的另一位外籍干事 Backrey 先生又怂恿我参加 Recreation（文娱）事工。1948年夏修毕后我仍回上海青年会任全职干事，专门从事职业青年、学生及音乐事工。直至1949年解放后，离沪赴



津工作时才正式离开了青年会。

1990年春天津男女青年会指定组建“青友合唱团”，因我尚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职，工作较多，只能挂个空名为（青友）艺术顾问。当年秋天，原计划另请一位音乐学院教师来担任指挥，后因该教师身体不佳，未能前来指挥，而我正好即将退休下来，干脆由我自己担任指挥，这样使我与青年会中断了四十余年的情缘和关系，又由此而得到了衔接和继续的保持关系。后来又被天津青年会聘任董事（现改名为理事），至2004年又从青年会董事退休至名誉理事。长期以来一直愉快地为天津男、女青年会做一名老义工。2005年幸逢天津青年会建会110周年纪念，而天津青年会是我国第一个建立的城市青年会，我又有机会参加建会的纪念活动，这让我与青年会的情缘又将发扬光大。

世界性的青年会运动起源并流传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宗旨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它所倡导的是积极人生，主张德、智、体、群全面发展，长期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会训，都带有较浓的民主性、人民性和群众性。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中，无论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男女青年会都曾做出过不少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好事，相信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只要在政府领导下，广泛组织群众，正确制定措施，则在全社会努力奔小康的大道上，将继续做出贡献，将同样地发出光芒。

举办助学讲座,为国育才

邴永生

党中央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地位,并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以加速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广大群众越来越认识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家长们总希望能送自己的子女上个名牌校,多读几年书,取得更高层次的文凭。

教育事业发展得快,师资培养不能适应需要。因此,学校与学校之间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出现了差距。即便在一所学校里,也不可能做到门门课程都由名家任教。

基于以上的情况,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乔维熊先生提出,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和群众的企盼,举办助学讲座,请最好的老师进行知识点拨,弥补在校学习的不足之处,在学校教学的基础上巩固、提高。强调服务、为国育才,重社会效益,不以盈利为目的,办学经费不够,由青年会补贴。

根据乔维熊先生的意见,青年会由杜锡同志负责,经工中梁老师的努力,创办了助学讲座班。办学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为国育才”。青年会免费提供课堂、办公室、灯光、音响、黑板、暖气、水电等等,青年会的工作人员都义务为办学服务。

根据社会需要,我们举办的助学讲座是逐步发展的。从1988年



始,并办了高考英语助学讲座班,每年高考前搞五讲。1991年在中共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申报天津市第二教育局批准,将英语班扩大为文化进修部,由我任校长,王中梁任教务主任。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由高三年级的英语班,逐步发展为中学六个年级各种助学讲座班。曾一度在南开区办了分校,开设了小学英语提高班,以及和南开教研室合办小学、初中语、英、数同步班。总计从1988年至2003年的16年中,共开办助学讲座188个班,学生9427人,共听课196771人次。

16年来,我们在办学中遵循了“聘师为贤”的原则。我们聘请的主讲人都是京津两地著名的特级教师和经验丰富的高级教师,是各科教师中的权威人士。这样强的教师队伍,是任何一所中学所不可能做到的。有些教师只到青年会来任教,其他地方高薪聘请都不去。这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有好的办学宗旨,我们的工作正规,不以盈利为目的。相反,办的班越多,在经费上,青年会付出的补贴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会总干事罗世龙同志、副总干事牛冰峰同志多次对我和崔胜同志讲:“不要考虑经济负担。筹集经费是我们的事。你们就根据社会需要一心把班办好。”由于我们强调服务,重社会效益,意在为提高我市中学生的质量尽一份力量,因而能感动、吸引这些最优秀的教师来我部任教。

为了巩固和不断壮大我们的教师队伍,广泛吸取外地的信息和经验,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提高助学讲座的质量,天津青年会联络北京青年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京津高考助学讲师团”,由京津两市的全国知名特、高级教师组成。乔维熊董事长到会祝贺并向教师们颁发了聘书。《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报》的记者也到会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我们的办学特点有三。其一,努力发挥我市教师优势资源的作用,聘请名师任教。其二,强调点拨。学校教学是主,青年会的助学



讲座只起学校教学的辅助作用。名师任教,他们都有深厚的业务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通过这些老师的点拨,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巩固、加深、提高。在教思路、授方法、提高学习能力上下功夫,从而提高了学习成绩,达到了增强学习信心,培养兴趣的目的,为一生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三,重社会效益,不以盈利为目的。

16年的办学,我们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首先是16年来参加听课的学员共196771人次,每年都有一些学员或家长向我们反馈意见,感谢青年会为他们办了一件好事。

如,21中学生王晓冬,高考录取后来信感谢青年会,感谢各位老师。他说:“我在班里属中等生,数学基础最差,比别的同学低儿十分,参加高考已没有信心。通过听了一年的讲座,学习成绩逐步提高,对学习有了兴趣,对参加高考有了信心,高考时数学得了85分,考上了北师大。”

又如,57中学生刘鸿超来信说:“我有幸得到了很多特级教师和在高二工作多年,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的指导,使我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他们的点拨,我不但加深了对在校学到知识的理解,更将所学的知识系统化了”。“知识网络的建立,使我在处理问题或面对新题型时的思路更加开阔,联想更加丰富,加深了对问题理解的深入性和全面性”,“自己已不再拘泥于题的做法,而是思考一类题的特点与思维模式;不再拘泥于死记硬背,而追求前后知识的联系。我不仅得到了知识,更锻炼了能力”。“这时,我已充满了信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注:刘鸿超原在高三年级排名第五十多,高考618分,为57中高三年级的第二名,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该生家长反映,原来学习兴趣不大,贪玩,现在有了兴趣,自觉地学习,不再用家长督促了)

再如,南仓中学的童老师,在校教初三物理课。他说:“平时想听听这些教师的课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从郊区赶来,连续在这儿听



课,受益很深。”

在我们开办助学讲座期间,《天津日报》报道了《聘师为贤,助人为乐》、《北京四中著名物理教师董连生应邀来我市讲学》、《宁潜济等18位教师为考生点拨》、《津京高考助学讲师团成立》、《为学子高考义务咨询》;《今晚报》上刊登了《青年会培训部组织重点中学优秀教师为高考学生义务咨询》的大幅照片。《天津日报》记者多次采访了我会的授课教师,并刊登在《教育天地》版上。此外,《天津日报》记者还采访了我本人,并作了专题报道。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讲了教育、科技、经济三者的关系和教育的战略地位、目标、做法等问题。《天津日报》和天津电视台主办了部分校长座谈会,座谈了《教育如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问题,并作了现场直播。我以青年会文化进修部校长的身份被约请去了,就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的问题,谈了个人的体会和青年会文化进修部几年来的做法。《天津日报》和天津电视台的负责同志在直播座谈会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市教委副主任赵宝琪同志曾到会视察,查看了有关办学的材料、课堂教学情况,课后组织了部分学员座谈会。会上,在听取了反映后,对我部的办学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说,青年会文化进修部助学讲座办的宗旨明确。进修部、学生、家长都一致认为,这是你们最大的特点。你们有名校长、名教师,教学效果出名,这“三名”就决定了你们的学校是名校。天津市补习类的学校还缺少名校,你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总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开办助学讲座16年来,实现了我们的办学宗旨“服务社会,为国育才”,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为振兴中华,为国育才,尽了我会的一份力量。

天津青年会

——培养口琴人才的摇篮

邱景山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就没有口琴队,天津青年会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立口琴组织的单位之一。

我自幼爱好口琴,七岁开始学吹口琴。解放后 1950 年口琴泰斗石人望老师到天津来讲学,在青年会开办口琴学习班。为了提高自己的琴艺,我听到消息后迫不及待地跑到青年会报名参加口琴学习班。在石人望老师走后,丁言伟、王勋章老师先后在青年会办班教授口琴,由此在青年会培养了大批口琴人才。由于当时天津只有青年会开办的口琴学习班别无第二家,因此绝大多数 60 岁以上吹奏比较正规的口琴爱好者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与青年会的口琴班有关系。50 年代初,尤其是石人望老师来天津讲学后,走到大街小巷到处都可听到口琴声,许多学校相继成立了口琴队。譬如:南开中学口琴队、师范附中(实验中学)的热风口琴队、耀华中学的海燕口琴队、二十四中学口琴队等。

1953 年春的一天,我和琴友王志元、宋惟勤与王勋章老师一起商量,招集口琴爱好者在青年会成立天津市最大的口琴组织,统一意见后我们一起找到青年会负责人谢纪恩先生,向他请示。谢先生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毫不犹豫立刻就答应了,并且给我们安排了排练地点和活动时间(每周六晚 7 点到 9 点),并且告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



需要什么找李松年就行。为了把口琴组织管理好,开始活动前我们开了一个会,明确了组织名称“天津青年口琴乐团”,成立了由七人组成的干事会并进行了分工,其中王勋章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兼指挥,我和宋惟勤负责组织领导,王志元负责刻印乐谱。李松年先生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帮助我们油印乐谱。

口琴乐团 1953 年成立时只有 20 多人,到 1954 年就发展到 60 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少数成员是企、事业职工。口琴团成立后,为了培养口琴人才,每年举办 2~3 期口琴学习班,讲课由王勋章老师、我和王志元三人分别负责。1955 年 7 月的一天,口琴乐团全体成员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一次录音,录制了口琴大合奏“双鹤进行曲”和“快乐铜匠进行曲”,电台多次播放了这两首乐曲。1956 年秋天,我们参加了天津市文艺会演,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有 100 人参加。由王勋章老师指挥的百人口琴大合奏演奏的乐曲是苏联乐曲“工人进行曲”和“友谊舞曲”,演出后获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天津市有史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口琴大合奏。青年口琴乐团自成立之日起,每年圣诞节都要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圣诞联欢会,演出口琴独奏、重奏、合奏二三个节目,有时联欢会后我们还要到舞厅用口琴为舞会伴奏。平时也经常应邀到一些学校演出。好景不常,从 1959 年 5 月起,由于多种原因参加活动人数越来越少,到 6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到青年会参加活动的只有七个人,这时我有点沉不住气地问王勋章:“老师咱们的人越来越少怎么办?”王老师回答说:“不要着急,照这样我们只得停一段时间再说啦。”从此“青年口琴乐团”的活动停止了。这一停就是 28 年,1987 年初,通过老口琴家赵嘉理老先生与青年会又取得了联系。1987 年春节过后我和曲延德、高达利三人通过预约来到广西路青年会拜见了当时青年会负责人谢维仲老先生和杜扬先生,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通过友好的回忆和



交谈,他们同意在青年会恢复口琴组织活动。经过筹备于1987年3月7日晚上7点天津青年口琴乐团在青年会正式恢复了活动。第一次活动的内容有三项,一是明确组织名称,经商讨确定为“天津青年口琴会”;二是选举负责人。经民主投票选举,确定邱景山任会长,高达利任副会长。三是制定活动计划和练习曲目。从此活动步入了正轨。大家干劲足,刻苦排练,很快练出一套能演奏一个半小时的节日。1991年10月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在电台大录音棚录制了有独奏、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大合奏等十多首中外名曲。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将这次录音在“口琴艺术专题音乐”节目中先后四次播放。从而更加鼓舞了大家伙练琴的积极性。青年会对我们口琴团非常关心和支持。谢维仲老先生和杜扬先生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当我们印乐谱需要八开白纸时,只要一提出来杜扬先生马上就给拿。拿出纸后他还要补问一句:“够不够?”每到圣诞节青年会总要给我们安排一二个节日,每次演出后发给每个参加演出人员一份小礼品。在完成青年会布置的任务后,为了宣传口琴,我们还经常到学校、部队、企业演出。从1987年到1998年共演出13场,其中1995年在纪念青年会建会100周年的文艺演出中,我们演出了口琴大合奏“旧友进行曲”。1999年5月17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李娟女士慕名来到青年会口琴排练场地进行专题采访。6月8日,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生活频道播放了记者李娟女士采访的现场实况,介绍了天津青年会口琴会近50年的历史及发展口琴音乐的活动情况。从此天津青年口琴会便成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台的常客。1998年我们到生活台直播口琴节目5次(每次一小时)。1999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生活频道在“相约16点”、“休闲时光”栏目和文艺频道“乐海扬帆”栏目多次邀请我们演播口琴节目。演出效果好,社会反映强烈。

罗士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主持青年会工作以来,对口琴团



的工作更是关心和重视。不但发给口琴团活动经费,而且为了让口琴团发展壮大,青年会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拿出三千元给买合奏用口琴。为了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口琴组织机构,以利口琴组织的发展,根据领导的意见,经协商决定,从2000年1月1日起,将天津青年口琴会更名为“YMCA口琴乐团”。邱景山任团长,高达利任副团长。2000年5月24日,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在生活频道直播了一组由电台音乐编辑中林先生作曲,邱景山配器的八首口琴曲(这八首乐曲包括独奏曲二首、三重奏曲一首、大合奏曲五首),演出非常成功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00年我们在生活频道和文艺频道共直播口琴曲九次。2000年7月25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我们到解放军防空导弹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近两个小时的口琴节目受到官兵的热烈欢迎。为了促进口琴艺术的发展,满足口琴爱好者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发现培养一批口琴人才,青年会在2000年9月举办了一期免费口琴培训班,来青年会报名参加口琴学习班的共有41人。开课后由我和孙永烈讲授口琴吹奏法。从2000年4月1日到2001年,我们先后到鹤童(解放南路)老人院、鹤童(川府)老人院、鹤童(海地)老人院、鹤童(黄河道)老人院,对孤寡老人进行慰问演出。2000年7月28日和2002年7月31日,YMCA口琴乐团两次参加青年会在文静里举办的消夏晚会,演出了口琴节目。2001年8月1日应天津武警部队的邀请,我们YMCA口琴乐团全体到武警部队六支队和部队官兵一起搞了一场庆祝“八一”建军节74周年军民联欢文艺晚会。2002年月10日,在总干事罗士龙、副总干事牛冰峰的主持下,召开口琴乐团常委会,会议讨论研究了口琴乐团的发展。经过大家提名,领导正式任命相晟同志为YMCA口琴乐团副团长。金口琴重奏组自2000年初成立之日起,先后五次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和生活频道演播口琴曲并介绍口琴知识。2000年,YMCA金口琴重奏组多次随青年会慰问服务团到青年会志愿服务基地



下营中学进行慰问演出。2002年5月1日和2004年4月30日两次到现代职专参加庆“五一”联欢会,为师生进行慰问演出。YMCA金口琴重奏组在2001年5月6日和2002年5月6日两次参加青年会主办的YMCA杯音乐知识大赛,分别演出了口琴三重奏“鸽子”和口琴四重奏E小调交响曲。2002年9月26日,YMCA口琴乐团全体参加了青年会为玉兰庄村民举办的“玉兰庄今秋之夜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演出了口琴重奏和口琴大合奏。2004年12月26日,青年会在玉兰庄、津兰海鲜城举办圣诞联欢会,YMCA金口琴重奏组演奏了口琴三重奏“鸽子”。

目前开展口琴音乐活动困难很多,为此我们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为振兴口琴事业而努力。

YMCA 和燕京大学情缘

林 放

基督教青年会(“YMCA”)始创于 1844 年 6 月,是美国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s)在英国伦敦市建立的一个基督教社会活动机构。1885 年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传入中国。当时青年会分为城市会和学校会。同年北京通州协和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校会,天津成立的青年会则是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美国美以美会于 1870 年起先后创立的中等学校,至 1888 年合并扩充为汇文书院,英文名为 Peking University,并经美国纽约州于 1889 年批准为美国州大学之一。

自 19 世纪末至今,YMCA 和燕京大学一直交往密切,情缘相结。

一、历史情缘

燕京大学是由美国圣道宗北派美以会美在北京设立的汇文大学(前述汇文书院),公理宗和长老宗合办的通州协和大学,卫理公会在北京所办的协和大学及协和神学院等四所院校于 1918 年合并而成。校址先在北京东城盔甲厂,后于北京西郊建新校址,至 1927 年 10 月 1 日举行燕京大学落成典礼。同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为外国教会在中国的民办大学之一。由中、美两国之联合董事会和美国托事部共同委任司徒雷登为校务长。YMCA 和燕京大学从此结下情缘。



在中国近百年风云史中(1885—1949), YMCA 和燕京大学又同样经历了五个不同历史时期。

YMCA 五个不同时期为:

1. 自 1885—1908 年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初创时期。主要是传教布道, 救济治病, 并和中国社会上层人士交往, 筹划基金, 设立会所在学校开展活动。

2. 自 1908—1931 年为发展时期。建立健全各地青年会的董事会, 并参与中国社会活动, 以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如在天津成立了张伯苓、王厚斋等社会名人参加的基督教青年会天津董事会。参与了宋则久先生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 掩护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先辈在青年会印制传单等。

3. 自 1931—1945 年为抗战时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开展募捐支前活动, 救护抗日学生等。致珍珠港事变后, 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 部分师生被日军逮捕。

4. 自 1945—1949 年为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由于受政治形势的影响, 青年会中有亲美的, 有亲共的, 也有中立的。

5. 自 1949—至今, 由改组董事会进行“三白”运动, 经“文革”整顿。改革开放后, 青年会活动逐步恢复至今, 为 YMCA 的黄金时期。

燕京大学的五个时期为:

1. 自 1919—1937 年为开创发展时期。主要筹资建校, 设置院系, 延聘老师, 扩大招生。

2. 自 1937—1941 年为动乱孤岛时期。卢沟桥七七事变, 虽政治局势紧张, 却扩大了声援, 校内开展了基督教团契。其中有 40 多位学生在暑期参加了社会服务活动。

至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变, 当日上午日军即封闭燕京大学占领校园, 并限令全体师生于 12 月 9 日必须离校。



3. 自 1941—1948 年,为迁校和复校时期。燕京、清华、北大、南开先后迁移至四川及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分别回北平、天津复校。

4. 自 1948—1952 年改为公立,调整合并时期。北平解放后,燕京不断健全教学秩序。至 1951 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大学。同年 2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府字第 3555 号”通知书,并由毛主席签署任命陆志常为燕京大学校长。至 1952 年 7 月,根据中央高等院校调整的部署,燕京大学割席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

5. 自 1952—至今,为燕京精神弘扬时期。燕京大学自 1952 年切并至 1979 年新中国进入第二个里程碑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以及香港等地区先后成立了燕京大学校友会,并与各地 YMCA 密切联系,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更加深了 YMCA 和燕京大学校友的情结。

二、爱心情缘

YMCA 引用《圣经新约 马克福音》第十章第 45 节经文“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青年会之宗旨。说明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青年会的活动则以提倡“德、智、体、群”四育为主。

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各团契的活动则以“联谊、友爱”为主。

YMCA 和燕京大学共同的服务精神都以爱心为前提。因此两者之间结下爱心情缘。

燕京大学虽是一所由英美等国教会参加创办的私立大学,并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她并不是一所宗教学校,更不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她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政治化、民主化都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

司徒雷登任校长后,明确表示,提倡“宗教之绝对自由,废置强迫做礼拜,并改宗教必修课为选修课”,提倡尊重学术独立与研究讲学之自由。同时奉行基督教之博爱精神和实现基督服务之自我牺牲精神。

青年会的义工活动和燕京大学的团契活动,都“以义务为权利”,“助人为乐”作为准则,充满了对人的爱心情缘。

三、人际情缘

YMCA 和燕京大学的人际情缘,天津可谓范例。如杨肖彭先生,于 1933 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后,于 1934 年被聘为天津青年会少年部主任,至 1980 年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同时担任燕京大学天津校友会理事长。

天津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原主委刘清芬,曾是燕京大学天津校友会的副会长。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原董事长乔维熊,则是燕京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和名誉会的副会长。

天津燕京大学校友会最后一任理事长林放,今还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老友会负责人。

还有一批青年会的资深会员和董事,都曾担任燕京大学天津校友会的理事,如张兰生、郑天增、郭德隆、陈志贞、刘行宜等。已故的谢维仲、谢纪恩、范旭、王仁风等老学长都为青年会的中坚。同时还有一些燕京大学女校友,参加了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

毕业于燕京音乐系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池元元女士,解放前就多次参加青年会的慈善演唱会。2004 年,她以 80 高龄来津访问时又和天津男女青年会的老会员、老校友会晤了,女青年会还专门举办了



热情的欢迎会。天津燕大校友会则一直以青年会作为校友们的一个活动基地。如原广西路青年会的燕友京剧社,就团聚了一批京剧爱好者。

正是 YMCA 和燕京大学长期的历史情缘和以共同的爱心情缘为思想基础,使人际情缘愈加亲密。今天燕京大学的老校友们,虽都步入古稀之年,却仍充满青春热情。愿与永葆青春的青年会为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永结情缘。

附录二：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110 周年纪事(1895—2005)

1895 年

10月5日 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公”来会理(D. Willard Lyon)偕夫人来华筹组中国城市青年会,开始寻求筹建城市青年会的城市。他在北京、上海、汉口、烟台和天津的宣教师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考察。

10月由北洋医学堂安德培博士(Dr. B. C. Atterbury)在学生中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前身——文学会。该会有基督教学生6人。

11月8日 公理会长老、北洋医学堂教授安德培在北洋医学堂组织筹各青年会,并命名为“勉励会”(Mutual Improvement Club),同时“勉励会”取得公理会院内的一间房子作为其活动会所。

12月1日 青年勉励会在节制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北美协会派遣来华组织青年会的来会理。当天到会的人有天津四所大学的100多名学生。会上来会理作了重要的演讲,他首先宣读了美国大学青年会的贺词,继而简单地介绍青年会的宗旨及其相关的事工,此次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12月8日 本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天津各校学生有70多人,内签名为同宗会员19人,为同志会员有46人。安德培将“勉励会”的一间会所捐出,以作为青年会会所。

12月14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第一期正式出版。



12月15日 本会决定创立英语查经班,最初决定每周上课一次,由勉励会主持。其后不久,查经班召开英语辩论会,并开始会在公所草场周边举行篮球活动,这是篮球运动首次传入中国。

12月22日 本会选举出为期一年的工作人员,会长为怡和洋行经理埃德穆德·卡森斯(Edmund Cousins)、副会长孙望(Wang Hsun)、记录书记为沈望(Wang Shen)、司库为庞崇文(Chung Wen Pang)、总干事为来会理。

1896年

1月初 本会会员发起募捐会所活动,其募捐款大半为学生认捐。后来青年会利用这些捐款购买了海大道(今大沽路)北洋大学附近地基一处。

1月11日 本会首次举行较为正式的篮球比赛,至4月4日已进行多场比赛。

4月6日 本会举行欢迎美国克伦扶兰的戴乐尔夫人(Mrs. J. Livingstone Taylor)大会,会上戴乐尔夫人宣布捐款1万美元建筑青年会会所,后来该会所被命名为戴乐尔纪念大楼。5月,会所建筑正式开始动工建筑。

5月 《本会会刊》报道修建会所事宜。

6月 本会主办的《中国的青年》创刊号出版,每期印刷300份,赠送给天津的学生和商业青年。

7月10日 本会第一次董事会在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Livington Hart)的书房举行。会议选举白雅各(James H. Pyke)为董事长,来会理为秘书,赫立德、美国公理会安德文(F. E. Aiken)合众教会(Union Church)的安指南(A. S. Ammand)和伯拉小礼拜堂的伍约翰(John Wood Berry)(后二人并未到会)为青年会董事会董事。

7月18日 自青年会成立以来,开了12次传教会,主题是“十诫



的意义及利益”；文学会每两周会友集会一次已进行了 12 次，讨论“时代问题”。

9 月 21 日 北美青年会学生干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博士(John R. Mott)来华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游历视察，在天津戈登堂(Gordon Hall)发表了演说。

1897 年

6 月 5 日 本会举行新会所的落成典礼，埃德穆德·卡森斯也捐款 1000 多银两。该会所成为了中国城市青年会第一座会所(其地址在现大沽路)。

1898 年

4 月 28 日 北美青年会派遣格林(R. R. Gailey)来津，接任赴通州(今通县)学习汉语的来会理担任本会总干事，王厚斋、王阁臣、王正廷等人协助格林一起办理会务。不久会中诸事渐趋兴盛。

1899 年

本年 本会组织召开由北洋大学主办的天津学堂联合运动会，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学校除了北洋大学堂外还有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等校。

1900 年

上半年 格林联络各商行人士进行赞助会务活动，将本会会所进行一些修缮和扩充并添盖寄宿宿舍。

夏 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德军占据青年会宿舍，不久又归日军占据，会务也因此而停顿。



1901 年

2 月 中韩香港青年会总干事巴乐满(F. S. Brochman)来津,协助本会在法租界建立城市职业青年会支会,从此,青年会就把学生青年会与城市职业青年活动联结起来。

3 月 本会决定聘请通州神学院毕业生宋愚溪为干事,宋愚溪也成为了本会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干事。

12 月 14 日 北洋大学因故迁校到郊外,本会将原海大道会所以每月 500 银元的价钱,租给德军作医疗部。同时,本会又开始新建法租界巴黎道一会所。以后又于城内经司胡同 11 号设立分会,以图联络各界,藉以发展。

本年 格林与本市绅士林墨青等人在城西铃铛阁创办中学堂,命名为“普通中学堂”。

1902 年

本年 天津青年会董事会有华人董事司徒医学博士及钟文鳌。

10 月 20 日 本会第四次运动会在西南城隅青年会操场举行,共分田径赛及竞走 12 项。

本年 华人董事有司徒医学博士及钟文鳌。

本年 本会会员组织“阿拉法”(alpha)俱乐部。

本年 本会在奥租界运动场举行年度运动会。

1903 年

2 月 普通中学堂移至东门内仓廩街会所内。

4 月 9 日 本会在戈登堂举行青年会第 7 次纪念大会,中韩香港青年会总干事巴乐满发表了重要演讲。

6 月 4 日 在本会董事会会上,格林作了在城厢青年会工作的



报告。

秋 本会派出外籍干事饶伯森、盖克、沃克尔、白雅各等人分别到北洋大学、新学书院、工艺学堂、普通学堂、官立中学堂等处发表讲演，并传授篮球及田径活动，不久天津的各项体育活动兴起。

11 月 贺嘉立携眷来津协助办理青年会会务。

2 月 由于本会会务活动蓬勃发展，格林经董事会同意，决定聘请华人仲伟仪、张用川为青年会干事。仲伟仪(子凤)，曾为秀才，后毕业于山东登州长老会，任城里青年会干事，月薪白银 20 两；张用川，在巴黎道会所主持会务，月薪为白银 100 两。

本年 本会以普通中学堂为主，发起组织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其中有北洋大学堂、官立中学堂、新学书院和高等工业学堂等校参加运动会。从 1914 年即第 11 届运动会起，改名为“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至 1925 年共主办了 21 届(其中仅有 1923 年暂停一次)。

1904 年

2 月 8 日 格林向董事会报告事工。

2 月 27 日 本会第 8 次纪念会在戈登堂举行。

9 月 16 日 城内会所迁至经司胡同(门首有匾一方题为“志学会社”)。

10 月 29 日 本会在城西南建立一个新的操场，并举行运动会。私立中学堂(即南开学校前身)、北洋大学堂、天津中学堂和新学书院等校派人参加。

12 月 9 - 13 日 本会召开三次阐明圣经大会，共有 2825 人到会。

本年 中国会员捐款 7136 元作为会务经常费。



1905 年

8 月 格林返回美国,会员日常工作由代理总干事饶伯森负责。

11 月 10 日 购得法租界巴黎道楼房两院:一为会所,一为西人住宅。

10 月 28 日 本会公布了青年会第三次运动会 12 个竞赛项目。

10 月 29 日 青年会第三次运动会举行。

12 月 韩慕儒干事来津主持会务工作。

1906 年

4 月 东京创办中国学生青年会,派遣中西干事各一人,为当地中国学生服务。其中中国干事为本会同宗会员王正廷。他在东京青年会的工作很有成绩,1909 年还担任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总干事。

10 月 21 日 天津第四次青年会运动会在青年会操场举行,本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仍为 12 项。

冬 格林由美国返回天津,不久他与张佩之一同赴京筹备组建北京青年会。

本年 本会共有同宗会员与会员 235 人。

1907 年

1 月 世界青年会同盟会会长穆德抵达天津,在卢木斋的陪同下,穆德在公园学会对天津各界代表及各校学生代表 2500 多人发表演讲。

3 月 本会中西干事 4 人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韩青年会议,会议决定,委托仲子风作为会议代表,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万国青年会会议。

5 月 7 日 本会第 11 周年纪念会在戈登堂举行。由美国来津



的武德华(S. W. Woodwad)与司理门(F. B. Sleman)在会上作重要演讲,当时到会者近 500 人。

9 月 18 日 郝瑞满、崔伯两人来津,担任天津官立中学堂教师。

10 月 19 日 本会举行第五次运动会。从此次运动会后,运动会分童子组、成年组,共有 15 项竞赛项目。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为获奖代表发送奖品。

12 月 21 日 本会举行圣诞联合会。B. 圣约翰先生、陈伟平先生以及费齐海先生到会并讲话,晚会有弦乐及其他乐器的演奏、日本少年合唱节目和中外人士的合作节目。

12 月 26 日 布朗给青年会员讲演。本会每星期都要举行科学讲演与通俗讲演。

本年 本会共有干事 16 人(其中美人 5 名)。

本年 本会还接待了北美协会总干事慕尔斯(R. C. Morse),斯德哥尔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福来斯(Kaul Frjes),美国保提慕尔州女子学院校长哥其尔(John Gouher),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毕奇(H. P. Beach),北美协会克尔顿(E. T. Colton)、海瑞(C. D. Hurrey),德国柏林威尔森(Baron Von Werthen)、克尔泰尔(Von Gertell),法国巴黎玻尔泰尔斯(Count Pourtales)伯爵、苏特尔(Sauttter),荷兰柏克豪斯(B. H. Backhouse),美国赛威尔安斯(L. H. Severanoe)等。

1908 年

2 月 29 日 本会组织举行网球比赛。

秋 本会召开阐明圣经大会,并邀请美国博士丁冠西和明恩溥主讲,效果显著。

1909 年

9 月 15 日 在本会董事会选举中张伯苓、刘建侯、王厚斋、朱蕊



臣、刘铭泉、张佐庭、夏松藩、曾侗忱、全绍清等人当选为董事。

本年 华人董事开始取代洋董事负责本会的日常公务。

1910 年

春 格林辞去本会总干事之职，该职由韩慕儒代理。

本年 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界运动会上，代表天津参赛的本会日校学生崔承修共获得六项田径冠军，同时本会日校还夺得学校组团体第三名。

1911 年

3月31日 由华人组成的董事会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选举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董事会董事长。会上美国干事提出“原会址不敷应用”，必须“另立新基，以求扩张”。为此青年会决定举行募捐。湖南籍富绅欧阳旭德为本会捐款 20000 两白银，利用此款本会在东马路购买空地一块。后来，本会又从美国募捐 86000 元，作为建筑会所之用。

4月15日 本会与北方学界联合举办运动会，由青年会的毕辅安担任此次运动会的体育总教习。

6月 本会干事宋恩溪赴美留学。

本年 本会主办《天津青年》杂志创刊。其宗旨是“传达会务消息，联络会员感情，唤起服务精神，谋求社会改进”。该刊为半月刊，16开，每期4~8页。

1912 年

5月2日 本会在李公祠举行了青年会成立 16 周年纪念大会。

秋 韩慕儒偕蔡乐尔大夫回津，蔡乐尔出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913 年

5 月 23 日 美国万那美克捐助 114000 美元,兴建本会东马路会所,直隶民政厅长刘仲鲁、参议院副院长王正廷和美国社会学家海岩参加了该楼的奠基典礼。

1914 年

10 月 7~9 日 本会组织的足球赛在南开学校和法租界球场同时举行。

10 月 16 日 本会在东马路新会所进行乒乓球、台球活动。活动所使用的乒乓球、台球球台均为天津市第一张球台。

10 月 梅贻琦、刘鉴堂被本会聘请为干事。

秋 艾迪来津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天津绅商学各界代表 1300 多人到会聆听其演讲。

12 月 23 日 南开学校举行毕业式本年会总干事韩慕儒代表美国总领事费先生发表演说。

1915 年

1 月 22 日 本会组织了天津学校第二次辩论会,南开、北洋、法政等校都组队参加。

2 月 28 日 从本学期起,本会发起组织进行各校篮球赛。

3 月 19 日 本会《会务杂志》出版,该刊为周刊,每星期五出版。

7 月 15 日 本会组织北戴河夏令总游会,严修、孙子文、陈芝琴等人参加。

8 月 30 日 本会会员及宾友参加开查经班,研究真道。

9 月 4 日 本会开“特别交谊会”,有协和人学校友唱四品诗、韩慕侠舞剑,以及电影、双簧、音乐、谐谈等游戏。



9月9日~12月30日 本会童子英文晚课开班。课程为新世纪英文读本、文法会话、作文、正音。9月中旬本会韩慕儒总干事应邀到南开学校演说《社会问题》，连续讲演三次。演讲词由童启颜记录，分别发表于南开《校风》第4、6、10期。

10月 本会举办的体育培训班正式开课。

本年 本会日校改名为“育才学校”，并由青年会全国协会代请陈敏修为智育部主任，宁约翰为学校部主任干事，饶伯森为童子部主任干事。

1916年

1月16日 本会邀请天津各校代表商议，从即日起举行天津学校联合篮球赛，为期一周。

本年 张伯苓在南开学校青年会上作了《信教之缘由》的演讲。

1917年

夏 本会韩慕儒总干事偕艾迪博士一起到各省巡回布道，后又赴法国办理华工青年会事宜。

夏、秋之际 天津发生特大水灾，本会与各教会组织成立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并以该会会所为总事务所，督办京畿一带的水灾赈济事宜。南开学校的校舍被洪水侵占后，也曾借用青年会上课。

本年 本会总干事一职由郝瑞满代理。

1918年

11月6日 本会与政绅商各界代表倡导成立了欧战协济会中国直隶筹款部，11月13日在青年会会所内建立办公处。9日，协济会组织召开天津市各校校长会议。

12月 本会举行桥梓会，此次桥梓会由青年会童子部筹办，钱



博泉致开幕词,张伯苓作了最新教育法《桥样会之精义及其作用》的演说。同时,在此次会上宋愚溪干事、徐子时报告了公务。

1919 年

1月3日 本会育才学校,开办四年制中学、三年制商科学校。高小毕业而英文有一二年程度者得入中学,本科读毕中学二年后可入商科。

1月9日 《天津青年》改为月刊,特送会员及赞助者阅读,月末有“会务杂志”。

1月12日 本会举办“星期德育讲演会”,同时还与海大道伦敦会堂举行联合祈祷会。

1月18日 本会首次举行游艺比赛。活动内容有象棋、围棋、蛙棋、跳棋及乒乓球、地球等。

1月20日 截止到本日,协济会直隶省全省共捐款 333944.65 元,其中天津捐 212131.119 元。此次捐款活动有 91993 人参与。捐款中一大批,捐献给法国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阿尔贝特市,进行市政建设,修建医院及重建家园。为此,该市于 1920 年 3 ~ 4 月间树立“天津街”,以表纪念。

2月18日 本会又开办英文夜校,该夜校有普通、高级、商务英文、簿记、英文速记、打字及绘画等。

5月3日 本会举行 24 周年纪念会,黎元洪前大总统直隶省长、前教育总长范静生莅会并发表演说。

5月 本会支持的天津“五四”大游行,游行从东马路青年会所出发,绕城一周后又回到本会会所。

6月14日 基督教信徒陈芝琴、王瑞亭、张信天等 14 人发表《提倡全国公民大会宣言书》,指出:“既为民国则人民应有解决之权,亦惟有人民有解决之力……以为组织全国公民大会……由全国公民大



会议决之事即应执行”。

7月3~4日 本会育才学校假青年会礼堂演剧。所得捐款，悉捐入学生联合会。又于中旬在旧城议事会内演《一根簪》，并邀请刘清扬演说。

8月31日 下午4时，“五四”运动游行讲演者暨欢迎赴京请愿代表回津，自东马路青年会前出发赴各处讲演并于6时赴新车站欢迎赴京代表。

10月2日 天津各校学生4000人，于东马路青年会集合，赴省公署请愿。

1920年

春 董事部：会正张伯苓、会副王晋生、司库陈芝琴、书记戴练江、朱季柳、工厚斋、宋则久、工右丞、雍剑秋、吴清泰、陈宝禾、卞倬成；宗教事业委办：陈宝禾、何铭周、雷舜生、李安素、工崇光、工佩明、杨醒愚；成人部委办：宋则久、阮渭涇、俞蔼青、何铭周、瞿允卿；智育科委办：卞倬成、凌水、唐宝桐、梁文兴；学校部委办：戴练江、杨学羔、王见心、章辑五、史译宣、霍恩华。

干事职员：总务科韩慕儒、王治平、郝瑞满；宗教事业委办王治平；成人部委办宋恩溪、杨立民、贾连山、王墨樵；智育部委办陈敏修、张锡鸿、陈锡三；学校部委办宁约翰、林仁旺、纪树屏、关叔和、刘明义；体育科委办罗克礼、吴国模、董守义；童子部委办饶伯森、陈学敬、张濯泉、张玉星、徐子明；编辑科委办仲子凤、张晓斋；庶务科沈子实、李智泉、蓝恩天、瑞麟甫；经济委办韩慕儒、仲子凤、郝瑞满、王治平（义务职员：陈芝琴、聂管臣、雍剑秋、工厚斋）。

4月2~6日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天津维斯理堂召开第八次全国大会，并举行创立二十五周年庆典。到会者有北美协会副总干事巴尔满、美洲非拉特非亚青年会干事盖士开、香港青年会



总干事皮尔斯及该会会长大来、本会创始人来会理、欧美各国青年会全国协会负责人,王正廷、蔡元培、张伯苓、诚静宜、汪精卫、黄炎培、黎元洪等人。英、美、法三国公使也由北京来津参加此会议。参加此次全国协会的全国代表共有 1106 人。本会总会正张伯苓在会上作了《基督教对于明日中国之贡献》的演讲。

9 月 18 日 本会开秋季大会,报告会务纲要。到会会员异常整齐。会正张伯苓致词,谓今次聚会为振奋精神,预备下半年工作。青年会之宗旨今昔比较有消极积极之分,以前为消极的即保护青年“不为所不应为”,恐其道德堕落,最初青年会在英国时即本此旨。现今之青年会为积极的,凡青年人应作之事均宜使之负责为社会国家服务。梁启超发表《个性与组织》的演讲(讲词在天津青年报第 99 ~ 100 期)。教育厅长马振武也发表了演说。最后,王化清副总干事报告会务。

9 月 19 日 本会鉴于建会二十五年来,工作多限于绅商,而少于工商,所以特设职工部以补助其不足。目的在工人群体中输入德智体群四育,提高工人素质。同时以东马路崇仁宫旧址为会所,先设普通教育,如卫生识字等科目。拟设职业介绍部,以备相机引进无业工人,得有相当职业,用来自养,赞助共商。

9 月 25 日 本会举办卫生讲演《防霍乱症法》。

10 月 23 日 本会召开卫生演说会,邀请海军军医学校沈鸿翔演讲“家庭卫生,注重生活,身体健康”,并有电影助兴。

10 月 25 日 本会召开兑换邮票会,邀请美国邮票大家诺提摩演讲,并开展邮票交流活动。

1921 年

1 月 27 日 本会定期选举董事会。

3 月 5 日 本会童子部在该会的大讲堂召开童子交谊会,内容



为奏乐、演说、放灾民情影片、活动电影等。青年会为提倡儿童正当游戏，发达健康体魄精神，决定每年都举办儿童游戏活动，包括网球、垒球、篮球、棒球等等。

3月9日 本会举行六项运动比赛。计有六十码蕃薯赛跑，一百六十码蕃薯赛跑，投掷十磅铁球，腾越比赛，急行跳高，立定跳远。

4月25日 本会在其会所内设立阅书室，并定于5月1日开幕，会员可于每星期一二三五晚7~9点阅览学习。

4月30日 本会童子部新剧团开会讨论教授新剧事宜。

5月1日 本会职工部设立通俗学校学生家长恳亲会，200余人参加。其内容为本校学生奏乐、主席致词、本校学生歌诗、朗诵英文字母、英文拼音、唱歌、诵读英文、音乐、英文问答、英文故事、演说、英文短剧、京剧等。

5月2日 本会童子部组织武术研究会，研究讨论中国武术事宜。

5月6日 本会在会所大讲堂举行南门外中西女中特别音乐会，票资大洋1元。

6月11日 本会举行游艺会，内容有小学跳舞、中国音乐、新剧、西方军乐、中国武术、童子军表演、相声、魔术、电影等节目。

6月24日 本会举行英文夜校休业式。同时组织青年会音乐团，藉音乐之习备，供服务之事工。每星期集会六次，周六为团员会演。

7月1日 本会组织会员赴北京参观。

8月28日 全国青年会第四次干事大会将在广州举行，拟定讨论如何使青年会的事业发展于中国；如何培养干事人员，使其应付时代之需要。

8月30日 本会童子部组织成立新剧班。

11月3日 本会童子部开会议定，设立体育师范班，其宗旨为



养成体育师范人才,以为服务社会之根本。

11月9日 本会篮球队在美国兵营与其篮球队比赛。

11月14日 本会足球队与西人俱乐部足球队在南开操场比赛,英国军队足球队与青年会足球队在英国球场比赛。

11月17日 本会在会所,邀请上海全国青年会干事医学博士毕德辉组织电影讲演会,约请讲演卫生问题,演讲关于“花柳病”等问题。

11月26日 梁启超在本会发表《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的讲演。

1922年

1月18日 本会举行运动会。

2月11日 本会在东马路大讲堂召开智育演说会,邀请了李燕豪做“教育救国”的演讲,并于17日召开了游艺活动。

2月21日 本日为旧历正月十五。本会在会所大讲堂举行智育演说会,李燕豪再次发表“教育救国”的演说,会后燃放烟花庆祝元宵节!

2月17日 本会夜校开学,请名人演讲,举行游艺并看电影。

2月14日 本会童子部设立华美通信社,与美国儿童进行相互通信,交换知识。

3月12日 本会社会服务团组织平民学校学生游行,宣传平民教育,并有唱歌音乐活动。

3月22日 本会社会服务团设立第一平民义务学校。

5月2日 本会成人部组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邮票俱乐部”。

5月19日 本会学校部开委办会,章辑五,文安思、黎泊尔、刘明义、关叔和、蓝恩天、韩慕儒等人到会,讨论宗教教育扩充事宜。

5月21日 本会召开成立二十六年纪念大会。



5月23日 本会童子部成立篮球队。

5月27日 本会童子部养成团在天津河东一带向各铺户散发捕蝇传单。

5月30日~6月4日 本会举行第一次卫生教育大会,讲演关于疾病的来源与防治方法。

6月2日 本会社会服务队,赴法租界利生猪肉铺宣传卫生,并讲授捕蝇方法。

6月21日 青年会童子军联合部开干事会,本会干事陈学敬、南开章辑五、成美徐文远,新学张忠仁,拟定图书阅览室章程。

6月24日 北京青年会约请本会特别赞成会员赴京颐和园游览,已经清室特许。

又 本会开第27周年纪念大会,报告会务,请美军乐队演奏助兴。同时,欢迎新会员并发征友纪念品。

6月29日~7月6日 本会学校部组织本埠各校学生参加北京西山夏令会。宋愚溪、李燕豪、刘明义、王治平、张玉兴、关叔和、蓝恩天等赴会。

12月21日 本会以改良婚姻为题,召开家政讨论会。

1923年

5月21日 本会体育干事董守义出任中国篮球代表队指导,准备参加第六届远东运动会。

7月5日 本会在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新建网球场一处。

8月23日 陈哲甫在本会举行的德育演讲会上演讲。

9月20日 本会准备召开秋季运动会。

10月14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南开学校举行学生退修会。讲员有彭锦章、牧师都立华、张伯苓。讲演内容涉及“如何



使基督实现在我的生命里”和“社会事业基督徒学生有何贡献”。

本年 王治平出任本会总干事。

1924 年

2 月 1 日 本会童子部为学术研究起见,由各会员发起出版半月刊,每月 1、15 日出版。

2 月 18 ~ 25 日 本会发起举办“节俭运动周”。分宣传、展览、集会、经济委办等。另外银行、商业、宗教、学生、教师、慈善、寿险等 11 个团体协办。在“节俭运动周”中举行的主要活动为储蓄、丧嫁、子女教育及预算等专题讲演。

3 月 3 日 本会主办的平民教育会在会所举行开幕式。直隶省长、教育厅长到会演讲。本会主办的平民学校的校址有 4 处:西门内福音堂,承办人为学生同学会刘明义;崇仁宫本会职工部,承办人傅清淮;东马路福音堂,由女青年会主办平民学校;南开美以美会。

3 月 14 日 本会召集扶轮、南开、汇文、同文及青年会各中学代表开会,讨论参加华北运动会篮球、垒球、网球、足球及其他各项运动的选手问题。

4 月 20 日 本日是耶稣复活节。本会在礼堂召开万国特别庆祝大会。到会者男女青年甚为踊跃。特请上海洽得金博士讲演。西北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也专轮山京至津参与盛会,并在会场讲读圣经。最后有克林女士之钢琴独奏,幼女四人合唱。并女士八人歌唱英文圣诗以资助兴。

5 月 17 日 本会学生布道团邀请本市各教会牧师讨论“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事宜。

7 月 18 日 ~ 8 月 4 日 本会童子部第 8 次夏令远足队,赴烟台旅行。活动有洒水、营火、运动、旅行体操、识天然物、水产研究、博物卫生、游览名胜、参观美国军舰、美军武术、查经、音乐、游艺、手工等。



参加活动者有 40 人。

9 月 20 日 本会召开秋季大会,到会者有会员 700 余人。会议由王右丞主持,法政校长李秀夫作《铜元跌价之因果与救济法》的讲演,此外,大会还有美国军乐、体育科、武术团表演以及电影放映。

1925 年

6 月 20 日 本会职工部举行沪案讲演会,由南开大学李家光、褚保华、吴作民及王卓忱向与会裕民、华新、隆源、宝成等 10 几个工厂 300 多名工人作反帝爱国演讲。工人们当即议决:1. 不买日货;2. 不卖英日货;3. 工人努力奋斗;4. 尽力为沪案失业工人捐款。

11 月 12 日 本会儿童珍玩大会开幕,每日参观时间定于下午 4 时至 8 时,展品多为各学校手工及童子部会员制品。其中平均每天参观者近千人之多。

11 月 2、16、26 日 本会篮球竞进会与美国陆军篮球队举行三次比赛。

12 月 16 日 本会童子部会员应邀参观英国电灯房。

12 月 17 日 本会在健身室举行新会员交谊大会。

12 月 由于各乡战地难民纷纷来津避难,无处住宿,天津青年会决定在崇仁宫职工部,设立妇孺收容所。截至 12 月 19 日止,共收养难民达 240 人之多。

本年 会员人数近 1700 人。其中成人 900 多人,少年 700 多人。

1926 年

1 月 24 日 本会参加“天津市民大会”讨张(作霖)排日集会游行活动,宋则久为大会主席并致开会词。

秋 本会董事张伯苓应邀赴烟台青年会参观访问,在烟台青年会作了《公民教育运动》的演讲。



本年 本会体育干事董守义与布鲁士发起“万国篮球锦标赛”，并成立“万国篮球会”，董守义担任副会长，组织本年度的篮球比赛。

本年 本会会员人数达 1300 人，其中成年 700 多人。

1927 年

9 月中旬 在本会会所召开成年会员工作委员会上，总干事郝瑞满在会上提议成立联青社。与会的杨宽麟、杨锦魁、黎宗尧、阮渭涇、顾海田、关颂声、宋愚溪、董守义等人一致赞同，并为联青社的发起人。

9 月 27 日 本会邀请天津各界上层人士 100 多人，在英租界共济大楼召开成立联青社大会。杨锦魁担任主席，颜惠庆演讲。1928 年 6 月 1 日，美国国际联青社给天津联青社发来许可证，正式承认为“万国分社”之一。

秋 上海协会应本会之请，派遣西干事海上来津服务。

本年 本会成立益友社，作为本会会友所组织之小团体之一，其宗旨是“遵守天理、预防腐化、交换知识、联络感情”。

10 月 13 日 关锡斌(管易文)应南开学校青年会邀请讲演，讲题为《青年会的使命》。

1928 年

春 宋愚溪辞去本会代理总干事之职，总干事一职由隐芝琴代理三个月，不久这一职务又由郝瑞满接替。

春 巴黎道分会成立。

春 体育干事董守义《篮球术》一书正式出版。

冬 郝瑞满休假返美，董事部推选杨宽麟为名誉总干事，董守义任执行干事。

本年 会员人数为 1200 人。其中成年会员有 700 人，少年会员



有 500 人。

1929 年

1 月 22 日 天津体育协会在本会会所举行全市足球裁判员资格考试。

2 月 24 日 本会在法租界聚英球房举行天津市全市台球决赛。

9 月 2 日 董守义辞去本会执行干事之职,董事部委海士为总干事,宋愚溪、陈锡三为副总干事。

9 月 本会组织天津万国甲乙组篮球赛,华北地区有 100 多男女篮球队组队参加比赛。

12 月 15 日 本会举办清洁运动大会。

本年 本会智育部同联青社、益友社共同协办的平民补习学校,一年内毕业的人就 300 多人。

1930 年

春 本会派员参加全国春季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其中以篮球的比赛成绩最好。

春 本会智育部举办“公民教育周”和“公民教育研究班”,邀请专门人才讲授。

6 月 12~13 日 第四届远东运动会中国总领队张伯苓和篮球队指导董守义先生返回天津。张伯苓在与《大公报》记者谈话中指出“我国体育落后”,主张“强迫体育教育,以养成体育之爱好”。

9 月 2 日 董守义因平津体育课繁忙之故,辞去本会体育部主任的职务。

下半年 西北灾情奇重,天津青年会发起“西北筹赈会”,朱庆澜将军为委员长。四个月内共募款 43,000 余元,全数汇往灾区。

10 月 27 日 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委员成立,本会董事雍剑秋



当选为常务委员。

11月15日 本会出版《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三十五周年纪念册》一册。胡汉民题写书名,张学良为本会35周年纪念祝辞,同时题词的还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铁道部长孙科、外交部长王正廷、工商部长孔祥熙等人。

本年 本会重新选举董事会,杨锦奎、阮渭涇为正副会长,王晋生为司库,奚东曙为书记。新的董事会董事由金伯平、张伯苓、陈芝琴、周瑞山、张子翔、张周新、周贤颂、雍剑秋等人组成。海上为总干事,宋愚溪副总干事兼会员部主任,陈锡三为执行干事。

本年 本会体育部委员有杨锦魁、陶少普、章辑五、董守义、吴质夫、李壮飞等6人。智育部委员奚东曙、张季高、杜芝良、于鹤年、张建新、王晋生、金峻轩等7人。会员部委员:雍剑秋、杨宽麟、金伯平、郭玉山、董守义、刘建伯等6人。少年部委员:张子翔、阮渭涇、杨宽麟、奚东曙、林柱生等4人。

本年 本会会员人数近1300人。其中:成人1000人,少年近300人。

1931年

3月7日 本会体育部举行国际武术表演大会,其中有日本青年会武术社10名,美国兵营武术团10余名参加表演。表演的项目有美国击技、中国武术、日本柔道等。

9月15日 本会与天津市其他基督教团体一起举行水灾救济会。

9月17日 本会举行游艺会,京剧演唱、西洋音乐演奏等节目。

9月18日 由于美国经济困难,本会的外籍干事全部离华。

10月7~11日 本会邀请艾迪博士来津讲演。7日,他在本会作了《现今世界大局对中国之关系》的演讲。11日,他又在法租界维



斯理堂为观众作了《中国之危机》的演讲。

10月29日 联青社举行例会，全绍吉作《关于西藏情形》的演讲。

11月15日 本会举行庆祝本会成立35周年纪念大会。

本年 第20届征友人数优胜队张周新、赵君达、张子翔、杜用文、章以吴、宋恩溪；分数优胜队，金士宣、王仲琳、徐遂实、谭锦涛、高毅之、王明雨、关仲石、陈锡三。会员人数近900人。其中：成年700人，少年100多人。

1932年

初 联青社决定出资成立“拾球儿童(贫困子弟)义务学校”，以教育为目的，临时雇用10几个儿童，以3~5元的代价，雇用他们从早到晚为英国球场内拾落地的网球。另外，联青社还给他们开办国语、算术等课程，以资灌输教育知识。

2月6日 由巴黎道分会主办的天津《体育周刊》创刊。该报每星期六出版，张伯苓在创刊号上发表《今后我国之体育》一文。

春 陈锡三出任本会总干事一职。

5月28日 本会在北宁公园举办基本会员及各部委办员游园友谊大会。

3月9日 天津体协裁判员在本会会所内举行全体会议。

10月 本会巴黎道分会开办无线电学校。聘请专门人才，担任教授。定期五个月，其毕业生服务于各机构。

11月23日 本会举行万国武技表演大会。

12月3日 本会体育部举办的“第四届室内公开男、女篮球赛”开幕。

12月17日 本会在会所大礼堂举行会员交流大会，有报告、音乐，各小团体表演及电影。



12月20日 本会在巴黎道分会伉俪社举行第二次大会。联欢内容有演讲、讨论、游艺等。

本年 本会主办第二次天津市乒乓球公开赛,并在此次公开赛中增设女子项目。男子单打冠军女子单打冠军分别由李学项和纪文英获得。团体冠军由青萍队获得。

本年 第21届征友人数优胜队:卞白眉、王文典、孟镜宇、张道川、黎绍芬、陈锡三等;分数优胜队6人。

本年 会员人数1600多人。其中成年会员1300多人,少年会员近300人。

1933年

1月7日 本会为使其会员明了世界形势和国内情形,特意举办“特别演讲会”,邀请天津学者、名人讲演。

1月~12月 联青社资助平民服务所开办的“阅览室”,计备有《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午报》、《新天津画报》等报刊,平均每日阅览者达50人,全年达18000余人。

1月~12月 联青社资助平民服务所开办的图书馆书籍系由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发来。每三个月更换一次,每次100余本,分小说、医药、文学、哲学等。每日阅览者平均20余人。本年计600余人。

1月14日~10月28日 本会会员部举行学术讲演会,邀请本市各大学教授或专家演讲。杨豹灵作了《水利问题》的演讲,侯曜作《复活得国魂》的演讲,黄钰生作了《国难教育》的演讲,张崧冠作了《中国之水产业》的演讲,李适生作了《农业与工商业之联系》的演讲。

2月 鉴于东北失守,热河告急,本会联合天津各宗教教徒及热心公益之同道,组织成立天津基督教救济会。

2月24日 本会之小团体“对立”福利社成立。出席会员共有



25人。福利社的宗旨是“对立是联络友谊及研究学术,使感情与理智平均发展,对立是本着我们共同的力量去服务社会”。会上一致通过福利社章程。首任社长为韩午晴,第二任社长为张俭斋。

3月1日 巴黎道分会欧洲语班开始招生,它设立有英文、德文、俄文班。

3月9日 本会召开青年会会员大会,陈宝泉等29人出席。会议通过了财产保管章程,改选三分之一的保管委员,同时选举出董事部新董事陈芝琴、金伯平等人,基本会员有黄作霖、关颂声;会员卞白眉、杜芝良。

3月15日 本会巴黎道分会开办无线电学校。

3月18日 为救国危亡,本会举行国民自新扩大运动大会,张伯苓、陈宝泉、王文典等人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演。

3月23日 本会成立伤兵服务团,一些热心的会员分赴各医院参加伤兵的救护工作。

4月22日 由史未丹率领的法国著名童子军一行2人来津,在本会表演“Wahde Wogel”和德国名剧《死之舞》。

4月 本会分会筹办青年会国术馆。教授太极、八卦、形意拳等武术项目。

5月6~13日 本会举办“公民教育运动周”。内容是有关公民教育的展览及讲演,时子周、李仲吟、郑澄波、张彭春等人到会,发表讲演。其中张彭春作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讲演。

5月 本会在天津东局子组织难民收容所,已收容难民2300多人。

8月5日 救济华北战区灾民委员会成立,本会董事雍剑秋当选为常务董事。

10月 本会成立“伉俪社”。

10月10日~11月8日 本会主办“提倡国货大会”,名誉会长



史敬一、于学忠、雍剑秋；会长王文典、副会长王晋生，陈锡三。参加此次提倡国货大会的参展厂商 80 多家，参展商品在 7000 多种。本次大会上史敬一、宋则久等 13 人发表了讲演。

11 月 1 ~ 18 日 本会巴黎道分会举办摄影展览会，广泛征集了北平、天津摄影作品 238 多件，最后经过评定选出多幅优秀摄影作品。

本年 本会的会长为雍剑秋、副会长杨锦魁、书记王晋生、司库卞倣成；董事张伯苓、陈芝琴、陈宝泉、黄子诚、阮渭泾、周瑞山、王鹏云。总干事为陈锡三。新成立的小团体有少年青进团、青青团、青群团。

本年本会各部委员：会员部杨锦魁等 4 人；德育部雍剑秋等 10 人；财产保管部陈芝琴等 6 人；智育部张伯苓等 4 人；体育部王鹏云等 4 人（有章辑五）；少年部阮渭泾等 4 人；国术委员章兆东等 13 人；征友委员王文典等 5 人。

本年 本会干事部陈锡三总干事；会员部王子英主任干事；庶务科钟嗣庭主任干事；少年部戴云峰主任干事；文牒科杜逢伯主任干事。除以上各部外还有分会所、会计科、平民服务所，设有干事书记或管理员。

本年 本会会员人数 2400 多人。其中成年近 1900 多人，少年 418 人。

1934 年

本年初 本会新征友会员人数为 2850 多人。其中成年会员近 2300 人。少年会员 500 多人。

1 月 13 日 本会为救助灾民，特定期举办游艺会，以资筹款，曲艺、戏曲等，票价每张一元。

1 月 18 日 本会鉴于天津市贫苦儿童冬令饥寒交迫，由少年部



调查并发给 1600 贫儿领物证。并在崇仁宫举行“贫儿会”，内容有国乐、口技、口琴、清唱、双簧等。然后按人分发出本会热心会员捐赠的玉面等物品。

1 月 19 日 本会举行年会。会上改选董事会，新当选的会长雍剑秋、副会长杨锦奎、书记王晋生、司库卞倣成；连任董事有张伯苓、陈芝琴、卞倣成、金伯平；候选董事有：宋□卿、张兰格、关颂声、张周新、黄作霖、林桂生。

1 月 20 日 本会举办全市万国脚踏车赛。

2 月 17 日 本会发起组织天津万国自行车赛，陈宝泉任名誉会长，张伯苓、邓澄波任名誉副会长，赵亚夫任会长兼裁判长。

3 月 4 日 本会与《益世报》联合举办儿童生活运动大会，项目是儿童的健美比赛。

3 月 10~18 日 本会举行扩大宗教生活运动，请中学教员著述并演讲。

3 月 25 日 第二平民服务所首次举办星期演讲会，请师范学校教授王天相先生演讲，题目为《有关于卫生恶习惯》。

3 月 29 日 本会组织“定县晏阳初创办军民教育参观团”计 18 人，有银行经理金峻轩、龚庆恩、章以吴，新华中学校长黄作霖，律师卞仲禾，工程师杨锦魁。此行历经 4 天，对定县的教育、古迹、教育等进行考察参观。

3 月 31 日 第二平民服务所举行游行演讲。请各中学生作游行演讲关于卫生及教育的问题。

4 月 4~8 日 本会在东马路会所举行儿童运动大会。有关于营养及教育方面之读物、衣服、玩具、医药用品展览，并有专家讲演（邓澄波讲儿童教育，黄钰生讲儿童训练，李子曜讲儿童卫生），参观市助产学校、育婴堂和南开小学。

4 月 本会假南开大学举行基本会员、义务员退休会，主席雍剑



秋会长致开会词,张伯苓演讲。然后大会分三组讨论一、社会改造(艾德敷领),二、学生事业(陈锡三领),三、青年与宗教(金伯平领)。

5月13日 本会举行公民教育运动,选举产生天津市十大模范公民。张伯苓、刘孟扬、李仲吟、雍剑秋、祁云五、陈宝泉、叶文楼、赵鹤舫、时子周等人当选为十大模范公民。

5月 本会童子军为募集远征露营的活动经费,举行八国音乐演奏会。

6月20日 本会在会所健身房举行国术表演。

6月30日 本会组织小团体“父母会”,并召开父母大会,邀请三八女子职业学校张人瑞作讲演。

8月1日 本会聘请杨肖彭为少年部主任。

9月1日 本会福利社筹创之“西沽小学校”开学。该校山原育才小学校易名而来。为减轻贫苦家庭的负担起见,特将学费减低为每学期只收一元。现该校有男女学生80余人。

9月2日 本会励育社改选职员,苏成林为社长,栗菊植为副社长,张向寅为会计,莫家鼎为书记。

9月12日 本会少年求是团举行第一次例会,选举王远馨为团长,刘锦涛为书记,程明枢为会计。

9月18日 本会及天津社会各界举行欢迎大会,艾迪博士来津讲演。晚,举行圆桌会议,张伯苓等50多人到会,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有:1. 天津青年道德及生活一般状况;2. 青年对宗教态度等问题。

9月22日 本会少年部友家团举行正式团会。选举团长为张风桐,副团长为李文芳,会计为姚文鸿。领袖为田进之,后改为王远馨。

10月4日 褚民谊在本会会所表演太极拳。

10月8日 天津慈善事业委员会进行内部改选,推选新的董事会筹办冬赈,本会董事雍剑秋当选为常务董事。



11月10日 本会设立广播电台,电台电力为200瓦,呼号为XOKB,并正式向外播音。

11月28日 本会举行国际武术表演大会。表演者有美国、意大利及我国等国的武术爱好者多人。内容主要有美国士兵的拳击、摔跤,意大利士兵表演的拳击以及我国的武术等项目。

12月15日 联青社进行改选,社长王鹏云、副社长黎宗尧、书记赵道生、通讯书记马家驹、司库丁估;董事杨锦奎、陈锡三、林桂生、黄作霖。

1935年

1月1日 本会励青社进行职员改选,王振宇和栗菊植为正、副社长。

1月5日 为提倡会员注重法律常识起见,在本会礼堂举行“法庭表演大会”。法律班领袖及班友等人与本会新剧团合作表演《黑暗家庭》。

1月6日~12月29日 本会举办英文德育讲演会,共进行40多次讲演,并由电台播出。

1月19日 本会举办“学术讲演会”,张彭春作《赵太爷,贵姓》演讲,阐发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观察。

1月26日 本会在法租界分会举行“基本会员年会”(每年一月举行一次),36人到会。雍剑秋会长致开会词,全体唱诗,李瑞禾牧师祈祷,王化清牧师读经,王晋生先生读上次记录卡卜倣成先生作经济报告、阮涓涓先生汇报会务报告、陈芝琴先生报告财产保管部之事工。后通过新基本会员及改选董事,雍剑秋、杨锦魁、陈筱庄、王晋生、宋□卿当选为董事。

2月9日 本会在其人礼堂举行口琴音乐会,音乐会首先由李雪致开会词,后由常学增演奏了各种中外名曲。



2月23日~3月1日 本会举行“父母教育运动”大会,本次父母教育运动大会有400余人到会,大会主要举行了优生学、性教育、胎教、家庭教育等教育活动。郑达如、邓澄波、黄子坚等人在会上发表讲演。同时青年会还在沈王庄教会、西沽小学、南竹林服务所及西关福音堂举行讲演会,借此青年会在沈王庄、西沽、东马路、三义庄组织了四处父母会。

3月2~8日 本会举办以“治学之方法”为总题的学术讲演周。学术周依次邀请了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教授潘光旦、何廉、李书田、蒋梦麟、熊佛西、李适生、赵鉴堂等人作有关治学方法的报告。

3月23~30日 本会主办宗教生活大会。大会特意邀请了佛、耶、回、道、天主教等宗教团体代表作讲演,介绍各宗教的生活情况。同时大会还举行宗教文物展览,唱诗、演剧、出特刊等活动。

4月4~10日 本会举办扩大儿童周,其活动有展览、参观、集合、健美比赛。参加展览的物品有儿童食品、服饰、玩具、用品、作品、图表等。天津市市长张直卿,天津各界社会名人吴秋尘、王婉贞、张人瑞、陈嘉琪、孙金城等人到会。《大公报》特意选登了雷洁琼、张鸿钧等专家关于儿童的文章。7日举行的健美比赛,参加人员达200多名,这次健美比赛也是天津市举行的第一次全市范围内健美活动。

4月20~27日 本会举办卫生周活动,有讲演和展览活动。

4月27日 天津联青社在20日来到北平与北平联青举行联谊活动。北平联青社特意举行扩大欢迎招待会,第一天进行宴会辩论,地点在皇家饭店,北平联青社社长孟广礼作了极为精妙的致辞,他认为如果举行辩论赛,天津的社友一定会输掉比赛,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 北平是文化中心,天津比不了;2. 中国是礼义之邦,北平的社友招待天津社友,他们依礼应该谦让。但最后辩论的结果,天津获胜。其辩论题目为“今日之中国情况下应否节育”。平方主张节育,



津方不主张节育。双方辩论者四人,为了调侃平方,津方四人均带有法国式软兜便帽用来象征节育的所需之物,并以购买航空奖券作为比喻,认为欲中奖,需多买,所以优生则不能节育。平方认为航空奖券即使全买下来,结果一样是吃亏,而且妇女大都赞成节育。当日裁判为全绍文、王锡焯、陈达。第二天,天津联青社还在北平举行了游园览山活动。

4月22日 本会以观光日本文化建设为名,组织赴日旅行团。此行共历经三周,足迹踏遍了东京、大阪、神户、奈良等日本的名胜古迹。

5月4~10日 本会组织新生活运动周,于学忠、张伯苓、王问山、郑达如、陈涌洛到会并发表讲演,此次新生活运动周还举行了新剧的演出。

5月11日 本会举行公民教育运动,举行模范公民选举,到会投票民众约千余人,每人可自由选举自己钦佩之天津市公民十人,投票结果,得票最多之前十人发表如下:一、张伯苓,二、刘孟扬,三、李仲吟,四、雍剑秋,(注:原文似缺第五人姓名),六、祈云五,七、陈宝泉,八、叶文楼,九、赵鹤舫,十、时子周。

5月25日 青年会世界协会总干事哈门(Francis S. Hormon)来津指导本会的会务工作。

5月26日 本会巴黎道分会举行天津市公开脚踏车比赛。参赛的人员有男运动员29名,女运动员18名,最后穆成宽、林秀莲分获男女组冠军。

6月16日 本会联青社儿童游戏场开幕。

6月15日 本会为提倡正当婚礼,免去繁琐奢侈之风气,青年会举行集团婚礼,这次共有9对新人参加活动。这也是华北地区首次集团婚礼。

8月19日 本会商科职业学校开学,学制三年,预科两年。陈



宝泉担任学校董事部董事长。

8月~10月 本会参加天津各界救济水灾联合会,水灾救济会的会址就在青年会会所内,此次共募捐 19 万多元。

9月12日 本会组织进行了“全市公开游艇比赛”。

10月24日 本会前总干事长米会理捐款 1000 元,以作为训练干事专款之用。

10月26日 本会举办“科学运动周”活动,王正路、程松生、高少白、笪经甫、魏明初等人到会,并作了有关科学知识方面的讲演。

10月31日 本会国术班为应付社会需要增设晨练班、女子班,教授太极拳、八卦拳等等。

10月 本会少年部成立“少年社会服务团”,进行每周视察一次工厂、报社等活动。

11月16日 本会举行庆祝 40 周年的庆祝大会。雍剑秋会长致开幕词,商震、张伯苓、格林、阮渭涇、陈锡三等人到会并作讲演。

11月 本会出版《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

12月7日 本会在其会所大礼堂内举行国际音乐会,当天到会者达 500 余人。

本年 本会的董事会名誉会长为商震、程克、张直卿;会长雍剑秋、副会长杨锦奎、司库卞倣成、书记王晋生;董事会董事有张伯苓、陈芝琴、阮渭涇、金伯平、陈宝泉、黄子诚、王鹏云、宋□卿;陈锡三任总干事。会员部主任王子英;智育部主任王正路;少年部主任杨肖彭;体育部主任毛骏民;宗教主任张益三;事务科主任钟洞庭;文牍科主任桂逢伯;会计科主任邵杏题;分会主任陈德轩;电台主任钱仲攻;平民服务所杨鹤寿;财产保管部陈芝琴等。

本年 本会人格救国运动会刊登本会会长雍剑秋著《祸福之门》一书,该书收入了他有关人生、义理等内容的文章 32 篇。



1936年

1月4日 本会巴黎道分会于新年假期之际,举行了第一届象棋比赛。

1月 本会巴黎道分会在三义庄美以美会内主办少年四育养成团。假礼拜堂举办新年庆祝大会。除讲演报告外,并备各种游艺及表演话剧助兴。

1月18日 本会举行基本会员年会。其间除报告事工外,还增选基本会员及改选期满董事。选举会长雍剑秋、副会长陈芝琴、司库杜芝良、书记王晋生。本会公推雍剑秋、金伯平、陈芝琴为全国协会协委。

1月16日 本会举行“儿童技艺播音比赛”,比赛的项目共有唱歌、音乐、演讲和讲故事四项。

1月25日 本会从联络会员感情,提倡工友高尚道德出发,特举行“工界新春同乐大会”。其活动的内容有演讲、有声电影及工友自己制作的各种节目。

2月7日 本会少年部公布贫儿会收支报告,统计捐款数目及款项用途,为贫困儿童买面买棉衣。

2月8日 本会举行“春节会员大会”,邀请了河北省政府教育厅陈宝泉到会,总干事作会务报告。在大会上,青年会员表演了提琴演奏、独唱等节目,此外还邀请市政府乐队奏乐前来助兴表演。

2月23日 本会为阐明真理引人皈依起见,决定举行“青年会福音团”。邀请张周新作“基督的福音”,田畴作“青年与宗教之修养”的讲演,美以美会的毕尔克太太作“爱在活动中”的演讲。

2月29日~3月5日 本会举行“经济生活运动周”活动,特邀南开大学方显廷、刘锦毅教授到会作讲演。

3月4日 本会举行学术演讲周,李书田作有关水利问题的



讲演。

3月23日 本会举行宗教生活运动,邀请英国学者讲“宗教与人生”,并有音乐、诗歌活动表演活动。

3月30日~4月4日 本会协助天津县政府举行“乡村卫生运动周”活动。

4月7日 本会举办儿童健美比赛。

4月18~23日 本会举行卫生演讲大会,藉以唤起民众对于卫生知识之认识及宣传预防传染病之方法。请名大夫李允恪、田人文、丁懋英、芦永春莅会讲演,并有卫生挂图展览,且检查会员身体等。

4月26日 励青社为增长见闻,举行塘沽沿河旅行团。乘航业公司“天行”轮船出发,抵塘参观久大、永利工厂,并举行游艺会。

4月26日 天津联青社开办的儿童体育场开始游戏,本会董事陈芝琴先生慨借河北三马路北首地亩一方作为场址。去年开幕以来,儿童受益匪浅。今年该场大加扩充,设备力求完善,并增加了排球场。

5月16日 济南青年会联青社举行受登典礼,邀请平、津、青三处联青社社员参加。15日,天津联青社应邀派遣十余名代表启程前往。16日,到达济南,受到济南社友的热烈欢迎。在济南青年会稍事休息后,即往省立图书馆参观,旋赴大明湖游览。饭后,往齐鲁大学、广智馆等处参观,4时到省政府赴主席韩复榘宴请。晚6时后,观看济南青年会受登典礼。17日再赴景点游览。

5月30日 本会在法租界维斯理堂举办国际音乐会,邀请天津各国音乐名家参加表演。

5月2日 联青社华北区大会在天津举行,参加此次联青社华北区大会代表有济南、青岛、北平、天津四处。大会地点在新华大楼银行俱乐部。内容有平津两社友网球赛;雄辩会题目为《中国现在应实行小家庭制度》,正方组为天津章以吴、丁佶、王鹏云,负方组为北



平萧澗千、孟广礼、古治安,评判员为丁懋英、赵鉴堂、罗隆基等人。最后,天津队获得优胜奖。

5月中旬 本会少年部出版一册《少年生活画刊》。内容均系本会少年部之各种活动写真。

6月 本会陈锡三总干事赴加拿大留学,在孟垂奥大学进修一年。会务由王子英负责对外联络,杨肖彭负责开展工作活动,钟嗣庭负责内务庶务,组成三人执行委员会,王子英为召集人。由陈芝琴掌握经济。杨肖彭参加联青社活动,王子英参加益友会活动。

7月3日~9月23日 本会组织赴美旅行团,游历西北大公园,圣保罗、芝加哥、底特律、纽约、费城、华盛顿、好莱坞、旧金山、檀香山等30余处。

9月12日 本会为唤起社会人士注意日常游戏中富有体育价值的运动,发起游艇公开赛。

9月14日 本会少年部因“青青团”播音组成立近一年以来,成绩颇佳。特举行“扩大音乐,歌咏的播音”,男女播音员40多人,打破历来播音记录,播出科目有18项之多。

10月3~8日 本会举行“少年健康运动周”。邀请南开学校体育主任章辑五先生前来演讲,南开中学乐队演奏音乐,“春筍剧团”演剧。《大公报》为此出版特刊。

10月6日 天津联青社决定在本月9日晚表演四幕剧《王宝钏》(拜寿、抛球、别窑、团圆),该剧由张兰格编导。5日晚上,联青社在大华饭店举行排练,前往参观者甚众。

10月9日 天津联青社主办的“联青夜”活动在西湖饭店隆重举行。内容分为内外两部,内为来宾跳舞及表演游艺之所,外场为游戏抓彩,奖品分为一等奖为冰箱,二等奖为地毯一床。

10月10日 本会与女医院协助天津县政府成立戒毒医院。医院成立仅两周,就有三四十人出院。为联络其感情,并诊断其出院后



健康状况,又举行“戒毒生回院口”。

10月24日 本会举办集体婚礼。举行集体婚礼宗旨主要是为改良风俗,提倡俭约,尊重婚礼。

10月25日 本会在巴黎道分会举办第一届小学演说竞赛会,在东马路本会大礼堂。最后,汇文学校的王兆先演说的《塞翁失马》、南开学校的黄作华《干》获优胜者奖。

11月5日 本会体育部为训练裁判员人才起见,开始筹备成立裁判员训练班,请专门体育家担负指导和讲师,课程规定为球类、田径、体育原理,运动规则等等。

11月20日 本会举行国际武技表演大会。

12月初 本会举行为期两月的长期篮球表演赛。

1937年

2月 本会成立美术班,两个月毕业;化学工艺班四个月毕业。

2月22日 本会参加绥远战区服务部工作,派干事及义务员前往襄助其事。

2月26日 本会巴黎道分会英日文班开课。英文班教员为英国香港大学毕业女高材生担任教授,日文班为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任教授。

2月 本会为提倡正当兴趣并练习艺术起见,将成立美术班及化学工艺班。美术班两个月毕业,化学班四个月毕业。求是团半日学校、励青社平民晚校先后开学。联青社第一、二平民服务所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并发给笔墨纸书。

5月6、12、19、26日 本会为提倡会员注意国际常识及研究时闻问题起见,特定五月每星期三在巴黎道分会举行“国际问题演讲会”。分别请南开大学教授蔡维藩讲《现代扩军的特点》、《国闻周报》编辑马季廉讲《世界原料分配问题》、南开大学教授林同济讲《世界政治之



趋势》。

5月13日 本会福利社为扩充社务,造福人群起见,召开全体职员会,通过重要议案:设立教育、医药、慈幼三组。教育组则推行西沽小学校添设高级及立案之程序。医药组则拟据一适宜地,设立平民施诊所。慈幼组则筹设托儿所,以期改善劳工生活。

7月28日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华北沦陷。本会总干事陈锡三从国外返回天津,继续任总干事一职。

8月2日 本会董事会在北安利粤餐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日军轰炸天津后的局势和对策。

8月 本会陈锡三总干事根据董事会的意见,为应付时局的变化决定裁员减薪。会中由20多干、职人员减为7人:总干事陈锡三、会员部主任王子英、少年部主任杨肖彭、事务主任钟嗣庭、会计主任邵杏题、会员部干事工锡昌、巴黎道分会事务助理崔耀华。

8月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华北区干事艾德敷抵达天津,赴本会东马路会所视察日军侵入时遭破坏的情况,要求日军赔偿损失。

下半年 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后,本会事工中心由东马路转移至法租界巴黎道会所。在会务工作方面,逐渐恢复了宿舍、食堂、体育馆、阅览室的工作。

秋 天津地区发生大水灾,本会开展各种救济工作,并参加天津基督教协进会救灾天津分会工作,同时深入河北农村,共对天津和河北的17个县发放救济款5.5万元。

本年 开封青年会美国干事师渡尔到天津准备乘轮回国。因战争关系停留天津,夫妇二人担任青年会夜校英语教员,又兼任本会副总干事,领导英文查经班。

本年 本会继续开办英文德育演讲会。由杨肖彭主持,并邀请美国传教士主讲。



1938 年

上半年 经陈锡三总干事提议,董事会通过,邀请美以美会牧师狄克逊(Edward E. Dixon)为副总干事。

本年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灾会天津区分会”多由本会董事和干事充任;杨肖彭为总务组主席,组员郑汝铨和狄克逊。王锡昌、邵杏题、任永康、钟嗣庭分任书记、会计、宣传、庶务工作。经济、调查、施放三组主席分别由杨锦魁、霍培修和李瑞和担任,并负责全部救济工作。

1939 年

8 月 20 日 天津发生罕见的水灾,市内河渠溃决。本会迅速开展水灾救济工作。

8 月 25 日 本会在法租界大明电影院成立了难民收容所,同时还组织会员驾船前往各地营救灾民,为灾民提供粮食。后在耀华学校、大明电影院、开滦医院组织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水灾服务团。

9 月 15 日 应英租界工部局之请,本会将青年会耀华学校收容所服务团调往隆茂仓库收容所工作,并替英工部管理一切。不久,与天津市河北省银行总行合作,组织施医游艇队,约请津市名医每日乘游艇在英法租界为被淹区域的灾民出诊,并免费为灾民预借药品。

9 月 25 日 本会在英法租界选择难民众多的地方成立施诊处,为灾民出诊看病。

1940 年

4 月 15 日 本会水灾救济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从 1939 年 8 月 20 日起,本会努力救助难民工作达 8 月之久。参与服务的人员共计:义务员 25 人,干事 12 人,义务大夫 7 人,受薪大夫 5 人,受薪护



士 5 人,传教士 9 人,教师 3 人,连同工友共约 70 多人。此外这次为灾民募捐活动还为灾民募捐到的款项 374200 元,分别发给天津市、河北省各地的灾民手中。

7~8 月 本会组织会员赴北戴河避暑。

本年 本会组织英文德育讲演 43 次,由伦敦会、通圣会、循道公会、公理会和卫理会轮流负责。听讲者达 1372 人次。

本年 在陈锡三总干事的支持下,杨肖彭主持儿童训练班,授以处世和售货术等技艺知识。

1941 年

2 月 本会派遣巴黎道会所主任杨肖彭与事务主任钟洞庭,出席在上海法租界文林路艾德敷住所召开的北京、上海、天津城市总干事秘密会议。由全国协会艾德敷布置沦陷区青年会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保持青年会本色,尽可能利用租界、会所、设备及会员和原有社会关系开展一些工作。

夏 联青社邀请燕京大学校医部郭德隆讲演《肺结核病对青年的危害及其预防方法》,并为会员检查肺病。

12 月 11 日 日本占领军查封了本会东马路会所。不久,日本宪兵队就逮捕了美国人青年会副总干事狄克逊,使日美矛盾激化。不久又逮捕了主任干事王子英、巴黎道会所宿舍工友张普光。后被释放,但日军的暴行给青年会造成了一种很大精神威胁。

12 月 12 日 本会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讨论应变办法。

本年底 郭德隆大夫在巴黎道会所设结核病诊所,后扩为结核病院,开天津市防治结核病之先河。

1942 年

6 月 6 日 本会雍剑秋会长捐赠六十二路(即今广西路十号)楼



房,设立本会服务部,并扩展学生救济工作。

8月底 本会东马路会所启封。日本华北基督教团天津分会强征东马路会所作为办公室。董事会同意陈锡三辞去总干事职务,职务由阮渭泾代理。

1943 年

1月 本会出版的《天津青年》改名为《会员通讯》月刊。内容贴近生活,其编辑部设在巴黎道会所。

3月8日 本会电台的全部机器设备被以指定低价卖给日伪天津市广播电台。

7月 本会六十二号路服务部附设福音诊所,为贫者免费诊病。

9月 本会《会员通讯》编辑部出版《万丈高楼从地起》一书,杨肖彭作序。后又出版了由宋宝琨主编的《人生如我》、《西笑集》和杨肖彭所编的《英文讲演集》。

本年 本会组织青年学生学唱歌,张肖虎教唱《救救中国》、《要大家奋斗》等歌曲,以激发爱国热情。

1944 年

夏 本会为应付时局的变动,将巴黎道北楼会所向外出租。

1945 年

8月23日 本会召开董事会。会议由阮渭泾主持召开,最后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1. 慰问被拘于山东潍县之各传教士等;2. 俟地方秩序完全安定后,再开始活动。

9月3日 本会恢复正常的会务活动。

本年 本会成立“学生部”,谢纪恩任主任干事。



1946年

上半年 本会谢纪恩干事在南开大学组办“基督教学生团契”。

1月1~2日 本会与维斯理堂联合主办冬赈募款,演唱《弥赛亚》。

1月6日 本会英文夜校恢复招生。

2月23日 本会组织成立由宋致泉领导的“摄影研究班”、张锡鸿律师领导的“法律常识研究班”和冯国良领导的“口琴班”的三个兴趣小组。

3月9日 本会与学联合会合办“时事演讲会”。请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之李烛尘讲演。

3月30日 本会主办联合婚礼,纯为服务,不收任何费用,后每年元旦举行一次。

4月6日 本会在第10区广西路该会服务部请联合国救济总署长之私人代表 Mr. George Mooney 演讲《对全世界的救济》。

4月13日 本会与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及市卫生局举办防疫卫生电影会,分别于13~15日三日晚在广西路、东马路该会所映演电影6场,面向市民。

4月26日 本会请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学院院长赵紫宸来天津演讲。赵氏所制《圣诞曲》一词,翌晚在广西路会所公演,招待各界。

5月26日~6月1日 本会放映反映美国新闻处最新影片,招待会员及其他有关团体。

7月12日 本会举办夏令卫生会一周。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图表、标本展览,免费防疫注射,施发暑药给贫民大众,进行防疫讲演及电影和话剧演出。

10月1日 本会福利社筹设儿童义务学校,公设两班。

10月18日 本会成立国术班。开展八卦拳、少林拳、各种兵器



及各种软硬功夫教授。山国术专家张凤鸣教授、齐如山指导。

11月12日 本会举办庆祝孙中山诞辰,同为慰劳伤兵而举行画展活动。

11月24日 本会文友会在第十区保定路慈慧学校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2月初 本会代为扶抡社办理贷金,北洋、南开、工商三大学中报者共计 200 余人。经审核共录取 40 人。

本年 本会改组董事会。董事长阮渭淦,董事宋裴卿、王晋生、王厚斋、房质彬、卜倣成、冯子樨、周启圭、杜用文、乔维熊。

1947 年

2月 天津学生救济委员会成立,本会学生部主任干事谢纪恩任执行干事。

3月29日 本会举办青年运动周,在十区广西路会所举行青年问题讲演,由南开大学黄钰生主讲青年心理问题,并在东马路会所举行电影会。

5月17日 本会开始举办周末电影会,邀请天津教育局放映教育片。

7月20日 本会总干事杨肖彭赴美考察一年。

9月18日 本会为加强会员的爱国意识,在东马路会所大礼堂举行纪念会,并播放盟军进攻日本的影片。

10月11日 本会福利社筹设儿童义务学校,在河北路该会设两班,举行开学典礼。

10月11日~11月1日 本会年度征友大会举行。杜建时总队长 15 日在市训团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正副队长、顾问及队员。本会青年部李振声主任致开会词。杜总队长演讲《宗教生活》。28 日电影招待会慰劳各队。结果超过目标,征得会员 4267 人,会费及捐



款388,115千元。未举行音乐会,请南开女中歌咏团合唱名曲和陈禹铭昆仲之提琴二重奏,袁效先之钢琴独奏,以资庆祝。

12月13日 本会举办周末会,请吴布音牧师演讲,题为《基督教与佛教之异同》,吴前为虔信佛教,出家后又转入基督教,对两教之教义研究甚深。

12月24日 天津联青社举行周会,特约全国体协总干事董守义讲演《世界第十四届运动会》,并希望联青社能致力于推动发展体育的工作。

12月27日 本会在东马路总会所礼堂举行圣诞庆祝会,由通圣会和圣书学院的教士学生参加合唱,并放映了圣诞故事幻灯片。

12月 本会代替扶轮社办理货金,北洋、南开、工商三大学申报者共计200余人。经审核共录取40人。其中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各15名,工商学院10名。

1948年

1月1日 本会主办的第11届市民联合婚礼,在会所大礼堂举行,由王锡之牧师证婚。

1月3日 本会举办经济问题讲座,邀请达仁商学院袁贤能教授讲《通货问题》,刘敬讲演《保全财产方法》。

1月21日~2月26日 本会举办寒假补习班,在广西路会所上课。

3月29日 本会举办青年问题讲座。邀请《大公报》严仁颖、河北师范学院齐璧亭讲演。

春 联青社决定将义校改为“识字班”,招收失学儿童,以一年为期。

4月3日 本会为纪念青年节在耀华礼堂举行唱歌比赛会,参加比赛和普通组有南大唯歌及工商两歌咏队;中学组有南开甲乙两



队、工商初中、广东、中正音光、新学、河东含光联合、木斋等 11 个歌咏团。此外,唱歌比赛还约请了音乐界神童张志新、张志勤、张志玲三姐妹及袁效先表演,并由广东口琴队、市中国乐社演奏。评判委员会主席由马大夫医院大夫雷爱光担任。

5 月 11 日 本会“益友社”举办科学问题讲座。

5 月 全国协会提议,经本会董事会同意,北美协会派华展谟(James Hall)来津工作。

下半年 本会华展谟和卫理公会狄克逊到东北流亡天津的“临时中学”的学生中去传道。

7~8 月 本会开展天津市助学运动,以配合反内战、反饥饿斗争的开展。

8 月 20 日 国民党反动派以学生救济运动的嫌疑,逮捕本会干事谢纪恩,后直到年底才被保释。

8 月 杨肖彭临时接替郭德隆院长代理天津结核病防治院院长。

8 月 10 日 本会受天津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委员会委托,在东马路会所主办登记难民及发放面粉工作。

10 月 9 日 天津联青社举办“联青夜”活动,开展捐款助赈活动。

10 月 18~21 日 世界青年宗教讲演家艾迪再次来津进行讲演布道活动。

1949 年

1 月 19 日 天津解放后,本会董事宋裴卿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离天津赴香港。

8 月 本会电影院开幕,以此奠定自立自养的经济基础。

8 月 本会“乐园”成立,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都集中定期来会



学习,并开展文娱活动。

12月9日 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备案,本会为合法的人民团体,并为天津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

1950年

上半年 本会夜校已达22个班,分设英、俄语;数理化及商业簿记班,义务小学增为300人。另有青叶及青年两小团体组织各科学习小组。

1月 本会举办的集体婚礼改为每季一次。

2月 本会西沽义务小学开学,改为妇女儿童学校。

2月 本会广西路服务部开办。服务部设有成人识字班、礼乐班、大学生医药救济、中学生流动图书馆、义务小学、夜校(俄文班)、会计班等。

5月1日 本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播放电影免费招待工人同志。

5月4日 本会主办青年联欢会,在东马路和广西路两会所分别举行,上演话剧《人民的血》及歌咏等节目。

6月~7月 本会向天津各大药房募捐暑药,救济贫病者。

夏 本会主办全市夏令公开团体乒乓球赛,有兴业银行、群力、铁马等22个队参赛。

7月1~2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本会播放电影免费招待各界。

8月24日 为纪念八一建军节,本会播放电影招待解放军及军烈属,观看者达500人。

8月19~20日 本会青年剧团在南开中学礼堂为救济失业工人义演《矿山的主人》。

9月7~9日 本会开展防止脑炎的卫生宣传,请天津市卫生局



负责人讲演。天津青 10 月 1 日本会举办国庆游艺会,有魔术、话剧、音乐、口琴、相声等。夜校全体同学参加并招待市民,青年剧团演出话剧《母亲》、《凯旋》及《他回来了》。

9 月 22 ~ 25 日 本会与第八人民文化馆合作举行“和平签名防奸反特宣传大会”。展出内容有:苏联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苏联儿童反特案件以及蒋军暴行等,并开展了和平签名运动。

秋 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基督教界代表,本会杨肖彭总干事参加并发表了《革新宣言》。

10 月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通讯》恢复出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纸杂志登记证新字第 31 号,为不定期刊,发行量 800 份。

12 月 26 日 山本会董事乔维熊、总干事杨肖彭带头发动,举行“反奥斯汀诬蔑”示威大会及宗教界爱国大游行,7000 人参加。

本年 本会统计所属小团体计有:

联青社,有 22 年历史,每周有例会,在 10 区小营门维格多利聚会。每周三请专家讲演,并讨论财经、税收、工商、物价、教育、风俗、见闻以及婚姻法和国际形势等问题。该社组织两处义务小学。社长朱继圣(仁立公司总经理)、副社长李之楠。

青年会口琴队,由石人望在天津青年会开办口琴班两期,在东马路及广西路会所两处,共计 400 人。山两会 50 人联合组成口琴队。由张为栋先生领导,经常参加人民电台的广播及公开表演活动。

青年剧团,谢纪恩负责,有团员 40 余人,经常参加演出。

青年歌咏团,附有广乐组与学习小组,经常参加表演及广播。

基督教青年团契,谢维仲负责,有 10 人。

青年乐团,宋宝琨负责,有 30 人。

报童班,谢维仲负责,有 20 人。

文娱社,谢纪恩负责,有 25 人。



1951 年

2月19日 本会向天津市宗教处登记,填报《天津市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总表》

2月23日 本会原董事长张伯苓逝世。

1953 年

本年 本会举办中级文化学校,共培养 500 名初中毕业生。

1954 年

本年 青年会全国总干事扩大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除继续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外,并为社会青年、基督教青年和对青年会有兴趣的朋友开展有益的事工”的方针。本会杨肖彭总干事参加了会议。

1956 年

下半年 本会文化学校并入天津市第 31 中学。

本年 本会部分会员参加了京津两地基督教青年 100 人赴东北参观的活动,杨肖彭总干事任团长。

1958 年

本年 由本会杨肖彭总干事与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张志淼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将一、东马路青年会大楼一所;二、其全部家具设备;三、青年会在银行的存款三万元统一交给市青年联合会管理。青年会到广西路会所办公,天津青年会开支由市青年联合会负责。



1959 年

年底 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杜德成面告杨肖彭总干事：天津青年会楼房改为出租，年租金为 4970 元，全部家具作价 3 万元拨给青年会。

1960 年

本年 本会杨肖彭总干事编写有关青年会的史料。

1966 年

本年 因爆发“文化大革命”，本会停止工作。

1981 年

3 月 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天津青年会恢复活动，编制 5 人，当时有干事杨肖彭和谢纪恩 2 人。

4 月 9 日 上午，本会正式恢复活动。在广西路 12 号会所召开了董事扩大会议，有原董事和上层会员 20 人，以及天津市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煜文，天津青年联合会主席刘增祺，民委副主任张光华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杨肖彭总干事回顾了天津青年会历史和所做的有益社会的服务工作，并对今后工作做出规划。

10 月 5 日 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代表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天津青年会全体人员出席，并协助会务工作。乔维熊董事长当选为三自爱国会副主委，杨肖彭总干事当选为名誉主任委员，刘清芬任主委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霍培修董事任爱国会副主委和教务委员会名誉主席、苏汉均任教务委员会副主席。本会董事陈洁清、郭德隆，干事谢纪恩、谢维仲分别当选为两会常委



或委员。

10月 美国作家约翰·赫西(John Hersey)来天津访问。访问期间,特意赴天津青年会访问,受到杨肖彭总干事接待。赫西之父曾任天津青年会干事。赫西本人生于天津,访问期间,他走访了新华路童年故居,并拜访其父老友李清安、李友珍、王鹏云等。回国后他在《纽约人》上发表专文介绍本会。天津青年会恢复会务以来,杨肖彭总干事先后接待了十几个国家的基督教团体和 200 多位来访者。

11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合作举办科普卫生知识讲座,请天津市儿保所杜裕生讲《婴幼儿保健》。

11月29日 本会与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合作举办科普卫生知识讲座,请天津市胸科医院预防科主任郭德隆讲《吸烟与冠心病》。

12月5日 本会与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合作举办科普卫生知识讲座,请天津眼科医院赵堪兴医师讲《谈谈青少年的近视眼问题》。

12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合作举办科普卫生知识讲座,请天津药材公司韩义英医师讲《响应党的号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12月2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年”联欢会。

12月31日 本会组成新一届董事会,并召开首次会议。原董事4人:乔维熊(董事长)、郭德隆、崔培修、陈清清;新增选7人:谷源田、郑志雄、李清安、李友珍、岳克川、刘清芬、苏汉均。会上,与会董事们畅谈感想,讨论工作,杨肖彭总干事等三名干事列席会议。会后,本会连续组织了几次会友和基督教青年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为下一步工作做了准备。天津市政府宗教事务处副处长潘连江,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秦福贵到会并讲话。



1982 年

2 月 8 日 本会举办灯节联欢会,老友及基督教青年 60 余人参加。

4 月 21 日 下午,本会组织会友和部分基督教青年 70 余人参观天津特种工艺品厂。

4 月 30 日 本会与天津市宗教事务处、市青年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在水上公园联合举办“五四”青年节基督教青年会游园联欢会。

5 月 25 日 本会组织会友和部分基督教青年 60 余人参观天津塘沽新港码头及造船厂。

5 月 30 日 本会开设英语初级班,试办一个月。招收基督教青年及待业青年参加,由谢维仲干事任教。

6 月 9 日 本会召开第二次董事会,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杨肖彭总干事汇报恢复活动以来的会务工作,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设想,各董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刘长喜代表秦福贵秘书长出席并讲话。

6 月 29 日 下午,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本会会所礼堂联合举办庆祝“七一”联欢会。

6 月 30 日 本会组织会友和部分基督教青年 50 余人参观天津手表厂。

8 月 26 日 本会英语初中级培训班开始招生。

9 月 15 日 本会开设书法培训班。

9 月 30 日 下午,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祝“党的十二大,迎国庆”联欢会。

10 月 23 日 本会组织会友和部分基督教青年 50 余人到大港参观,相继参观了化纤厂、涤纶厂、水产养殖场等处。



11月20日 本会和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友、会员和部分基督教青年70余人参观泥人张彩塑工作室。

12月4日 本会举行第三次董事会,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杨肖彭总干事汇报工作。

12月28日 下午,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年”联欢会。

12月 美国信义会马鼎森(Martinson)牧师率领美国基督教访华参观团一行18人访问天津基督教会,并与教会、天津青年会负责人座谈。

本年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李寿葆、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施如璋视察本会。

1983年

1月9日 本会举行基督教青年座谈会,征求对开展基督教青年工作的意见。

2月3日 本会组织会员、会友50余人赴天津杨柳青年画社参观。

2月11日 本会书法班学员书法作品展览在会所礼堂举行。

2月27日 本会英语初、中级培训班开课。

2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灯节联欢会。

3月2日 本会书法培训班开学。

3月15日 本会老友会召开例会。

3月27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员、会友100人到青年宫参观对台工作宣传展览。

4月9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30余人赴西郊区(今西青区)王稳庄公社参观。

4月16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80



余人参观工艺美术厂。

5月8日 下午,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运动爱国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北宁公园联合举办基督教青年纪念“五四”游园联欢会,共有会员、会友 50 余人参加。

5月25日 本会组织会员 80 余人参观“六一”儿童玩具展销会及佛教寺院大悲院。

5月27~28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赴北京旅游。

6月2~3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赴北京旅游。

6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 80 余人参观第一金属工艺品厂。

6月30日 本会召开第四次董事会,出席的有董事乔维熊、陈洁清、刘清芬、郭德隆,总干事杨肖彭,干事谢维仲、牛冰峰;董事郑志雄、谷源田、李清安、李友珍、岳克川缺席。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谢维仲干事报告本会上半年工作,杨肖彭总干事作报告补充。乔董事长总结指出:旅游、聚餐、座谈都是联系交友的活动;夜校教育应拾遗补缺,继续做好;还要做好外宾接待、回国探亲工作。天津市青年联合会正副秘书长刘长喜、王平到会并讲话。

下半年 老友会例会,共举行 6 次,分别座谈“六届人大改选新国家领导人”、“结合游览海河公园座谈观感”、“打击刑事犯罪”、“参观引滦工程体会”、“各自介绍参加青年会经过”、“学习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等内容。

7月14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 50 余人参观山海关汽水厂和天津糕点食品厂。

8月16~2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 40 余人赴承德旅游。



8月27日 本会英语初中级培训班、口语培训班、书法基础及实用班开学,共计举办英语班8个,口语班1个,招收学员360人。

9月5日 本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天津市卫生宣教所合作,为群众播放卫生科教影片,用以普及卫生知识。

10月4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国庆联欢会。

10月18日 本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天津市卫生宣教所合作,为群众播放卫生科教影片。

10月26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100余人游览海河公园。

11月11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80余人游览西沽公园,赏菊。

11月30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举行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成立基督教青年工作委员会和组织基督教青年团契事宜。

12月6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成立基督教青年工作委员会和组织基督教青年团契事宜。

12月9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80余人参观第三玩具厂。

12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圣诞,迎接新年”联欢会。

12月30日 本会召开第五次董事会,总结1983年本会下半年工作情况,讨论会务,并请老会友和会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年 创立“老友会”。该会是天津青年会的老朋友聚会的组织。最初是组织老友们学习时事政治,进而增加了科学技术、养生保



健、人文景观、金融知识、宗教现状、海外访谈、当代青年等热点问题系列讲座。每次均有 30 余人参加。

1984 年

年初 天津市为筹建青少年活动中心发起募款运动,本会干事、会员、会友踊跃捐款,共认捐 1034 元。天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筹委办特赠送天津青年会“替国家分忧,为后代造福”锦旗一面。

上半年 老友会例会共举行 8 次,主要内容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

3 月 27 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基督教青年观看菲律宾电影《金牌》。

4 月 8 ~ 9 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 40 余人赴蓟县旅游。

5 月 29 日 上海青年会总干事罗冠宗在天津作《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观感》的报告。

6 月 30 日 本会举行董事会例会,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谢维仲干事报告本会上半年工作,杨肖彭总干事做了补充,各董事、干事就旅游、教育、国际交流等方面工作展开讨论。

10 月 1 日 本会召开董事扩大会议暨国庆节座谈会,出席董事有谷源田、李友珍、刘清芬、苏汉均,干事杨肖彭、谢维仲、牛冰峰,以及张澜生、刘畅耀、史玉书等老友参加。杨肖彭讲述青年会历史。李友珍讲新旧中国体育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澜生、刘畅耀展望了青年会的未来。

10 月 21 日 本会请燕京大学校友、美籍华人杨富森介绍“中美习俗礼节之异同”,到会听众 200 余人。

11 月 4 日 本会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Howard Collens 介绍加拿大风光。



11月6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60余人到水上公园碧波庄参观菊展。

11月11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外国语学院勒梅林(兼本会高级英语班教师)讲《英语词汇》,听众80人。此外,还举办了3次英语晚会,每次到会20余人。

12月26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庆祝圣诞联欢会,到会会众250多人。天津市宗教事务处、市青年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到会并讲话。

下半年 老友会例会共举行9次。会议采取中心发言方式,先后有刘畅耀、张澜生、杨肖彭、周明钧作中心发言,张澜生介绍香港近况,刘畅耀漫谈对美国观感。

下半年 本会业校英语班招收学生360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分基础5个班,口语两个班及科技、高级英语共九个班。

1985年

年初 本会英语、日语培训班共开设9班,招收学员370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分基础英语班五个班,专业英语班,口语班三个班,科技英语一个班。

上半年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任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两会领导小组组长,并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三次会议,杨肖彭总干事连任天津市人大常委。

上半年 天津外院讲学的美国费城德莱西大学交换教授罗磊(Rarmord Lovantus)两次拜访杨肖彭总干事,就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先生的历史畅谈多时。

1月18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参



观天津食品一条街。

3月6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灯节联欢会。

3月8日 本会召开第七次董事会,天津市宗教事务处刘增祺处长和市青年联合会孙海麟、刘长喜、尤树根、王平正副秘书长到会指导。

3月21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肖彭总干事讲天津市动态,着重宣讲《市民守则》。

4月4日 老友会例会,请画家严六符讲《书画漫谈》。

4月14日 本会邀请天津外国语学院访问教授 Ramond lorantas 介绍“美国情况”。

同日 本会与茂林书法学院合办离退休老干部书法研究班开学,招收学员 100 余人,分文字、书法史、书谱、技法等专题讲授。

4月17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赴北京旅游。

4月18日 老友会例会,请郑志雄董事介绍访法观感。

4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赴静海县参观大邱庄。

4月29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 50 余人参观天津市总体规划展览。

5月2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政协委员张澜生介绍天津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情况。

5月9日 本会初次举办钢笔字班,招收学员 20 余人。

5月12日 本会邀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Howard Collens 介绍“菲律宾情况”。

5月16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传达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精神,分析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5月21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 50



余人赴白庙工业区参观搪瓷厂。

5月30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图书馆主任杨思慎讲《新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影响》。

6月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赴天津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游览。

6月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再赴天津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游览。

6月13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骏昌先生介绍天津市食品工业的概况。

6月17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50余人参观绒绢工艺品厂。

6月27日 老友会例会,请文史馆馆员、小提琴家马道允介绍深圳之行。

6月29日 本会召开第八次董事会,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杨肖彭总干事、谢纪恩主任干事、谢维仲干事分别汇报1985年上半年工作情况,与会董事讨论下半年本会开展工作的计划,并对工作做了进一步总结。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王平出席本次董事会。

下半年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英语专修班开设,招收学员502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课程开设精读一个班,口语四个班,基础三个班和高级口语班。

下半年 杨肖彭总干事与谢纪恩主任干事参加天津社会学学会年会,谢纪恩就基督教青年和宗教生活问题作了重点发言。

7月12~16日 本会谢维仲干事、牛冰峰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在承德举行的“青年联合会委员为四化做贡献经验交流会”。

8月5~9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旅游。

9月5日 老友会例会,组织会员进行漫谈。



9月9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参观天津市市政建设新成就。

9月14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再次联合组织会员、会友参观天津市市政建设新成就。

9月1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举行庆祝教师节座谈会,两会全体干事和英语班、钢笔字班的教师参加。杨肖彭总干事主持,大家畅谈了感想和体会。

9月19日 老友会例会,请贾东篱讲《上大人孔乙己来源考》。

9月27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40余人赴北京房山县旅游。

9月 本会举办钢笔字提高班。

10月3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政协委员张澜生讲《核动力问题》。下午,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国庆三十六周年联欢会,天津市政府宗教处、市青年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有关领导出席。到会有会员、老友、宗教界人士和信徒青年200余人。

10月17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肖彭总干事传达天津市人大十届四次会议精神。

10月31日 老友会例会,请史玉书介绍其本人与青年会的关系。

11月14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肖彭总干事介绍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劳保条例实施的情况。

11月1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组织会员、会友、基督教青年90余人参观天津照相机厂。

11月24日 本会邀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T Habick 介绍美国情况,到会听众200余人。

11月28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政协委员陈宝实讲《老年人



的保健和长寿》。

11月~12月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随同工商联全国代表团赴香港参观访问。

12月8日 本会邀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Edward Harkness 介绍美国庆祝圣诞节情况,到会听众 200 余人。

12月9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联合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座谈会。燕京大学校友、“一二·九”运动参加者谢维仲主持,杨文泉等回忆了当年参加运动和游行的情况。

12月14日 本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联合邀请在南开大学讲学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讲《我在美国川年》。

12月24日 本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联合邀请乔维熊董事长介绍香港之行的观感。

12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联合举办“贺圣诞,迎新年”联欢会,天津市政府宗教处、市青年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有关领导参加联欢。

本年 本会刘清芬董事随中国基督教代表团访问英国。

本年 本会谢纪恩主任干事参加对台宣传工作。

1986 年

上半年 本会与茂林书法学院联合举办离退休老干部书法研究班。

2月24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灯节联欢会。

3月27日 老友会例会,请胸科专家郭德隆董事讲《生命 健康 疾病》。

3月30日 本会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Edward Harkness 讲



《美国的少数民族》。

4月10日 老友会例会,请周明均介绍其与青年会的关系。

4月1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燕京大学校友会组织会员、会友参观天津古文化街。

4月18日 为残疾人募捐,加拿大人汉森乘坐轮椅周游世界,本日到津。本会为此特发起劝募活动,共募得人民币 163 元。

4月24日 老友会例会,请徐家吕讲《古典文学》。

4月27日 本会请天津外国语学院访问教授 Jay Cullinane 介绍美国概况。

5月4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员、会友赴北京游览。

5月8日 老友会例会,请白占友讲《甲骨文研究》。

5月13日 英国基督教会访问团访问天津,本会乔维熊董事长、苏汉均、刘清芬董事、杨肖彭总干事与之座谈。

5月18日 本会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T Habick 介绍美国习俗。

5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燕京大学校友会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请乔维熊董事长介绍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情况。

6月1日 本会举行英语演讲比赛。

6月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燕京大学校友会再次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

6月28日 本会召开第九次董事会,出席董事有乔维熊、谷源田、苏汉钧、杨骏昌、刘畅耀等,杨肖彭总干事、谢维仲主任干事、牛冰峰干事列席。乔维熊董事长主持会议,谢维仲干事报告工作,杨肖彭总干事作补充发言,到会董事讨论会务,新聘董事杨骏昌、刘畅耀发言。

6月 美籍华人、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家梁夫人来天津访问。本



会杨肖彭总干事介绍其到南开中学访问并与该校师生举行座谈。

7月30日 本会牛冰峰干事参加了由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和侨办联合举办的中日青年夏令营活动。

下半年 本会开设英语专修班,招收学员520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分12个班上课。

7月 英国伯明翰撒利奥克学院新任校长马丁·康威夫妇来访。刘清芬董事负责接待。

8月5~12日 本会谢维仲干事随天津市基督教参观访问团访问青岛、烟台。

8月25~28日 本会杨肖彭总干事作为天津市人大常委,参加人大会议。

8月 本会向非洲受灾国家捐款226.5元。

9月11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肖彭总干事介绍“青年会”。

9月17~28日 本会牛冰峰干事参加天津青年艺术节筹备工作和活动。

9月25日 老友会例会,请郭德隆董事讲《老年人健康问题》。

10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张澜生先生讲《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0月27日 老友会例会,请《长寿》杂志总编张继尧漫谈“编辑杂志的经验和对健康长寿的体会”。

10月28日 本会开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外国语学院 T Moomaw 介绍美国文化。

10月 前燕京大学教授 D Shedick 访问天津,本会郭德隆、杨思慎董事和杨肖彭总干事、谢维仲干事参加接待。

11月3~6日 本会杨肖彭总干事作为天津市人大常委,参加人大会议。

11月6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徐家昌讲《孙中山革命



哲学思想》。

11月9日 本会开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师范大学访问教授 T Price 介绍美国大学生的生活。

11月17日 本会开办英语讲座,请天津经济干部管理学院 Reece 介绍美国历史。

11月20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思慎董事讲《辛亥革命及其失败的原因》。

11月24日 为训练学生英语会话能力,本会特组织“英语之角”活动。

11月30日 本会开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外国语学院 David Klos 讲音乐知识。

12月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化工局卫生研究所顾问金季华讲《老人健康》。

本年 本会杨肖彭总干事出任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并当选该委员会常委,谢维仲干事当选该委员会常务委员。

本年 本会与茂林书法学院合办书法班,共招学员 100 人。

本年 本会配合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未婚青年恋爱观的调查活动。

本年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在苏州举行的“商会与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

本年 本会杨肖彭总干事重新修订《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史》、《八十回忆》等文。

1987 年

年初 本会开设英语专修班,共招收学员 540 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分 12 班。



3月8日 本会青年口琴队恢复活动,每星期六晚7~9时活动。顾问为燕京大学校友赵嘉理,队长是天津起重设备厂工会干部邱景山和煤建四厂调度高达利。

3月12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肖彭总干事讲《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问题》。

3月26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医药公司工程师韩扶生介绍“旅游报导”问题。

3月29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外国语学院 David Klos 讲音乐。

4月4日 本会组织会员、会友76人参观天津SOS儿童村。

4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徐家昌讲《陶渊明生活的真善美》。

4月25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外国语学院新西兰留学生 Stanyon Hellen 介绍新西兰概况。

5月6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漫谈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人的感想。

5月12日 英国基督教(中国教会之友)旅游团来天津访问,本会杨肖彭总干事参加接待工作。

5月17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外国语学院 A Lozynsky 介绍“津巴布韦的教育”。

5月21日 老友会例会,举行老友漫谈。

6月7日 老友会例会,请京剧评论家吴同宾介绍京剧知识。

6月13日 本会组织会员、会友参观天津大悲院。

6月18日 老友会例会,请朱同、李宪章介绍老年羽毛球队访问日本情况。

下半年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开设英语专修班,共招收学员467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分11班。



7月14日 本会杨肖彭总干事逝世。

8月14日~9月15日 本会牛冰峰干事协助青年联合会组织委员到舟山群岛、福州、厦门参观访问。

9月7日 老友会例会,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张隆栋讲《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到会110人。

9月20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大学美籍教师张明珠(Margaret John)讲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in America* .

9月24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讲其本人对青年会的认识。

10月3日 本会宴请英语班15位教职员,同时庆祝教师节,并向老师们表示慰问。

10月4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财贸学院英语教师 Hilary Clark 讲 *the exerienc of being foreigners in two country* .

10月8日 老友会例会,请郭德隆董事讲《保健与长寿》。

10月17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员、会友80余人赴蓟县参观旅游。

10月22日 老友会例会,请林兆丰讲《从珠海经济特区这个窗口看开放政策》。

10月31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员、会友50余人参观天津外环线,并赴水上公园参观菊展。

11月1日 本会京剧兴趣小组恢复活动,有陈宗宽、范旭、田荫渠、卢鹤松等燕京大学校友参加。

11月5日 老友会例会,请庄浩然大夫讲《气功与长寿》。

11月15日 本会举办“我爱新天津”英语演讲比赛,有7人参赛,美国口语班韩远荣和李孟嘉、戚华分别获得第一二三名。

11月19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骏昌董事讲介绍十三大文件的体会。



12月3日 老友会例会,请牛牧师讲“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12月4日 日本青年会学院专门学校副校长小泉勇治郎率团访问本会,牛冰峰干事负责接待。

12月17日 老友会例会,请会友张澜生介绍改革情况。

本年 本会与茂林书法学院合办离退休干部书法学习班,招收学员100人。

本年 本会举办财会培训班,共招收学员24人。

本年 英国女作家韩素音来天津访问,本会杨肖彭总干事等参加接待活动。

本年 本会向黑龙江大兴安岭火灾受灾群众捐赠救济款200元。

1988年

上半年 本会英语专修班,共招收学员290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请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美籍教师乔佳与周明钧老师合开高级口语班。另举办五次“高考英语助学讲座”。

3月17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慎思董事讲《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

3月20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大学美籍教师张明珠(Margaret John)讲《中西文化的差异》。

3月31日 老友会例会,请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薛新翔讲《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

4月11日 本会谢维仲干事被评为1987年度天津成人教育先进工作者。

4月1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第二医学院邵学元、刘倩英漫谈《老年病的病理和防治》。

4月15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妇女联合会李真同志介绍天



津各界赴老山前线慰问团情况。

4月24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教师乔佳讲《广告学》。

4月28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医药公司工程师韩扶生介绍赴西安旅游的知识。

5月8日 本会组织会员、会友赴西安参观旅游。

5月26日 老友会例会,请新华社高级编辑刘桂梁介绍国际问题。

5月29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教师陶智讲《1942~1960百老汇歌舞沿革》。

5月30日 本会举办女中青年健美操学习班开课。

6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南开大学教授贾秀岩介绍物价问题。

6月20日 美国耶鲁大学无伴奏合唱团访问本会,并进行演出交流活动,本会英语专修班、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大学300余名师生观看了演出。

6月23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介绍访问新加坡观感。

6月26日 本会口琴、京剧两团体举办消夏晚会。

下半年 本会英语专修班,共招收学员165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分5班。同时新增“托福考试预备班”。

9月15日 老友会例会,请郭德隆董事谈“如何生活得更健康”。

9月18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迎国庆度中秋”联欢会。

9月29日 老友会例会,请谢纪恩干事讲“解放前青年会学生部工作”。

10月6日 由本会倡议,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天津基督教女



青年会和本会承办的天津市第二届青年艺术节宗教界青年文艺联欢晚会举行。天津市委常委杨竞衡、市政协副主席肖元、市委统战部长黎钦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观看了演出。

10月13日 老友会例会,请京剧评论家吴同宾谈京剧艺术。

10月27日 老友会例会,组织会友观看天津市第二届青年艺术节宗教界青年文艺联欢会录像。

10月30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员、会友40余人参观北京慕田峪长城。

11月10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人大代表讲《满清宫廷文化》。

11月12日 本会牛冰峰干事赴南京参加“中口青年友谊厅落成典礼”。

11月2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医学院教授崔志潭讲《衰老与长寿》。

11月29日 本会谢维仲干事参加天津市政协、市委统战部主办的各界人士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经验交流会。

12月22日 老友会例会,请新华社高级编辑刘桂梁介绍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12月27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在天津市政协礼堂举办“庆圣诞,迎新年团契联欢会”。

1989年

上半年 本会英语专修班,共招收学员100余人,学员来自工程技术、医务、文教各界。

2月21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会所联合举办灯节联欢会。



3月16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政协委员刘海龙介绍中医中药的现状和问题。

3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燕京大学校友会、沪江大学校友会、中西女中校友会联合邀请美国哈莫尼亚区罗克演奏团创建人万长炎(宇航工程师)在会所礼堂举办音乐欣赏会。

3月30日 老友会例会,请南开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李宏硕讲《蒋经国病故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分析》。

4月13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电力局技协秘书长刘铭新讲“电的回忆和现状”。

4月20日 本会口琴队在南开大学分校进行演出活动,受到师生欢迎。

4月27日 老友会例会,请会友何矩楨介绍天津市霓虹灯业的今昔状况。

5月1日 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本会举办口琴演奏会。

5月11日 老友会例会,请杨肖彭董事之子杨大辛讲《天津近代史话》。

5月14日 本会举办英语讲座,请天津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美籍教师 Tomclay 讲《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

5月31日 本会口琴队在铃铛阁中学进行演出活动,受到师生欢迎。

6月8日 老友会例会,请刘名君大夫漫谈气功。

下半年 继续招收英语专修班学员 109 人,开设美国口语、新概念英语等四个班。

7月 本会牛冰峰、杜锡参加在上海召开的青年会全国工作座谈会。

9月7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作《不平凡的暑假》的演讲。



9月13日 组织男女青年会会员参观天津罐头厂,此外还组织参观了水上公园菊展及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9月21日 老友会例会,为老友播放了《五十天的回顾与思考》、《飘扬吧,共和国的旗帜》录像片。

秋末 本会协助京津冀三省市青年联合会组织的医疗服务队赴冀东老区迁西县山区义诊,同时开展医疗卫生科普宣传活动。在3天里,为离退休老干部及群众义诊千余人次,听课300余人次,并散发了《农村卫生》、《避孕与节育》等20种小册子1000册。

10月5日 老友会例会,请市文史馆副馆长孙竞宇讲《天津文史馆工作》。

10月19日 老友会例会,请北方曲校讲师刘文亨讲《天津相声史话》。

10月1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建国40周年联欢会”,天津市有关单位领导参加。

10月15日 本会与女青年会合组会员100余人赴十渡旅游。

11月16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人民艺术剧院郑天庸讲“目前电视剧状况”。

11月30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国际投资公司工程师周沛泉讲“天津化工行业引进项目及出国见闻”。

11月 本会郑志雄董事赴日本,代表中国麻醉学会参加世界麻醉学年会。

12月6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牛冰峰干事、杜锡并代表谢纪恩干事分别拜访了谷源田、郭德隆、陈清清、郑志雄、杨忠慎、刘清芬、杨骏昌、苏汉钧各董事进行慰问并就本会的作用和工作交换了意见。

12月1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人民银行倪邦逵讲《天津外汇管理工作》。



12 月底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午音乐联欢会”，天津市有关单位领导参加。

1990 年

年初 本会开办“助学讲座”，为中学生升学进行辅导活动。请邸永生担任校长，并聘请了有关学科的著名中学教师任教，先后聘请津京重点学校特级和高级教师共 40 余位任教。

1 月 6 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出席了天津市青年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并作专题发言，希望广大青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贡献青春。

4 月 本会成立“天津新力青友合唱团”。该团是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组织的合唱团。其前身是本会会员团契音乐组，请原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杨今豪教授任顾问兼指挥。多年来排练演唱了圣诗，世界名曲，民族歌曲等，并参加了大宾馆的圣诞、复活节演出，举办专场音乐会。在参加天津市业余比赛中，获指挥、表演、伴奏、编曲、组织五项奖。

夏 天津市西郊区、静海县遭受雹灾，本会特捐款 300 元。

12 月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举行首次演出。

1991 年

3 月 28 日 老友会例会，请牛冰峰干事传达上海全国政协“面向 21 世纪研讨会”的情况。

3 月 本会举办首届高考英语助学讲座，1500 人参加。聘请京津特级教师授课。这次讲座属于义务为社会服务不收学费，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

4 月 11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图标研究会副会长蒋靖工程



师讲《中国图标学》。

4月25日 老友会例会，请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美史学会会长张友伦教授讲《美国史》。

5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河东区政协委员姚士馨律师讲《老年人法律保护》。

5月10日 老友会例会，请全国人大代表、本会董事长乔维熊传达全国人大会议精神。

5月23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烹饪学会理事白庆华特级厨师介绍中国菜。

6月6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图标学研究会副会长蒋靖工程师讲《世界图标学》。

6月13日 老友会例会，放映录像《本世纪的战争——海湾战争》。

6月20日、7月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烹饪学会理事特级厨师白庆华讲《中国各大菜系》。

6月29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的青友合唱团，参加全市庆“七一”歌颂党的200人人合唱。

9月12、26日 老友会例会，请市烟酒专卖局解衍奇科长讲《中国名酒与酒文化》。

9月2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合办了庆“十一”联欢会。

秋 本会积极捐款支援灾区人民，共捐款330元。

10月10~24日 本会举办讲座，请韩扶生会员讲《中国旅游珍宝——佛像》；天津文史馆员徐家昌讲《孔子》。

10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会员、会友100余人参加北宁公园举办秋季登高游园会。

10月 本会口琴队应天津广播电台要求录制口琴艺术专题音



乐节日,并介绍了本队活动历史,演奏的多种形式及其作品。该队成为全国口琴协会理事单位后,参加 1992 年 9 月的全国口琴比赛。

11 月 15 日 老友会例会,请中共天津市委社教研室主任廖竞讲《当前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11 月 20 ~ 21 日 香港基督教代表团一行 20 余人到天津访问,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了会见及接待工作。

12 月 5 日 本会请天津致公党副秘书长陈天日讲《中国致公党》。

12 月 19 日 老友会例会,放映录像《反对和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渗透》。

12 月 23 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的青友合唱团参加天津市合唱协会成立会的庆祝演出。

12 月 25 日 青友合唱团在市音乐厅举办了“迎新年音乐会”。天津市委常委杨竞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桦、市政协副主席肖元、何国模、市委统战部长刘增祺,以及宗教局、水利局、团市委、市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人出席观看了演出。《今晚报》、天津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作了报道。

12 月 29 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庆圣诞联欢会,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丙学、市宗教局副局长王博瀛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并分别讲话。

本年 本会英语专修班经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重新登记后,经天津市第二教育局批准,更名为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文化进修部,办学专业主要为英语。本年招生达 200 人,开办 8 个班,以口语为主。并举办了两次师生联谊活动。

本年 本会与市爱乐协会共同举办了六次讲座,每次听众达 80 人;共同举办的纪念莫扎特逝世 200 周年音乐会,到会听众达 150 人。



本年 本会京剧社每周活动一次,节日联欢参加演出。

1992年

1月9日 上海青年会总干事李寿葆、施如璋、李亚平、金蔚联袂来津视察工作,在天津期间分别会见了天津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市青年联合会、市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同志,并就本会的工作交换了意见,对本会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同日 老友会例会,放映录像天津青友合唱团圣诞音乐会演出实况。

5月 青友合唱团参加天津市第二届合唱团艺术节,获“优秀演出奖”、“专业指挥奖”、“专业伴奏奖”、“最佳创作奖”、“优秀组织奖”五项奖。

9月 青友合唱团与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家长合唱团同台演出。

9月 青友合唱团参加“李叔同(弘一法师)圆寂50周年纪念音乐会”演出。

10月2日 本会与北京联合会联合在北京青年会礼堂举行了“京津两地名家高考助学讲师团”成立大会。讲师团宗旨:对高考生进行义务助学、义务咨询,并义务支持培训青年教师及边远地区教师,共聘请23位全国知名特、高级教师组成。乔维熊董事长到会祝贺并颁发了聘书。

12月19~20日 青友合唱团举办“圣诞音乐会”,杨今豪指挥,张婉玲钢琴伴奏。

本年 本会组织“老友会”讲座五讲。

本年 本会组织会员赴北京、威海和西安旅游活动3次。

本年 本会开办了“高考助学讲座”。共开设语文、历史、数学、物理、英语五门课,共34讲。听讲者有8800人次,聘请天津特、高级



教师各 10 位,外院教授 1 位;北京 3 位。

本年 本会开办了“中招助学讲座”,共开设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共 18 讲,听讲者有 4000 余人次。

1993 年

1 月 10 日 ~ 2 月 17 日 本会发起了一次“93’新春献爱心”活动,共捐款 465 元,服装 300 多件及部分学习、生活用品,送儿童福利院。天津电台在 2 月 22 日的《海河晨光》中做了报道。

2 月 25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文史馆馆员徐家昌讲《传统诗歌的现代化问题》。

3 月 11 日 老友会例会,请中国银行陶宗谦讲《当前世界金融贸易的若干问题》。

3 月 25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工来华介绍访美见闻。

4 月 8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郝麦收讲《老年婚姻问题》。

4 月 22 日 老友会例会,请南开大学教授宋海燕讲《关贸问题研讨会情况》。

5 月 6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孙仲一讲《天津经济》。

5 月 11 日 韩国光州青年会访问团一行 5 人访问天津。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接待,并介绍本会的概况。

5 月 20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文史馆馆员徐家昌讲《孔子学说之现代价值》。

5 月 21 日 本会组织男女青年会会员 40 人,游览了杨村小世界。

6 月 3 日 老友会例会,组织观看录像《圣诞耶路撒冷 5000 年》;
9 月 16 日看《青春畅想曲》。



6月17日 老友例会,请天津市物价局刘黔德讲《国内物价问题及发展》。

6月24日 随日本友好代表团来津访问的神户青年会体育主事山根泉先生参加了天津与神户建立友好城市庆祝活动,并与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等负责人进行座谈。乔董事长介绍了我会筹办100周年纪念活动情况,并提出双方建立友好市会的意向,双方愿进一步磋商,双方互赠礼品并摄影留念。

8月17~22日 本会崔胜干事组织并参加了天津市男女青年会首届夏令营。

8月23日 青友合唱团与台湾高雄女青年会妇女合唱团在音乐厅同台演出,受到广泛好评。

8月 本会举行基督教青年联谊会,并多方位地宣传了我国宗教政策和坚持走三自的道路的必要性。

9月1日 本会继续举办高考助学讲座,共31次,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外语五门。请天津特级教师10名、高级教师8名任课,参加学员7800人次,于翌年6月8日结束。同时中招助学讲座开5门课,讲23次。增开英语、语文二班,讲12次课,学员8600人次,受到社会广泛赞誉。

9月23日 老友会例会,乔维熊董事长讲《青年会100周年纪念活动各项工作安排》。

9月 本会英语夜校开班,计有英语高三在学同步班、现代美国口语班、商贸英语班。

10月14日 老友会例会,请团市委郭栋讲《POP文化和北京人在纽约》。

10月28日 老友会例会,请团市委楚斌讲《当今行业青年状况》。

11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致公党主委、南开大学教授李



宏硕介绍访台情况。

11月17~20日 本会牛冰峰、杜锡、崔胜三位同工参加天津市宗教局举办的宗教界外事人员培训班。

11月25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宗教局石志华讲《天津市宗教管理工作及党的宗教政策》。

12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罗世龙介绍青年工作。

12月23~25日 青友合唱团派出30人小分队先后在本市三所四星级宾馆、饭店进行营业演出,共8场,受到广泛盛赞。演出对传播严肃音乐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自养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12月14、24日 青友合唱团参加天津市总工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演出和天津市举办的纪念晚会。

12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合办了“庆圣诞迎新年联欢会”。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李长兴,市宗教局正副局长刘长喜、王博迎,市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赵顺利等参加。

本年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本年 本会同工杜锡参加了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八届三次全委会,并在会上介绍了我会开展高考、中招助学讲座情况。

本年 本会培训部正式加入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协会,收费许可证号:津和费证字54-1-38号。

1994年

1月8日~4月2日 1994年中招“语、数、外、理、化”助学名家讲座继续由本会与民盟市委会助学中心合办。

3月3日 老友会例会,请唐玉福工程师讲《周林生物频谱治疗仪使用及发展》。



3月17日 老友会例会,举行老友工作研讨会。

3月31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介绍全国人代会情况。

4月14日 老友会例会,请姒喜孙先生介绍集邮的趣味。

4月28日 老友会例会,播放录像片《台情参考》。

4月 本会代表参加“1994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服务全局,找准位置,发挥优势,努力奉献》的发言。

5月11日 老友会例会,组织北京世界公园旅游。

5月20日 老友会例会,请张澜生董事主持座谈。

6月9日 老友会例会,播放录像片“台情参考”。

6月23日 老友会例会,请张澜生董事介绍本会董事会会议情况。

6月18日 本会为增补新董事召开中断了七年的董事会,即1994年第1次会议。乔维熊董事长致开幕词,介绍青年会的性质和历史;本会10年来的七项活动;明确本会当前任务和作用;并宣布决定每季度召开一次董事会。

新一届董事为:董事长乔维熊

副董事长张元龙

董事:(按姓氏笔画为序)

孔约翰、边嘉琨、吕斌、刘清芬、刘耀新、杨今豪、谷源田、张澜生、郑天增、郑志雄、武国维、高伦、徐少英、郭德隆、崔约翰、韩文光。

干事:总干事(待补)主任干事:牛冰峰 干事:杜锡、崔胜

8月17~31日 本会牛冰峰主任干事、崔胜干事参加“西安——延安希望工程夏令营”活动,为1995年在天津开展此项工作吸收了经验。

8月 本会董事吕斌访问香港,受到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热情接待。



9月15日 老友会例会,请团市委郭栋漫谈访问香港感想。

9月2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李世瑜漫谈访美观感。

10月8日 本会召开本年第二次董事会。张元龙副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商讨本会 100 周年庆祝活动;汇报接待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团来津访问的情况;吕斌董事访港情况;汇报干事参加“西安——延安希望工程夏令营”活动的情况。

10月13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第二医附院高伦董事讲《颈椎病的预防、治疗、保健》。

10月27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胡光叨讲《天津城市环境美》。

11月10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林纯业讲《天津商业发展概况》。

11月2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任云兰讲《天津商会商事公断》。

12月8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王兆祥讲《天津民间宗教》。

12月22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宋美云讲《北洋军阀和天津城市发展》。

12月20日 本会召开本年第一次董事会。张元龙副董事长主持会议。乔维熊董事长传达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对本会的希望与要求。会议通过了本年工作总结和 1995 年工作重点(本会百周年庆典设想及会所、经费)等。会议成立了百周年庆典筹备工作组;本会基金筹备组,由董事分任。会议还增聘了天津市基督教两会秘书长孔约翰牧师为本会董事。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王伯迎、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世龙、团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戴蕴等参加了会议。他们对本会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12月21~22日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在天津市音乐厅举办中



外名曲音乐会,并邀著名歌唱家楼乾贵、李孚生、倪容华、陈蓉蓉、韩艾等同台演出。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文桀、钱其璈、刘文藩,市政协副主席廖灿辉,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绍宗等出席。

本年 本会继续开办“高考助学讲座”,聘请邸永生任负责人,京津两地特、高级教师 40 余位任教,坚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宗旨,教学水平较高,受到天津市二教局的肯定和学生家长好评。

1995 年

1 月 18 日 ~ 29 日 本会牛冰峰主任干事随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十事访问团访问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3 月 9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马玉珍演讲《日本妇女面面观》。

3 月 22 日 老友会例会,请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崔国良演讲《关于南开话剧》。

3 月 27 ~ 30 日 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李亚平总干事来津视察工作。

3 月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牛冰峰主任干事参加在武汉举行的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研讨会。

4 月 5 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乔维熊董事长传达全国人大会议精神。

4 月 19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林纯业演讲《日本的经济膨胀及其独占中国总战略》。

4 月 29 日 新力青友会合唱团参加天津音协举办的“迎世乒、庆五一”音乐会。

5 月 3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林纯业演讲《“七七”前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活动》。

5 月 1 ~ 3 日 以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钟澄汉总干事为团长



的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访问团一行五人来津考察“95'内地 香港青年服务工作交流计划——儿童希望工程夏令营”的前期准备工作。该营是本会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联合主办。

5月17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姚洪卓演讲《天津事变》。

5月31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姚洪卓演讲《华北伪政权》。

6月1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姚洪卓演讲《日伪统治时期的天津外贸》。

6月28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张利民演讲《日本对华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演变》。

6月 本会参加由中宣部、全国总工会、总政治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团中央、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全国群众歌咏比赛,获得三等奖。

8月18日~29日 本会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广州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内地 香港青年服务工作交流计划——希望工程夏令营”活动,来自香港、天津、广州、北京、西安的70余名义工导师分别在天津市蓟县宋家营乡、官场乡,为当地两所学校500名儿童开展服务工作。

8月31日 本会参加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广播电视局及天津警备区政治部联合举办的“天津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歌咏大会”。

8月 本会吕斌董事随中国青年会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中日青年和平研讨会。

9月20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崔胜下事介绍夏令营情况和百



周年纪念筹备情况。

10月2日 经本会干事提议和倡导,本会义工联谊会正式成立。会上拟定了今后一年的发展计划,联谊会设主席一人、书记一人、司库一人,张惠娟被推举为第一届联谊会主席。

10月4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张利民演讲《日本对华北铁路的统治与抗日居民的破击战》。

10月13日 本会牛冰峰主任干事参加中日青年会联络委员会会议。

10月17~18日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成立一百周年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基督教两会主席丁光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王光英,天津市领导高德占、张立昌、李建国、聂璧初、刘晋峰、鲁学政、张好生、李长兴、黄炎智,全国三白副主席兼秘书长罗冠宗,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公会长吴肇光等领导为本会百周年题词。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顾问李寿葆、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为本会百周年题写了贺词。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协会和各有关单位发来贺电。

10月17日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召开成立百周年庆祝大会,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永根,老同志吴振、何国模,天津市宗教局局长刘长喜,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庞金华出席了纪念大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协公,各地市会负责人参加了庆典活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永根在会上作了纪念讲话,本会董事长乔维熊发表讲话。

10月18日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继续召开成立百周年纪念大会,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李亚平、金蔚和各地市会负责人及国际友人300多人参加,本会董事长乔维熊致欢迎词,副董事长张元龙作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百周年来工作报告,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罗世龙



发表讲话。会后,国内外来宾参观本会百周年历史展览。晚,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演出文艺节目。

11月1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汪寿松演讲《抗战时期“永、久、黄”》。

11月15日 老友会例会,本会牛冰峰主任干事介绍天津青年会百周年庆典情况并播放录像。

11月29日 老友会例会,本会张澜生董事谈《当前形势及体育新闻热点》。

12月6日 本会召开董事会,总结百周年庆典活动经验和本年工作,同时研究1996年工作设想,制定工作重点。

12月9日 本会议工联谊会举办儿童周末口营活动开营。本次活动是义工们自发组织起来为解决双职工和没有实行新工时制单位职工子女周末没人看管的具体困难而举办的。

12月17日 本会与天津新力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在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联合举办纪念世界残疾日,一片爱心向明天主题活动。乔维熊董事长、新力公司总经理宋冀生、天津市民政局有关领导参加了本次活动。

1996年

3月20日 老友会例会,请韩扶生介绍旅游知识。

4月3日 老友会例会,请乔维熊董事长介绍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

4月9~15日 应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随同天津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访问香港。访问期间,分别参观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各处会所、书院、中学、老人服务中心、聋哑人服务中心、弱智人庇护工厂等服务设施,并参加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同工月会等处。



4月10日 老友会例会,请焦振山讲“现代营养保健品对人体的作用”。

4月24日 老友会例会,请焦振山讲“功能性食品与人体保健知识”。

4月28日~7月16日 由本会无偿提供会所礼堂,由本会杨今豪董事捐助演出经费,并由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与天津音乐家协会合唱会合作举办8次“双周免费音乐会”。

5月8日 老友会例会,请韩扶生讲“三峡游记”。

5月22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张澜生董事讲《中国严重的淡水危机》。

6月5日 老友会例会,请任佐讲《历史上青年会支持学生运动的回顾》。

6月8日 本会文化进修部部分特级、高级教师参加天津市宗教局举办的“天津市宗教界为社会献爱心咨询服务”活动。

6月19日 老友会例会,请汪洋介绍台湾之行。

本年 本会义工联谊会举办“儿童周末日营”活动,为周末不休息的双职工及会所周围社区的儿童提供照顾,并由义工带领开展有意义的康体活动。

7月31日~8月6日 本会崔胜干事随天津青年联合会“聋哑青年代表团”赴香港参加由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第二十届国际失聪青年营”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台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聋哑青年、聋哑教育专家及青年会干事参加。在本次活动中,天津聋哑青年表演的“春江花月夜”、“草原牧民”等八个舞蹈节目受到来自各国朋友的高度评价。

8月16~27日 本会组织10名义工赴北京参加由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内地—香港青年服务工作交



流计划——儿童希望工程夏令口营”活动。

9月初 天津电视台播放本会口琴队演出。

9月21日 本会义工联谊会举办年度会议。

9月2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会在冶金局礼堂举办“庆中秋迎国庆联欢会”。

10月1~9日 本会牛冰峰主任干事赴日本参加神户青年会建会110周年庆典活动,并参加神户青年会举办的“跨向21世纪青年研讨会”。

10月16日 本会合唱团组织部分团员参加电影《太阳火》拍摄。

10月25~31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牛冰峰主任干事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赴香港参加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建会95周年庆典活动,牛冰峰主任干事还参加了“青年会华人领袖研讨会”。

11月16~19日 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邀请,美国奥矾塔大学董事访问团一行来天津进行访问交流、经贸洽谈,并向天津市长递交美国阿肯色州政府的友好信件。

12月8日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应邀参加天津市委、市政府举办的“1996天津——跨向新世纪文艺晚会”演出。

12月16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天津市政协礼堂举办“庆圣诞、迎新年联欢会”。

12月21日 本会组织义工联谊会成员赴天津市儿童福利院,开展服务活动。

本年 本会继续开办高考、中考助学讲座,各36次,另开办“中小学教育同步班”39班、“小学英语提高班”5班。

本年 本会与爱乐协会合作举办六次免费音乐讲座,每次到会的音乐爱好者达200余人。



1997年

3月26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乔维熊董事长传达全国人大第八届第五次会议精神。

4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青少年研究所郭栋讲“跨世纪的青年一代”。

4月23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青少年研究所郭栋讲“国际大都市的建设”。

4月29日 根据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建议,经天津市委、市宗教局、市青年联合会批准本会联青社工作,并于本日举行复社典礼。亚洲联青社社长安贤□、国际联青社议员仇永平、香港地区联青社第一副总监方淑范等来宾,以及天津市宗教局、市青年联合会、市委统战部等单位领导到会祝贺,大会一致推举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为复社后第一任社长。

5月10日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在音苑礼堂参加“天津市第三届合唱艺术节”。

5月11日 本会口琴队参加天津冶金工业学校举办的“迎香港回归”口琴演奏会,口琴队的表演获得天津市各界广泛赞誉,15日,《天津日报》对此活动进行了报道。

5月14日 本会召开第一次董事会,牛冰峰主任干事就本会上半年工作情况作了总结,并提出下半年工作安排,乔维熊董事长在会上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报告等,本次会议决定聘请文飏为本会董事,牛冰峰任副总干事,崔胜任主任干事。

5月22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会员任佐讲“城市规划”问题。

5月24~25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接待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神学博士、芬兰男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一行多人,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向友人介绍了本会情况,并宴请该



团全体成员。

6月5日 老友会例会,请原天津市科委主任甄建民作“当代社会科学纵横谈”报告。

6月19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外事办公室陈卫明介绍香港知识。

7月3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孔约翰董事谈“目前中国基督教情况”。

7月15~22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带领本会部分义工赴山西参加“中港台青年生态环境保护研讨营”活动。

7月17日 本会组织老友会会员观看记录片《海之啸》。

8月4~9日 本会接待以宫口满雄会长、山口澈总干事率领的日本神户青年会代表团,并与该团举行座谈会,分别介绍各自青年会所做的工作情况。

8月13~24日 本会崔胜主任干事带领本会部分义工赴南京参加“内地、香港青年服务交流计划”。

8月15~16日 本会接待日本大阪联青社来访的藤川卞基一行。

8月18~19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赴上海参加中日联络委员会会议。

8月19~21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在上海参加“三年规划工作和外事工作会议”。

8月23~25日 本会与香港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主办“97一片爱心向明天”夏令营,并在天津市武清县曹子里乡西掘河小学开展活动,活动内容分为组织学生开展口营活动和对当地老年人进行体检并传授卫生知识。此次活动结束后,本会鉴于学校体育设备年久失修,决定向西掘河小学捐助1000元人民币用以修缮设备。

9月13~22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到北京参加“社区工作



培训”。

9月22~26日 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李亚平来天津视察工作。

9月25日 老友会例会,请韩扶生介绍京九铁路及其旅游点。

9月28日 本会议工分会进行新一届主席改选,蒋海滨当选为1998届义工分会主席。

10月10日 老友会例会,请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邢中柱讲“心率失常的诊断”。

10月14日 本会召开第二次常务董事会,牛冰峰副总干事汇报8月在成都召开的青年会全国协会会议精神和今后三年的规划,乔维熊董事长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提出十五大后本会应本着“有为才能有位”思想来开展本会工作,以适应社会发展,解决自养问题。此外,与会董事就解决本会公所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24日 老友会例会,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邢中柱讲“科学工作者支持、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问题。

11月6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韩扶生漫谈旅游问题。

11月18日 本会口琴队高达利、武健应天津海关邀请,参加天津市海关系统文艺汇演。

11月20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培训部顾问邸永生漫谈教育问题。

12月15日 本会举办的首期“下岗人员计算机免费培训班”举行开学典礼,共招收35名学员,分别来自天津市冶金、一轻、二轻、机械等4个局单位。团市委领导参加了本次开学典礼,并对本会义举给予充分肯定。

12月19日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在天津音乐学院礼堂举办“庆圣诞、迎新年”合唱音乐会。



12月23日 本会联青社召开会议,总结复社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对1998年工作做了初步计划。晚,新力青友合唱团参加由天津市政府举办的新年联欢会演出活动。

12月26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爱国会、天津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举办“庆圣诞、迎新年”联欢会,天津市委统战部、宗教局、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到会与本会同度佳节。

本年 本会文化进修部开设高考助学讲座共36次,参加人数达2052人次;中考助学讲座共72次,参加人数达6000人次;本会与南开区教研室、三十一中学等学校合作,以及本会培训部举办的中小学同步班共计30讲,参加人数达5000人次。

本年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参加天津市委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大型庆祝会。

本年 本会口琴队与台湾台北中山国立二小口琴乐团、黄石口琴乐团、高雄《口琴家》杂志,及蒋荣欣、许永哲口琴演奏家进行交流,观摩演出,切磋琴艺。

1998年

1月10~12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崔胜主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九届第三次全委会。

1月12~16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赴杭州参加“全国总干事工作研讨会”及“内地—香港联络会议”。

1月31日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常务董事李寿葆来天津视察工作,乔维熊董事长、吕斌董事、文鹰董事、牛冰峰副总干事陪同接待。

1月 本会口琴队应天津海关邀请参加海关系统文艺演出。

3月1~16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由青年联合会主办的



甘肃、新疆考察活动。

3月12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图书馆研究员康军讲“当前图书市场”。

3月25日 老友会例会,请全国中医脑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讲“老年养生”。

4月9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传达全国人大第九届第一次会议精神。

4月23日 老友会例会,请韩扶生漫谈旅游。

4月 本会组织部分义工赴香港进行培训,在港期间受到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热情接待,并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义工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切磋。

5月7日 老友会例会,请本会孔约翰董事介绍天津基督教现状。

5月21日 老友会例会,请原《天津日报》社编辑徐致介绍国际形势。

5月 本会口琴队被邀请参加全国口琴名家演奏会。

6月4日 老友会例会,请电业局高级工程师李津尧介绍“家庭影院、VCD知识”。

6月18日 老友会例会,再次请本会孔约翰董事介绍天津基督教现状。

6月21日 本会为乔维熊董事长举行八十寿辰庆祝活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永根,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主委朱文架,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郭金侯,以及天津市宗教局、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年联合会、市工商联、市政协、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业余大学、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单位领导、负责人出席了祝寿会,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主持了会议,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永根讲话,充分肯定乔维熊董事长一生的业绩和对事业的工作态度



度,朱文策、张炳学等先生先后向乔维熊董事长致词。

7月19~26日 在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统一安排下,本会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台南基督教青年会、西安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城市环保青年研讨营”活动。本会派出以牛冰峰副总干事为团长,由南开大学环科系师生参加的团队共24人赴香港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研讨重点在“废物处理、水质处理、企业环保、环保教育”四个方面。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7月30日~8月1日 本会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市武清县曹子里乡西掘河小学联合举办“内地 香港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

7月31日~8月8日 由本会崔胜主任干事任领队,由天津聋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访问团一行7人赴韩国参加“第二十一届国际失聪青年营”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挪威、台北、香港、西安等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会130余人参加。天津市残疾人在本次活动中向世界展示了天津在特殊教育、康复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天津市在残疾人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

7月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委托本会将92400元人民币第一期捐款致送1997年1月遭受强烈地震灾害的张北县,帮助重建该县李家营小学。

8月15~26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率团赴杭州参加“迈向2000—中国心”夏令营。

9月1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和北京青年会朱琦主任干事陪同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钟澄汉总干事一行4人到张北县参加李家营小学落成典礼。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乔登贵,市政府副秘书长许伟文,市民政局党委书记王士原等领导同志会见了钟澄汉先生一行,为表达对青年会的感激之情,将原小学命名为青年会李家营小学,并立碑以示纪念。



9月3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钟澄汉总干事及夫人一行多人访问本会,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牛冰峰副总干事、主任干事崔胜,以及吕斌、文飏董事参加了会见。

9月16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社区工作交流团来天津参观,访问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及天津青年会。当晚,天津青年会宴请该团成员,乔维熊董事长、戴蕴秘书长、文飏董事、吕斌董事、牛冰峰副总干事等人出席。

9月17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委员与甘肃省青年代表团交流座谈会”。

10月4日 本会义工分会举行新一届主席选举,一致推举朱明为青年会义工第四届主席,米娟为书记。

10月8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营养学会顾景范讲《老年营养》。

10月22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医药研究所曾淑范讲《糖尿病的防治》。

11月5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市外事办公室新闻处副处长陈卫民漫谈国际政治动向。

11月19日 老友会例会,请国务院港澳办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受荣讲“从香港经济看国际经济趋向”。

12月3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宏硕纵谈两岸关系。

同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常委会。

12月11~12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崔胜主任干事出席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四次全委会。

12月16~22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组织的青友合唱团应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邀请,赴港进行为期一周的合唱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合唱团先后访问参观了香港青年会九龙会所、必街



青年会、青年会书院、新界会所等处。19 日晚,青友合唱团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了大型音乐晚会,受到了香港各界热烈欢迎。

12 月 17 日 老友会例会,请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长王大□漫谈教育问题。

12 月 28 日 本会与天津基督教爱国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年”联欢会,天津市委统战部、宗教局、妇女联合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到会与本会同度佳节。

12 月 本会口琴队被邀请参加全国口琴名家演奏会。

本年 本会文化进修班共举办高考助学讲座 36 次,听课近 4000 人次;中考助学讲座 72 次,听课 7000 人次;小学同步班若干次,听课近 6000 人次。

本年 本会举办第二期“下岗人员计算机免费培训班”。

本年 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本会连续多次参加捐助灾区的救济活动,向灾区人民表达爱心。

本年 本会被天津市民政局评选为 1995 ~ 1998 年度百名先进社团之一。

1999 年

1 月 28 日 本会召开董事会,天津市政府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等领导出席。

1 月 本会开办免费少儿声乐初级培训班。

2 月 5 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郑汉钧访问本会。

4 月 19 ~ 25 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随天津市宗教局代表团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交流访问。

4 月 23 ~ 29 日 本会崔胜主任干事随天津市少工委代表团出访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5 月 20 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郭文藻、董事孔宪绍、



总干事易嘉濂等人访问天津,天津市委统战部、宗教局、青年联合会等有关单位领导及本会董事、干事会见并接待。

5月31日~6月14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温哥华基督教青年会,并进行参观考察。

6月1日 原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罗世龙先生于本日到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

7月15日~8月16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先后随天津市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赴台湾、甘肃、澳门等地交流访问。

7月23~30日 由本会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台南基督教青年会和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的两岸四地“99’城市环保研讨营”在天津、大连举行。共有70余名青年参加本次活动,在活动中研讨营成员分别参观了天津与大连的开发区及两地各处污水处理厂等处,通过了解各地环保情况,进行经验交流。

8月3日 本会新力青友合唱团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圣乐团在天津音乐学院演奏厅同台演出。

9月18日 本会与蓟县下营中学签订协议,下营中学正式成为本会志愿服务基地。

9月28日 本会在天津市政协俱乐部议事厅举行“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座谈会”,天津市政协、天津市政府、团市委、市青年联合会等有关单位领导出席本次座谈会,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风年、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相继发表讲话,对青年会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对今后工作提出希望。

10月18~23日 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主办,本会承办的中日联络委员会会议在天津举行。19日,中日青年会在友谊宾馆召开“青年会的营地与发展”讨论会暨中日青年会联络委员会例会。参加会议的中方代表分别来自全国协会、上海、武汉、西安、南京、杭



州、天津等地,日本代表分别来自日本青年会全国同盟、东京、大阪、名古屋、奈良、三重、广岛等地,会议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金蔚主持,本会罗世龙总干事致词。本次会议,中日青年会代表分别就青年会营地与发展、第五次中日青年和平研讨会评估及中日青年会之间交流与合作项目等展开讨论。22日,中日青年会同盟代表团参观本会会所及会所所属志愿服务基地。

10月29日~11月8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联青聋人中心来天津交流访问。

10月 本会开办少儿声乐培训班中级班。

11月2~5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应邀访问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并到其所属各服务处参观访问。

11月6~8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应邀参加在澳门召开的“迈向21世纪社会工作研讨会”,并访问澳门青年会。

12月2日 本会与天津银河高级中学联合成立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合唱团。

12月18日 本会在天津友谊宾馆主办“1999 圣诞,跨越 2000,走向春天联欢会”,天津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市青年联合会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本会所属各团体及本会志愿服务基地——蓟县下营中学、天津聋哑学校师生均到会参加。

12月24~29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竹园会所 17 名义工来天津服务。

12月 本会成立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大马康必砾少儿合唱团。

2000 年

1月5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九届第五次常委会。



1月7~8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九届第五次全委会。

1月10~1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清华大学“中国非盈利组织管理干部研讨班”。

1月24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郑汉钧访问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接待郑汉钧等人,共同交流两地青年会工作情况。

1月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天津市第十三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市政协第十届第三次会议。

2月8日 本会少儿合唱团到鹤童老人院慰问演出。

2月20日 本会少儿合唱团到福康老人院慰问演出。

2月29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致函李盛霖市长,呼吁解决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所问题。

3月7~1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赴西安参加“内地 香港联络委员会会议”,本次会议就两地青年会的发展及交流情况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并对今后双方交流和合作思路与计划展开研讨。

3月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赴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九届第三次会议,在会上,他就反腐倡廉问题作了发言。

4月12~13日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蔡葵等人来本会访问。

4月17日~5月10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随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赴欧洲访问。

4月26日 本会义工分会参加天津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音乐知识大赛,获得集体参与奖。

5月1~3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牛冰峰副总干事赴上海参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百年庆典活动。



5月16~17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访问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5月22~28日 本会同工、义工4人随青年会全国协会代表团赴香港参加“迈向百周年杯康体运动邀请赛”。

5月27日~6月2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交流访问。

6月1日 本会少儿合唱团参加天津市“同在阳光下”庆六一演出活动。

6月22日~7月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赴日本神户基督教青年会访问。访问期间,天津、神户负责人就两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干事培训、共同发展教育事工等方面工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

下半年 本会开办免费知识讲座共计6次。

7月25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带领口琴乐团赴北京空军某部驻津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及联欢活动。

7月27日 本会与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举行志愿服务基地签字仪式。

7月28日 本会在河西区文静里社区举办“YMCA之夜”消夏晚会,同时举行授予志愿服务基地牌匾仪式。

8月3~5日 韩国釜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林东奎、联青社社长徐金圣等4人到本会访问,考察本会发展情况等。访问期间,釜山、天津两会负责人就合作、交流及联合开展事工活动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

8月16~17日 武汉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涂汉桥等一行5人到本会访问,了解天津宗教界自养方面的有关政策和先进经验。

8月16~20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带领同工、义工、艺术顾问等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开展“心连心”活动。



8月21~2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到张家口专程看望青年会李家营小学师生。

8月30日~9月8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随天津市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赴江西井冈山地区慰问考察。

9月2日 本会举办的免费口琴培训班,共招收学员38人。

9月13日 天津市宗教局有关领导来本会视察。

9月16日 本会在蓟县下营中学举行志愿服务基地授牌仪式,来自北京、天津两地的青年会义工47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9月17日 天津、北京两地义工开展登长城比赛,并进行交流、参观等活动。

9月29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现代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星光灿烂”联欢晚会,同时举行授予志愿服务基地牌匾仪式。

10月1日 本会少儿合唱团参加由本会与天津市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举办的“红旗飘飘”庆国庆文艺演出。

10月6日 本会在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举行“枫叶情”联欢会,同时举行授予志愿服务基地牌匾仪式。

10月12~16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属必爱之家、必爱之家宿舍、华爱之家、天平老人中心宿舍组团120人来津交流。

10月15日 本会举办的免费民谣吉他培训班开课。

10月25日 天津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到本会视察并了解情况。罗世龙总干事做青年会一年来工作情况汇报和新世纪工作计划的详细介绍。

11月12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带领青年合唱团赴北京与挪威基督教青年会合唱团、北京青友合唱团进行交流演出,此次演出为青年合唱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国际交流活动。

11月21~27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带领本会艺术顾问、志愿服务基地负责人及天津电视台记者一行8人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交流访问。

12月24日 本会义工分会召开第五届全体会议,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等有关单位领导,以及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张澜生董事、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了本次会议。孙凤年副局长、乔董事长、罗总干事分别讲话,义工分会主席朱明做了工作总结,并选举第五届义工分会主席、副主席。会上,本会董事会还向张澜生、杨今豪、邸永生、邱景山、高达利等5位老先生颁发了“十年服务奖”,向张惠娟等7名义工颁发了“五年服务奖”。

同日 本会会员、同工、义工欢度圣诞佳节。

12月30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年迈向新世纪”联欢会。天津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夏宝龙及天津市宗教局、民政局、团市委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本次联欢会,天津市民委主任、宗教局局长李仁智代表夏宝龙副市长致词,高度赞扬了基督教“四会”对天津市发展做出的贡献,并对与会者致以节日问候。

12月 本会举行“2000年回顾图片展”,本展览分“青年会简介”、“文化活动”、“服务基地建设”、“对外交流”、“组织建设”五部分,以大量图片和资料文字全面介绍了本会在2000年中所开展的各项事工和取得的成绩。

本年 本会义工分会全年定期活动共52次。

本年 本会为下营中学筹办图书馆,共筹募图书三万余册,价值8万余元。

本年 本会文化进修部开设初高中助学讲座,共服务11980人次。

本年 本会面向社会各界开办免费知识讲座15次。

本年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今晚报》、《天津青年报》、《天津煤建报》、《天津老年时报》、《天津工人报》等媒体介绍、宣传本会共计



15次。

2001年

1月9~14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并提交本会《关于解决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所问题》的提案。

1月11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接待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郑汉钧一行来津访问。

1月10~16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天津市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

1月14日 本会开设的免费民谣吉他初级、中级培训班开课。

1月20日 本会召集各文艺团体负责人、艺术顾问及天津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召开文化工作会议。

同日 本会聘请何悦律师为本会法律顾问，向本会无偿提供法律服务。

1月29日~2月2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随天津市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赴香港考察。

1月31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组织的“声讨邪教法轮功”的会议。

2月3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声讨邪教法轮功”座谈会。

2月12日 本会成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烛光画社，聘请天津画院院长李志强为社长。

2月22日 本会与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开大学校友会、南开大学高教研究所、天津教育史研究会在天津市政协礼堂联合举办“纪念张伯苓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座谈会”。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永根、市领导王鸿江等领导同志，以及南开大



学侯白新校长、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等 150 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2 月 25 日 ~ 3 月 2 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赴香港参加“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百周年庆典开幕礼暨抗逆韧力研讨会”。

3 月 6 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参加全国人人第九届第四次会议。

3 月 16 日 本会被鹤童老人福利协会增补为理事单位,并聘请罗世龙总干事为专家组成员。

3 月 23 日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赵克正、秘书长陈福顺等政协委员,就“加强天津文化建设,提高天津文化品位”专题到本会视察,并进行座谈。座谈中,市政协委员们听取了罗世龙总干事所作《关于开展社会公益性群众文化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对本会在群众文化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3 月 本会成立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东方明珠服饰表演团。

3 月 本会成立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民谣吉它俱乐部。

4 月 18 日 本会烛光画社在本会志愿服务基地——王兰庄举办新春笔会。

4 月底 本会举行“支持北京申办 2008 奥运会”集体签名活动。

5 月 1 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现代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青春年华”联欢会。

5 月 4 日 本会组织义工分会欢庆“五四”青年节。

5 月 6 日 本会所属团体在天津电视台参加“YMCA 杯第二届音乐知识大赛”决赛录制。

5 月 10 日 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风午等领导视察本会。

5 月 14 日 本会成立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老年文学社。

5 月 23 日 本会义工分会召开第五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会议,会上各执委对前一阶段义工分会工作进行了



总结。

5月29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常委委员会会议。

5月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乔维熊统战工作文集》正式出版，该书辑录了乔维熊董事长在人大、政协、民建、青年联合会、工商联，以及青年会、海外联谊会、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业余大学工作时的各类发言、讲稿、文章124篇，50余万字。

6月1日 本会少儿合唱团参加了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为了西部的孩子”大型少儿专场演出。

6月17日 本会文化进修部举办教师联谊会，用以表示对教师及教师眷属的慰问和感谢。

同日 本会口琴团参加天津市庆祝建党80周年口琴音乐会。

6月18~24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赴武汉参加武汉基督教青年会成立90周年庆祝会。

6月24日 本会义工分会、老年文学社举办“庆祝建党八十周年联谊会”。

上半年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共计7次。

7月1日 本会组织同工、义工赴北京观看升旗仪式及建党八十周年图片展。

7月1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参加“人口老龄化与养生社会化——鹤童个案研究课题论证会”。

7月25日 “《乔维熊统战工作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天津市政协会议厅召开。

7月26日~8月1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率代表团赴香港参加“2001年国际失聪夏令营”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北京、天津、西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人参加。

7 月 27 日 ~ 8 月 2 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赴柬埔寨、澳门交流访问。

7 月 30 日 本会口琴乐团、义工分会参加天津武警总队第六支队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演出。

8 月 9 ~ 10 日 韩国釜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林东奎一行 12 人访问本会。访问期间,天津联青社与釜山新日联青社签订友好合作协议。

8 月 12 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河西区文静里小区举办“美丽的家园”消夏晚会。

8 月 16 ~ 20 日 本会组织干事会、义工分会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花淖尔盟学习考察,旨在使义工了解我国西部地区状况,同时收集“环境保护及土地沙化”等方面相关资料。

8 月 25 日 本会文化进修部举办的 2001 ~ 2002 年度中学课程培训班开课。

8 月 26 ~ 30 日 日本神户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宫田满雄、总干事山口徹、理事武田寿子、水野雄二访问本会。访问期间,本会与神户青年会签订友好合作协议。

9 月 10 日 本会老年文学社邀请小说家扈其震做“小小小说的鉴赏与写作”专题讲座。

9 月 16 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蓟县下营中学举办“新世纪新起点”服务口营活动,请天津科技产业园区总公司总经理任学峰作“当代电子科技知识”的专题讲座,并为该中学师生演出文艺节目,同时,捐资 2000 元用以资助 3 名贫困学生。

9 月 24 日 本会老年文学社邀请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汤吉夫作“当前小说创作”专题讲座。

9 月 27 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



年联合会举办的“庆国庆,迎中秋‘明月今宵情’”联欢会。同日,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关信平讲《当代社会问题分析》。

9月28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庆祝建国52周年座谈会”。

同日 本会与天津女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举办“天津青友合唱团建团十周年合唱音乐会”。

10月初 本会录制体现本会各项工作的VCD光盘,以及本会所属各文艺团体、艺术顾问经典曲目的CD各一张。其中VCD主要内容介绍本会新世纪初始的活动概况,以及本会在“德智体群”四育方面开展活动情况。

10月11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南文石先生讲《台湾问题》。

10月21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举办“九九重阳”慰问活动。

10月17~21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赴香港参加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百周年及系列庆典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会代表,各有关部门相关人士2000余人参加。张元龙副董事长向香港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一百周年表示了祝贺,并赠送了礼品。

10月25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市老龄委副主任王辉讲《网络知识简介》。

10月29日~11月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率团访问韩国釜山基督教青年会。访问期间,天津、釜山两青年会结为友好市会,签订友好合作协议,访问团参观釜山青年会会所及青年



训练会馆等处。同时,两会就今后两地青年会如何加强合作进行了会谈,达成共识。在韩期间,访问团还顺访了汉城基督教青年会。

11月8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市图书馆研究室主任康军介绍新书。

11月13日 本会义工分会召开第五届第二次执委会会议,本次会议对义工分会前一阶段工作进行了简要总结,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决定将义工分会划分为综合活动组、文体组、服务组、组织管理组,同时制定了各组工作职能,分配负责人,以便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11月14日~12月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城市地区的公共设施、社会福利、老年人服务等。

11月22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中央党校函授分院《学习与信息》副主编林忠雄讲《日本简史》。

12月6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马玉珍讲《当代日本状况》。

12月12日 由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周绍熙主持召开“关于解决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所问题”提案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天津市政府、天津市政协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多位政协委员。会上天津市政府提案处处长王树春详细介绍了天津市政府落实提案的情况,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对该项提案做了详细介绍,与会人员广泛参加讨论,并对解决好本会会所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了进一步探讨。

12月24日 本会烛光画社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白雪美术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画展。

12月27~31日 本会代表团赴香港参加由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香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题为“团结青年力量”国际青少年营活动。本次活动共有来自中国北京、天津、西安、武汉、香港、台湾,以



及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地区的 70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各地青年会的相互了解和交流,而且对于培养青少年团结合作、服务社会的精神都大有裨益。

12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年‘爱满人间’”联欢会。

本年 本会义工分会全年共定期活动 52 次,召开执行委员会 2 次。本会义工坚持到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服务共 35 次,服务 1040 人次。

本年 本会为蓟县下营中学筹办图书 1 万余册,价值 3 万余元。

本年 本会文化进修部开设初高中助学讲座各一班,全年听课共 10500 人次。

本年 本会面向社会各界开办免费知识讲座 15 次,听课 1000 人次。

本年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天津有线电视台、《今晚报》、《天津青年报》、《天津老年时报》等媒体介绍、宣传本会各项活动共计 20 次。

2002 年

1月31日~2月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第二次全委会。

2月5~6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慰问本会董事及文化进修部部分教师。

2月14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执行干事胡定邦一行来天津访问。

2月15日 本会义工分会在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举行春节团拜活动。



2月17~19日 日本神户青年会一行2人来天津访问,参观本会文静里会所,并与天津青年会所属协作单位就互派留学生问题进行研究并达成共识。

2月26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中共天津市委党外人士元宵联欢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2月27日 下午,本会在河西区文静里会所召开“2002年文化工作会议”,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及本会艺术顾问、所属各文艺团体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各团体负责人总结了2001年工作情况,并汇报了2002年工作计划和设想,罗世龙总干事介绍了2002年在开展文艺活动方面的安排。

3月5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同日 本会义工分会召开了第五届第三次执委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此次会议,会议对义工分会前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检查各小组工作情况,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安排。

3月23日~4月10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表团赴美访问。在美期间,访问团一行参加了美国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圣地亚哥举办的“2002年美国青年会事工博览会”,还访问了美国青年会全国协会并参加了题为“会员招募策划”的研讨。此后访问纽约、檀香山等地青年会,并与之进行交流。

3月27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潘允康讲《社会改革与心理障碍》。

4月11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原滨海办公室总工程师陆征懋讲“滨海新区的来龙去脉”。

4月20日 本会义工分会参加了由鹤童老年福利协会举办的



“非营利组织论坛”，牛冰峰副总干事及义工代表出席此次活动。

4月21~27日 本会张元龙副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市政协第十届第五次会议。

4月23日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郑汉钧来本会访问，乔维熊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共同接待，宾主双方就两地青年会进一步合作和发展进行了交流。

4月23~28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参加天津市人大第十三届第五次会议。

4月25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作家冯景元讲《创作的准备》。

4月28日 本会烛光画社应邀参加在北京海洋馆举行的“蓝色空间”环境雕塑艺术展。

5月1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现代职业中等专科学校举办“同沐阳光”联欢会。

5月6日 本会所属各团体参加“YMCA杯音乐知识大赛”的决赛录制。

5月9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南开大学教授杨心恒讲《中华魂》。

5月23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原天津社科院院长王辉讲《关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6月6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与信息》林忠雄副主编介绍德国情况。

6月29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民委宗教界庆“七一”书画笔会。

7月22日~8月11日 本会文化进修部暑期开设初高中培



训班。

7月18~20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张元龙副董事长出席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张元龙副董事长当选工商联会长,本会武国维当选为工商联副会长。

7月31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河西区文静里校区举办“夏夜亲情”消夏晚会。

8月4日 本会部分干事搬入天津市西青区王兰庄花园8号别墅办公。

8月24日 本会文化进修部开办的“2002~2003学年度初一至高三年级培训班”开课,共招收学员231名。

9月14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名誉总干事郑汝铨先生九十五寿辰庆祝会。

9月15日 本会义工分会赴志愿服务基地——天津蓟县下营中学开展“快乐征程”服务日营活动,并捐款2277.7元,用以资助3名贫困学生。

9月18~22日 本会东方明珠服饰表演团代表天津参加“第十四届大连国际服装节”,获得“中老年模特大赛”团体金奖冠军,同时还获得最佳上镜、最佳活力、最佳表演等9项个人奖,并应邀参加棒槌岛服装节演出。

9月19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师范大学扬弃教授讲《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9月25~27日 本会承办了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主办的“第三次中韩青年会联络委员会会议”,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代总干事金蔚、韩国青年会全国同盟总干事李南周,以及来自中国天津、北京、武汉、西安、杭州、广州、韩国汉城、大邱、釜山、龟尾等地青年会的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在本次会议上,乔维熊董事长作了



欢迎发言,罗世龙总干事在“青年会在新世纪的价值”研讨例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9月26日 本会为王兰庄村民举办了“王兰庄金秋之夜”联欢会,并举行授予志愿服务基地牌匾的仪式。

10月7日 天津电视台播放了“王兰庄金秋之夜”联欢会录像。

10月10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民革天津市委员会祖统委员何秋田先生介绍台湾情况。

10月18日 本会接待美国纽约、夏威夷青年会干事、义工访问团,该访问团参观了本会文静里会所,并收看了本会会务及事工的专题片。罗世龙总干事与纽约、夏威夷两青年会负责人商谈了今后的合作意向。

10月31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市侨联副主委王立子介绍“侨联和华侨工作”。

11月21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天津市图书馆研究室主任康军介绍当前新书。

12月5~14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随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表团赴台湾高雄、台南、台中、台北等地青年会访问。

12月9~15日 以天津市民委主任、宗教局局长李仁智为团长的本会代表团一行7人赴香港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具体了解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事工的发展情况,并参观了该会九龙、新界会所、乌溪沙营地、天平老人中心、盛爱之家等,以及幼稚园、小学、中学、书院等服务设施。

12月12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赵梦兰老师讲《美国青少年教育》。



12月24日 本会乔维熊董事长、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宗教局组织的“天津市天主教、基督教圣诞座谈会”，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宝龙，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叶厚荣、天津市宗教局局长李仁智，以及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了会议。会上，乔维熊董事长作了题为“恭贺圣诞，答谢慰问”的发言。

同日 本会义工分会第六届全体会议召开，罗世龙总干事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义工分会主席陈阿红做了 2000 ~ 2002 年度义工分会工作报告，并对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进行了新一届义工分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选举魏书鹏为新一届义工分会主席，潘春兰为副主席。

12月28日 本会与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举办“庆圣诞、迎新年”圣诞联欢会。

12月29日 本会义工分会在河西区文静里会所召开第六届第一次执委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对义工分会各执委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同时讨论了 2003 年义工分会的内部建设、组织工作等。

本年 本会义工分会定期举行活动 52 次，到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服务 54 次，服务 1620 人次。

本年 本会文化进修部开设初高中培训班，共服务 12960 人次。

本年 本会面向社会各界老年人开办免费知识讲座 12 次，听课 840 人次。

本年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天津有线电视台、《今晚报》、《天津青年报》、《天津老年时报》等媒体介绍、宣传本会各项活动共计 23 次。



2003年

1月2~7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率团赴美国夏威夷进行经济考察。

1月14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第三次主席办公会。

1月15日 本会董事会在河西区文静里会所召开,天津市民委副主任、市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团市委副书记李虹、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崔欣祥等有关单位领导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乔维熊董事长主持,罗世龙总干事代表董事会、干事会作本届本会工作报告。本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本会董事会更名为理事会的决议》,并讨论了新一届理事会组成人选,会议选举张元龙为本会理事长,选举罗世龙、王国柱等12人为本会理事。

1月16~2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市政协社会及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月18~24日 本会乔维熊名誉理事长、张元龙理事长参加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张元龙理事长当选为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月26日 本会承办天津市民族宗教局主办的春节联欢会,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夏宝龙、天津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炳学、天津市民委主任、宗教局局长李仁智等领导,本会乔维熊名誉理事长,以及天津市各民族代表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领袖等出席联欢会。

2月13~14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第三次全委会。

2月23日 本会在体育宾馆召开了天津青年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天津市宗教局局长李仁智、副局长孙凤年、团市委副书记王润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罗世龙总干事作了《继



往开来,与时俱进,走有中国特色的 YMCA 发展道路》的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了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张元龙为本会理事长,选举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世龙、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王国柱、副秘书长杨佳智、天津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鲁杰、天津电视台文艺部编导倪音海、天津肿瘤医院副院长王平、天津市河西法院副院长史宝龙、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天津市京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文熨、天津迅龙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心宽、维信(天津)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永宽、天津市大力神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铁励等 12 人为我会理事。天津市宗教局局长李仁智向新任理事颁发了聘书。此次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聘请乔维熊先生为天津青年会名誉理事长的决议》和《关于聘请张澜生等五人为天津青年会名誉理事的决议》,本会新任理事长张元龙、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风年分别向乔维熊先生、张澜生先生、杨今豪先生、孔约翰先生、郑天增先生、边嘉琨先生颁发了聘书和纪念品。

2月24~28日 本会组团访问日本神户基督教青年会,拜访神户市政府和神户市生活文化观光局,并参观神户青年会学校的体育事工和新建幼儿园等。访问期间,天津、神户青年会负责人就今后的交流和合作进行了探讨。访问期间,访问团还拜访了东京青年会。

3月9日 本会议工分会在河西文静里会所召开第六届第一次组长工作会议,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服务基地工作的开展、义工分会建设、义工培训等工作事宜,并决定在现代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英语角”交流活动。

3月18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参加鹤童老年福利协会理事会。

3月22日 本会议工分会“下营中学义工分队”在蓟县下营中学成立,此为会在志愿服务基地内组建的第一个服务组织。是日,牛冰峰副总干事带领部分义工对下营中学义工分队同学进行了一天的思想指导和技能培训。



6月17日 本会与天津电视台、凯威化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环宇艺谭》栏目在天津电视台文化娱乐频道首播。

6月26日 本会与燕京大学校友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请原SOS国际儿童村村长孟丽华讲“SOS儿童村妈妈的爱”。

6月27日 因受“非典”疫情影响,本会义工分会于4月26日中断了每周一次的义工培训。晚,本会义工分会在河西文静里会所恢复举行义工培训活动。

6月 本会成立“天津YMCA凯威篮球俱乐部”。

7月27日 本会在河西区文静里社区举办“风雨后的快乐家园”消夏晚会。

8月2日 为进一步推进天津群众文化活动,扩大本会影响,本会与天津电视台联合举办了“YMCA杯音乐知识大奖赛”。

8月27日 德国沃尔兹堡青年会总干事一行5人来津访问本会,与罗世龙总干事进行了座谈并参观工兰庄会所。两会负责人相互了解了各自青年会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就事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9月3日 本会名誉理事长、原董事长乔维熊先生逝世。

9月5日 本会所属光华河西培训中心开办第一期下岗职工免费营销员培训班,本期共招收35名学员,共向其进行了20课时的集中培训。通过学习该批学员基本掌握了营销基本知识和技巧。

9月7日 本会所属光华河西培训中心举办的初一至高三年级培训班开课。

9月13日 本会在蓟县下营中学举办“朝阳颂”服务口营活动。在本次活动中,本会义工、同工捐款2400元资助蓟县下营中学3名贫困学生。

9月25日 本会与河西区文静里居民委员会联合举办免费知识讲座开讲,至12月18日先后请来中央电视台评论员何秋田讲《有



关当前台湾的几个问题》；老唱片研究会李恩璞副会长讲《关于老唱片的历史演变》；天津社科院日本所马玉珍教授讲《日本老年人长寿秘诀》；市侨联书记王立子讲《侨联和华侨工作》；天津师范大学扬弃教授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天津市图书馆研究室主任康军讲《一年来的新书介绍》；本会理事、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讲《天津近代教育与本会》。

9月30日 本会在现代职业中等专科学校举办“祖国颂”联欢会。

10月4~6日 河北省“爱心互助”助残志愿者协会组织的“圆梦之旅”残疾人旅行团50余人到天津访问，本会负责接待，并于4日下午与该团随团志愿者举行座谈会，罗世龙总干事向该团领队赠送纪念品。

10月11~15日 天津、釜山、神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少儿巡回画展《我们爱和平》在天津开幕，本次共有110幅作品参展，其中由天津儿童绘制的参展作品共入选30幅。

10月16日 本会老年文学社正式恢复活动，邀请于辉、林忠雄、谢大光等名家前来授课。

10月18日 本会议上分会召开全体执委会，讨论增补执委问题，经全体讨论决定增补鄢慧、沈哲、赵宏一为义工分会第六届执委会执委。

10月30日~11月6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随全国宗教界青年代表人士考察学习团赴沈阳、大连、鞍山、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11月11~1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赴上海参加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会议，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天津、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武汉、西安、厦门等9城市男女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及负责干事24人参加。罗世龙总干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大会发言，与会代表围



绕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环境下“青年会、女青年会的团体宗旨、社会责任和服务项目；公共关系拓展及思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积累团体自身能力建设”三个题目进行研讨和交流。

11月15日 本会协助艺术顾问李华典在天津举行独唱音乐会。

11月29日 本会协助艺术顾问李华典在北京举行独唱音乐会。

12月19日 本会议工分会举行第六届第三次执委会，总结一年来的工作。

12月21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第六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张元龙理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会议，义工分会主席魏叔鹏作了2003年度工作报告，并决定授予何悦等16人“荣誉义工”称号，授予魏叔鹏等21名义工“益人奖”。同日，本会理事、艺术顾问、同工、义工及荣获“荣誉义工”称号的嘉宾共庆圣诞。

12月27日 本会张元龙理事长、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及干事、职员参加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九十周年庆典活动，张元龙理事长在庆典会上作了大会发言。

本年 本会议工分会定期活动41次，召开执委会、组长会3次，坚持到鹤童解放南路老人院服务39次，共计1170人次。

本年 本会经与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协商，决定将本会“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文化进修部”更名为“天津光华河西培训中心”，扩大教育服务范围，更名后该中心可以举办继续教育、职业教育、文化生活、老年教育、少儿教育等多种培训活动。

本年 本会所属天津光华河西培训中心开设各类培训班，共服务7280人次。

本年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今晚报》、《天津广播电视报》、北方网等媒体介绍、宣传本会各项活动共计93次。



本年 本会与北方健康管理中心筹备开办本会健康俱乐部,向广大天津市民提供完善、快捷、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

2004 年

1 月 7 ~ 13 日 本会梁吉生理事、王平理事、牛冰峰副总干事一行 4 人访问韩国釜山基督教青年会,并参观其总部和所属各类服务性工作单位。访问期间,天津青年会和釜山青年会就今后的交流和合作达成了实质性共识,代表团在韩国期间,还访问了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并向该会致送了纪念品。

1 月 8 日 本会与河西区文静里居委会在该社区合作举办“迎新春社区文化建设展”,历时一个月左右,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并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展览获得了广大社区居民和各级领导的广泛赞誉。

1 月 11 ~ 16 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月 25 日 本会议工分会义工到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服务、慰问孤寡老人。

2 月 27 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第六届第四次执委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本次会议,并就义工分会 2004 年工作重点作了重要发言。

2 月 本会在共青团天津市委、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支持和帮助下,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权批准本会光华河西培训中心设立“国家计算机高新技术考试考站”。

3 月 7 日 下午,本会与天津电视台、凯威化工有限公司举办“《环宇艺谭》研讨会”,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天津电



视台崔振江总编辑、高克明副总编辑、《环宇艺谭》制片人倪音海，以及来自京津两地的评论家、电视工作者、观众代表 20 余人参加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对于《环宇艺谭》给予充分肯定，并对该栏目的定位、目标观众、改进意见和市场化运作前景等方面提出建议。

3月14日 本会议工分会在河西区文静里校区举办“庆三八联欢会”。

3月24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第四次全委会。

3月25日 上午，本会邀请天津人艺话剧团许瑞生团长在文静里会所为本会会员、会友作了《天津话剧史》专题讲座。

4月30日 下午，本会在天津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办“缘分天空”联欢会。

4月 本会为庆祝建会 110 周年，开展 110 周年纪念标志征集活动，共收集到义工递交的设计方案近 20 幅。

5月 本会成立中老年书画社，旨在培养社员兴趣，陶冶情操，提高书画修养和审美能力，会所所在地文静里社区、周边社区，以及本会会员中爱好书画的中老年人踊跃参加。

6月7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第六届第五次执委会，会上牛冰峰副总干事作了发言，各执委针对如何调动新义工积极性问题作了讨论，并对执委及各组组长人员分配做了调整，一致推选韩莉代理潘春兰副主席职务，增补谢晓玲、张鹏、孙园为执委。本次执委会议对义工分会上半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初步计划和安排。

6月 本会与天津电视台、天津凯威化工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环宇艺谭》节目组赴土耳其、埃及、意大利、法国等亚欧五国采制节目，并于本年 8~11 月在天津电视台文化娱乐频道播出。

7月9日 本会被天津市河西区马场街授予“建学习型单位先



进集体”光荣称号。

7月10日~8月5日 本会为丰富青少年暑期业余文化生活,特举办“首届免费五子棋夏令营”,并与天津五子棋工作委员会联合成立了“心奕五子棋社”。

7月22~28日 本会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主办“2004 两岸三地淡水环保研讨营”。

7月 老友会开展“本会成立 110 周年征文活动”,老年文学社开展“本会成立 110 周年人物专访活动”,手工编织组开展“喜迎本会成立 110 周年编织活动”。

8月1~3日 日本神户基督教青年会和兵库县青少年本部组织的青少年交流团来天津访问。

8月7日 本会在会所所在的河西区文静里社区举办了“凝聚每分爱”消夏晚会。

8月7~8日 本会组队参加天津首届五子棋段、级位赛,并取得好成绩。

8月10~2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率天津市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赴西藏考察。

9月4~9日 本会议工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青年会志愿服务者向村服务国际营”活动。

9月8~12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在北京参加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 2004 年总干事工作会议。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厦门、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 10 个城市青年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全国协会的总干事、执行干事 29 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事工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商讨了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大会还特别邀请中国科学院康晓光教授作了《NGO 与社会公正》的学术报告。会议期间,



各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北京青年会、女青年会的事工项目。

9月9~11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出席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中日韩青年会联络委员会会议。本次专题会议的主题是“三国青年会在构筑东北亚地区和平中的作用”，议题主要有进一步理解青年会在构筑和平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工作；进一步认识和平运动、和平文化与和平教育；通过建立东北亚地区青年会的网络来增强为和平工作的能力等。

9月18日 本会在志愿服务基地——蓟县下营中学举办“青春在飞翔”服务日营活动。在活动中本会理事、天津讯龙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心宪作了“IT产业的发展”主题报告。在本次活动中，天津眼科医院大夫为该校高年级学生做了眼睛检查，本会艺术顾问、义工，以及该校同学分别演出精彩节目，在演出中，本会将义工、同工捐助的2400元人民币交付下营中学领导，用以资助该校三名贫困学生。

9月24日 本会老年文学社社员及特邀《劳动者》编辑部编辑一行39人赴天津蓟县进行为期四天的采风。

9月26日 下午，本会健康俱乐部与红□房地产共同举办“红□之约”联谊活动，邀请医务界专家、学者30余人到会就关爱生命健康、建立健康住宅等问题进行相关探讨。

9月28日 本会举办“外地在津义工中秋节联欢会”。

10月2~5日 本会心奕五子棋社代表天津市组队参加第三届全国五子棋大赛，共在5个项目中获得2项冠军。

10月9~12日 本会与韩国釜山青年会、日本神户青年会共同在天津启动中日韩青年会《我们爱和平》少儿巡回画展。

10月18~2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率团访问日本神户基督教青年会。访问期间，天津青年会与神户青年会就今后合作发展做了深入探讨，并商谈了有关2005年交流计划。代表团在日期间，还参



观了神户青年会会所、幼儿园,并拜访了兵库县青少年本部。

10月21日 本会老友会、老年文学社举办重阳节联欢会。

10月21~24日 本会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西安基督教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新会所启用典礼。

10月29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第六届第六次执委会,对义工分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布置了2004年第四季度工作,讨论义工培训大纲草案。

11月19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出席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建会95周年庆典。

11月20~23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赴香港、澳门访问。

12月13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第六届第七次执委会。

12月18~20日 澳门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叶培辉、理事萧卓芬等一行11人访问本会,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等会见。

12月26日 本会议工分会召开第七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张元龙董事长、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以及天津市有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会上,义工分会总结了2004年度工作,并由相关人员作义工分会财务状况汇报。本次会议选举新一届主席、副主席和执行委员,并对优秀义工朱彤、谢晓玲等人颁发“益人奖”,授予杨今豪、林放等人“荣誉义工”称号,表彰了张文静、冯宏伟等在本会110周年会标设计征集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义工。

本年 本会部分义工参加2004年天津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工作。

本年 本会议工分会定期活动51次,召开执委会4次,到解放南路鹤童老人院服务52次,服务1560人次。

本年 本会所属天津光华河西培训中心开设各类培训班共服务1800人次。



本年 本会举办免费知识讲座 13 次。

本年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今晚报》、《老年时报》等媒体介绍、宣传本会各项活动共计 159 次。

2005 年

1 月 1 日 本会在群星剧院举办了“纪念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新年音乐会”。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会张元龙理事长致贺词。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天津市政府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处长赵仙飞，市青联副主席、团市委副书记李虹，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韩振起、王怀凤，市青联秘书长翟欣翔，中国音协理事、市音协秘书长黄淑英等领导出席了本次音乐会。本会青友合唱团、艺术顾问、特邀嘉宾、义工同台献艺，共有 400 余名会员、会友、义工、同工观看演出。

1 月 1~2 日 由本会和天思置业联合举办、由耀华中学承办的“YMCA 杯业余羽毛球邀请赛”在津举行。来自天津 YMCA、天津耀华中学及全市业余选手共 200 余人参赛。大赛分为初中组、高中组、成人组三个组别，分别角逐了团体、男子、女子单打、男子、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 6 个项目。天津 YMCA 代表团荣获成人组团体亚军。2 日下午，在耀华中学体育馆举行颁奖典礼。和平区委书记刘福胜、本会法律顾问何悦女士、罗世龙总干事、天思置业张跃总经理出席了此次颁奖典礼。

1 月 21~26 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参加天津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 月 13 日 本会义工分会到鹤童老人院解放南路院进行春节团拜活动。

2 月 20 日 本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参加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第五次全委会。



3月17日 本会举办了“天津青年会老友会座谈会”。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老友会负责人林放及长期为本会免费知识讲座授课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上半年 本会义工分会全年定期活动共计 16 次,义工分会到鹤童老人院(解放南路院)服务 25 次,服务 700 人次。

3月29日 在本会玉兰庄会所召开了天津青年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本会罗世龙总干事介绍了“天津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纪念活动”和“天津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庆典活动日程安排”的情况。此次会议,通过了增补市政协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原市图书馆研究室主任康军、天津基督教会牧师刘炳赫、天津基督教会仓门口堂牧师王颖、天津凯威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玉凯、天思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跃等五人为我会理事。张元龙理事长作了重要讲话,对我会 110 周年庆典活动在组织、安全等方面作了指导。

4月2日 天津联青社例会在利顺德饭店举行。本会理事长、天津联青社社长张元龙、罗世龙总干事、牛冰峰副总干事及联青社社员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例会。会上,牛冰峰总干事介绍了联青社的情况。张元龙社长就联青社今后的发展和加强与国外联青社的交流等方面作了重要的讲话。

4月1日 由本会编辑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正式交付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

上半年 本会所属天津光华河西培训中心开设各类培训班,共服务 800 余人次。

上半年 本会面向社会各界老年人开办的免费知识讲座 7 次,服务 300 余人次。

上半年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今晚报》、《天津老年时报》等媒体介绍、宣传本会各项活动共计 70 次。



后 记

为了纪念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一书,感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会理事长张元龙先生为本书作序。

本会为筹备纪念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早在去年就开始了组稿工作,期间得到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因本书主题所限,论文未能全部收入。编者对有关论文做了某些修改。书中还收入本会名誉理事长乔维熊先生和本会原总干事杨肖彭先生生前撰写的文章。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天津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谨表示衷心感谢。

当我们把这本《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奉献给读者的时候,要特别感谢本会理事吴玉凯先生的慷慨资助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刘晓津社长及担任具体编辑工作的吴锻霞同志,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伟伟教授和本会义工谢晓玲为本书有关内容提供了英文翻译,张绍祖教授、侯杰教授积极为本书组织了有关稿件。刘海岩研究员在美国研修期间,主动为本书提供青年会档案资料,并寄来论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主要由本会理事梁吉生教授策划并始终负责了具体编辑工



作,王吴同志协助统编并承担了大部分编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王建明、本会同工崔胜、傅雁秋参加了有关编辑工作。

由于时间匆促,加之编辑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罗世龙

2005年3月31日